

最后的地主

中国冤案录第三卷

下册

廖亦武 著

目 录

记忆随风而逝	1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上）	6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下）	15
向南，再向南	25
土改受害者康朗罕	32
答案随风而逝	45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	50
事故及后果	58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64
基督徒孙医生（上）	74
基督徒孙医生（下）	83
土改受害者杨自海	92
土改受害者杨品英	99
退休政府官员苴公	106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1）	113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2）	122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3）	127
土改受害者朱家全	133
土改民兵何秀元（上）	140

土改民兵何秀元（下）	150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上）	158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下）	167
寻访未遂	176
再次寻访未遂	183
第三次寻访未遂	190

红色档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227
土地改革记实	236
“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269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286
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	295

记忆随风而逝

好几个月了，我住在苍山的脚背上，眼前是拔地而起的古塔。塔尖刺入的天，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云密布，犹如人的记忆——裂缝般的长廊，从天边外，从浑沌的幼年哇刺延伸过来——继续延伸，雨季就到了，苍山和洱海之间的云团变脸更快，五、六分钟的晴，七、八分钟的阴，风雨交替，来得比扇耳光还猛。每当此时，数不尽的面孔，活人或死人、陌生或熟悉、过去或现在的面孔，就从窗外不期而至，比耳光还薄，比耳光晃动得厉害，逼迫我赶紧低头。

再次抬眼，窗口已万籁俱寂，墨色深重。回到文字里，竟不晓得何去何从。叹息几声，想起《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也这么声声叹息，躺倒在类似我身后的一张床上，半梦半醒地涂鸦，遂成意识流的世界名著。自 20 余岁，我就发誓要啃完它，以领略人类记忆涡流的奥秘，可如今 20 余年又过去了，我不仅没啃完它，且连啃的心劲也流逝了。

再过 20 余年，我就差不多接近自己曾采访过的那些土改老人的晚境，创作记忆之书的 36 岁的普鲁斯特却还留在原地，犹如灰尘密集在古代天空——谁统计过，在几十亿人类中，坚持啃完这个短命鬼的可有 100 人？

凤阳邑是个百年古镇，位于大理古城和下关新城之间的公路边，却极少有外来者光顾。凤阳邑头顶数十米，有座破落的千年小庙，叫法真寺。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一次次去那儿晃荡，与唯一的和尚混成熟脸。后来和尚去他乡云游，接手庙里日常事务的，竟是一个 22 岁的美貌尼姑！经常有一帮男女居士环绕左右，不作什么功课，却其乐融融，状若神仙之游。

我也邀约友人，庙前庙后，凑了不少热闹。一日在下山途中，

巧遇赶牛老者，顺嘴东拉西扯，就套出其名为“金德尧”，73岁，土改那年18岁，家庭成分贫农，曾参加民兵，还奉工作组之命看管过地主，“诉苦，开大会，拿枪托子逼他们交出财产”。

我大喜过望，欲顺势做个访谈，无奈坡路短暂，转眼就拢凤阳邑村口。天已擦黑，分手在即，幸而老者遥指暮色苍茫下的石板小径说：改天你来吧，一问我名字，全村都晓得。

2006年12月11日上午10点，我与刚拍完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像老骥一道，依约重返凤阳邑。经了解，才晓得这是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著名村落，由于马帮往来稠密，曾经十分繁荣——可如今却落得十室九空，原因不是瘟疫，而是长期滥砍滥伐所造成的山体滑坡步步逼近，已经在两三年前酿就屋毁人亡的惨剧。

从村头至村尾，有近千米经马蹄和人脚反复打磨了百年的石板路，锃亮如铜镜。两旁门庭倾颓，荒藤绕墙，我们像强盗一样肆意进退，双臂搂不住的石柱、石梁，以及由云南高原特有的粗砺红土嵌砌的墙面随处耸立，如伤痕累累的顽固斗士，支撑着崩塌或即将崩塌的青色瓦顶，还有笼罩着一片片瓦顶的庞大山丘。老骥屏住呼吸，持摄像机在半人高的败草中游弋，却被隐蔽的砖头绊了一下，屁股嘭的着地，虚惊出一头冷汗。为了给先入为主的蛇和其它爬虫打个招呼，我偶尔掏出美国带回来的山地口琴，呜呜吹几声，引起有一沓没一沓的鸟儿回应。

谁也没料到，如此风景还有人烟！一个身着绿军装的疯子从塌了一半的屋檐下露头，啪地行个军礼，然后向我们查验证件。我们笑了，果真摸出《身份证》。疯子呲出大黄牙，不知算不算笑，却将十几个证件在阶沿上一字排开，计有《身份证》、《士兵证》、《复员证明》、《外出打工证明》、《劳改释放证》、《离婚证》、《独生子女证》、《暂住证》、《病历证明》、《拘留证明》等等，老骥依次拍摄了。我心生慈悲，摸出100元人民币递去，岂知疯子不爱财，竟一把打落尘埃，直令我等俗众无地自容。

躬身退却，记起昨日与赶牛老者的约会，我们就奔村子中段人烟密集处而去。的确，每个人都晓得“老民兵金德尧”，可又指不出具体的出处。磨磨蹭蹭抵达“老年活动中心”，迈入门槛，屋里却是一窝青壮年，正闹闹嚷嚷围住一张八仙桌打扑克，又是四川人发明的“斗地主”。我不禁高声问：你们晓得啥子叫斗地主？没人回答；我又问：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呢？也就是划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中农？还是没人回答。

不过还是安静了片刻，我瞅见有人在挠头皮，似乎在思索；有人悄声嘀咕：陈谷子烂芝麻，哪个记得住哦。

接着我了解到，这些青壮年目前都住在新城下关附近，不知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相约回凤阳邑探亲，因为还有一部分长辈舍不得离开这百年故土，晚辈们隔一阵就返乡聚一下。当然，也有没钱建新房的家庭，就只能提心吊胆地暂居危邦了。

格外古朴的阳光从外面探进来，我们跨出门槛透气，却正巧与阶下闲逛的金德尧老人碰个正着。我急忙迎上前，连声寒暄，不料对方反应平淡，急得我拼出娼妓迎客般的强笑，重拾两三次昨日话题，均被置之高阁。于是我采取迂回战术，厚起脸皮要跟定去“登门拜访”，可人家仍旧笑模笑样地不接招。

幸好我穿过老民兵的肩头，认准了更老的一群——他们都蜷缩在一小块空地里晒太阳。空地中央有一颗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周围是枯草凄凄的老房顶，从相机镜框里看，那一颗颗凝固不动的陈年脑袋似乎就挂在屋檐下，犹如枯涩的果实。我拍了几张照片，来了点感觉，就放过老民兵，冲着最老那颗果实而去。

这是一个戴白框眼镜的长眉罗汉，连头带脚，活脱脱一根千年人参。果然，他叫戴作，公元 1921 年生，属鸡，大理中学毕业，为凤阳邑村年岁最大文化最高之尊者。由于耳背，我对他的初步提问近乎声声呐喊：晓得土改吗？晓得嘛。你家啥子成分？上中农。就是富裕中农，接近富农了。没上线啰。参加过斗地主吗？贫农、

雇农、下中农才有资格，我没资格。大会总参加过嘛。啥子大会？清匪反霸的大会，减租退押的大会，多了。在七里桥乡开会，凤阳邑归七里桥管。清匪反霸枪毙了几个，乡长、团长，副团长、保长……可以详细一点吗？你说啥子？可不可以详细点？详细？晓不得。凤阳邑村4个社，就没有叫“详细”的人。我是说……我听得懂你的四川话，云南、四川、贵州的口音差不多啰。凤阳邑有几户地主？一个社两三户，加起来有十几户吧。斗争他们吗？打他们吗？毛主席的政策，斗垮他们的威风嘛，反压迫，反剥削，劳苦大众翻身做主嘛。你觉得毛主席的政策如何？对的，永远是对的。邓小平的政策呢？对的，永远是对的。毛的政策和邓的政策打架呢？嘿嘿，永远是对的。现在这儿还有地主吗？1979年就揭帽了，哪还有地主。我是说住在本地的。都死了，没死的也搬走了。他们的儿女还在不在？晓不得。老人家指个道，我去找找看。晓不得。晓不得？晓不得。你是不愿意说吧。老糊涂啰。糊涂好哦，糊涂可以长命百岁。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风调雨顺，儿孙满堂，我85岁还不喘不喘不咳，日子好过。

可以当选村中红色秀才了——我嘀咕一句，接着转向左边的老人：

你是哪年出生？1942年。哦，土改那年你才8岁，有记忆吗？一点点。你的名字？杨写。是吗？这位老人家叫戴作，你叫杨写，凑拢来就是“写作”，真有学问啊。都是私塾先生取的。那你在旧社会读过书？启过蒙的。《四书》《五经》学过的。你家不算穷吧？我半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家里剩下爷爷、父亲、姐姐和我，耕种7亩多地，挺辛苦的。后来经常忙不赢，误农时，庄稼收成不稳定，就出租部分给别人。于是到了土改划成分，我家就是“小土地出租”，相当于上中农。你参加过斗地主吗？我太小了。不过也晓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党和政府依靠的都是贫下中农，管制四类分子。怎样管制？打他们，要他们低头认罪，向贫下中农投降。这跟母亲打

孩子一样嘛，说到底还是爱护嘛。地主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毛主席在九泉之下听了可不依哦。哪我不说了。当时太小了，记不得。

日头当空了，好几个老人抬头望望，低头溜溜，作出撤退的样子。我见状有些着急，就站起来伸个懒腰，兜着圈儿搭话。斜对面那个老头也像千年人参，瞅上去与戴作一般大，一般有内容。于是我抖擞精神趋前，嗓门逐渐加大，终于类似轰炸机；可对方如特殊材料造就的桥头堡，永远巍然不动，甚至连眼皮都不抬——原来是个聋子。我只好举起相机，以树杈和蓝天为背景，记录一下他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紧接着的受访者叫杨彪，近 80 岁，不是聋子，可比聋子还不如。成分？下中农；土改？忘记了；斗地主？忘记了；分田地？忘记了。可是你说话还好？说话还好，就是说了就忘了。

说了就忘了？我颇为不满地高声反问，不料周围全都点头称是。无奈之下，我试图抓住最后的稻草——他叫杨吉，74 岁，贫农，当过民兵。我问土改，他干脆答当时不在家，没参加土改。我愕然：怎么可能？他也愕然：怎么不可能？我在下关街上打铁，连凤阳邑的会也没来。我呆如木鸡，陷入木鸡阵中。老骥早已收妥摄像机，拉了我几次衣角，方惊醒一般还魂。

我们如败兵，沿锃亮的石板路走向村尾，残垣断壁接踵而至，阳光如密不透风的红樱矛头扎在上面，浸出了斑斑血渍。爬虫般的攀墙葛藤被大块大块的红色所笼罩，竟燃烧起来。

万籁俱寂的燃烧。幻象的燃烧。我分明瞅见普鲁斯特及其《追忆似水年华》均在虚无的火苗中灰飞烟灭。人心的坟场啊，难怪山体要滑坡。

在 2006 年底的中国，一个村庄的落后记忆就这么随风而逝。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上）

前奏

2007年1月5日深夜，阴雨绵绵，我从北京赶回昆明。松弛一天，与冤案线人孙医生碰面。他刚为一个农村病人动完大手术，面露倦容，可依旧答应按原定计划南下西双版纳。

我内疚不已，本要请一顿饭，弥补少许，可席终之际，人家却瞅空子付了款。罢了，这个谦卑到家的基督徒，有时弄得人浑身不自在。就是怕你不自在，他笑道，我的餐前祷告才免了。

接着敲定，双方于次日早晨8点半在某处汇合。可当我准时抵达，孙医生却不见踪影；半个钟头又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我好生纳闷，因为孙医生的守信近乎刻板，难道……

坐过牢的人，遇事都习惯往最坏处琢磨，于是连拨几次电话，不通。正六神无主呢，孙医生却突然在对面街沿浮现！我大叫一声冲过去，却忽略了环绕他的五、六个泥腿子。稍后了解到，他7点钟就与相约登门看病的农民们打交道直至当下。

我好奇地询问诊费及药费几何？孙医生哑然失笑，指指办公桌下持续动弹的肥料口袋，定睛一认，竟装着两只土鸡。他们非要留下，最后都冲我发火了，孙医生解释道。可我没时间弄来吃，只有送人。

时光倒流啊，我感慨道，好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们就时兴给村里的赤脚医生送鸡送蛋，折抵医药费。

是啊，孙医生一本正经道，那就将这份源远流长的朴素情感，转赠威老师你吧。我吓了一跳，旋即哈哈大笑：可惜时间不够，要不就煮熟当路上的干粮。2007年1月7日上午9点40分，我们登上昆明至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大巴，估计途中要耗去10个小时以

上，所以我一落座就作好打瞌睡的准备。而孙医生始终瞪着双眼。开头我还以为他在西双版纳当过知识青年，如今有故地重游的兴奋，却不知这是人家根深蒂固的毛病。

高速路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汽车飞驰，可感觉上的时间却枯燥而缓慢。我打了好几场瞌睡，惊醒时，孙医生总是及时应答：还早。不禁想起我的六四牢友李必丰和杨伟，还有吴嗣渝，都沿这条路线没命逃亡过。杨和吴成功了，却因是无名小卒，先后在泰国曼谷滞留好几年，躲躲闪闪，跟叫花子或盗贼的处境差不多。杨曾投奔美国驻泰使馆，要求避难，被扫地出门；吴曾投奔联合国驻泰政治难民署，几度申请被挡回，差点叫警方递解回国。幸而两个家伙均得到民运权威刘青、徐文立等人的反复证明，方勉强落脚——而他们的先驱李必丰，越境4次均未遂，有一次，已深入缅甸边境数里之遥，却被缅共的游击队捉住送回，几乎叫边防军活活打死。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多年前就高声疾呼“无权势者的权利”，可直至如今，事实证明“无权势者只有被宰割的权利”。正如我在《证词》里所写：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颠簸了7个多小时，我们在一个叫普文的小镇下车。虽是冬季，高速路两边仍郁郁葱葱，微风暖洋洋的，霎时就洗尽旅途的疲惫。出了收费站，一望无际的香蕉林扑面而来，我们跟在几个傣族妇女的身后，似乎在异国风情里陶醉了几里路，方抵拢普文有些喧闹的镇口——原来有人办喜事，破破烂烂的饭馆里外，至少聚了上百群众。我是改不了凑热闹的顽童天性，可刚嘻开痞子嘴，就被孙医生拽上一辆机动三轮。时间不早了，他说。

同中国若干偏远小镇一样，这种屁股蹦蹦冒黑烟的三轮就相当于都市出租车了。我和孙医生在车棚内相对而坐，弓腰低头如两个

密谋者。街景单调乏味，清一色的两层筒子楼，旧不旧，新不新，洋不洋，土不土，而且垃圾成灾。给人的感觉如十几年没洗脸的老娼妇，还敢大模大样地当门接客。幸而街道转瞬即逝，我们又在大片浸透太阳之血的耕地之间狂奔约一刻钟，才在一岔道口嘎然而止。

继续沿左边的土路深入，就是普文农场 4 中队的地盘。原来，普文镇的过去就是一个容纳几万犯人的超级劳改农场，分 6 个大队；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才逐渐在劳改就业人员及家属的基础上，发展或蜕化成一个普通乡镇。

耕地间的几道铁丝网早已锈蚀，与之勾连、配套的兵营、岗楼早已废弃，因此我们得以长驱直入。最里的平房老化得更快，墙面起泡起壳，瓦顶在阳光的反射下，如大片嚣张的牛皮癣。可占据整面墙的标语显然是新近刷上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羚羊般跳跃着，穿越排列整齐的平房群及臭水沟，我们直趋寻访对象——胡成章、肖秀云老两口的家，正巧在“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招牌旁边。这是和“与时俱进”的大环境严重脱节的居所，隔着水泥晒坝，一边是历史遗留的老寝室，一边是自己搭建的比老寝室还破的厨房。孙医生随意招呼了一声，一家人的脑袋就全部从几道门内探出来。

在交代采访正文之前，有必要将孙医生于途中断断续续的相关叙述拼凑呈现，以便大伙搞清楚来龙去脉。

孙医生的讲述：

98 年以前我就来过，当时胡成章大爷还很健康，很健谈，成天乐哈哈的，一点不像在劳改队呆了几十年。我们一见如故，劳动之余还一起打篮球。大爷的口琴也吹得不错，把我带回在版纳做知青的年代，大爷不是知青，不晓得他跟谁学的。

自土改始，大爷全家就倒霉透顶，至于如何倒霉透顶？他没有细谈，我也不便追问。我们的话题多半是普洱茶，周围的人都说，

大爹懂得完整的制茶工艺，经过他的手调配出的普洱茶，味道就是与众不同。也许有人会说，普洱茶嘛，就是年头放得越久越好，没得什么工艺不工艺，其实不然。我喝过大爹家的普洱茶，那种绵绵长长的口感难以形容，与之比较，市面上卖的那些包装精致、价格昂贵的东西简直就不叫茶。

大爹祖籍镇越县易武老街，那儿从古至今，都是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不大的城镇，几乎家家都制茶，而大爹家更是招牌传了几就代的老字号。大爹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头脑灵活，眼看能将家学家传发扬光大，不料解放了。接着世事沉浮，家族蒙冤，这一家三代不得已从祖籍易武迁徙到流放地普文扎根，转瞬数十年不思茶味矣。

大约前年吧，我向美国来的吴医生推荐大爹的茶，人家很感兴趣，想投资扶持，改善一下他们的贫困处境。可大爹却不行了，我和吴医生千里迢迢赶来，与之脸对脸，他也没认出我是谁。据他 53 岁的大儿子胡俊忠讲，莫提普洱茶，更莫提口琴、篮球，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好半天呢。

老威：这是孙医生，你不认得了？

胡成章：哦，哦，好像面熟嘛。

孙医生：大爹啊，我已经来过好几次。

胡成章：是么？我想想。

老威：老人家怎么成这样的？

胡俊忠：1998 年的一天，我爹正在修理机器，突然之间高血压发作，倒地上了。我们急忙赶过去，抬着送医院。我爹口鼻耳都出血，很稠很稠的血，随手就能抓起来，稍后小便也失禁，红彤彤地淌，浑身还不由自主地抽搐。

医院全力抢救，我们两人一班昼夜监护，我爹深度昏迷 8 天，才好歹有了动静，逃脱鬼门关！12 天头上，我爹就如幼儿一样，

咿咿呀呀，似乎在吃力地学着说话；13天早晨，他能自己下床了，可目光闪烁，变得很生疏，居然问我——他的儿子是谁？母亲进门，也愣愣地叫不出名字。原来他的中枢神经受损，造成绝大部分记忆力丧失。

老威：能恢复吗？

胡俊忠：又过去8年多了，身体倒是逐步好转，能吃能睡。

老威：我看举手抬脚还是显得僵硬，走路也颤巍巍的。

胡俊忠：只有靠打针吃药控制。记忆力嘛，也恢复了一点点，比如孙医生来了，他还是觉得面熟；今天这一两个小时内，做了啥子事，见了啥子人，他暂时晓得。至于明天晓不晓得，就不敢担保了……

胡成章：你们是客人，我咋个不晓得？有时候，忘了，又没忘。

老威：啥意思？

胡成章：比如我原籍易武，13岁就到过泰国；我们家解放前，制过茶，赶过马帮；我的爹很厉害，参加过地下党，打游击，镇反时却遭枪毙了，冤枉哦。我们家好像是商人？我是咋个判刑劳改的？记不得了，混乱了，脑子里如一锅稀饭在翻滚，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我还会吹口琴，在劳改犯中算多才多艺，可现在忘了；我制的普洱茶可以吹牛啰，几辈子的家传啰，也记不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禄劝县马鹿塘山沟里一个老地主，80多岁了，跟你一样失忆，不，一回忆就头疼。

胡成章：我不头疼。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搞不清。嘿，这个医生姓啥子？我又记不得了。

老威：孙医生。哦，老人家，你生于哪一年？

胡成章：有印象，可是想不起了。

肖秀云：他 1933 年生，我 1931 年生，我 12 岁就跟他订婚，16 岁就嫁了。

胡俊忠：这位老师远道而来，不容易，就不要东一句西一句地浪费时间了。家里的血泪账明摆着，父亲失忆，还有我啰。

老威：可你临近解放才出生。

胡俊忠：十几岁开始，父母就不厌其烦地灌输“革命家史”，即使不愿意听，逐渐也烂熟于心了。如今看来，冥冥之中有一种预兆吧？

老威：弄不清。上苍的安排谁也弄不清。

胡俊忠：我们家还保留了一本家谱，从上面看，我们家源于安徽省徽州，不晓得是由于战乱还是戍边，迁移云南。先落脚建水，后转石屏县宝秀镇，直至曾祖父上一代，才扎根易武老城，靠茶叶和马帮生意发达起来，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我们家在茶马古道都算有点名气，可到了祖父胡顺光手里，已家道中落。哦，不止中落，简直就衰败了。曾祖父死得较早，所以祖父小时候没钱念书，几岁就学制茶，并且替马帮赶马。当时的茶马古道，上至昆明，下至境外老挝的乌德、朗塔、打七岭，缅甸的鸣善、景洞、仰光，还有泰国的曼谷。由于祖父长年累月出入边境，加之头脑灵活，因此 20 来岁就会几个国家的十几种方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就更不在话下。有一年，仗着自己是“活地图”的祖父，拿出多年的积蓄，邀约石屏的表弟一道“自立门户”，不料拢橄榄坝时，马群染上血吸虫，全部害病死掉。有啥办法？茶叶不会自己长腿，只能眼睁睁地赔光老本，各自回家。

老威：你祖父算资格的劳动人民嘛。

胡俊忠：大约在抗战前夕，易武的几个小商人合资拼凑一个股份制马帮，他们拉上我一贫如洗的祖父，答应他用劳力换取一份干股。这样，驮茶叶出境，驮洋货入境，拼死拼活两三年，祖父他又

起死回生，有了属于自己的七、八匹马。跟着大马帮走，不求多赚，只求稳赚。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东南亚，茶马古道叫封死掉，马帮赶不成了，祖父就转行做其它生意，波折不大。

转眼到 1948 年，四处都闹共产党。当时在易武最有影响的人物叫王少和，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自石屏宝秀迁到易武，后家道中落。王少和与我祖父年龄相当，经历也相似：打小没念书，去制茶、跑马帮、贩烟土，懂多种方言，做越境生意。不过人家更会走上层路线，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被推举为“镇越县抗日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稍后又当区长和土司代办，最后出任县参议会参议长兼国大代表。

老威：你祖父望尘莫及啊。

胡俊忠：易武多少年才出一个王少和哟！该人家心高气傲，连云南省主席委派的县长也不放在眼里。拿现在的话说，就叫“地方对抗中央”。所有政务及诉讼，都得经过姓王的，才行得通。县长气疯了，出动保安团，以“包庇种烟，武断乡里，任意浮摊滥派，擅理行政司法”等罪名抓捕王少和，镣铐加身，打入死牢。却不料王少和神通广大，居然在狱中与社会各界频繁往来，聚集武装，策划了一场推翻县政权的暴动，将县长和法官都砍了头。

火玩大了，王少和的暴动武装不得不改换门庭，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接受整编。成立了党领导的反蒋的“人民自卫军”，与国民党打游击，代价惨重，连自己的家眷三代 6 口也遭杀害了。一直到 1949 年 9 月，王少和任总队长、李衣人任副队长的“江越支队”才被正式并入“边纵”9 支队；10 月易武解放，王少和终成正果，任镇越县首届人民政府副县长。

老威：这跟你祖父有何直接关系呢？

胡俊忠：我祖父就是王少和手下的经济委员啊。1951 年镇压反革命时，王少和刚率团去昆明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代表大会不久，

正风光呢，不料转眼就被抓了。严刑拷打跟着上，要逼他交代“历史反革命”和“组织土匪武装”问题。

老威：我曾听说整个边纵，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都被定性为“土匪武装”，直到 1984 年才平反。

胡俊忠：等不到了，王少和进普洱监狱才 3 个多月，就莫名其妙地“病死”，终年 50 岁。他的部下，还有地方上与他有牵连的，好几百，全被当作土匪镇压掉。人变鬼，当然不需要平反。你看，我祖父的《平反通知》在这儿，简单几句话，就值一条人命啰。

老威：请说说你祖父的具体遭遇。

胡俊忠：1948 年的劫狱暴动成功后，王少和亲自找到我祖父，拉他入了伙。当时的“江越支队”有 400 多人，军需是个大问题，我祖父当经济委员，说白了，就是负责筹枪、筹粮、筹款。

老威：你祖父的能耐不小嘛。

胡俊忠：他有《华侨证》，还掌握了一个马帮，经常出入法国人控制的老挝和英国人控制的缅甸，贩卖烟土、枪支，轻而易举就能逃过检查。

老威：跟现在的跨国毒梟差不多。

胡俊忠：不一样啰，如今为了干经济，过去为了干革命，个人不会私吞一分钱。我祖父出生入死，也算立下汗马功劳。直到 1949 年 9 月，经过半年改造的江越支队并入“边纵镇江整训总队”，四、五百人缩编为 120 人，四分之三被遣散回家，我祖父也随大流从江城回到易武。

接着云南全境解放，上面派来由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组织学习，大家都还摸不着头脑。有略知共产党政策的亲戚，曾偷偷劝我祖父一起弃家逃命，可当时拉家带口，哪能说走就走。况且老人家有些底气，心想：撇开革命功劳不提，我在本地也算声望较高的开明士绅嘛，大不了再贡献点财产出来。

嘿，这一念之差，脑袋就飞了。1951 年镇反运动，我祖父，以及“江越支队”所有在岗和遣散的人员，都琅铛入狱。

老威：为什么？

胡俊忠：刚成立的镇越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并报上级核准，认定以王少和、李衣人为首的江越支队是土匪恶霸武装，正积极筹备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暴动。

老威：可有证据？

胡俊忠：镇压反革命是有任务和指标的，无处下手？哪先秘密逮捕两个江越支队的成员再说。跟着突击审讯，大刑伺候。两人熬不住，就狗咬狗，引起更多的狗被咬被抓，案子就越滚越大了。啥子“总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啥子“接头时间、地点、暗号”，啥子“纲领和组织系统”，啥子“枪支弹药从哪儿取”，等等，编得活灵活现，其实屁事没有。

老威：几十年后又来平反昭雪啰。

胡俊忠：几百号人，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我祖父是“暴动骨干”，解放前两年就埋在老挝境内的枪支被挖出来，拍了照。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接下来，我们家的财产、房屋也被没收。

老威：“土匪武装”全军覆没？

胡俊忠：凡是有点家底、有点积蓄、有点声望的，都难逃法网，人财两空，亲属还要受几十年的株连；只有穷得就剩一杆枪的，才作为“受蒙蔽群众”教育释放。还是要讲究“阶级原则”啰。

老威：唉，王少和一干人以劫狱暴动起家，最终却死于反革命暴动罪，算一种因果轮回吧。真叫冤枉的是你祖父，47 寿终，人还没活明白。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下）

天擦黑了，最后的晚云如一只断手，拖着斑斑血迹，终于隐没在倾废的岗楼上空。水一般的凉风漫上台阶，我们随即退至室内。孙医生将好几瓶国外的药放在桌上，又低声唤胡俊忠过去，一一叮嘱。而我这厢，肖秀云大妈刚刚提起忆旧的兴致。由于音调低缓，状如喃喃自语，我只好欺上前，将录音机凑拢她的嘴角。而哲学家一般的大爹凝视着门外的夜色，不知在想什么，难道一个失忆的脑袋深处，还有另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世界吗？

灯光昏暗，六、七平米的狭窄空间堆着六、七个人，连身子都转不开。可此刻的氛围却显得鬼魅，似乎还有些我们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在往里面涌。远远有幽幽之音传来，又像歌声，又像脚夫的吆喝声，刹那将我带回童年的乡间，老地主爷爷，不太老的爸爸，与我脸贴脸，如两三堵凑在一块的墙——然而他们是那么远，比我感觉到的幽幽之音更远。

有记忆的大妈继续说着，没记忆的大爹想说，却说不出，他们在一起共了几十年患难，为什么呢？

肖秀云：自 16 岁嫁到胡家，就没过啥好日子。公公是赶马经商的，没种过地，也没地可种，住的是土坯茅草房，家具也比较简陋。稍后有点积蓄，才在易武老街开了个铺面。边疆地区啰，大多数与我们家类似，不特别穷，也不特别富。

老威：我查过西双版纳的整块地图，发现镇越县，也就是如今的勐腊县，与老挝的边界线长达 600 多公里，而且杂居着傣、汉、彝、哈尼、瑶等多种民族，尽管习俗习惯南辕北辙，可共同点是生存不依赖田地，而依赖越境边贸。真不晓得汉族人发明的土地改革在这儿怎么搞？

肖秀云：上面派的工作组一直都在嘞，可是划阶级成分已经1956年的事。

老威：这么晚？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呢？

肖秀云：1951年镇反，随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没咋个搞，好像政策还是学习过。少有人种地嘛，连村长、保长都住茅草房嘛。我们家是小商人，相当于中农。

老威：易武是县政府所在地，地主、富农多不多？

肖秀云：旧政权手头当过官的，有势力的，地方上说得起话的，做得起慈善事业的，枪毙剩下了，不管有没有土地，都摊派个地主给你当。你还敢不要嘞？易武老街的汉族大姓，王、黄、刘，就划了十几家地主。对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先还客气，在政府里安插个职位，可某一天毛主席的指示下达，该翻脸就翻脸，打下去，照划剥削阶级。哎哟，跟我们家也没啥区别嘛！土改之前，他们的房子、牲畜、财产被没收，我们的财产、牲畜、房子也被抢得光光，每次开斗争会也挤在一块。好像反革命家属中，划贫农的也有，你说这个王少和死鬼，牵扯了多少人？

老威：你见过王少和吗？

肖秀云：一条街上的人，与我们家来往多。1948年暴动，杀国民党县官，街坊邻居都去了嘛。脚跟脚，共产党政工队就来了，与王少和他们打得火热，大张旗鼓，同国军干了好多仗。江城县的李衣人又带齐人马，上门搞联合，成立跨县的“江越支队”。

老威：也就是后来的土匪恶霸武装。

肖秀云：公安局搞的大冤案嘞！小小易武，一镇三乡，六、七个村，就杀了100多，连政工队（解放后编入工作队）的人都杀了好些。有的集中杀，有的分散到各村去杀，有的开会公审，有的就黑灯瞎火，一脚踢出去崩掉。血浆子将溪沟都染透了，鱼也喂肥了，白愣愣朝沟坎上跳，可谁也不敢去捡。我记得公公被杀是三八妇女

节以后，清清楚楚的，头天就在几条街反反复复敲锣通知，当当当。胆小的藏在窗后偷看，胆大的就窜上去拦住问：杀几个？更夫横起砸一锤，当！然后爆着青筋吼：6个！问的人猛拍两巴掌，也爆着青筋跟吼一声：6个啊？又是6个！

我们家大小都没睡着，熬啊熬啊，月亮起来了，星星更亮了；月亮没得了，星星没得了。起一阵风，接着就没风，蟋蟀和青蛙倒是吼得狂。公公他们天不见亮就被五花大绑，听说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就押到学校坝子里去。嘿，那口老远就能望见的大铁钟，还是公公他捐款铸造的呢。

老威：这批杀的都是江越支队的游击战士？

肖秀云：有江越支队的，有商人，也有小学校长、老师。都做了冤鬼，30多年后又平反昭雪，没一个有罪！特别是公公，下到阴曹地府，会让国民党的冤鬼笑掉大牙：哼哼，良民不做，帮共产党杀我们，结果报应眨眼就到。

老威：当时你在枪杀现场吗？

肖秀云：屋里躲着嘞，大儿子刚生不久，正坐月子。小脚婆婆还在，胡成章又被抓了，家中就没个撑得起的。哎哟，那口号声嘞，那排枪的砰砰声嘞，吓得我们抱成一团，抖个不止，哭个不止。后来听人讲，是开完会，架到老街外的溪沟边杀的，齐刷刷地倒，全部射成筛子了。哎哟，都是易武街有名望的人物，可不可惜！

尸体是请亲戚帮着埋的，坟包包两三年就平了。究竟在哪儿？以前晓得，现在就不清楚了。易武街周围变化也大，盖的房子也多，估计那么多尸骨都垫了基脚。

胡成章：爹的尸体我没见着嘞，我被关起嘞。

老威：为啥关你？

胡成章：受连累。

老威：为啥受连累？

胡成章：记不得。

肖秀云：他被关了1年多才放，家里就剩婆婆、我、侄儿侄女。大儿子1岁出头就死了，出麻疹没过关，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大儿子是1953年出生的“假老大”。那时候，民兵三天两头来扫荡，屋里啥子都没得，锅碗被砸掉，东西就用树叶裹起，烧熟了吃；床叫抬走了，只好铺几把草，睡地下。多余的布片片都拿走，房顶捅出十几个大洞，漏雨，把我和婆婆都整成了医不好的风湿。哎哟，所以到了1956年土改，我们家已经成原始人，比贫农还贫农，还分了一点点地呢。

老威：也就走个形式啰，因为全国统一的土改已结束几年了。此前这儿搞的“杀人分赃”算是“不叫土改的土改”吧。

肖秀云：瑶族和哈尼族住山坡山脚，刀耕火种，根本就不需要土改；傣族住勐仑、勐腊、勐捧三乡，从古至今都受头人、土司管辖，种不种地没多大关系；还有彝族、汉族，很多人就不会种地，有就吃，没有就想办法弄来吃，哪存在啥子阶级剥削！划完成分，我还找过工作队，我说我们家既然不是地主富农，那么财产就该受政策保护，就该把几年前拿走的4匹骡子4匹马退赔了，损失的东西就算了，哪怕归还两匹骡马也可以。可是人家撵我，还骂我反攻倒算。

胡成章：我又第二次坐牢啰。

老威：还是受株连？

胡成章：放卫星。

老威：放卫星？

胡成章：放卫星放错了。

肖秀云：1958年的事，人家在大跃进，放卫星，《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亩产粮食好多好多万斤，仓库都堆不下。大形势摆在那儿，毛主席在吹，全国人民跟倒吹，到处敲锣打鼓，天天在过节，天天在超英赶美。嘿嘿，你就听嘛，表态附和几句也不打紧嘛，实

在不愿意，就装哑巴聋子嘛。偏偏这一位，开口就说吹牛！

老威：在会上说的？

肖秀云：反革命家属，不敢在会上发言……

胡成章：几个人私下议论，还哈哈笑，我就插了两句嘴，说山药亩产 40 万斤是吹牛，反正吹牛不花本钱。谁知这话传到公安局耳朵里，没几天就遭抓了。

老威：嘿，老人家的思路清晰着呢。

胡成章：检举材料都搜集了一摞。接下来判刑，送到普文。

老威：罪名？

胡成章：破坏大跃进的反，反，反革命，判 6 年，他们打，打我。记得嘛，还拿绳子绑，说，说不成了……

肖秀云：我记得是 8 月初 4，大女儿才 1 个月零 4 天，他就进去了。先转到思茅，最后送到这儿劳改。我喊天都来不及，又搞公共食堂，民兵背起枪，闯进屋将猪也赶走，粮食也掏空，然后宣布：私人不准开伙，谁开伙谁犯法。我的身体都要虚脱了，还得领着儿女，去食堂排队打饭。半饥不饱地拖了 3 个月，食堂就开不下去了，牛皮吹嘛，吹到头来，毛主席不饿肚子，当大官的不饿肚子，就是群众饿肚子。59 年到 62 年，3 年多，人就只有一个想法：找吃。每人每个月，供应 4 斤大米，额外的要凭粮食局的条条。不敢想哦，反胃，难受，那年头啥子不能进嘴？树皮、树叶、蚂蚁、蚯蚓，带刺的藤藤，只要不是毒药，不是大粪。接受不了，身体自然起反应，大不了呕出来。饿死掉好多人嘞，连走路都要小心，免得沟沟底快脱气的人突然翻上来，伸手扯你裤脚。唉，如果没得娘家的父母兄弟接济，我们家恐怕绝户嘞。我爹当时在加工厂，经常弄些带壳的糙米，得舂了才能吃。我天天凌晨 5 点起床，邦、邦、邦，舂到 7 点，才下锅熬粥。吊命嘞，呜呜，吊命嘞。

老威：大妈莫伤心。

胡成章：劳改队也饿死人，我跟牛一样，把铺草都吃完了。

肖秀云：劳改队死人更多，二三十岁的精壮汉子，饿得倒下去，说咽气就咽气。厉害的时候，每天有四、五个人抬出去，埋都埋不赢。几个月，1000人的中队，就少300多。胡成章为啥没死？一是因为在外面养猪，稍微自由些；二是他接了个犁田的美差，他使劲犁得深深的，有时就会翻出鳝鱼、泥鳅及其它活东西，他马上捉住吃掉。后来又偷偷带火柴，设法烧熟吃。

胡成章：1964年，我，我满刑，不准走，留，留在普文农场。

肖秀云：饥荒过了，劳改犯死得太多，大片土地荒起，于是他就留场就业了。1968年，我们也迁过来了。

老威：易武到普文多远？

肖秀云：以前赶马要走七、八天，现在坐车要大半天吧。

老威：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呢？

肖秀云：他回不来，我们在老家又缺劳动力，饥荒熬过了，仍然吃不饱。娃娃们还小，婆婆还在，我一个体弱多病的妇道人家，只算半个劳动力。那时农村是大锅饭，工分大家评，没有全劳动力，工分就低；工分低，粮食就分得少。而且每年还要从基本口粮里，扣除三分之一作为生产队的公济粮。1000斤就要扣300斤。

老威：除开大锅饭就无法可想了？

肖秀云：文革当中，天天闹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连鸡鸭都不敢多养。猪肥了要上交供销社，按国家牌价统购统销，每斤肉返还几毛钱吧。私下杀猪是犯法的，易武下面村里，有家人娶媳妇，半夜偷杀肥猪，办酒席招待亲朋好友，结果还没散席，一窝人正醉醺醺地猜拳呢，公安局就提着手铐子抓人来了。

老威：中国有《杀猪法》吗？我怎么不晓得？

肖秀云：有杀猪政策，可以当作法律的，不过比较轻，违法杀

猪一头，判刑一两年。

老威：70年代末之前，全国所有副食品都凭票供应，每人每月才半斤肉4两油，搞得大伙饥态百出，却不明白城镇居民的肉食是这么来之不易。

胡俊忠：那时我十几岁，正长身体，顿顿喝稀，屙泡尿肚子就空了，扛不住啊。加上书也读不成，小学教室不够，贫下中农子女得优先，我们这种家庭背景嘛，踢回家。

老威：日子没法过了。

胡俊忠：所以要迁过来，普文荒地多，劳改犯填不满，正缺人手，所以敞开接纳就业人员家属。关键的是，这儿除了警察，大家的身份都差不多，用不着互相歧视。

老威：跟你们家类似的外来户有多少？

胡俊忠：如今占农场的一大半了。母亲和祖母先到，我满16岁才招进来当工人。父亲正式的工人待遇是80年代，大约在公安部长赵苍璧讲话之后拿到的。

老威：可你们家是冤案啊。

胡俊忠：我父亲1982年平反，来了个通知，说1958年是错判，破坏大跃进的现行反革命罪名不成立，应予推翻。我祖父1985年平反，过程非常曲折。

老威：牵扯好几百人，当然曲折了。

胡俊忠：1951年镇反冤案是易武的公安局局长经办的，而上级审批者是当时的江城、镇越两县的中心县委书记，姓余，石屏宝秀人。没料到，这位余书记后来也成右派，入冤狱，劳改了20年。1979年刚平反恢复工作，他的一位老表就脚跟脚找上门，也闹平反——原来也是我祖父案子里的苦命人，死罪逃脱，活罪受了几十年。可能是同病相怜，或者是天良发现，余书记当即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还联络当时的公安局预审科长，国务院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等

老干部共同签署，要求平冤。

老威：后来呢？

胡俊忠：王少和的生平正式写入中共勐腊县党史，最先也有我祖父的名字，后来又没看见了。易武老街许多家都接到了平反昭雪通知。

老威：有赔偿吗？

胡俊忠：我祖父 700 元，我父亲 200 元。

老威：两个冤案加一条人命，才 900 元人民币？

胡俊忠：80 年代的 900 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了。

老威：你父亲受你祖父株连，还坐牢 1 年多呢？

胡俊忠：没算。

老威：为啥没算？

胡俊忠：因为没定罪名，就平不了反。

老威：这叫什么话？

胡俊忠：哎呀，以前没定罪名就坐牢的太多了！我家三妹夫是个四川人，1959 年曾在勐养县做工，由于外出手续不全，被民兵扭送公安局，关起来集训，随后又被劳动教养两年——没任何罪名，平啥子反？找哪个平反？唉，老百姓，历朝历代都是砧板上的猪肉，横切竖切都可以啰。

胡成章：横切竖切？可以嘛。无所谓嘛。

肖秀云：啥子都记不得，吃了睡，睡了吃，你当然无所谓啰。

【补记】

告别两位老人已是深夜 10 点多钟，胡俊忠拎起一把大电筒，将我们送出“沦陷的监区”。翻耕过的土地在光柱两旁延伸，弯曲

的铁丝网外，窜跳出好几条野狗，眼睛贼亮，令人回想戒备森严的昨日。果然胡俊忠说，这是进出中队的主路，以前都是几架探照灯来回扫到天亮，除了岗哨，还有牵狼狗的巡逻哨——说不定这些野狗都是狼狗和土狗乱搞，窜的种呢。

我叹息道：人生而自由，你们家却甘愿背井离乡，迁徙此地！注重精神生活的孙医生却抬头望天道：别伤感了，我相信上帝会眷顾这些受苦的人。胡俊忠说：上帝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我也说：我只看见稀稀落落的星星，跟狗眼睛差不多，天空都布满铁丝网啊。人在这个世界真是插翅难飞。孙医生沉吟道：上帝比我们看见的事物还要高，可只要你相信，他就在你心中，你就会得到一种支撑自己活下去的自由的力量。

我们又默然走了一段夜路。胡俊忠方从一堆杂乱平房里唤来一辆屁股蹦蹦响的三轮，并抢先付罢车钱。彼此依依惜别，珍重珍重。十几分钟后返回普文镇，住进一家不用登记《身份证》的旅馆。

出于外科大夫本能，孙医生谢绝了我上街觅食的邀请，立即洗澡。我在路灯暗淡得比鬼火不如的几条街兜了一圈，发现歌厅和发廊依旧敞着门，里面的小姐千姿百态，像植物标本，浸泡在红药水一样的灯光中。而在每个街口，都拥挤着青烟缭绕的烧烤摊。我目光发绿，在摊前流连了三二来回，却不敢贸然点菜——因为周围的饮食男女均为清一色的妓女嫖客，我一个光头和尚，上哪儿落座就餐才不惹人笑话？或者不招蜂惹蝶？

只好在一通宵营业的小卖部购得几包小食品，带回旅馆填肚子。孙医生已入梦了——他长期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却陪我长途奔波，还忍饥耐渴，乱了生物钟。

展开被子细细搜索，查得污渍数点，阴毛两根。没办法，明知此处曾是嫖宿窝点，也只有和衣躺倒。倦意睡之袭来，不料朦胧之间，睫毛上竟浮现梁宗岱翻译的里尔克的诗：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这村里
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
荒凉得象世界的最后一家。

.....

那些离开它的，飘流得远远，
说不定许多就在路上死去.....

向南，再向南

2007年1月8日上午，我和孙医生继续南行，两个多小时以后，即抵达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走在景洪市街头，我心潮难平地四下张望，视野内当然有水桶粗的遮天蔽日的芭蕉树，有傣装妇女，有傣家楼模样的建筑，可跟我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十几岁时，读过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他自己早年的流浪经历：文弱书生，身上没几钱碎银，经常半饥不饱，昏昏噩噩，连一双垫作枕头的旧布鞋也叫更穷的房客偷去。可就这样子潦倒，他还摇摇晃晃地向南，再向南，居然从昆明一直走到西双版纳，还随随便便就出了边境，饱餐异国风情，抵拢缅甸首都仰光。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书，知名度虽然没有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之作《在路上》大，但也等于我们这代的《在路上》了。我八几年的女友某某，与我分手的前夜，还在含泪钻研《南行记》，稍后果真沿着书中指引的方向，向南，再向南。第一次叫边防军给抓住，关了半年的收容所，受够暗娼和毒贩子的折腾；第二次执迷不悟，用倾家荡产的钱砸翻了景洪郊区一傣族野导，越境成功。如今是泰籍华侨，老窝在曼谷，成都也购下房产，儿女都一双了。2001年她曾登门拜访我，相邀进高级馆子，酒酣耳热，她劈头就批判：当年叫你跟我一起走，你死活不，结果呢，栽进了监狱！我狡辩说：各是各的，我坐牢和你越境扯不拢关系。她叹息说：你20几岁就送我《南行记》，可活到这把年纪，还叫共产党绑死在这儿！莫提国外了，恐怕连西双版纳都没去过吧？

接下来的江湖传说是撒娇派诗人京不特，从此地越境去了缅甸仰光，正宗的艾芜南行路线，却在异国街头浪荡之际，被警察抓进监狱，整整泡了1年多。据说曾与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关同一号子，后来却被充着他国劳工，由政府输出到欧洲。一波三折的命运就这

样改观了——如今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乡丹麦，依旧刮一光头，很平和很滋润的样子。再接下来，又要提到我的六四牢友，四次越境未遂的李必丰和已遂的杨伟、吴嗣渝了。李必丰是个老文学青年，80年代就组织过诗社，不幸进了班房，脸蛋已经叫揍成一边大一边小，阴囊也时常蓬勃如馒头了，诗意还没遭受丁点影响。一本《南行记》，更是当作日日必诵之功课，搞得滚瓜烂熟。可如今的下场我已久闻：二进宫合计12年后，皈依基督教，出任包含临终关怀之养老院之负责人——唉，一个曾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偷渡犯，越境之心真的死了？抑或认命了？叫边防军打怕了？

杨伟和吴嗣渝的文学情结没那么重，越境前经常去我家串门，与前妻宋玉打得火热。大约我那本缺了封皮的《南行记》就是被杨伟揣跑的，而吴嗣渝要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国内版及一支箫。他俩自忖身份轻贱，竟与我八几年的前女友如出一辙，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道弃暗投明。吴嗣渝甚至往返西双版纳两三趟，亲入傣家寨踩门路，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他俩在泰国当了好几年“国际叫花子”，杨伟被中国人权的刘青弄到加拿大后，断了音讯；吴嗣渝从2003年至今还呆在曼谷，以下是他个把月前寄来的求援信：

威哥，你好。

前次你给法国玛丽的信是否有回音？记得她只是在一月底给我来过一次信，之后就一直没音信。期间封从德也给她转述过我的境况，但如今都无结果。

最近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泰国军政府强令联合国难民署驻泰机构停止运作，几天前该机构已暂时关闭，据里面的翻译说该机构很有可能撤走。如此一来，连这一线希望都断了，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期盼威哥再辛苦辛苦，看如何来拯救我等！伫候佳音。

还有已去世的蒲勇，已入狱的许万平、佘万宝，都曾经向我谈

到越境，口吻之热烈，更胜于初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名，快将我的耳朵磨起茧子——自 1997 年“香港回归”，自由港荡然无存，在陆地上的“光明暗道”，似乎就只有《南行记》里的艾芜路线了。

向南，再向南，我默念着。耳尖的孙医生诧异地瞟我一眼，说老威你在做诗吗？我笑着反问：你觉得现在的西双版纳有诗意吗？孙医生摇头：我 1974 年从南京到这儿上山下乡，那时的景洪就是一座森林城镇，猴子经常在竹楼间窜来窜去，逗引唱歌的傣族姑娘和小孩，那才叫诗意呵。可现在，这儿一天天变大、变脏，变得跟其它地方一样，满街都是灰尘和劣质旅游产品，连一家正宗的传统傣家楼都难找。

的确，我们穿了几条街几里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水泥建筑。兴味索然之际，我们钻入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傣族村寨。司机回答：傣家寨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品牌，已经集中到郊区，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度假村了。孙医生说：我们就去普通的傣家寨。司机一脸迷惘。我们只好退出，又换了四、五辆车，终于遇上个傣族妇女，愿意拉我们去景洪机场周围碰运气。孙医生高兴极了，称我的下一个访谈对象也在同一方向。“如果能进寨子住下采访，就两全其美。”

相对其它同类城市，景洪市区的车和人还是比较稀少，所以一路顺畅，似乎没拐几个弯就上了机场大路。过了机场的路更加宽广，简直能并行五、六辆车，司机说，沿着这道一直飙下去，20 多公里就抵橄榄坝农场，离边防非常近了。

大道两旁有若干通往傣家寨子的土路，女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认准傣汉两种文字的指示牌，拐入某一条，继续了大约 3 华里，即停车收钱。我们沿着越来越窄的路深入，芭蕉树的浓荫状如深宫，孙医生说，有点当年的味道了。

接着撞上弯弯曲曲的围墙，我们沿墙根绕了两三百米，就从简陋城堡一般的牌坊进寨了。四处都是新旧相间的圆顶傣楼，砖石结

构居多，也夹杂些传统的木竹结构，顶上发黑，如久不冒烟的蒸笼盖子。

我们在这个叫“曼景保”的村寨里转悠了一刻钟，到底有运气，寻了家木竹结构的傣楼住进去。底层约一人多高，犹如地宫，支撑着若干老木头柱子；二楼才是整个家庭的活动场所，蒸笼盖子下的主屋，足有半边操场大，囊括了全家的地铺、厨房、饭厅、聚会厅及细软储藏室。我和孙医生被请入右边霉味扑鼻的客房，拉开两个两尺宽的地铺垫子，孙医生落屁股试了试，叹道：时光又倒流了。

在晒台上吃了一顿地道的傣家菜，有炖鸡、薄荷、本地蔬菜，还有好几种油炸树叶。我们眉开眼笑。紧接着，孙医生挎包出门，为我落实采访对象去。而我则遵嘱原地待命。

游笔至此，正是 2007 年 6 月某日，网上沸腾着因山西“黑窑童奴”所起的众怒，相关文章铺天盖地。来龙去脉是：今年 3 月，两个父母为找回失踪的孩子，去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乡下，他们跑了 100 多家砖窑厂，甚至当众下跪哭诉，仍然一无所获，却无意间发现了黑窑女童的内幕。于是他们邀约了 6 位失踪孩子的家长及 1 位河南记者，用摄像机偷偷拍下种种惨状。稍后在河南都市频道进行了电视曝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 1000 多位失踪孩子的家长闻讯前来求救，100 多位家长亲往山西。

紧接着，400 位被人贩子诱骗或绑架，转卖到山西临汾、永济等地黑砖窑做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论坛发出“泣血呼救”，始而惊动了中央。

我细细端详着黑砖窑的网络图片，那些孩子，最小的 8 岁，最大的也就十六七岁，在打手和狼狗的监视下，出入那些半人高的黑窟窿。长达 19 个小时的超强苦役，已经将他们的浆汁榨干，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具具被泼了沥青的木乃伊插在那里——如此的狠，如此的恶，比共产党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翻身教育”而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更甚。可刘文彩是典型，与其同级别的也就舞台上的

“黄世仁”、“南霸天”；黑砖窑却很普及，光是山西就有上千家，每家均由刘文彩望尘莫及的村支书牵头垄断。

由于成本低廉（一个孩子的出手价才几百块人民币），这样的黑砖窑极有市场竞争力。山西、河北是邻居，从地图上看，离北京的距离不到两厘米，说不定北京疯涨的房地产与此关系密切，搞不好若干奥运工程也是由黑砖头垫起来的——真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泪和血。

朋友一平自美国来信问：是不是中国彻底没救了？人心这么黑，人性这么坏，是不是任何制度都救不了？宗教呢？老威你采访地主，跑过不少信基督教的穷山沟，那儿的情况如何？要好些吗？

我无力回答。本来我想说，黑砖窑令我记起 20 多年前目睹过的“黑煤窑”。那是 80 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的时候，经常随车队从雅安翻泥巴山，去蒙经、汉源一线的小煤窑拉煤。半匹山被掏得如蜂窝，每口窑的出口比狗洞大不了多少，那些大人和小孩，成天四肢着地，爬进爬出，脑壳中央绑着个手电筒，外加孙猴子紧箍咒一般的头圈，屁股后的煤筐车绳子就连着头圈上。计数的监工照样有，出一车煤，领一张纸条，月底凭纸条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历经几朝天子的黑砖窑的伟大进步是：1，添了狼狗；2，添了打手；3，入夜锁死工棚；4，克扣或不给工钱；5，奴隶的年龄更小；6，劳动的时间更长；7，打死人不偿命。

置身如此国度，一个人的神经若还正常的话，都会想到逃跑。连贪官污吏都想逃跑，他们枕着钞票睡觉，却在担心某一天遭遇更厉害的强盗。“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了。要什么宗教呢？拯救谁呢？还是向南，再向南，冒着边防军的炮火，一溜烟冲出边境，冲出东南亚，漂洋过海后，再傻傻地叉腰回头，隔岸观火，裂开大嘴巴忧国忧民吧。

可眼下，我神走了，皮囊却还在原地。网上有一首叫《窑奴》的诗，作者王新旻，其中写道：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他们并没有愤怒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我知道整个中国是一座黑窑我知道这里的人们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钻进地下变成蚯蚓一口口吞食着这有毒的土壤临近黄昏了，孙医生才回到傣家楼，汗水淋淋，看样子累得不行，可还冲我强笑。原来他追寻几年前的记忆，一下午跑完附近 3 个傣族村寨，却吃了无可救药的闭门羹。两个傣族老地主都在去年死了，他说，后人又太小，不知道土改的事。我当然沮丧，本想说，是不是这一趟白跑了？但话拢嘴边又打住。孙医生转身去洗澡，我只得叹息两声，顺手拿本书，落坐嘎嘎响的毛竹露台，望着浸透夕阳之血的无尽的芭蕉林发呆。

就这样干等到夜色笼罩，繁星四起。我们潦草吃了点东西，孙医生的精神头似乎有所恢复。他下意识地抚摸低矮的屋檐，突然说：还有一个线索，在飞机场背后的曼喃村。

好啊，我低落的情绪一下点燃了，可又习惯性地不放心：你确定能找到人？

那就看上帝怎么安排了，孙医生说。那神色如一个有耐心的渔夫，不紧不慢地抛下诱饵：这家地主的故事很惨，父子二人偷渡境外，结果父亲被当场击毙，儿子被抓回来判刑劳改。

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上帝会安排的，我如此默祷，倘若他还叫上帝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留下见证。

这是我所在的西双版纳的夜晚，也是 1949 年以来，无数中国偷渡者曾经魂牵梦绕的夜晚。从这儿向南，再向南，可以走陆路，穿越原始丛林，追至茶马古道的尽头；也可以走水路，顺澜沧江直下，即漂往划开缅甸、老挝、泰国边界的湄公河。人和飞禽走兽一样，生而自由，可边防军的子弹却专门射人，不射飞禽走兽。几天前，接到一位坐过 21 年大牢的老反革命的海外来信，居然邀请我去美国喝酒。他说自己两三年没喝酒，两三月没说中文，每天上班

下班，忙忙碌碌。他说你来吧，带着你的箫，带着你的喉咙，我们像在中国那样，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往死里喝一次，就一次。我回信说去不了，没护照。他顿时生气了，说你这种在牢里自杀过两次的家伙，命已经算白捡，难道你就不会跑到西双版纳，重金收买一个傣族向导，向南，再向南吗？大不了横着躺下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偷渡者横着躺下去了，想想他们在阴间做你的人肉床垫，很软和不是？

可是孙医生，一个朴素的基督徒领我来到这儿，不是让我向南，再向南的。他在这一片乡村巡回行医多年，经常走在界河这边——伸腿就能到那边，可我为什么要到那边呢？

他轻轻地捶着腰眼，他已经很累很累，但依然立在星空下，谈起他永远的偶像——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平凡神迹”。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他说，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我问：对专制社会也不评判吗？

他答：不用评判，因为上帝已经替我们作出了评判。你早就明白上帝的评判，所以你不像其他作家，成天关起门胡编乱造。你一直采访受难的人，没人写的你写，做得好。不管受没受洗，上帝对你这个孩子还是照顾的，满意的。

土改受害者康朗罕

前奏

2007年1月9日，我和孙医生起个大早，结算完食宿费用，便匆匆离开傣家楼，去曼景保村毗邻的几个寨子走马观花一回，然后直奔景洪机场背后的曼喃村。我和孙医生的脚力算旗鼓相当，可此番赶路，却总觉得有无形的东西扯我后腿，才走一个多小时，就嘘嘘小喘了。孙医生奇怪道：精神不好？昨晚失眠吗？我回答：做梦算不算失眠？睡觉前水喝多了，就一直做尿急的梦，就像现在，挪步都很别扭，一掏鸡鸡，跟前就站一堆女的。孙医生笑得杨柳似的，随风弯腰；我却无意间发现自己的裤子穿反了，开口跑屁股上去，难怪走不动呢。急忙捡植物茂密处狂窜，迅疾拨乱反正。不料在暴露过程中，耳边突然炸起一连串可怖的尖叫，原来咫尺间有个傣族大嫂正撩起筒裙出恭！哎呀，这种大洋相，平生真出过不少！路上想问题走神，误入女厕所两回，进去了还在嘀咕：咋个没得尿槽？在劳改监狱里早起跑步，大冷天哗哗淋罢冷水，马猴般蹦个高，卜地朝监区院坝冲，兜了两三圈，猛低头才发觉一丝不挂——此“政治犯绯闻”顷刻就轰动全监。

幸而孙医生不闻不问。君子风度能到这个程度，是要经过长期修炼的——他只是瞅瞅我，再瞅瞅手机上的时间，步子迈得更大。我们接着穿过一段垃圾成堆的土路，才进了曼喃村的寨门。一架客机正巧从我们头顶起飞，动静相当于三四个往远处延伸的闷雷，机尾的强烈气流刮得寨子内外的芭蕉叶子乱晃，连垃圾堆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也被旋起老高，飘飘洒洒的。孙医生叹道：曼喃村的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

继续深入，遭遇了不少牛马及其粪便，然后才是三五成群的傣族村民，妇女居多。孙医生趋前打听，我不懂傣话，就白痴一般跟

着陪笑。曼喃村比曼景保至少要大一倍多，更像现代的傣族小区，在风格考究的傣家传统楼群之间，夹杂着大量潦草搭建的红砖房子；浓荫蔽日的大树下，年岁稍大的妇女在做针线活，而年轻人热衷于汉地流传过来的扑克和麻将。孙医生假装有兴趣地观摩了三五分钟，方绕着矮桌打招呼，竟没人愿意搭理；只好转而去几十米开外的佛寺，企图寻个肯帮忙的出家人，不料金碧辉煌的尖顶庙宇内，虽一尘不染，却空无一物。孙医生站门外喊了两声：有人吗？我则注意到旁边的汉文标志牌，上面用红字写着：免费参观—进入寺庙请脱鞋—女子经期请勿入内。

经期女子就不能拜佛吗？我正嘀咕着，孙医生已经与一个灰衣老者搭上话了。看来有重大收获，因为十来分钟后，我们迎面遭遇了我的追访对象康朗罕——他身着军便服，扛一把锄头，面貌清瘦，显得比较年轻。

他与孙医生十多年前见过两次面，可彼此还清晰地记得。孙医生连连叹息：这寨子变化太大，差点迷路，我还担心和你重逢不了。

于是三人行。绕几个弯进一短墙，再启门入室。两排红砖平房，中间水泥院坝，几间四壁徒然的屋，周围杂草丛生。

没任何声音，连蟋蟀叫也没有，因此他放下锄头的碰撞显得很脆。我注意到他头上有几块俗称“鬼剃头”的斑秃——这是因极度的紧张、焦虑所致。

掏出录音机的同时，我瞅了一眼时间：9点58分。天色较阴沉、闷热。可能是许久没和人谈话了，康朗罕刚开口就呼吸紧迫，语速极快，经我反复提醒，才稍微放慢一点。但尽管如此，我和孙医生的耳朵都得兔子一样竖着，因为必要时，两人要互相翻译、核对。

老威：我听你的话比较吃力，能说慢一点吗？

康朗罕：吃力？人一辈子，干啥不吃力？种地吃力，走路吃力，今天晚上还出气，说不定明天早上就没气可出了。

老威：理解理解，看来老人家活得不顺啊。

康朗罕：就剩孤人一个了，哥哥去年才死，妹妹死了好几年。整个村子，你一路过来都看见了，东一堆西一堆的大人小孩，就数我家清静，空荡荡，啥子都没得，进出都不用锁门。

老威：没养个狗儿猫儿？

康朗罕：养不起。

老威：养不起？这么丧气？你好歹也是地主的后裔啊。听孙医生说，你们家在旧社会也骡马成群，经常赶着越境去缅甸。

康朗罕：我们家是富农，不是地主。这个曼喃村有十来户地主、富农，但是都没活过 60 岁。

老威：后代呢？

康朗罕：后代是些毛崽崽，比我小得多，不记事。今年我 69 岁，土改时候我也是毛崽崽。

老威：土改之前，你们寨子与汉地一样吗？有保长、甲长、族长？

康朗罕：不懂你说什么。每个寨子都有村长，有寺庙嘛。解放前就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家事村事，只要有纠纷，只要化解不了，就找村长；再不行，就去寺庙里听僧人念念经，火气就渐渐没了。傣族都是很平和的，其他民族多少造过反，与朝廷打打杀杀过一阵，只有傣族，能让能忍，就让一点忍一点，因为大家都信佛教嘛。几岁的孩子就进庙念经，既学习信仰，又学习文化。

老威：昨天傍晚我们在曼景保村闲逛，无意中上了佛庙二楼，也见一个和尚再领着两个孩子念经，一遍一遍，很认真。

康朗罕：我不认识汉文，一点点傣文，都是几岁进庙学的。我

们家田地不多，自己种点吃点，骡马倒不少，过去父亲经常伙同寨里其他人，运各种东西到缅甸，再倒腾些东西过来。

老威：边境自由贸易。

康朗罕：对对，多少辈边民都这样，该务农的时候务农，该经商的时候经商。缅甸人也过境，来往多了，就熟了，傣话和缅话混杂着讲，跟亲戚一样，彼此可以随便在家里吃住，家眷也不避讳，寺庙也不避讳，因为都信佛。

老威：哪边界线就成多余了。

康朗罕：过去是这样。国民党不太管，也管不了，可到共产党手里就不行。所以刚解放时，跑了不少人。我们家骡马多，也没搞清楚形势，就留下来。眼鼓鼓盯着解放军来，然后工作组也来。先是傣话不懂，要靠翻译，渐渐能够懂一些，就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情况，将寨子里的穷人组织起来，还劝大家不要去寺庙，新社会了，要搞社会主义，不搞封建主义，要推翻三座大山。村长啦，寺庙的主持啦，在旧政权手头当过差啦，都是三座大山的代表，帝国主义跑了，蒋介石跑了，他们的狗腿子还来不及跑，所以就要打断。要开会斗争他们，要消灭他们。佛教是封建糟粕，是麻醉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烟，念念经就能消除剥削？光忍让就能翻身做主？不行，要靠共产党、毛主席指方向。

老威：嘿嘿，老人家的政策水平不错。

康朗罕：都是十多岁那阵，开会听来的。

老威：哪一年？

康朗罕：52年？53、54年？记述不清了。寨子里天天开会，学政策杠杠，够几条算地主，够几条算富农。越穷越好，进农民协会的都最穷。以前最穷的有寺庙管，有村长召集家家户户，分摊点钱出来管；而今有共产党撑腰，最穷的在会上闹得最凶，这家也地主，那家也富农，哼，地富分子越多，他们分得财产就越多嘛。主

持会议的工作组，有两个是南下干部，还有一个才十八、九岁，奶毛还没褪干净，屋里吵翻天，他们都一声不吭，只是最后才作总结报告。

我们家先叫搞成地主，后来讨论一阵，又评为富农。父母都哭了，还争辩说：就几亩田地，还自己种，顶天划个上中农嘛。可农民协会当场就拿枪出来，拿绳子出来，要捆要杀。说你们家有牲畜，有银子，还瞒得过关？你划上中农，我们该划啥？比贫雇农更低的成分没有。

老威：还算比地主强点。

康朗罕：只是房子没收，其它都一样。按当时的说法，地富分子一条裤子，贫雇农、下中农一条裤子。骡马、猪牛全部赶走，还遭检举揭发。民兵上门抓了我父母，逼他们交浮财，坝子上跪起晒太阳，水不让喝，饭不让吃，还用荨麻条条抽，父母身上被咬得起红杠杠，火燎火烧。还有扇耳光、压杠子、顶石头，去林子里捉蛇来绕你脖子，咬你的乳头。

老威：傣族人也这么狠？

康朗罕：寺庙被关了嘛，观世音菩萨吃不开了嘛，毛主席的像在村子里到处挂，终于家家都挂，寺庙改成开会的地点，也挂，只有地富家里不准挂。满寨子都是民兵，耀武扬威的，见着地主、富农家的毛崽崽，都要撵得鸡飞狗跳。我母亲被吊在门框上，几天几夜不放下来，一只胳膊都残了。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要她交银子。父亲熬不过打，就说她亲手埋的。结果她领着民兵，将以前存的骡马银子，还有金银首饰都挖起来上交。哎呀，那年头，天亮一睁眼，或者还没睁眼，就在想今天咋个过？会发生啥子事？找不找个沓兄藏起来？遇着民兵该咋个说话？

老威：然后呢？

康朗罕：好几个深夜，父母都头抵头，噉噉说悄悄话。母亲还哭，我们懵懵懂懂的，好奇怪嘞，天天挨整，人的眼泪早就整干了，还哭个啥子？我们哪晓得，父亲转眼就失踪了。当时我们三兄妹抱住母亲的腿，要父亲，可她死活不吭气；民兵又上门来抓走她，又吊了几天几夜，人都脱形了，快咽气了，她就是不吭气。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一两年后，她才悄悄告诉我们，父亲越境去了缅甸。正当风头，她怎么敢交代呢？越境就是叛逃，就是反革命，还要连累家属。如果她坐牢，我们三兄妹咋办？

老威：你父亲算有本事。

康朗罕：他在缅甸躲了好几年，那边没搞阶级斗争，他朋友多，还混得走。现在这边也不搞阶级斗争了，边境两边也开始自发做买卖，只要不贩毒，不走私枪支弹药，做啥也可以。

老威：偷渡呢？

康朗罕：有时候卡得紧，不行；多数时候可以，塞点钱，弄个《边境证》嘛。人民币比缅甸好用，如果钱多，不想办《边境证》也行，带着穿原始森林，让缅甸那边来人接。靠得住，傣族人靠得住，不会在境外被抢。可惜我父母都死了，没看到社会发展几十年，运动来运动去，七搞八搞，结果又倒转回去，跟解放前差不多了。只是以前私人有马帮，现在没听说，可能是公路修得好，汽车代替了马帮吧。

老威：是啊，倘若你父母活着，该有九十几岁了。

插记：

交谈刚顺畅一些，门突然笃笃响了。康朗罕闻声迎客，尾随进来的却是两个身挎各种布袋的焦炭色的缅甸男女，操着生硬的中国话，不由分说地往地上摊开一大块花布，然后再自布袋内倾倒出更

多更花的布。便宜的，他们比划道。

康朗罕苦笑着，也冲他们比划：我，一个人，不买。缅甸女人随身兜个圈，指点着每扇关闭的门：有女人吗？叫她们出来。我插话道：没有。对方不相信：真的没有？我点头。对方露出狡猾的笑容：老婆也没有？他的，不是你的。康朗罕激动了，将几扇门嘭嘭全推开：看嘛，没老婆，没女儿，我，老光棍，不做筒裙，不做花衣服，买花布，没用。缅甸人还不死心：老婆，女儿，在外面？可不可以，叫她们，回来？康朗罕生气道：她们在阴间，在阎王爷那里，回来不了。缅甸人眨着眼睛：阎王爷是谁？你，去叫，我们在这里，等一等。

我和孙医生不禁哈哈笑。缅甸人感觉受到戏弄，就粗暴地推了康朗罕一掌，唧唧咕咕一阵，将大堆花布塞回布袋里，走了。

孙医生道：没想到缅甸人也这么走村串寨做生意。康朗罕道：很普遍嘛，中国人过去，他们过来，认识钱就行，世道变速啰。孙医生乘机恭维道：可你还是老样子。康朗罕道：人老啰，搞不到钱啰。种点菜，锄头刨两个吃两个。

我赞同道：锄头刨吃是辛苦一点，可总比动不动就要你小命的毛时代强。

康朗罕默然。跟着访谈继续。

康朗罕：三年自然灾害，西双版纳出产这么丰富，只要肯下力气，水稻都两三熟，可还饿肚子。搞个球的大跃进哦，公共食堂哦，白天黑夜在稻田里，唏哩哗啦打谷子，几班倒，睡觉都在田坎上，稀泥巴几个月都没洗干净。累了还不准吃饱，人家说，狗日的地富子女，凭啥子要和贫下中农吃一样多一样好？大伙每人每顿吃 3 碗，我们就只准吃一碗半。大概到了 1960 年，贫下中农都只能每顿吃一碗，我们就半碗，或者小半碗了。地主、富农饿死好几个啰，

我们不晓得国外是咋个宣传的，也不晓得饥荒的消息是咋个传出去的，总之，父亲在那边，啥子都一清二楚！

老威：看报嘛，人家有新闻自由嘛。哪像中国，三年大饥荒，人饿死好几千万，报纸还在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康朗罕：父亲急了，担心我们全部饿死，就不顾那边人的劝阻，非要回来一趟。

老威：给你们带吃的？

康朗罕：他想把全家人都带出去。

老威：好啊，有远见！如果那时出去，现在回来就是归侨了。

康朗罕：1960年的有个晚上，天黑漆漆的，全家人喝了半锅稀米汤就睡了。一会儿我被尿胀醒，但是夹着不敢起床屙；因为一屙了，肚子憋下去，就更难受。那年我20出头，胃口大，消化力强，跟牛跟马有得一比，但是吃不下草。肚子饿起来呀，不仅脚软，脑袋冒虚汗，而且肉里面，筋里面，都一抽一抽痛。所以哪敢轻易屙尿！正在折腾呢，竹楼就嘎吱嘎吱响，接着就是敲门，很轻，比老鼠打架的声音大不了多少。母亲起身凑拢门边，问谁呀？外面闷了几秒钟，才回答是你男人。

不敢点灯，全家都不约而同起来了，坐拢一处。父亲喘了好久好久的气，才说：都还在？母亲憋了半天哭声，才回答：今天还在，明天在不在就难说了。父亲叹气说：一晃好多年，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可是眼下也不能呆得太久，否则被人发现就坏事了。母亲生气说：哪你回家干啥？送钱呢？送米呢？父亲摇头说：我走了几天几夜，就想回来接你们出去，虽然缅甸不是我们的家乡，但是只要能劳动，就不会挨饿，更不会受人欺负，比家乡强多了。

跟着，全家人都不吭声，只听得楼外的蟋蟀吱吱叫了好久。母亲终于说：这样来去太危险！况且家里还没收拾呢。父亲说：都是些不值钱的破烂，收拾个啥？还是趁着天没亮，马上走。母亲还是

犹豫，父亲急了，就伸手拉她，两人当着孩子们的面，亲了个嘴，母亲即闪到一边说：不行，我不能由着你！这是将全家的命拿去赌博。父亲见拗不过她，气呼呼地站起来说：你不去就算了，崽崽们呢？他们愿意陪你挨饿陪你等死？陪你做永无出头之日的地富子女？

那时我们没见过世面，只晓得偷越国境就是反革命，所以心脏跳得崩崩响，紧张得饥饿都忘了。天色开始朦胧，屋里不冷，父亲却浑身哆嗦，他其实很害怕！像一只挨过打的老鼠，见不得外人，也不敢躲家里。他不由分说地一把拽起我，命令说：老二，跟我走！母亲还要阻拦，父亲粗暴地推开她：我千难万险摸回来，总不能空手而归。我本想说：我又不是畜生，想牵跑就牵跑。可转念一想：人比畜生高些嘛？与其做个命贱的剥削阶级饿死鬼，还不如跟父亲闯荡一回。

老威：唉，你父亲在异乡多年，也很孤独啊。

康朗罕：所以他要拽上我这个儿子。我们这两只鬼鬼祟祟的老鼠，刚刚溜出村口，斜刺里就窜来四个人，一把抱住我父亲，将他老人家吓了个半死。可定眼一认，原来是本村乡亲，地主老少 3 口，富农 1 口。其中某人昨晚无意间瞅着我父亲进寨子，就约齐人马，在这儿候了几个时辰。哎呀，都是活不下去的苦命人，既然撞上了，就一起跑嘛。

老威：3 家 6 口地富分子？称得上是“阶级敌人的胜利大逃亡”了。

康朗罕：胜利个屁，一个都没逃得脱。唉，如果只是我们父子，目标小，或许神不知鬼不觉就跑了；可大小 6 口，还有个 50 几的地主婆，还背了些包袱，就太费事。从曼喃村到橄榄坝，现在是一条大路，20 多公里，坐车眨几下眼就到了。可那时候，还没开垦，四处密密的原始森林，藤子碗口粗，大芭蕉树冲起十几丈。树啊藤啊，根本砍不赢，这几天砍了，过几天来场暴雨，又长起来了，一

道道天然活篱笆，动不动就封路。所以在林子里穿，虽然能避开人，但到橄榄坝就耗了将近一天，还累得人人不鬼不鬼。

歇罢脚，啃罢几个冷饭团子，天就黑了。摸夜路往景哈乡赶，到了景哈就快半夜 12 点了。我们这时还不晓得，曼喃村那边早已炸开了锅——上午吹哨子出工，民兵挨家挨户催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出来集合，结果少了一堆人。这还了得！马上将 3 家剩下的男女老少都绑了，一拷问，就真相大白。立即作为“重大敌情”上报，这边派追兵，那边一连串的专线电话，各乡各寨各单位的党支部、基干民兵，各边防哨卡都通知到了，高音喇叭也反复广播了。

老威：真是天网恢恢。

康朗罕：我们还在瞎窜。地主老两口脚起泡，走不动，父亲还转回头帮他们背东西。景哈过去一点点，景播老寨还没到，我们大概就在这之间的某个林子落入包围圈的。那一刻非常静，路只有巴掌宽，还叫树叶子盖住，所以父亲得边用哨棍将白路印子扫出来，边试探着走，下脚既不能重，也不能偏。正当父亲咳嗽一声，说再走两三个时辰，就拢边境时，天就突然亮了。哎呀，不是天亮了，而是几十根大手电齐刷刷射过来，鱼网一般上下左右交叉。我们顿时眼花缭乱，感觉地震一般摇晃起来。不准动！不准动！到处都在喊，天地、树子、藤子都裂着大嘴在喊：不准动！投降！投降！投降！我的腿肚子抽筋，一下就栽了。可父亲他没栽，而是直杠杠愣在原地，几秒钟，突然，他蹦了一个高，拔腿就跑，树枝随着咔嚓一阵响。站住！有一个枪栓，不，几十个枪栓在嘎嘎地拉，站住！！嘭！嘭嘭！枪响了，接着是哒哒哒，哒哒哒，妈呀，冲锋枪！蝗虫样的子弹在我们身边炸，吓得那个富农直喊饶命，而地主家 3 口早就变成乌龟，抱住头趴地下，估计尿都出来了。

老威：你父亲跑掉了？

康朗罕：倒拖回来了，两个橄榄坝的民兵，一边拖一条腿，从十几米深的林子过来。他浑身稀烂，不晓得被射了多少个窟窿，总

之，用肉饼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接着，他们将这张“肉饼”捆在我背上，拿枪指定我，命令背起走。其他坏蛋就用绳子连成一串，前后绳头都由民兵拽着。没办法呀，没办法呀，我只好背着自己的亲人，也不悲伤，也不流泪，脑袋完全空白。那破罐子一样的头就歪在我的脖子旁，血啊脑浆啊往颈窝里淌，一会儿，我的脊梁就与父亲粘一块了，再一会儿，混着血和脑浆的汗水就从裤裆淌到脚背了。唉，如今我快 70 岁了，想起背父亲尸体那几里路，还觉得挖心一样难受，几分钟前还活生生的，几分钟后就，人生说不得啊！坎没翻过去，只能怪命太软太轻。当时父亲才 40 几岁，真是遭了鬼怂恿，回来干啥嘛。

老威：后来呢？怎样料理你父亲的后事？

康朗罕：不晓得。我们被押回来，橄榄坝的民兵审了，曼喃村的民兵又审，要我交代父亲他说了啥子反动话。啥子都没说嘛，非要交代嘛，不合他们的意就吊起打。眼看活不成了，老子就顺着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越境暴动等等，都认。对对，你妈那个屁，该千刀万剐，父亲反正死了，再大的罪也不可能再死一次。

后来就关进景洪看守所，熬了几个月，每天喝两碗稀饭，把命吊得奄奄一息了，5 个人才判刑。我 8 年，其他都 6 至 8 年，跟着就送思茅劳改农场，分在 6 队。

老威：《判决书》上是什么罪名？

康朗罕：《判决书》？不晓得，我没看到。

老威：没《判决书》？怎么判的刑？

康朗罕：法官说几年就几年嘛。反革命叛逃嘛，对，越境都叫反革命叛逃。

老威：听起来挺吓人的。

康朗罕：啥子吓人？傣族外逃的多嘛。在劳改农场，管教干部

问我案情，我一讲，他们就说：这法官咋这么乱整？瞎逃一气，连国境线都没碰着嘛，这种情况最多教育教育，放回家接受监督劳动嘛。

老威：既然如此，他们就出头为你伸冤啰。

康朗罕：已经成定局了，咋个可能？不过嘛，寨子内是劳动，监狱内也是劳动，管教干部比寨子上的民兵还讲理些，不会动不动把人朝死里打。况且在外面看来，劳改队都坏蛋成堆，我一个富农后代，在成堆的坏蛋里，就是一颗不那么坏的蛋。

老威：老人家真是在哪儿都能生根、开花、结果。

康朗罕：60年劳改到68年，刑满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就强迫留场。稍后普文农场缺人，又从思茅调过去，这一下就种了十几年的蔬菜。混到80年代，领导还不愿意放我走。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我种菜手艺好，又肯下功夫，受过多次表扬，所以他们就舍不得。

老威：我们刚从普文农场过来。

康朗罕：哎呀，那儿原来有14个队，几万犯人；后来改制了，只剩3个劳改队，其他都是我这样的留场人员和家属。

老威：家属？你在普文结婚了？

康朗罕：没有。八几年回家结的婚。当时母亲还在，还有哥哥、嫂嫂、3个侄儿侄女，就在勐养给我找了个本族的。

老威：你那时怕有40几岁？

康朗罕：是啰，人家比我小个十来岁，搞不拢，在曼喃村呆了1年就跑了。第二个老婆是个寡妇，带了两个崽崽过来，吃饭的嘴太多，我不喜欢，她又气跑了。

老威：你的条件也不好嘛，还挑三拣四。

康朗罕：她一去十来年，找不回来了。如今我父母不在，哥嫂不在，妹妹不在，我没有亲生子女，只有自己活。幸好手脚还能动。今天大早，我就去菜地干活，现在和你们聊完天，还得继续——天天这样，除开星期天在寺庙念经拜佛。

老威：往事如烟啊，如果眼下再转回土地改革，依你的状况，恐怕就划不成富农了。

康朗罕：一直穷，一直倒霉，前一阵子还遭了盘“鬼剃头”。他妈个屁，我们家啥子时候富农过啰？

答案随风而逝

2007年1月9日晚10点，我和孙医生自西双版纳返回昆明，乏极而卧，感觉才几分钟就天亮了。恍惚中瞅见孙医生起身洗漱，影子一般飘出门去。接着，市井之声逐渐嘈杂，刺耳的军号也从楼群的另一端阵阵吹响，搅得我这条懒虫不停蠕动，直至下床，将脑袋埋入水池约几分钟，方恢复日常状态。

再度出发已是早晨8点40分，孙医生斜挎一包，精神抖擞地领我下楼，来到一辆咖啡色面包车前。探头一看，车内已堵满各类旧衣物，我们奋力将旧物塞得更紧扎些，以便新人能够坐得比较宽敞。我笑道：教会也做这种访贫问苦送温暖的政府工作？孙医生一丝不苟地纠正：都是教友和病员个人捐赠的，跟教会和政府都没有关系。

接着我们磕磕绊绊穿越了大半个昆明市区，又在通往禄劝县的北郊堵上了。记得2005年底首次去禄劝，就在这地名“王家桥”的烂泥滩堵了1个多小时，数百车辆屁股抵屁股，一尺一尺绕着“施工现场，车辆慢行”的招牌挪移，那种令人疯掉的乌烟瘴气！我从前座回头道：这路大概要修拢世界末日才算完。孙医生解释道：前几天的新闻报道，云南省的交通厅长落马，受贿贪污几千万，据说跟这条路有直接关系。我愧疚道：屡屡出师不利，你受累了。孙医生道：我一年要进出禄劝好多次，已经对烂路产生感情，如果哪天突然换成好路，顺畅了，我会生气的。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对嘛，再烂也是自己的国家！可是一合拢嘴巴，我就想起了宋玉。我们离婚之后，她就从成都来到昆明，在市郊的某个停车场开了个添加黄油的铺子，据说有好几个雇员，生意还不错。没有电话，没有确切的方位，虽然时常有找找她的冲动，也无从下脚。若干朋友建议我，就一家一家，将停车场都寻遍，去争取一个戏剧化的大团圆结局。

甚至有朋友愿意提着摄像机，脚跟脚地记录这一“亲情行动”——然而观众需要看到的场面，我和宋玉不一定需要。那种无能为力的痛是永远的——以其出众的美貌和善解人意，她为什么至今没有再接纳一个能让自己过上安逸日子的男人？反而一意孤行，在弥漫着货车尾气的恶劣环境里谋生？她在电子邮件里，没透露任何现实信息，却一再说，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处，她会首先告诉我——她果真这么做了，今年初她奶奶患晚期肺癌，我依约回成都探望，却没见着她人。

既然世界上有路，既然人长有腿，就得往前走。这是 20 几岁的时候，鲍勃·迪伦教会我的，他唱道：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炮弹要纷飞多少次，和平才会降临？答案随风而逝。同居、结婚、坐牢、离婚、亲情都不是借口，你要往前走，不管遭遇什么，不管伤口多么深，不管你多么想回头，不管你曾经倒下去，没有力气、没有信念再爬起来，你都要记着往前走——“答案随风而逝”又怎么样呢？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成长呀！一个生在家里死在家里的德高望重的榜样，哪怕活 200 岁，也跟没活差不多。你看你看，虽然如今我又成资深光棍，虽然我的胆气和血气都大不如前，可老天毕竟眷顾于蒙昧的我，幼年时通过母亲，少年时通过姐姐，青年时通过阿霞，成年时通过宋玉，持续不断地教育和引导，令我在人心人性如此扭曲的铁血共产社会里，还一步步地学会感动、感伤、怜悯、坚持、忍耐、单纯且源源不断的爱。

无赖政权赋予我的无赖天性也一步步被抑制，这一天我吃惊地发现，嬉皮笑脸的面具裂开了，我在哭，假面具却在笑；我在哀悼，我在祈求六四亡灵的饶恕，我的假面具却在自嘲；我在酗酒，在江湖上瞎混，在虚无的舞台上表演，而另一个我却拒绝着，冷静着，追忆着，跟随着孙医生转穷山沟寻觅陈年冤案。我表里如一吗？我从一而终吗？答案随风而逝。

苍山是一排横亘古今的巨大屏障，自南向北，连绵几十公里；

几十条沟壑由天及地，如阴道，孕育繁衍了此地不同凡响的人类历史和文明。我阵发性地栖身苍山脚背，爬山方便。最近有一个月朗之夜，我在斑驳的树影里穿行，遭遇回族人的公墓，遂乘着酒兴撞入，终于靠住一残缺墓碑坐下来。冷风刺骨，簌簌叶动间似有人语；我打了个寒战，转身端详碑文，纳声雷，36岁。原来是位夭者。

复坐，为了壮胆，我扯出洞箫吹将开来，曲未终，竟闻鬼哭。摇摇晃晃下山之际，月色如一缕缕纱衣，来回拂面。眼前跳动着诸多死人活人、女人男人。母亲父亲、姐姐妹妹、宋玉刘晓波、刘霞周忠陵、蒲勇李必丰、金琴余杰王胖子、还有康正果与他的农村婆娘——为了对这人鬼神混淆的场景有个交代，我随口编了3段歌词：

月夜穿过丛林，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天边传来了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后来我把这命名为《八九悲歌》。由于箫音过于凄切，我改用拇指琴伴奏。反复的演练中我突然明白，第2段写的是刘晓波诸君的下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一呼万应的天马行空的人物，如今动不动就叫共产党堵在家里，数日出不来门，为了什么呢？信念吗？和无赖较劲吗？做软禁中的“自由人”吗？与现实和未来都要发生关

系的公共知识分子吗？

面包车颠簸着，临近中午才拢禄劝县城。刚说熄火吃饭，车却自动熄火，像一堆破铜烂铁摊在路边。小伙子司机反复折腾，无效，只得哭丧着脸说，生意做不成了。孙医生叹口气，就临时打电话给我们都熟悉的基督徒小张，上帝保佑，一下子就通了。10分钟不到，那辆白色面包车及灿烂的笑脸都浮现过来。

于是大家忙活一阵，在两车之间转移旧衣物，孙医生差点就闪了腰，小张急忙让他靠边，并开玩笑道：医生不能出问题哟。孙医生道：我又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为啥不能出问题？

用罢午餐，我们即脱离禄劝县城，朝武定方向行驶。两县相距不过10公里，起先属于同一专区，可而今却分属昆明市与楚雄州。沿途灰蒙蒙，过往车辆密集，但小张车技高超，谈笑间，再狭仄的缝隙也马不停蹄地钻，惹得孙医生直叫慢、慢，安全、安全。武定县城一晃而过，留下的印象仅仅是大大小小的“板扎壮鸡馆”招牌。小张连刹车都懒得点，就杂耍一般旋动方向盘，下坡上坡，往一派苍翠间的山道落荒而去。车至山腰，遇一鸡毛店，我们便下来买矿泉水。孙医生乘机向路边的苗族群众打听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本地，也是云南境内最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家族。中心人物王志明牧师，生于1907年，成年后继承了其父王撒世牧师的衣钵；1969年因坚持信主而被捕，1973年以反革命罪名遭公开枪决。然而，此以身殉教的事迹没被湮没，还传扬海外，令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替他塑像，作为上个世纪10位伟大的殉道者之一，永远并排屹立在大教堂的正门上方。

王志明牧师的儿子至今还是这一片教会的传道者。孙医生一挑起话头，大伙即踊跃作答，还自告奋勇带路。阳光普照，白云悠悠，山梁子犹如天路一般蜿蜒着，层层叠叠通往无尽之处。我们趁着格外好的心情，从车里拖下一口袋旧衣物，分发给在场的群众。眼看着那一张张红土捏成的脸逐渐绽放，并越发灿烂，我们体内的暖意

也越发浓郁。几个参差不齐的苗家孩子都冲我嗷嗷叫，那最小的女孩，大约才3岁，竟激动得放声大哭。没办法，我只好不客气地从小张手中拽过口袋，使劲抠底，终于翻出两三样玩具。我把最大的那只彩色绒布猪塞给最小的女孩，惹起周围一派气势汹汹的谴责，幸而是苗语，我不懂。

其实那绒布猪已经发黑，并多处绽线，显然是城里孩子玩厌了的垃圾。可我能说什么呢？剩在手中的两样东西都不够大。还是孙医生细致，他又从车里翻出两只双背书包，亲自挂上两个稍大孩子的肩，好好学习啊，他鼓励道，那爬满皱纹的笑容圆满极了。

这一插曲延续了十几分钟，我们接着上路。挤在车里带路的苗族男女七嘴八舌地介绍，上完这山梁子，再一路长坡下到底，就拢了。

我盯住窗外，心不在焉地点头；而孙医生已取下眼镜，比目鱼一般扁着身体，神态疲惫。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

前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在造物主的关照中顺坡直下，一溜烟就抵达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路左是基督教的“明恩堂”，洁白的墙，粉红的顶，犹如群山环绕中的儿童乐园；路右则是一条条通向苗族村寨的土坎。我们在村民的指点下步步登高，不过几分钟，公路就在十几米深的藤蔓掩映的脚底了。与我们探访过的所有偏远村庄一样，大人、小孩和狗源源不断地自泥土里冒出来，茫然而友好地笑着。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远远就仰望到本文的主角王子胜屹立在岔路口，在他之上是变幻多端的裸土，以及亘古不变的群峰。

我们如异姓弟兄一般，握手并彼此拍肩。王子胜生于1940年，67岁，身材矮而壮，像扣着大棉帽的土墩子。寒暄之后，他就引领我们再登十几米蛇形土坎，直达西北角的农家大杂院。眼下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猪狗鸡人错落混居，异味扑鼻。王子胜率先推开正门，躬身让客；可客还未入，一只爆鸡婆就咯咯招呼着数十鸡娃喳喳抢入。我于昏暗中挖出相机，习惯性地拍了好几张废照片，直待主角在谦让声中落座，其目光坚定的面部特写才清晰地定格在镜头里。

阳光投进来半截影子，孙医生开始介绍我们的来意，跟着，访谈开始。

王子胜：你是教内弟兄吗？

老威：不是。孙医生是教内弟兄，我听他讲述了你父亲的事迹，深受感动，所以特地赶过来采访。

王子胜：听口音，你不是云南人。

老威：我是四川人，在成都长大。不过云贵川三省的口音应该很接近。我目前是职业作家，也就是说靠卖文为生。

王子胜：不容易啊。

老威：你们更不容易。在眼下人心惶惶的乱世，始终坚持一种信仰真的很难。

王子胜：我们家从老爹（爷爷）那代就信主了，顺着这条血脉一直下来，信主就成自然而然的事。

老威：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啰？

王子胜：记忆中，基督教最早传入本地是 1906 年，教堂设在离这儿不远的洒普山。当时有两个牧师，一个澳大利亚人，叫郭秀峰，一个英国人，叫师明庆，骑着骡子，颠簸了几天几夜，从昆明过来。进入苗寨时很轰动，因为自所谓开天辟地，好几千年，莫提苗人，就是汉人，也没见过长成这样子的。黄头发、绿眼珠、鹰钩鼻子，个头比一般苗人要高许多，所以不管他们到那儿，隔半里路就能望见。

老威：你的描述令我想起了《山海经》，两种相互隔绝的东西突然遭遇，感觉上是很奇异的。

王子胜：自古以来，无论是贵州，还是云南的苗族，都生活在崇山峻岭。刀耕火种，采桑狩猎，比飞禽走兽好不了多少。《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就是招降边陲苗王的掌故。

老威：对，孟获是大苗王，统领各洞苗王对抗蜀汉大军。我还记得书中的苗地瘴气弥漫，汉军水土不服，成天昏昏沉沉，而裹着兽皮、扛着藤甲盾牌的苗兵就乘机来袭。

王子胜：苗族拜鬼神，鬼神却从来没有帮助苗族摆脱被征服、宰割的命运。在旧社会，由于传统的陈规陋习，苗民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烧香祭鬼，遇红白事，更要请端公、师娘来家里，摆道

场，吹吹打打地跳神作法。本来家家户户都穷得刨地坑，可还要铺张浪费，死 1 个人，要杀猪宰羊，请全村人大吃大喝 7 天；尸体要停放 10 到 20 天，臭了，水都从棺材板里往外淌了，还在顾及忠孝的名节，还在顾及鬼神的报应，不愿抬出去埋掉。总之，请神送鬼，端公开口才算数。外国牧师来的那一年，恶性循环到了极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富户。房子歪歪倒倒，一场大雨过后，就塌掉。塌掉就塌掉，将就着住，也没那力气重修。人与牲口同宿，吃喝拉撒全在同一个地盘，穷狠了，还讲究个啥？“卫生”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可结果呢，1 号病 2 号病流行，跟刮风一样，一个村接一个寨，人一片片倒。

老威：什么叫 1 号病？

王子胜：1 号病是鼠疫，2 号病是伤寒。染着就死，根本埋不过来，几个人一个坑也不行。腐烂了还污染土地、水源。端公与鬼神同在，可那时端公也死得差不多了，因为传染病不认你是谁。只有骑着小毛驴来的外国牧师，不提钱，不提端公还是普通人，统统抢救。别人逃出来的地方他们偏要进去，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往你嘴里塞药片；实在救不活了，才低下头，划着十字，在旁边做临终祷告。

就这样，他们的事迹传扬开去，许多死里逃生的人都放弃鬼神，信了耶稣。外国牧师还替大家打井起房子，重建家园；教大家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讲究卫生、认清端公的骗人把戏。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后，他们才讲解《圣经》，教大家做祷告。最后，他们选中了洒普山作为传教的据点，并在那儿逐步修建了云南境内最早的教堂。

从此方圆百把里都有了信靠，每逢星期日，苗、彝、傈傈族的群众就自四面八方聚拢洒普山，听上帝的声音，而平时则在家里或村里做祷告。许多家长领着孩子，让外国牧师取名。我已记不得我老爹原来的名字，只记得“王撒世”这个名字是澳大利亚郭秀峰牧

师改的，意思是丢开尘世的一切去追随主。

老威：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也只有追随主了。

王子胜：我父亲王志明生于 1907 年，也就是外国牧师进来的第二年，原籍富民县东村乡芭蕉菁村。1921 年上禄丰县大菁小学，1924 年被老爹送到洒普山上教会小学，1926 年毕业，受教会指派，先后在嵩明、禄丰两县乡下教书并传教，直到 1935 年回到武定县洒普山，继续在各山村教书、传教。抗日战争爆发，外国牧师受命去别处，我父亲就被推荐为洒普山总堂的传道人，1944 年出任洒普山总堂会长。

老威：据你描述，这洒普山算云南境内苗族教会的发源地，那总堂的范围有多大呢？

王子胜：下辖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 5 县苗族教会，是最大的教区。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全靠骡马，传播一次福音要翻山越岭好多天，十分艰辛。可在父亲的亲自操劳下，教会发展得非常好，据有关资料证明，到解放前夕，仅武定县内，就有 5500 多苗、彝、傈僳族群众受洒普山总堂之感召，信了耶稣。1945 年，父亲他还去昆明翻译编纂了苗文的《颂主圣歌》，这恐怕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诗。

老威：可否讲得更详细一点？

王子胜：我出生太迟，旧社会的事情就只晓得这些。到了新社会，所有的活动都被禁止了……

老威：此地的土地改革是哪一年？

王子胜：1951 年，我 11 岁，记得那年我父亲在昆明受储怀安牧师按立，升任牧师。

老威：储怀安？外国人？

王子胜：中国人，长期住上海。当时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撵跑了，共产党说，洋教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老威：你父亲也算受命于危难之际。

王子胜：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这是自然而然；父亲既然做了多年 5 县教会总堂的会长，神职升迁也是自然而然，不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

老威：我在禄劝那边采访过 84 岁的张应荣长老，他家因为信仰耶稣而被划为地主。

王子胜：我们村子太穷，没有地主、富农，成分最高的是中农，有 3 户，剩下的统统贫农和雇农。按土地政策，我家划贫农，因为信基督，就区别对待，不能分包括田地、房屋、财产之内的任何胜利果实，不准入小社（初级合作社）。

老威：没有地富分子，阶级斗争如何搞？

王子胜：本村没地主，就从外村借来斗，诉苦呀，游田坎呀，打打杀杀呀，除了不准我们基督徒聚会，运动方面的花样一次也没少。当时父亲曾私下叹气：咋个搞的嘛，人家外村好心好意将田地租给我们种，租子也不多，算施恩了，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

老威：没料到你父亲身为苗族教区总堂会长，家里这么贫寒。

王子胜：可精神并不贫寒。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勒令父亲回家种地，于是他就回村里，在群众的监督下踏踏实实地种地，还兼任小队会计。因为《圣经》里讲，身体要顺从掌权者。

老威：作为上帝的牧者，他中止了放羊吗？

王子胜：每日的祷告从未间断，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摸上门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互的祷告紧张张张，完全是地下活动。接着，上面派了民兵，专门看守，逼着父亲交代与外国牧师的的关系，是不是帝国主义留在本地的定时炸弹，等等。没办法，基督徒之间的往来只能中断。1954 年，公安局还以“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的罪名逮捕了父亲，在禄劝县监狱扣押了好几个月。

老威：据我所知，有相当一批基督徒在所谓的解放初期惨遭迫害。

王子胜：父亲在苗族教众里威信极高，加之身体能够顺从掌权者，所以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在严厉镇压的同时，要树一个正面的可以对外宣传的典型。于是父亲莫名其妙被扣押，又莫名其妙被释放，还进入楚雄州政协筹委会。1956年，他竟以牧师身份，任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老威：你父亲有幸成了共产党“三自爱国”的统战工具。

王子胜：这在当时的确比较轰动，《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消息。后来父亲从农村调到武定县文化馆，还当上第一届州政协委员。

老威：帝国主义走狗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了？

王子胜：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始终不放心父亲，父亲也觉得心不在那儿，他一直祷告，求主宽恕。他的人生就这样起起伏伏，虽然是见过毛主席的名人，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叫揪出来，写交代，挨批斗；到了1964年的“小四清”和“大四清”运动，他就被解除一切职位，彻底清除出阶级队伍，重回村子接受监督劳动，好比兜了一个政治荣辱的大圈子。其实他晓得，置身这样的无神论社会，自己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在十字架和共产党，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最终必须要有个了断。他在等待，在逆来顺受，可从不随波逐流。

老威：基督教最著名的箴言是：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

王子胜：是，无论是耳光还是亲吻，都一样。父亲他晓得自己一出生就被选中，将以人子的血肉之躯去重蹈神子之路，上十字架！在荣耀主的同时复活！

老威：后来呢？

王子胜：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涌入家门，抄家打人，我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串游乡。父亲戴着“帝国主义间谍走狗”的高帽子，揪去开万人大会，简直就叫拳头和口水给淹没了。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这样熬了两三年，风浪看上去平静些，造反派忙着打内仗，也顾不上天天上门。父亲借此空隙，又和村里的一些老基督徒串联，半夜跑到附近山洞秘密聚会，手里没《圣经》不打紧，只要心里有《圣经》，就能领受福音。苗族虽然穷，还是比汉族纯朴，毛泽东这种“万寿无疆”的人间邪灵，尽管热闹一时，最终却蛊惑不了本族的心。福音又慢慢在村子里传开，也没人去告密。

可最后的考验到底来了，1969年5月11日凌晨，我父亲被正式逮捕。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王子胜：我一家住在这边，我父母、我小弟一家住在公路那边。你顺着我的手指望出去，教堂的屋顶往上，过那片包谷地再往上，对，就是那座崖子下的草坡。现在草坡间的几个房子已经属于别人，可我们一大家在那儿住了好几十年。后来茅草屋失火，烧得精光，我就搬这边来建房子。我父亲是半夜鸡叫时被抓的，我正在梦中，听见嘭的一声枪响，比打雷还凶，比山崩地裂还凶，我全家大小6口都惊醒了。我急忙拱出门，望见公路边的汽车灯，有两三盏，刺亮刺亮的；草坡周围的电筒光密密麻麻，真的，比阴历七月七的星星还密。又嘭的一声，不是枪声，是门被撞开了。人的叫喊比刀子还尖，可隔得远，这边不太清楚，只能辨出大兵的吼和老小的哭。

我将4个娃娃安顿在屋里，一再叮嘱不要出门。我和老婆往对面没命地跑，公路上码满了解放军，不敢过，我们就远远地绕。可能是圈子兜得太大，还没找那边，汽车就轰轰地发动了；等找了那边，车灯已经移到半坡，在山嘴壳晃两晃，就消失了。

跟着我才晓得，是两个大兵守在外面，另两个大兵踢门进屋。

刺刀上架，子弹上膛，鸣枪为号朝里冲，谁有异常就弄死谁。大兵挺枪直扑父亲床前，刺刀一下挑起被子，甩开，大吼道：不准动！起来！跟我们走！

父亲似乎早有预感，就和平时一样，一言不发地起身。他的内衣内裤都没脱，外衣外裤整齐地叠压在枕头下，所以很顺当就穿好了。脚落地时，当兵的一左一右来扭胳膊，他却轻声说：不用吧，我会跟你们去。接着抬起手腕，让当兵的给自己戴手铐。临出门，他一再回头，用目光暗示母亲，不要有任何举动。可毕竟是生离死别啊，母亲还是忍不住跟出去，叫了一声，当即被当兵的迎胸一脚，踢飞起来，顿时昏厥。

我赶到时，母亲已抬回屋内，全家大小数口正围绕着。她老人家大小便失禁，衣裤全湿。我们忙乱了好久，才听得一声哎哟，算还过魂了。我们替她擦身子，重新穿戴，她却直嚷口渴，喝了好几大碗水——这一来，落下一个心口疼，终身未愈。

而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武定县看守所，长达4年多，直至1973年12月惨遭杀害。**老威**：什么莫须有的罪名？

王子胜：正式宣布的是“5顶帽子”。其一，帝国主义走狗，死不悔改的间谍，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其二，现行反革命；其三，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其四，地主党；其五，红军长征经过禄丰县境时，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真刀真枪地干，亲手打死了7个红军战士。

老威：基督徒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了。

王子胜：全是诬陷！几十年前，禄丰那边的确发生过当地民团与红军交火，双方各有死伤的事，可距离武定这边很远，跟父亲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老威：唉，覆巢之下有完卵乎？

事故及后果

行文至此，老基督徒王子胜的声音突然湮没在一片城市嘈杂之中。我拿起录音机反复检查，又将磁带掏出来重装重放，终于明白，这个访谈的后半截已被永远抹掉了！

廖亦武！你个狗鸡巴！我抬脸冲窗外，好像在骂另一个人，一个盗窃记忆的贼。双耳直鸣，冷汗直冒，猛砸自己的秃脑门，跟戏子一样折腾来折腾去，均无济于事。此前一段，为打出国护照官司，我先后去了成都、重庆、涪陵、北京，辗转 20 多天，才折回云南。好不容易收拢心猿意马，要咬牙切齿干活了，却出意外！十几年，我访谈了 200 多次，这是第一次出这种低级可笑的意外！

稍微冷静，就从桌边败退至床上，平躺着琢磨补救法子。是否如过去搞《底层》那样，凭记忆往下整？我这方面的能力超常，估计读者也很难窥破机关。可是，可是，心里总有一道陡坎，翻不过去。

唉，追寻了 6 年各类冤案，不知不觉，就养成较劲的陋习，自己对自己有“善始善终”的要求了。可却时常贪恋《底层》里那种民间文学状态，无耻、率性、疯癫、麻木，脓血溅得比天高，脸皮厚得比城墙，无可救药如明代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

废话打住，我立即与孙医生取得联系，敲定重访圣徒后裔的时间。2007 年 8 月 5 日，我从丽江赶往昆明，正好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影老骥和四川平武县作家阿贝尔也在孙医生家里，于是相约第二天清早同行。

6 日 8 点半，我们打的斜穿春城西北角，抵达乱得不可开交的黄土坡车站。由于在行进中交谈激烈，竟将背包忘在了车子后备箱里。那可是我跑江湖的全部行头啊，计有：随身多年的洞箫、紫铜转经钵、算盘、口琴、铃铛、拇指琴以及好友岳建一不久前才送我

的特制的坝。此外还包括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本、各类音乐 CD 若干——时至今日，我仍觉得气紧和肉疼，不愿相信真的丢了。

可当时，跟电影镜头一样，才两三分钟，我就回过神，失声尖叫“糟了”。可出租车转眼已绕过一大堆建筑垃圾，消失在气势汹汹的烟尘里。我和老骥情不自禁地抬脚就追，横穿马路时惹起七零八落的喇叭声，可最终只有望尘兴叹。孙医生更是顿脚自责，为什么没养成要发票的习惯呢？

不得不继续打的，几乎跑遍整座城市。先抵门脸气派的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一位边看报纸边答话的女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然后抵门脸同样气派的客运管理处，在一位边看电脑边答话的男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接着，只能如纸人一般飘荡在街沿，面如黑铁，心如乱麻，可既定的生活目标不会因此改变。

咋这么倒霉？老天爷啊，这不跟抄家差不多？你怎么也学专政机器，动不动就收人家伙？我虽属天然戏子，可也没有玩物丧志，耽误码字的正事嘛。

老骥说：都怪某地的狗屁诗人某某，今天不提起他，你的情绪不会这么波动；你的情绪不波动呢，背包就不会忘。

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与 17 年前纠集一拨人搞《安魂》如出一辙，我的第二部实验电影《苍山下》拍完后，拿到某地大学一哥们负责的电教中心剪辑，由于保密好，当时没出任何纰漏。可时隔两三月了，国保警察却突然上门搜查，缴获存放在教学电脑里的《苍山下》原始盘，还传唤、审讯了所有参与与本片后期制作的人员，在当地文化界引发不小的震动——这连锁性灾难的直接祸首就是刚才老骥提过的诗人某某。有一天，几个国保警察请他喝酒，席间称兄道弟，其乐融融。可人家却乘着醉意，突然发问：听说廖亦武前一段来过本地？诗人不假思索地点头。人家接着问：你跟他是一二十年的老朋友，没在一块喝一壶？诗人答：他有事，不想喝。又问：啥子事？又答：做碟子。再问：啥子碟子？哪些人参与？再答：这

个嘛，这样的。唉，不晓得是天真还是糊涂，总之绝对不是故意出卖，诗人搜肠刮肚与警察掏了心窝子，他认为管他干啥的，既然能混到一个酒桌上，就是缘分，就该掏心窝子。回到家清醒了些，隐隐觉得不妙，就连夜给《苍山下》的余党们打电话，通知“警察马上要来”。

我气得吐血。祭灵招鬼，《苍山下》和《安魂》的路数相似，这要放在 17 年前，不又酿成一起反革命集团案？可是社会毕竟进步了，17 岁的孩子正当花季，不可能了解六四屠杀或反右劳改。我虽然为一时愤怒付出“丢失行头”的代价，可还能甩手甩脚地摇摆在外省的大街上。

新买了录音机。重整旗鼓已是中午 11 点。我们返回黄土坡车站，竟目睹售票处内外人海茫茫，我懵头懵脑扎入，游泳似地爆挤三二来回，人都成湿漉漉的肉饼，仍靠近不了任何一个售票窗口。孙医生把住一个彝族妇女打听，原来今天正巧是彝族的火把节，所以在天黑之前，四面八方的人流都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禄劝县城，汇入当地通宵达旦的节日狂欢。

他妈的，这世界和我较上劲了。孙医生刚提议改日再去，我就嚷着“不行”。迂回到站外，正碰上一辆被交警罚过款的气冲斗牛的破面包车，我灵机一动，就妄称“电视台”，对染着满头金毛的司机和售票员进行了短暂采访。老骥端起摄像机，很配合，很唬人。骗局就这样立竿见影，在双方共同谴责交警乱罚款之后，售票女孩答应拉我们一行四人去禄劝的“合理要求”。

在建筑工地和垃圾场之间寻了家烂饭馆，老板自称是四川广安人，紧挨邓小平老家，所以要给我们弄一份老邓爱吃的地道豆瓣鱼。可端上桌的却是老早就砍成块的死鱼，幸好佐料极浓，掩盖了死鱼味，所以我们非但不计较，还乘着旺盛的饥焰，整光了一大盘土豆烧臭牛肉及几盘素菜。在用餐间隙，敬业的老骥顺势体察民情，了解到这家老板曾远行广西搞传销，蚀了 7 万元老本，人还遭扣押，

差点没回得来。“凑了几千元接过这家店，开头生意马虎，可是后来就一直修路，日他妈修了两年多，还在修，把周围的服装店、杂货店、旅馆、茶楼、饭馆都修垮了。老子经过传销的破产洗礼，算最后一个钢铁战士”。

我颇为感触地拍他肩膀：对，死扛、死扛、再死扛，只要功夫深，破铜烂铁也能炼成金子。

下午 1 点，我们的破车终于正式上路了！乘客 5 人，加司机和售票员，刚好满载。途中，孙医生继续给客管处打了若干电话，追问失物下落，均无果。在丽江玩耍的京城酒友余世存闻讯发来几个短信，尽力抚慰。想起他不久前在香格里拉古城酒吧里，观摩藏族艺人热西才让与我的即兴音乐现场，还作了诗文：才让的听众只有我们十几个人，但他唱得认真。尤其他跟老威的配合，更是神奇。二人刚柔相济，一个宏亮时，一个低沉；一个人唱得如丝如线，一个人就唱得如钟如鼓。二人的歌喉都有一种悲绝，但在这雨天并不凄凉，反而有一种神圣、超凡的纯粹性。老外们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似乎在听这异国音乐，又似乎放空了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曲歌罢，大家鼓掌。才让就和老威们进入下一个演奏……

接着是古体诗两首，其一：少年哀乐过于人/老成即兴即天声/言辞穷绝思护法/江湖看尽自造身。其二更有味道：玉树倾折飘零若/三千寻音回向若/万人投宿心怡若/香格里拉一般若。

可如今，演出行头全没了，这一切只能如一个余音绕梁却嘎然熄火的美梦，叫我一腔空落落的。

然而文人的酸劲儿可爱却不顶用，车又堵上了。金毛司机伸脖子打望分把钟，嘀咕道：惨啰，少说前面堆了百多辆车。三十六计溜为上，趁屁股还没被封严实，掉头绕道吧。金毛的聪明才智令众乘客交口称赞，于是就得得意忘形，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滴溜溜地耍开方向盘，将车摆弄得如一头浑身泥浆的公狮子。还夸口道：这昆明周围么，莫有老子不晓得的路，我出不去，胡锦涛也出不去。

可能是吹牛太满，老天爷不爱听，不过十几分钟，车又在另一条路上被堵。金毛继续发挥聪明才智，立即掉头。如此故伎重演了五六回，不仅不值钱，还耽误了大把时间，于是众乘客的交口称赞变成交口挖苦。在昆明呆了多年的孙医生严正指出，与其在岔路上拐来拐去，不如一开头就直奔大道，尽管大道也堵得凶，特别是王家桥一段，可能一堵就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火把节，去禄劝的车流量增添数倍，交警必定也大量出动，没准比平时还疏通得快些。而一旦沦陷于小路，死定了就死定了，交警不会来。

金毛灰头土脸，充耳不闻，最后干脆推开车门下去了。窗外是起伏的郊野，谁也弄不明白，车怎么会驶入这绝望的包谷地，并且还首尾相接，好几十辆呢。昨夜才下过雨，泥路坑坑洼洼，迎面过来的一辆小面包，错车时轮子偏了十几公分，立马如慢镜头一般，缓缓朝土坎下倾斜。渐渐，在人民群众的惊呼中，车体打了半个滚，右前轮悬空而起。

接着，司机和乘客如狼狈的庄稼，从朝天车门内接二连三地生长出来。我探出脑袋，望见我车热心的金毛已加入抢险行列，还奔前奔后，指挥对面一辆一辆倒车——仅此一项，就足足折腾了大半个小时，然后才是敌退我进。教训横在眼底，所以每次错车，都有三、四个司机停车出头，充当义务交警。日头偏西了，我不禁叹气道：这大约是老子 2007 年最不顺的一天。

孙医生道：没关系啊，今晚回不来，住禄劝也行。

我学基督徒的样子，低头祷告：主啊，您在考验我老威的信心吗？逗得孙医生哈哈大笑。

下午 3 点 40 左右，路到底打通。久困的车子立即撒开车轮，没命狂奔；我们在车内持续摇晃、蹦跶了 1 个多小时，禄劝县城居然就遥遥在望。老骥道：这哪是开面包车，简直就是开超音速飞机！话音未落，连人带座位就跳将起来，脑壳猛射车篷，回落时还把我的脚背压了。此起彼伏的哎哟惨叫，金毛司机却丝毫没受影响，一

转眼，车站就到了。

4人车费120元付罢，接着又花100元，雇同样的面包车重返几十里外的楚雄州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由于遭遇太多挫折，我已习惯性地往坏处琢磨：万一王子胜老人不在家咋办？病重咋办？

快6点了，火烧云笼罩着天空和大地。我们在教堂对面靠边停车，又落脚在大半年前落过脚的红土上。这边走啊——我轻车熟路地招呼大伙，内心却暗流涌动，感慨万端。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前奏

2007年8月6日傍晚，我们一行4人，风尘仆仆地再次造访67岁的圣徒后裔王子胜，不料迎头撞上铁将军把门。围绕这陡坡间的陋居，屋前屋后寻罢一圈，回头向村民打听，才晓得老人在山腰伺候包谷地，早晨就带饭出门，至今未归。于是在爱好运动的孙医生的提议下，我们沿着村中蛇形坡道，开始新一轮跋涉，与若干苗族男女及牛马狗擦肩而过。出村尾，在暮色苍茫中大约爬了七、八分钟的红土坡，竟望见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天而降！不，像一块土疙瘩，从群山皱褶里滚将出来。

彼此都笑脸相迎，零距离接触时，孙医生顺势接过老人肩上的锄头，我则迫不及待紧握他的手，感觉捏住了大块磨刀石。边走边交谈，没想到时隔大半年，老人对我们的印象已经淡漠，我一再旧事重提，他才苏醒似的，猛捶一把脑门，大叫一声“你是——”，却没下文了。

老骥一路拍摄，老人瞥见机器冲着自己，就把腰板挺得笔直，步履坚实，说话也中气十足。“天上，地下；过去，将来；中国，外国；所有荣耀都归主”。

我频频点头，如这位矮个子传道者的应声虫。拢家之际，太阳刚好落山，天穹间突然浮现出交叉的彩虹。我虽然神经兮兮，对自然异象兴趣浓厚，可时不我待，只能不管不顾地挖出录音机。

屋内黑咕隆咚，开灯又昏暗不堪，老人就随我和孙医生在外面陡坎边坐下，连擦好几把汗水，谈话就在雨后蚊虫的大肆袭击中开始。

老威：对不起，又来打搅你了。

王子胜：贵客啰。神的旨意啰。

老威：上次的采访出了点问题，录音被抹掉半边，所以这次从断掉的地方开始吧。

王子胜：好的。

老威：上次讲到你父亲王志明被抓，以后呢？他关押在哪儿？

王子胜：武定县看守所。

老威：4年多都没换地方？

王子胜：是的。

老威：能探监吗？

王子胜：能，但是见不着人。送衣服可以，送吃的不可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时代环境不一样，我们经常忍受革命战士和群众的打骂，什么“你老子信上帝，那么坏，你咋个还不同他划清界线”；什么“上帝不是人民救星，只要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人民救星，你们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共产党”；还有什么“你老子是上帝的走狗，为啥还要送衣服呢？上帝与狗都是不穿衣服的”，等等。故意让你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他们就有了打你斗你的理由。其实完全不用找理由，作恶是没有理由的。

老威：对，撒旦统治中国也是没有理由的。

王子胜：但是我们有信靠，明灯就在心里。按政府方面的说法，本来像我父亲这样“罪大恶极又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是不允许同亲属见面的，可考虑到我们是少数民族，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特别批准见最后一面。

老威：你们晓得能见最后一面？

王子胜：我们，不仅家里，还包括村里的基督徒，天天祷告。自父亲被抓，就天天祷告，有感应的。对上不上十字架，有感应；

对之前和之后会咋样，也有感应。

老威： 是么？

王子胜： 父亲是 1973 年 12 月 29 号被杀害的，提前一天，民兵就上门通知了。于是全家十几口倾巢出动，紧赶慢赶，走了几个钟头，才拢武定县城。经过几道关卡，终于在高墙内看见了朝思暮想的父亲——头发全部熬白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挪步子，就唏哩哗啦，脚杆打飘。把全家人心痛得哭啊……

老威： 你父亲戴着镣子？

王子胜： 几年的脚镣手铐，到死才解下来。

老威： 跟杀人犯同种待遇。

王子胜： 全家人都拉住他哭啊，可候在旁边的公安人员吼了声“不准哭”。我们只好顺从掌权者，忍住了。人家又吼：来了这么多人！咋个说话？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快点，时间有限哦。

母亲就对父亲点头：你能讲，以前都是你讲，我们听你的。

父亲会意地笑了。接着拿出当牧师的威严，开口道：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向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老威： 这个“上面”就是上帝了。

王子胜： 对啰，信撒旦的不懂，信耶稣的一听就懂。接着是第二句话：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第三句话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

老威： 这三句话的语气似乎都出自《圣经》。

王子胜： 我们听得很温暖，因为后两句话，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父亲都一直在说；父亲之前的老爹，以及为老爹取名的外国牧师，也一直在说。我激动得又哭了，我说：爸爸呀，我们会好好听上面的安排！可是家里那么多娃娃等你养育，你改造不好，娃娃们就等

不着了——这个意思是，爸爸呀，上帝安排你做牧师，做教会的领袖，你可晓得还有多少羊群等待着牧羊人归去？

我妹子接着说：爸爸呀，到了这一步，我只是舍不得你的子拜！

老威：啥子叫“子拜”？

王子胜：就是子弹。意思是子弹明天就要穿过去，我舍不得。她说不下去了，却没料到，就这一句含混话，大家都听懂了。四周顿时鸦雀无声，连人保组、公安局和端枪的大兵都埋起脑壳。也许他们在想：这个无罪的人啊，却不得不死掉。

老威：唉。

王子胜：我母亲拿出 6 个鸡蛋，忍住眼泪说：我是你的女人，没有公话。这些鸡蛋已经煮熟了，你收着吧。我父亲叉开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她，然后接过鸡蛋，留下 3 个，再还给她 3 个。

老威：这是永诀的祈祷，血十字前，分出两个三位一体。不禁令人记起苏格拉底两千多年前的临终箴言：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去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王子胜：我们都明白。这时候大兵过来将我们隔开，公安人员站在父亲和我们之间大声宣布：王志明已经被判处死刑，定于明天公审公决。遗体由政府处理，你们不用过问。

老威：为啥不用过问？

王子胜：我们再三请求，公安人员才继续宣布：王志明死有余辜，革命群众强烈要求，用炸药将尸体彻底销毁。所以你们可以不去大会现场。

我们大吃一惊，就连声求告政府“手下留情”，让我们收尸，并保证不立墓碑，不弄任何显眼的标记，不给社会造成丝毫不良影响。可人家摇头说：哪个晓得你们会利用死人搞啥子名堂？苗族历来是宗教迷信的重灾区。

父亲被押走了，我们还不走，坚持要收尸。公安人员火了，叫大兵把我们赶出监狱。没办法，作为基督徒，要顺从掌权者，我们只能含悲赶回村子。天已黑了，信主的群众，好几十人，还候在公路边。弟兄姐妹们一听要“炸尸”，都流泪。大家约定，当晚全部在家中祷告，求助于神，制止毁尸灭迹的革命行动。

老威：结果如何？

王子胜：我们祷告完就睡了，可能因为太累，连梦都没做。第二天大早，大队突然来民兵通知，叫我们准备马车，赶到武定县第一中学大操场参加万人大会，“拖反革命分子的尸体回家”。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来不及生火做饭，揣点干粮，借辆马车就往县城跑，嘴里一直在悄悄哼《赞美诗》。抵拢会场，那个拥挤哦，那个口号哦，那个红旗招展哦，如开锅稀饭，人脑壳比开花的米还密，感觉是全中国人民都团结到这儿了。当时接受公审公判的有四、五个阶级敌人，除了我父亲，其他都判有期徒刑。

老威：四、五个反革命吗？

王子胜：不，是其他罪名，弄来陪我父亲的杀场。我们的马车一到，几个大兵就围过来，枪筒子指着喊：不准动！双手抱脑壳！蹲下！于是我们就蹲在马车旁边，背对会场，像瘟疫一般，与革命群众隔离开。

老威：你父亲呢？

王子胜：两三百米远以外啰。开会当中，大兵一松懈，我们就起来透过人脑壳缝缝打一下望，认清楚那个戏台，上面坐着两排领导，台前搭一架子，父亲站中间，左右是陪杀场的，全部五花大绑，挂黑牌。宣布“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又有几个大兵一拥而上，将父亲悬空顶起来，向广大人民示众。青天白日啊，整个会场却刮起一阵阵狂风暴雨。想想看啰，武定县多少公社？就算一个公社来几千，聚拢都是好几万。几万个拳头高举，几万个喉咙高喊：打倒！

砸烂！万岁！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切反动派垮台之时！

老威：疯了疯了。

王子胜：示过众，他们又朝父亲后颈窝插亡命标，多半个人高，5个罪名都在上头，“王志明”3个字打着红叉叉，很醒目。接着，父亲就被弄上卡车，游街示众。前头两辆小车开道，后头满满一车大兵压阵，架着机枪，上着刺刀，绕城个把钟头，才拉到武定郊区原先的小飞机场去打掉。

老威：你们可跟去了？

王子胜：枪指着，根本动不了。等群众差不多散了，大兵才吩咐：乖乖随我们走，要听使唤。于是我们牵起一条线，被大兵押到看守所门口，父亲坐牢的铺盖已经扔在那儿，一个公安说：反革命的破烂，领回去吧。

老威：谁为你父亲收尸呢？

王子胜：同村的。等他们赶起马车，跑拢飞机场，父亲已经倒在地下。好几百群众围观，乌鸦鸦的一片。赶车的站在车头使劲摆手：收尸！收尸！人墙就自动闪出一条夹道。还剩一个大兵在里面守候，问了句：是不是他家里人？回答：是。大兵就吆喝道：走开走开！打得稀巴烂的死人，有啥子看头？快让人家早点收拾。

拉起尸体，他们来与我们碰面。我拿毛巾给父亲擦脸，妹子用铺盖掩住他老人家。这是1973年12月29号的下午1点，天非常蓝，阳光非常好，几万群众渐渐散去，街道渐渐敞开了。马车载着父亲出了县城，嘀嘀哒哒朝家走，比步行还慢，我家来的7个人就干脆左右相随着。一路看见雀子飞，听见雀子叫，竟觉得父亲的呼吸还没有停止。

沿途都有一些苗民拦住马车，向父亲道别。老的，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还有小孩。绕过山梁子时，有个小女娃娃竟然爬上车，掀开铺盖，将我父亲从头摸到脚。嘿嘿，我们不由自主微

笑起来，暂时忘却了悲伤。

走走停停，太阳落坡才拢村子。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迎接。感谢主啊，父亲的遗体一直很软和，从倒下去，到抬上马车，到拉回来，到天黑，到半夜三更，一直同活人休息差不多，脸有血色，皮肤有弹性，肚子还热乎乎的。那个关口上，干部和民兵从早到晚严防死守，只有到夜里 12 点以后，确定“那些人”睡着了，信教群众才一家接一家，陆陆续续摸上门来，做道别祷告。

老威：来过多少人？

王子胜：至少七、八十。在沟坎上溜，又不敢打手电，跟夜游神一样。大概过了两点，最后几个弟兄做完祷告走了，我们伸手摸父亲，才感觉身体发凉，手脚变硬了。

老威：的确算黑暗中的神迹。

王子胜：荣耀主，感谢主。

老威：他说该有光，就有了光。

王子胜：天刚蒙蒙亮，我和哥哥、弟弟、妹夫一起上坡，看好岩坎下的一个地方，就吭哧吭哧挖洞。一两个时辰，弄得差不多了，我们才返回家吃早饭。接着把墓盒（你们汉族叫棺材）先抬上坡，放进洞里，再回头接遗体。

老威：墓盒与遗体分开抬？苗族风俗吗？

王子胜：不是。怕苗民动乱，军车大清早就开过来了。大兵端着枪，满坡守起，明令除了死者家庭成员，任何人不准接近。当时本村外村好几十人，都自己跑来，原准备搞个下葬仪式，眼下却只能相隔几百米，傻傻望着这边，干着急，帮不上忙。遗体带墓盒，至少要 8 个劳力才抬得起，可家里只得 4 个劳力。我们试了几次，还喊了号子，都不行，只有分开运送，人最后钻进墓洞去封棺。

大兵一直守到土盖完，坟包垒起，我们下山拢家门了，才吹一声哨子，跑公路边集合报数，上车回城交差——其实他们巴不得溜

快些，因为明天就是新年。

老威：1974年元旦。我十几岁。毛泽东、周恩来都病入膏肓，文革快搞不下去了。

王子胜：感觉得到。因为过了不久，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村子里又恢复聚会做礼拜。政府发现了，就派人来召集苗民开会，教训道：枪毙反革命分子没几个月，你们不仅不划清界线，反而敢秘密聚会！真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谁带头的？站出来。于是我就站出来。

我是1976年初被正式逮捕的，扔进武定县关过我父亲的监狱。他们说，我比父亲更坏，更不可救药，因为父亲的犯罪还有历史原因，我却属于明知故犯。开头4个月，我都关在禁闭间，两三平方米的黑屋子，水泥地，就一个洋瓷碗一个马桶，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跟狗洞一样。

王子胜：不如狗洞，因为始终不见光。只有等个十来天，马桶厕满了，才允许喊报告。大兵先撬开巴掌宽的监视窗，捂住鼻子瞅一瞅，再开门叫我出来倒屎尿。天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朦朦胧胧挨近茅坑，还得竭力稳住脚跟，提防腿肚子一软就栽下去。回到黑屋，眼珠子酸疼，要流好久的泪水才重新适应。

老威：屎尿味薰的？

王子胜：嗅觉已没有了。这人嘛，在茅坑上关多久也不会薰坏掉，可不能长期不见光。植物不见光一会儿就死，动物嘛，最多熬十几天，就要发疯。

老威：人在黑暗中不发疯，是因为有思想和意志。

王子胜：有上帝啊，他说有光就有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族共计7人蒙难。父亲遭杀害。二哥王子华，当时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任院长，也受父亲株连，叫造反派揪出来。因为忍受不了批斗毒打，就投怒江自杀。大哥王子荣，与我同时继承父亲

衣钵，为传道人，后来我们同时被捕，同时判刑，同样的 9 年刑期，同时释放——只是判刑后，我送姚安县监狱改造，他送禄劝县里面的草海子农场改造。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姨、四姨和老孃，她们是父亲的亲生姐妹，住在外村。后来二姨和老孃判 5 年，四姨判 3 年。

老威：都因为秘密聚会吗？

王子胜：是。1979 年落实宗教政策，就全部提前释放了，这样一算，我们就只坐了 3 年牢。1980 年开头，不晓得吹的啥子风，上面来指示，硬要把我选成武定县人大代表，反革命牧师的儿子，帝国主义的走狗，咋个能当人大代表呢？可是跟逮捕一样，你不干不行。记得当时，我拿着姚安县监狱的《减刑判决》，找人大主任，我指着上面写的“该犯坦白交代较好，予以释放”说：我还是“该犯”，不配做人大代表。主任脸红了一阵，生气说：太马虎啰！我找他们去。于是没过两天，“减刑判决”就变成“无罪释放”。

老威：估计此时你父亲的事迹已经传播到海外，大形势变了。

王子胜：释放不久，我们就接到了父亲的《平反通知书》。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确定他为 20 世纪 10 个伟大的殉道者之一，替他在正门上塑像的事，我们晓得很晚。大概是上个世纪末，人家派使者将有关资料送过来，都是英文，而我只有高小文化（政府不准黑五类子弟升中学），读不懂。2002 年 12 月，我家亲戚的孩子去伦敦，亲自在大教堂门口拍了照片回来，村里村外传看，大家都流泪了。荣耀归主啊！父亲他与魔鬼争战，共 65 个年头，终于胜利返回天家。正如经里记载——我听见天上有个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老威：作为传道人，你也算你父亲留在大地上的果效。

王子胜：我今年 67 岁，还跑得动。附近的村子，苗族、彝族，

都全部信主了。我就准备跑更远。更更远。如今社会，思想乱，心乱，每个人都比过去更需要福音。

【补记】

夜里 9 点来钟，谈话结束了。我们在满天繁星之下告别老人，他慈悲的老伴撵出屋子，塞给每人两块有些烫手的荞面粑粑。我三两下就吞并完毕，而孙医生依旧边下坡，边细嚼慢咽，还赞不绝口。我暗笑道：不愧本色的基督徒啊，任何时候都不忘感恩。

面包车晃着射灯在山道间盘桓，我到底松了口气，瘫软在座位上。感觉才迷糊一会儿，禄劝县城就拢了。孙医生说：我已给小张打了电话，他答应连夜送我们回昆明。我不禁叹息道：麻烦小张多少次了！如此有奉献精神的基督徒，在当今社会已属凤毛麟角。孙医生说：你不晓得嘞，我一直想把他弄到昆明开车，可那些公司老板嫌他土，有损形象。

快 10 点半，小张在城郊加油站接到我们，二话不说就朝车站赶。七、八分钟后，我们登上已经启动的加班的末班车。

小张和他的车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阴影。幸好是火把节哦！他喊道。

午夜 1 点钟，车抵昆明黄土坡站。接着打野的。1 点半钟，4 个貌似流浪汉的家伙，围坐在街口路边的小吃摊。一人一碗烫粉，吃得脑壳抵脑壳。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悲凉。仔细盯一遍其他 3 人，我对自己说：廖亦武，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是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

基督徒孙医生（上）

前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5点，我们结束对圣徒后裔王子胜的寻访，从高桥乡下长冲村回折几公里，就脱离还算平整的主路，拐入通往田心乡发块村的“糖石路”。所谓糖石路，就是泥巴与硬糖一般的碎石块掺和铺成的单行道，面包车一上去，就如伤寒病发作，嘀嘀哒哒哆嗦。我们也随之哆嗦，并且没完没了。孙医生在后座，在旧衣物的包抄之中，没过一会儿就得起身一次，将造反的旧物口袋镇压下去。而司机小张身子前倾，双臂已夹住方向盘，但情不自禁的嘎嘎磕齿声仍不绝于耳。出于诗人天性，我企图将颠簸化作游戏，不料屁股刚随嘀哒的节奏起落两回，脑顶盖就撞出一包。

尿频也一发不可收，车子平均几十分钟要停一次。在一座接一座枯燥乏味且浮尘飞扬的秃山间如此折腾，骨头散架不提，连肉皮也拉扯得不行了。可孙医生说，他一年要进来好几回！为什么？

太阳缓缓坠落，巨大的光轮像一盆盆血，哇泼泼向交错的峰峦。从前窗望出去，视野内全是紫红的潦泡。对面山坳闪出一辆来车，我车就在这面山坳刹住等候，滔滔尘头席卷腾空，太阳之血刹那被冲淡了。

黑夜接踵而至。寒风顿起。远方有扑闪的小灯。孙医生探头指出，注意了，下头是连续3个急弯，很容易撞车，一定要慢点。我估计马上就到了。不料孙医生接着指出，前方山窝子有家小店，山羊肉不错，我们吃罢晚饭再走。

深一脚浅一脚穿过泥地，踏上石阶。有点《水浒传》里的黑店味道，随灯影迎出一彝族壮汉，高声问吃几斤？孙医生答先来两斤，多配几种蔬菜。

旋即锅子端上桌，我们就着糙辣椒蘸碟，狼吞虎咽。身旁一大

堆彝人在烤火。孙医生客气地招呼：一起过来吃啰。惹动一阵哄笑。

身热胆壮，我们梁山好汉一般继续赶路。好多年没见识过这么黑的夜，跟墨汁似的。我感觉车子嗖嗖插入一个场口，房屋在光柱两边，极鬼魅地闪避。小张说：发块要到了。把坡下到底就是发窝。我不明其意。孙医生解释：彝语。发块的意思为山腰；发窝的意思为山脚。不过我们不必去山脚。而要拐进机耕道，左绕右绕很难走。我笑道：鬼门关都翻过了，还怕进阎王殿么？

夜里 9 点，我们抵达群山肚脐眼里的田心乡发块村，进入孙医生的得意门生孙庆元的院子。又是一堆人在屋里烤火，孙医生一露面，全部扑出门，那个久别重逢的亲热劲儿！42 岁的孙庆元为本地教会医生，极有威信，他当即按孙医生的吩咐，带人每家每户分发旧衣物，喜气洋洋，同过节一般。

忙碌停当已夜深，人逐渐散去。我和孙医生烫罢脚，围火坑而坐。无言，竟也无睡意。我习惯性地掏出录音机说：随便聊聊，就当催眠吧。

老威：跟梦游似的，我从来没想到会坐在这儿。

孙医生：主的安排啊。

老威：那眼下这个山村夜话氛围也是主的安排。

孙医生：嘿嘿。

老威：允许我问一句，你是医生，怎么会对土地改革感兴趣？

孙医生：因为我家就是大地主。我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在南京城里开有老字号诊所，很有名望。挣了钱，他们就在郊区购置了不少田地，当不动产存在那儿。可共产党一来，世界翻了个滚儿，我家就成剥削阶级，田地和诊所都遭共产。

老威：他们的命保住了？

孙医生：把我家搬到云南或四川的穷山沟，他们有 10 个脑袋都掉了；可南京周边是富庶之地，地主、富农太多，光我家所在的那条街，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店家在郊区有田地，相比之下，我家远远不算顶尖。当然，历次政治运动，我家都是重灾区，我从小就习惯了父母被突然之间揪出来，游街批斗。幸好还有家传医术，许多政府官员觉得有利用价值，就让你苟延残喘。

我 1974 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我年龄最小。当时刚读初三，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虚报岁数下乡的。说来可笑，1973 年到 1975 年，西双版纳这块还在搞“阶级成分复查”，给许多土改中漏划掉所谓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帽子，大肆批斗。

老威：是么？也太落伍了。

孙医生：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对时代的反应要慢好多拍。我们属于景洪公社，紧靠着橄榄坝公社，再出去是边境线，除了傣汉，还有哈尼、拉祜、布朗、瑶、彝、佤、白等民族，对汉族人灌输过来的土改怎么搞呢？据我所知，拉祜和瑶族既没搞土改，也没有地主。

老威：可能大伙都在坡上半裸着刀耕火种吧。

孙医生：但我们刚去的时候，到处都在斗地富分子。有个傣族小伙子，我们去的头天就认识了，知青要吃水果，他就猴子一样爬树，摘了很多。可没想到，这样老实的人是富农儿子，经常无缘无故被批斗。有一次民兵打得他满地滚，我实在忍不住，就跑过去扶他起来，由于我的身体插在中间，民兵没法继续打，只好罢手。多少年一晃而过，我却清晰地记得那种恐怖躲闪的眼神，与圈起来待宰的狗差不多。可他不是狗，年龄也和我们知青不相上下，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呢？

我对社会、对毛泽东思想产生怀疑就从这身边的一点一滴开始

的。什么人民翻身做主，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狗屁。1976年毛泽东呜呼那天，我正在林子里砍香蕉呢，我边砍边吃，肚子都有点撑了。突然，兵团的高音喇叭放起了哀乐，接着就是低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嘿嘿，不是万寿无疆吗？怎么说死就死？真是个好消息。

后来我当上赤脚医生。再后来恢复高考，我考上北京医科大学。临上京的那天，那个富农儿子还特地跑来送我，很依依不舍。

大学读5年，毕业分配到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一直当外科大夫。做了无数急诊，什么肝破裂、肠破裂、脾脏破裂，头颅破裂，开刀缝合，一分一秒抢时间，动作稍慢就大出血，要死人。我的医术就是这么操练出来的。到了1988年，为了“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被破格提升教务长，任了一届，又提升常务副校长。

老威：年轻有为啊。

孙医生：外科的关键是临床判断，该如何马上如何，来不得半点虚的。可这套在官场行不通。我锐意改革，卖掉专用的桑塔纳轿车，自己买辆自行车骑；我取消逢年过节会餐，禁止大吃大喝，限制财务报账。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人家恨死我，在背地整黑材料，我还蒙在鼓里。九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外教和留学生进入我们学院，通过他们，我读到了《圣经》，很受震动。刚巧官场的挫折也促使我反思。《圣经》的本质就是敬畏，就是爱，而中国人既缺乏敬畏，又缺乏爱，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靠党的领导？规章制度？废话。

大约是1990年9月，我在留学生宿舍第一次参加了祷告聚会，当时除了留学生和外教，还有几个中国学生。此后我一直参加礼拜，也逐渐养成睡前祈祷的习惯。1992年冬天，我休假去西双版纳，逢圣诞节，在家庭聚会上祷告时，突然意识到某种使命，心灵感动不已，就由德国宣教士大虎主持，正式受洗。

老威：既然如此，你的官还能当吗？

孙医生：我知道那个时刻在临近，我必须作出选择。我参加聚会的事也有人告密，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按理，我在体制内已多年，医术上亦有造诣，如果稍作让步，仍是一派锦绣前程。上帝和魔鬼在我头脑里反复争战。可最后，领导拿出一份《入党申请表》，让我填了它，这就意味着“谣言不攻自破”。

不能填。我说。因为不是谣言，是事实。什么？领导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信基督。我一字一顿地说。我只能选一样。

领导气得要命：你当共产党的官，拿共产党的工资待遇，却信基督！基督是什么？能吃能喝吗？

我不眨眼地看着他，依然一字一顿地说：我辞职。我得救。

于是我被院方解除了一切职务。

老威：这是哪一年？

孙医生：1993年。我不得不离开医学院。随后不得不离开苏州。西双版纳的景洪医院聘用了我，直到1996年。接着又去深圳两年。再接着出国，从环境相当优美的泰国清迈转道，进入相当糟糕的缅甸佤邦，服务于南佤军区范围内的一家国际丛林医院。

老威：脱离了体制，你的人生马上就动荡不堪。

孙医生：可内心不动荡。我是主动报名去佤邦做人道志愿者，因为那儿充满战乱、瘟疫、贫穷。当红十字会的车子颠簸在土路上，我看见窗外除了漫山遍野的罂粟，就是洋不洋土不土的佤邦军人，身上挎着枪，还挎着炮。附近还不时响起枪炮声。我们抵达的所谓“医院”其实就几间草棚，四周有几棵树。由于酷热，苍蝇相当密。可是技术力量很强，西方各国的医生来过好多批。

老威：你与他们交流没问题？

孙医生：傣话和英语我都会一点。医院虽简陋，气氛却很融洽，应对流行病、疟疾、妇产、吸毒引发的各种病症，以及大批量的大外科都很尽责。连续工作几天是家常便饭，但我在这儿学到不少东西，包括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做野外手术。

不过我反感那个台湾籍院长，他缺乏爱心。比如有一次，医院聘用的一个佧邦护士和军人谈恋爱，头天晚上，男女才钻入一顶蚊帐，第二天女的就被抓起来，那些当地人还闹着要把她推出去毙掉。我听见女孩的哭声，就去找院长，可院长却说这事儿不该他管，还劝我也别管。我气坏了，就直接找抓她的叫“山耿”的军官。山耿解释说：那个军人在家有老婆，是护士勾引他，所以该死。我说：这有啥了不得？还不快把钥匙拿出来。当地人对医生都非常敬重，山耿虽是人民军，也不例外。于是我就亲自打开女孩的铁镣手铐，接她回来了。

老威：真把人命当儿戏啰。

孙医生：是啊，抓人、放人、枪毙人全是一念之差。我的外科助手是个缅甸人，叫玉瓠，相当聪明。他原来也是正规医生，可吸毒成瘾，曾经进过戒毒所，出来后毒不吸了，却嗜酒如命，等于用酒代替了毒。因此院方将他从医生降为护士。有一次值夜班，玉瓠也喝得迷迷糊糊，被台湾院长的朋友，一个台湾牧师逮着，就大声骂他。玉瓠不服，两人就你来我往对骂。我出面阻止，并批评玉瓠：你这样对自己、对医院不负责任，以后怎么办？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玉瓠一下子清醒了，立马道歉，还发誓改正。可是第二天来了辆警车，当作大家的面将玉瓠抓走，从此再没有回来。

老威：咋回事儿？

孙医生：台湾牧师向军方打了报告啰。这前后两件事搞得我对台湾人很厌烦，也是我最终离开佧邦的动因。我在那儿呆了1年半，本来已融入当地，连总司令的太太都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呢。

我是上个世纪末回国的。可以说一无所有，但信心越发坚定。我先由侄儿介绍，去云南大学医学院代课，钱不多，却比较轻松。

老威：你有了异国行医的“通科”经验，不想借机重返体制？

孙医生：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肯定在大医院呆不下去。

老威：信仰障碍吗？

孙医生：普通良心。比如你开什么处方？病员坐对面，直勾勾地盯着你，人家已经叫病魔弄成那样了，你在处方里下什么药？因为同类型的药，价格悬殊很大。一般情况，我捡价格最低、疗效最佳的方子开，如此下去，药房、科室乃至院方都有意见。因为破坏了潜规则，就破坏了形形色色供药商与医院的长期平衡，就直接间接损害了集体利益。

老威：医生坏了良心，跟抢劫犯无异。

孙医生：治病就是抢钱啰。许多病对医生来说，就是对症下药，顺水推舟，不费什么力气。你自己也在治病救人中获得快乐啊。可现实呢，治一点普通病，动不动就几百上千，甚至几千上万。你为什么不习惯开几块钱的抗生素，几块钱的传统药？或许它们的进价才几毛钱，成本才几分钱——照此计算，医院已经赚够了。还嫌不够？

老威：所以你就成了害群之马。

孙医生：对。我是基督徒，我必须告诉病员实情，病员也有权了解实情。所以我进任何医院都容易，可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老威：你是叫逼成“游方郎中”的？

孙医生：没人逼。的确是神的旨意。

老威：嘿嘿，我洗耳恭听。

孙医生：我在教堂做礼拜时碰到我的一个学生，不料我的命运

从此改变。

开始我都没认出他，因为云大学生太多了。后来聊得不错，才知道他是禄劝皎西出来的农村孩子。

老威：皎西？撒营盘还往里走，快到红军窜过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了。

孙医生：偏远落后的大山沟，但民风纯朴，村村都信基督教。我的学生说：他的家乡有个等死的病人，问我有没有兴趣跑一趟？我随口答好。没想到这孩子第二天就找上门，领着我搭班车，折腾快一天，抵达了皎西。原来是本地教会长老的太太病了。我进屋一检查，乳腺癌。肿块已有鸡蛋大，得马上动手术。我当时生气地对长老说：病怎么能拖？长老说：禄劝和昆明的医院都跑遍了，动手术至少要花 8000 元，还不敢担保断根。我们回来东借西凑，才有 2000 元。我说：这手术我做。长老急忙问多少钱？我答免费。那一家人全愣住了，那种奇怪的目光盯得我不自在，就解释说：比这更复杂更厉害的手术我都做过，你们放心吧。

歇了一夜，我就匆匆往回赶。本来是约好病人随后来昆明，借医院的手术室做，可待我打电话去催，对方又说在皎西家里等。晚上，我跪下祈祷，求主赐给我力量，帮助更多的穷人。脑子里竟浮现出一个个美国或英国的老电影镜头，那些战地医院，或根本没医院，就一块野地，那些可爱的大夫正为病人开刀。还说笑话，引开病人的注意力。

内心充满感动。接着我花了不到 100 元钱，买刀子、针线、手套等等，其它东西原来就有。我背上药箱赶路，嘴角都挂着笑。我记得手术做了没多久，手术室就是长老太太的卧房，手术台就是她的床，那张黑黝黝的、睡了几十年的床。她以为自己快死在那床上了。

老威：你没有帮手吗？

孙医生：有个老大爷，60多岁，是当地的牧师。屋里很暗，开窗也光线不够，就把几个手电捆在一块，让老大爷举起来当手术灯。老大爷的身板硬朗，站一两个小时一点事儿没有。我让他照那儿，他就直端端照那儿，毫不含糊。我把病人的右乳房整块挖掉，而后做了仔细地处理。我没感觉累，只感觉同穷人在一起，就是同上帝在一起，很甜美。真的，心甜美，接出的果实也是甜美的。

老威：你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在农民家里做癌症手术的医生。你可想过万一出意外咋办？

孙医生：既然决定做，肯定要有充分的、万无一失的准备。我是正规科班出身，以前也没料到会在这种条件下做手术。消息刮风一般传开，皎西周围的村民纷纷上门求医。记得那次我呆了一个多星期，几乎不能脱身。

老威：就在一个地方？

孙医生：还从皎西走到武定县的乍基乡。两地间不通公路，起个大早，我跟着热心的带路者，爬坡下河，锻炼了将近8个小时，鞋底都差点磨穿了，才好歹到达。虽说我一直是运动爱好者，可这算是平生最长最累的步行啊。

老威：我进去过两三趟，坡太陡了，连骡子都打滑。爬某些山梁子，鼻子稍不留意就触地。

孙医生：但步行下来，感觉浑身透气，吃得香，睡得沉。趁着好心情，我在乍基村民家里又做了一个腮腺癌手术，一个囊肿切除手术。感谢主，没有一点问题。

感谢主，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道路和使命。

基督徒孙医生（下）

子时将尽。我知道孙医生不习惯熬夜，就提议明日继续。不料孙医生问：这是不是和做手术一样，开了头就不能停下来？我噗嗤一笑，只得承认道：的确，明日的气氛又与今日不同。

我不禁摸了摸自己的右眉，似乎手术刀还在那儿划动。两个月前，孙医生曾经背着一个简单的挎包到云南某地拜访我，谈笑之间，顺便在我的腋下和眉间动了两个小手术，割除两颗黄豆大的肉赘或瘤子。记得当时室内还在放鲍勃·迪伦的早期摇滚，孙医生叫把音量关小。窗外古塔矗立，夕阳正红，鸟儿在啁啾，有几头老牛向苍山草坡款款远去。孙医生叹道：好一个世外桃源啊。接着就挑起音乐话头，让我躺在床上瞎侃，从垮掉一代到黑人灵歌。从“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到“马车自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待我睁开眼睛，手术就结束了。真是从未有过的神奇经历！孙医生边收拾家伙边笑道：我要向你索取一点点报酬。我答好啊。他就试探着问：可不可以把你自己制作的箫碟拷贝一张给我？我又答好啊。

两人对话的余音尚在，可光阴已滑过一大截了。

我再次打开录音机。

只有抓紧往下说啰。孙医生道。

孙医生：昭通的彝良县是云南最穷的地方，那儿的很多山被砍得光秃秃，村庄在秃山腰，泥巴草房很矮，门跟山洞一样，只有埋着腰才能钻进去。而平时吃水靠两口井，一口喂牲畜，一口喂人。若遇天旱，就得跑山脚河里背水。我曾经到那儿行医，也有过几天不洗脸的记录。有一次，我在村里迎面碰见一个杵棍子的彝人，右

裤腿空荡荡的，脸颊一个劲抽搐。出于职业本能，我自然要询问。原来这是车祸的后果。我急忙扶他坐下，掀开裤腿。哎呀，不知是那个缺德鬼做的原始截肢！膝盖以下没了，可大腿骨却刀子一般暴露在那儿，四周的皮肉发黑溃烂，臭味令人恶心。我说：喂，你这样下去不行啰，骨头暴露，骨髓炎会一点点往上走，最后感染血管，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那彝人没话说，就直勾勾地看我，一会儿，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流。我说：没关系，我再给你截一次肢，齐大腿根全拿掉，就没事儿了。往后有条件，你还可以装个假肢。

村民们都围过来，没人了解我的底细，只知道我是昆明来的。不过大家也算给面子，帮我把病人架进屋，平放在床上。我耐心地做消毒、抗炎、麻醉，然后更耐心地剔除腐肉。太臭了！我就叫把门窗都敞开，让空气对流。

老威：你不怕空气中的细菌感染吗？

孙医生：乡村看起来破破烂烂，其实空气比城市、特别是比医院干净。至少没有各类病菌的交叉感染啰。我把腐肉剔光了，再一根根理出血管，与老大娘纳鞋底相似，要特别细致。待全部血管都缝合完毕，检查没纰漏了，就可以截肢。

嘿，没啥神秘，与木工活儿差不多，锯、锉、琢、锤、刨都得用上。我还特地买了把小锯子，锯口极锋利，外形却似木工锯。你想，人的大腿骨，特别是成年人的大腿骨，相当硬，没钢铁硬，至少比一般木头硬多了。我比划一下，猛吸口气，就下锯子。呼哧呼哧，才几个回合，手臂就震麻了，脑门的汗珠子牵着线下来。要是在正规医院，不用招呼，护士会主动擦汗，可在这儿，我一再暗示，别人也反应不过来啊。

不过这难不倒我。骨头锯了，又用小锤子敲几下，然后琢，然后将钝口锉平整。待一切都处理妥当，再将正常肉皮拉拢，缝合好。

老威：我听得汗毛直竖。

孙医生：没什么啊。村民也配合，病人也那么放心地把性命交给我，应该感谢才对。

老威：把人当作木工活儿来做，外科大夫本身也算特殊材料造就的。

孙医生：哈哈，作家的想象真丰富啰。那我接着讲。去年在红河州，对，云南著名的红河烟厂就在那儿。我到红河州石屏麻风病院，在那儿给一个麻风病人切除过阑尾。我的当地朋友介绍的，说本来是急性阑尾炎，可医生都不敢治，每次发作起来，送医院，就打打针，开点药，结果急性拖成慢性了。我说这样一个小手术，算得什么。人家就陪同我去了。抵达隔离区，人们都大吃一惊，叫唤：这个地方你也敢来！我说这儿四处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洁白，比我从前的看病环境还好，我为什么不敢来？见着病员，是个中年男子，手脚、皮肤开始烂了，脚也变形。可人不错，平和，不抱怨，不自私。我为他动手术，还有一个甘肃来的天主教姑娘协助，很妥当。刚一完，病员自个就起身。我按住他，让稍微歇一会儿。他说不用，感觉挺好的，就下床站起来。试着走两步，没问题，就点头致谢，然后走回去了。我立在门口望他，起码走了两百多米，才进那边的房间。

老威：我晓得你“胆大包天”，可掐指一算，你做游方郎中已第8个年头，没出过问题？

孙医生：不能出问题啰。

老威：为什么？你毕竟是人呀。

孙医生：治病救人，判断必须十分准确。不像写文章，错了还能修改，把人治错可没得修改。否则坏名声一传播，损害我个人事小，损害到我信仰的基督教，罪就大了。

其实，比医术更重要的还是爱心，比如你认识的小孙……

老威：就是上次你介绍我去马鹿塘找的那个瘸腿小伙子？

孙医生：是。

老威：他给我引荐了两个老地主、3个老贫农，贡献很大哦。

孙医生：他原来在广州一家造船厂打工，还结婚生子，不错的。可突然间得了一种脊椎怪病，令双腿瘫痪，连中山大学的名牌教授也无奈。这一来，老婆跑了，同乡们将他千里迢迢送回家，吃喝拉撒都得靠人，惨极了。当时我闻讯从则黑跑到马鹿塘去见他，动不了刀，西医的确没法子。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学习传统针灸。我的老师姓梁，很有名气。记得第1天开课有十几个学生，第2天剩七、八个，第3天四、五个，第5天1个，就是我。大伙议论道：梁老师啊，你教我们这个经那个经，弄得我们要发神经。我没发神经，我属中医世家，经脉一点就通，还其乐无穷呢。后来我觉得有些把握了，就赶去给小孙扎针。不料扎针后的头天晚上，他的腿就持续麻胀！就这样坚持针灸，加上他自己搞了些中草药偏方，配合治疗，慢慢就能站起来了。

老威：这太耗费时间。

孙医生：时间不是问题，我喜欢在农村逛，爬山、涉水、治病，碰见的都是善良的穷人，什么都愿意奉献。像小孙，非常聪明，现在他丢开棍子也能到处走，还愿意跟我学医，常见病也能处理一下。

老威：他在乡场上开了家奇怪的店，美容美发加治病加拔牙。

孙医生：嘿，我引荐他跟美国来的牙医学过，他聪明、刻苦，钻研过口腔结构，真的能拔牙。说不定比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还强些。

老威：你的乡村弟子，我接触过这个小孙，还有则黑大住基村的小孙，都自己开诊所，在当地蛮吃香的。

孙医生：这些年我陆续教了几十个学生，相当于由几十上百个点组成的农村医疗网络。其实，医术精湛固然好，可普及医疗常识

显得更迫切，因为乡村里的若干突发病，只要当时处理恰当，得到缓解，就能争取到救治时间。农民苦啊，住山沟山梁，赶一趟街，爬坡下坎，动不动就折腾几个小时。平时没什么，可犯了急病麻烦就大了。几个壮劳力，轮换抬啊背啊，山道几小时，拢公路还得等车，乘车到乡镇一级的医院，医生水平又有限。不少人就这么死的，不少人死得莫名其妙。

老威：抢救不及时，不是绝症也弄成绝症了。

孙医生：唉。

老威：可建立乡村的医疗网络应该是一项国家工程，一个人的力量……

孙医生：共产党烂成这样，我们别指望了。海外有些慈善机构，也关注第三世界，但它们有它们的目的。99年那阵，我与新加坡的“爱心扶贫”有过联系。发窝就是那次来的。当时我和1个美国、1个香港、1个新加坡医生来这儿赶街考察，逛了两圈，碰见这家主人孙庆元。一聊，就马上跟他来。

村里还有个痲病，吃了香港医生给的抗痲西药，很管用。这孙庆元学过医，开了家庭诊所，但欠款很多，面临倒闭。我们给了他坚持的信心。我说：有外援自然好，没外援也别指望，要因地制宜，发展中草药。你看到了，院子里晾的草药非常多，这些年，孙庆元在造福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还清了欠款，活得不错。

老威：我在你家遇见过两个美籍医生，1个姓吴1个姓熊，都不错。

孙医生：他们都下乡考察好几次，愿意投入一些资金。特别是吴医生，快80了，人非常善良。要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偏远乡村的状况，避开政府官员，去掉中间环节，农民就能直接得到实惠。

老威：你是深谋远虑。

孙医生：我不是商人，不是政治家，我的榜样是德兰修女。她

抛开贵族化的修道院，深入到遍地垃圾的印度底层，深入到穷人当中，把爱当作毕生的事业

老威：你随身带着《德兰修女传》。

孙医生：很多时候，你我对深重的苦难无能为力。在皎西那边的真金万，一个极边远的村子，有个村长。他的脖子原来生了个肿块，开过刀，没割干净，反而越变越大，还四处窜。我见着他的时候，肿块已经蔓延至肩头，蔓延至后脑勺，沉甸甸地坠着，把整个人拉扯得站不稳。我稍微检查一下，就知道是淋巴癌晚期转移，根本无法动刀。我只好在床沿坐下，读了一段《圣经》。我说：生命不是无限的，但在上帝那儿，又是无限而公平的。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点点头，还露出微笑。接着我握住他的手，静静地呆了 1 个多小时。门口的光投进来，许多人影子在那儿晃动着。第二天，他就死了。

老威：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在《哀歌》里写到：清晨、正午、黄昏到来前的每一分钟，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孙医生：但我更喜欢《汤姆叔叔小屋》中的黑人灵歌“马车从天上下来，把你带回你的家乡”。你唱过的。又有一次，刚拢一个村子，就被领到一个 50 多岁的大姐屋里。看她已上气不接下气，就询问旁边人，原来她发烧好长一段时间后，突然间大出血。我把脉了，太晚，没得救。当时她的大女儿还在外头瞎跑，只剩读初中的二女儿在。我就吩咐烧点水，我亲自拿盆子、毛巾为她洗脸。又接过木梳为她梳头。作为医生，我明白人在临终时刻，不能过分邈邈，否则就死得没什么尊严，连收殮群众都害怕接近。

举手之劳做完了，我还是老样子，握住她的手坐在那儿。但是她没有上一个死者安详，呼吸急促，好像胸腔随时会爆炸。我心里十分难过，就说：大姐姐呀，我明白这辈子你吃了太多苦。不要怕，不要怕。快结束了，天堂的门已经敞开，你的苦快结束了。她的眼泪淌下来，叭嗒叭嗒落在我手背上。跟着她猛抖两下，嘎的断气了。

还好，时间没拖很长。

老威：夜这么深，听你讲到死，虽然有大爱，仍感觉人生没多大意思。

孙医生：千万别这么想。你在记录苦难，你得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老威：我们是 2005 年 12 月初认识的，当时你正在丽江古城一个基督徒家里替一个老人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就跟你下乡，从此切入土地改革专题，这么久还收不了手。记得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吧？

孙医生：“麻风病人”张志恩。

老威：对。讲讲他。

孙医生：在他之前，有另外一段掌故。2001 年夏天，我去刚才提到的真金万行医，抵达时已下午 3 点。歇 1 个小时，感到肚子饿了，就在村民家里弄饭吃。可米和豆子下锅不久，有人来告诉我，另一个村子有人快病死了。我一急，马上开饭，半熟的豆子也咽了半碗。然后随带路的起身。路途耽搁两个半小时，泥浆山道，一不小心就打滑，可想到那头有人要死，也顾不了许多。8 点过赶到，太阳落坡了，昏暗的光影里，茅草屋的周围，全村 100 多人都聚拢了。我浑身湿得水透，可来不及擦汗就跑过去。只见屋檐下，红漆大棺材已摆在那儿，盖子掀开，吓人啰。我进到屋里，见床上床下都是血，而病人还在喀，气都快整断了，还在不停地喀。人们都异口同声称：上昆明照过片子的，是肺癌，活不了。我马上给他打止血针，很平静地问他病史。这人倒比较理性，一五一十地抖落得清楚。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他做详细诊断，确定为肺结核，虽然极严重，仍有一线希望。

抗结核的特效药没带身边，第二天大早，我和病人的两个女儿出村赶路，中午抵昆明买了药，让她俩先带回去。结果非常管用。

第三天我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病人已好转，棺材用不着了。

又过十来天，病人村里来人接我去复诊，完了再返回。就是在石门坎上面的公路边等客车时，抬头发现了所谓“麻风病人”张志恩的家。

远远望见红土山坳间绿树葱郁，枝头掩映中，还有一草房。我感叹道：太美啰！那儿有人隐居吗？就要爬上去探个究竟。不料却被送我的人牢牢拽住：去不得！去不得！有麻风病！我是医生啊，有什么问题？就去了。接着是你我都曾经历过的场面，两个老人坐在房前晒太阳。我边观测边与他们聊天，没一点病征，哪是什么鬼麻风！谣言可把他们害惨了。

故事你也写了。张志恩老人原来不住这儿。大约 70 年代，他上山砍柴，遇一窝麻蛇，就拿锄头敲。没想到麻蛇死了一条又窜出一条，他怕了，就逃回家。不知道麻蛇怎么和麻风扯上关系，又使他的前妻被村里人怀疑为麻风，弄去活活烧死掉。而他自己也叫弄进麻风病院，关好几年，才莫名其妙放回家。

老威：后来就迁到荒坡上，与世隔绝，枉背一张麻风的皮。

孙医生：是。没人管，房子漏了塌了也没力气修补。于是我联络附近教会的人，我个人出资近 2000 元，将草房换成瓦房。还给他们买了猪和鸡，好歹像在过日子。

老威：我有一个疑问：你在乡村坚持这么些年，经济上靠什么支撑？诊费怎么收取？

孙医生：开始两年，美国一家有教会背景的机构在支持，我与其中一位姑娘私交很好；后来她的老板变了卦，中止援助，就只能靠主的安排。深入乡村，班车和走路交替，有点路费开销。此外，像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一两月、两三月地走村串乡，吃住都在农家，大致不用花钱。特别是过年前后，挨家挨户有请，还吃不过来。

老威：这不是办法。

孙医生：人心是肉长的，农民看病也主动给点钱，10元20元30元不等。病比较麻烦的，也给个一百两百、两百三百。我有进药的渠道，无论如何，成本还是够的。近一两年，国外的一些医生同我有些接触，他们对我做的事很感兴趣，也捐赠部分西药。像你看见过的吴医生和熊医生，还租了房子，在昆明设点。他们不在，我就代管。

老威：我都在里面住过啰。

孙医生：进城来找我看病的农民也住过。最多一晚住6个人。嘿嘿，后半辈子就这样了。海外和城里都不缺医生，主如此安排很合理。

老威：主何时给你安排一个心意相通的女助手呢？

孙医生：你比我更需要女助手。多祷告吧。说不定今晚的梦想，明天就成现实。

土改受害者杨自海

前奏

2007年1月10日清晨，我和孙医生来不及洗脸，就拣了几样旧衣物，跟随一带路的彝族妇女，匆匆赶往位于田心乡发块村西南角的杨自海老人家。太阳刚刚露头，一片片瓦顶还缭绕着薄雾，可村中小道已经热闹起来，不断有猪狗、牛羊、骡马在人类的吆喝下，与我们不期而遇。孙医生的仪态像个超龄老知青，与村民们既熟悉，又保持了适当的矜持。感谢主。感谢主。大家微笑着互致问候。如此伊甸园的暖意笼罩了大约七、八分钟，目标到了。

羚羊一般跳跃几次，过了几滩牲畜粪便，落脚点却是一片荒草。眼前为一横一纵两土屋，横的茅草顶坍塌大半，夯实的土墙已风化得薄，橙色里夹杂灰白的纹路，见证着岁月的斑斑刻痕；纵的为千疮百孔的泥墙瓦房，门楣焦黑。一个满面愁苦的小伙子应声露头，紧跟着露头的是更加愁苦的父辈。孙医生急忙一手握住一个，并歪着脸问：身体可好些了？

回答起码推迟1分多钟，中间隔着撕心裂肺的喘息。哦呼——，哦呼——，我直盯着那气锤一般起落的胸脯，感觉世界末日在这一刻真切地来到。极不情愿地跨入门槛，中间是忽明忽暗的火坑，呛鼻的烟雾在洞穴内弥漫，令我们不得不快速下蹲，占据靠门边的有利地形。

适应了约分把钟，我才辨认出在杨自海老人的背后，那神秘的笑。她似乎没有一刻中断过笑意，麻木的，比哭更容易摧毁人。她直挺挺地靠墙而坐，有围巾，有帽子，还有彝族人高眉凹眼的特征，在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大美人。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她的双膝之间，那儿放着她的双手，戴着镯子，一个劲颤动。她叫杨品英，70岁，杨自海的老伴，3年前不幸

得了帕金森综合症。

我不禁又记起英国短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句子：整个世界的灾难像雪一样落在了她的肩上/她无声地呼喊/仅仅是为自己的创伤？

老威：两位老人家好啊。

杨自海：不太好。自从生下来就不太好。邓小平为地富分子揭帽，要好一点了，人与人不搞阶级斗争，不歧视了，又得病。你看啰，我一天到晚喘，她一天到晚抖，没个完……

老威：这是 100 元钱，我的一点点心意。

杨自海：感谢你。感谢主。

老威：惭愧。惭愧。

杨自海：哦呼——，哦呼——，哦呼——。

老威：这个发块村，土改时候多少户人？

杨自海：哦呼。将近 30 户人。划了 3 家地主，5 家富农。

老威：阶级敌人的比例很高啊。

杨自海：我爸爸叫杨茂勋，曾当过这一块的保长，所以一解放，我们家就划为地主。

老威：你爸爸土改时有多大年纪？

杨自海：他 1948 年就去世，只活了 36 岁。他是个急性子，好主持公道，大家就推举他做保长。有一次，邻村有家大户办喜酒，他应邀带些人去祝贺。吃宴席的时候，那家女人们却区别对待。看他是保长，有派头，穿得也体面，马上请入上席，大肉大鱼，十分丰盛；看他带去的几个人，特别是有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无精打采的穷人——可一盯住肉就不眨眼，直吞口水——笑脸转个就拉成哭丧脸。嘀嘀咕咕一阵，就把人往房背后的小桌子引，只给几样小菜，

沾点荤腥。我爸爸还在抱拳应酬呢，突然发现这等不平事，当场就拍桌子打板凳，冒起火来。那家主人急忙过来，问清缘由，才将小桌子撤掉，换成正席。人家还当众赔罪，责怪女人家见识短。按理，再大的风浪也平了，可我爸爸就是不依，非要让人改天单独请客。

老威：你爸爸够厉害。

杨自海：他挂在嘴边的话：富人穷人都是人。周围几个村都服他。

老威：后来呢？

杨自海：他得急病，天天拉肚子，止不住，就死掉了。那时我才八、九岁。弟弟才5岁。

老威：家境如何？

杨自海：几亩地，种的粮食还不够吃。不过我们舅家会做买卖，周济些过来，日子可以过的。

老威：你爸爸没留下点什么？

杨自海：房子一小点，还有地，还有1匹骡子1匹马。

老威：土改时候，凭这些财产就能划地主吗？

杨自海：爸爸是保长啰。

老威：死了两三年了。

杨自海：1951年土改，我才十二、三岁。村里人就这么说的，你爸爸是国民党的保长，虽然他死了，你们家也该划地主。我妈妈叫抓起来，每次开斗争会都逃不掉。五花大绑，绳子勒进肉里，还不准松，不准哭。十几年以后，她死掉，肩膀和手腕上的绳子印还没褪啰。

老威：幸好你爸爸死得早。

杨自海：对啰。等到土改也会遭枪毙啰。当时的田心、发窝，还有周围插甸、高桥几个乡，隔几天就开公审大会，土匪、恶霸、

大户、旧社会当过官的，统统拉来枪毙，感觉杀人跟砍洋芋砣砣差不多。田心乡的尼阿勒村，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叫李乐心，非常有钱，但乐善好施。只要有叫花子上门，他都会留住留吃，别人借他的债，数目不太大的，还不还无所谓。去乡场赶街，碰见小娃娃，他就买一碗饭给他吃；碰见老头，他就打一两酒给他喝。有人嫌不够，追着还要，他就回过来说：酒这个东西，少喝活血暖身子，多喝乱性伤身子。适可而止，适可而止。

老威：一个可爱的老夫子。

杨自海：解放了，好人变成恶霸。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挨家挨户动员，叫穷人起来与李乐心作对，可嘴皮子磨破了，也没哪个吭声。连没家没口没人理的滚刀肉，工作组最该依靠的苦大仇深的那种，说别的可以，拿棍子敲别人可以，一提起“李乐心”3个字，马上就这个啰，这个啰，我的屎胀啰。转脑壳躲得远远的。

咳咳。群众觉悟低，运动没法开展；运动没法开展么，工作组对上面没法交待。咋个办？总不可能让工作组自己拿枪拿绳子上，革命积极性再高，也是外省来的啰。那次，田心乡所有村子的男女老幼聚到利米村坝子开群众大会，解放军和民兵排开阵势，工作队的大官在戏台上指挥，噼哩叭啦枪毙了十几个，把声势造起来，上面最大的官才通过喇叭喊：李乐心来了没？尼阿勒村的恶霸地主李乐心！站起来！唉，头发花白的大善人只好揭下黑帽子，从人堆里拱出来，走向戏台子。还没拢啰，解放军就拿着麻绳扑过去，按个嘴啃泥，再绑个寒鸭凫水，架到戏台前示众。啥子“罪大恶极、假仁假义、收买群众、破坏土改”，等等，罪状吓死人。

站我旁边的真正的坏蛋吕天富叹气说：李乐心落得如此下场！怕踩死蚂蚁的老好人落得如此下场！世道变了！坏掉，坏掉，全他妈坏掉！

老威：这个吕天富怎么“坏蛋”了？

杨自海：他是个汉族，比彝族还凶几倍。解放前他家穷得叮当响，就搞了一杆枪，去山里当土匪，抢过许多人，听说还欠有人命。清匪时，十几个解放军踢开门抓他，明明探清楚在屋里搂着老婆睡觉呢，却嗖的一声窜没了，比野猫子还快。接着在他家对面的山洞里藏了半个月，直到政府方面做他老婆的工作，保证不杀，才闪出来缴枪投降。

说到底还是穷人。他痛哭流涕，当众坦白：是个匪，是抢人，可没办法，叫地主剥削得揭不开锅，总不能等着饿死啰。况且是旧社会，没遇上共产党，如果遇上，提高了觉悟，肯定打地主，闹革命，闹翻身。

老威：真是天才演员。

杨自海：咳咳，这一来，政府还不好过分为难他。脑壳是保住了，但也受了几天活罪，弄去和我们一块做苦工。

老威：你也做苦工？

杨自海：是。

老威：那时你还小啊。

杨自海：十二、三岁的地主子女不止我一个，统统被民兵押去挖公路，接着又开荒烧炭，折磨了3年多才允许回家住。那真是地狱，白天连着黑夜，干活、干活、干活。吃饭、拉屎都得限定时间，超过了，民兵就打得你在泥浆子里乱滚。我的哮喘病根就这样落下的，开始是风寒病，没钱没工夫治。即使有钱有工夫，人家也不让你治。你算个什么东西啰？地主子女，天生的贱种，被人民政府和贫雇农踩在脚底的牲口。这样拖、拖、拖……

老威：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杨自海：我自己找了很多草药吃，都是缓一阵，又喘得更厉害。有一次，那个抢人的吕天富与我凑一块烧炭，突然对着我耳朵说：我害过人，拉过血债，也大肉大鱼享受过，玩过不少漂亮女人，连

大户人家的小老婆都搞过，所以有今天这个牲口不如的下场，也想得通。报应啰。最想不通的是李乐心，一辈子积德行善，亏欠过哪个？可到头来被当作恶霸地主，挨枪崩不提，还曝尸半天示众。而你这种娃娃，又最最可怜，人皮没长熟，零件没长齐，享受更谈不上，连旧社会新社会是啥子东西都没搞懂，就受气挨打，成今生今世翻不过身的坏种，哎哟。他连着哎哟了好几声，把民兵都引过来了。

老威：这强盗还蛮有想法。

杨自海：我们立即低头干活。可没料到，民兵的注意力刚转移到别处，另一个更厉害的强盗也悄悄凑上来。他叫凤一青，也是穷得不行就做贼，却在黑道上混出很大名气。他经常在撒营盘那边抢过路的生意人。据说有一次，他们抢到武装押运的官商头上，双方交火，打了一两个钟头，他们这伙子当场死掉几个，对方却死掉十几个，最后还是把官商给劫了。解放后，共产党出动上千兵马在撒营盘剿匪，凤一青一伙子全落网。公审大会是在高桥乡开的，36个匪，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标，架到坟地边。一人一个坑，提前就挖好了。见这么大的阵势，民兵端起枪都不敢上。全是清一色的解放军，身上的硝烟味还没退，就直接红着眼珠子来了。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大盖步枪，1米多长，枪筒酒杯粗，原本已转给民兵用了，又重新拿过来。子弹也是大号，每颗都像中指拇，在鞋帮子边擦、擦，发光发热了，才装枪膛。从左至右，一枪一脑壳，崩的冒一股脑浆浆，轰的栽入坑底，把人都看疯了。就这样六七八、十二三、二十二三、三十二三地毙下去，直到35，崩！冒脑浆，下坑。36，最后一颗，也就是凤一青的脑壳了——咳咳，不毙了。

解放军将他提起来，他还喊：来呀！老子该死！想死！为啥不打？！嘿，他懵懵懂懂捡条命，也叫押来做苦工。见我和吕天富一块，就过来摸我脑壳：娃娃，我做贼之前也帮地主，长工短工都搞过，没想到世道打个滚，你这个小地主比我做贼之前还苦。

老威：这些土匪后来咋样？判刑没？

杨自海：判啥子刑啰，逃过了鬼门关，按当时的政策，他们也划贫农。

老威：是么？

杨自海：还分了土地、房子和牲口。那个凤一青，解放前接了两个老婆，1个老婆生6个，总共有12个娃娃，17张嘴，靠正常劳动实在塞不满，只能做贼。还得做个勤快的贼。开展清匪反霸，他叫抓了，没毙成，就罚做苦工。这一来，老婆娃娃一大窝，挤在草棚里挨饿，眼看吊命粮也吃没了，就豁出去了。十几口破破烂烂的杂种主动找工作组，见面也不讲究说理，就东一砣西一砣倒下打滚，呼天喊地。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强盗的儿子会打洞，工作组拿着没办法。掏枪么，你还没比划，他就朝你的枪眼上撞；喊民兵拿绳子么，他就先把手杆伸过来，连叫“捆啰，捆啰，只要给吃，随便你们捆”。新社会啰，不能饿死人啰。更何况是瓦片都没得的穷光蛋。做贼又咋个？不穷，能做贼么？共产党早在，能做贼么？

老威：这土改，真是越改越荒诞。

杨自海：只有地富分子倒霉到底，从解放土改，次次运动都逃不掉。我妈妈杨玉贤，是1961年饿死的，没一颗粮食了，就一把把抓灶灰往嘴里填。我说不下去了，再说，这口气就上不来了。哦呼——，哦呼——，对不起啰，哦呼……

土改受害者杨品英

这对可怜老人的访谈是交替进行的。加之语言含混，伴之惊涛骇浪的气喘，我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回放录音。幸而有孙医生在旁边不断地注释，往事的轮廓方如沉船一般，一点一滴从波涛中闪现。

为了方便阅读，也因为杨品英的回忆本身比较独立，我做了文字技术上的剔分处理，以及语气、语感、节奏方面的压缩和调整。所以在原有场景的真实性上，没做到百分百，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原汁原味。我在此祈求土改冤魂们的理解和谅解，但愿这唯一的个体见证能经得住岁月的磨损。

山洞般的土屋，火坑边的病危老人，气管的哮喘，手的战栗——我这个当年土改工作组一样的外省人，兀然闯入。不是要救援，而是为了将他们拖进更加深重的历史灾难中。

上帝啊，用您那无底的杯子，来承接世人的泪吧。

老威：大妈没问题吧？

杨品英：没问题。抖了好几年。没问题。

老威：看样子，你有话说？

杨品英：哦哦。我娘家是发窝乡汤黑村，不太远啰。发块、利米、尼阿勒、汤黑几个村的人，赶街经常凑一块。我和杨自海是亲戚，我的爸爸是他的大舅，我的四爸是他的四舅，我的姨妈是他的妈妈。自小，两家人就亲如一家人。

老威：那你们算近亲结婚了。

杨品英：彝族人都喜欢亲上加亲。解放前，他爸爸虽然当保长，可家境并不富裕，还要经常靠我娘家铺贴。

老威：你娘家有多少土地？

杨品英：一小点。我们彝族地区，在山坡上烧荒种地，家家收的粮食都不太够吃。可我大舅头脑灵活，会做生意，隔三差五赶街时，他就在山里面的田心、发窝等场口，收购些猪羊、鸡鸭，再吆起骡马车，运到山外面的插甸、高桥去卖。

老威：我们昨天就从高桥，经插甸过来，颠簸了好几个钟头呢。

杨品英：以前没公路，骡马车要跑一两天，过坳口时，还要提防土匪。赚点差价不容易，血汗钱啰。

老威：按现在的观点，你爸爸是本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先驱。

杨品英：做生意风险大，可的确比种地划算。我至今还记得，爸爸每次回家，饿得跟老虎似的，卸了骡马，抖抖灰，手脸都不洗，就蹲在门槛上，从妈妈手里接饭吃。他要呼哧呼哧连整3斗碗干饭，1碗肥猪肉，才抬起头，伸个懒腰，出口粗气。然后转脑壳进屋，蒙头睡个一天一夜。

妈妈趁爸爸睡得香，就会把他丢在一边的脏衣裤拣起来，搜出一堆乱七八糟的钱，银元、角子、票子、铜版都有，捧到旮旯里，一遍接一遍地数。她不准儿女去偷看，说娃娃家爱钱不应该。可我们在墙外，却听见她一个人噉噉喳喳的，可能是高兴啰。因为爸爸跑一次生意，够全家用好久。

我娘家在本村富了，名声在外，穷人就眼红。我爸爸性子直，总是说：眼红有个屁用，有本事自己出力去挣，荞面粑粑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可是转眼解放了，荞面粑粑就真从天上往下掉，人不必有本事，穷就是本事。上面派土改工作组进村，还没拢，就在打听那家最穷，那几个人吃不起饭，讨不起老婆，受人挖苦等等，然后对直去寻。见面了，二话不说，就送干粮。如果有空地，还将铺盖卷打开，大家滚一处。

老威：这叫访贫问苦，土改的前奏。

杨品英：除了惹一身虱子，好像没多大效果。因为人饿急了，只对吃听得懂，其它嘛，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人越穷越懒啰，喂饱就想睡觉。而且工作组有3个是南下干部，外省人，跟孙医生一样，说的是普通话。没出过大山沟的彝族，可能几辈人都没听过普通话。啥子“翻身做主”“剥削压迫”“三座大山”，哦哟！懵懵懂懂，鬼晓得啥子意思。

老威：工作组也听不懂本地话吧？

杨品英：有本地人翻译啰。不过他们文化高，在村子里蹲一段时间，就啥都弄得明白。晓得彝族喜欢跳舞，也加入进来；对歌也加入进来。我那时十三、四岁，脸盘子漂亮，嗓子又尖又高，可以站在坡坡上，你一段我一段唱大半天。工作组的河北人老唐就三天两头踢破门槛，要请我去唱。还说彝族山歌的调调好听，就是词太老，既然到新社会，就该换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新词。

老威：你是地主家小姐，还让唱新词？

杨品英：搞不清楚啰。我还被老唐请到工作组住的院子去对歌，4个姑娘4个小伙子，都穿民族服装，两人一组轮番对唱。老唐拿着笔和本子在旁边记。全村人都跑拢看热闹，一颗颗脑壳都挤冒烟啰。哦呀，不知不觉，跳舞对歌就变成运动。先是工作组发展的积极分子挨家挨户通知开会，慢慢就不用通知了，大家主动去开会，还争着发言。大概是1951年夏天吧，老唐一变脸，我娘家就出事了。

先是农民协会来通知，我娘家被评为地主了。杨自海爸爸当过保长，也地主；发块、汤黑两边的杨姓，只要和我们沾亲的，都地主。全村30多户，有9户地主富农。接着开诉苦会，地主家的大人都叫揪去斗争，算解放前的账；再接着命令交粮交钱，按人头，一个罚多少，自己交到田心乡去。哦呀，家里很快就搞空了。骡马、房子也没收，换一间穷人的草棚给我们住；爸爸妈妈也被民兵押去关，一两个月不回家。我们送饭去，看见妈妈正被吊在梁上，逼她

交待隐瞒的财产。其实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民兵抄家，就剩一口缺了边的锅给我们。我哀求说：还是留几个碗下来。民兵答应好，就当场摔烂几个碗，喊狗地主拣碗啰。

老威：书中写的，在旧社会，贫下中农就过的你们这种日子。

杨品英：宁愿被土匪抢，也不愿被土改成地主。因为土匪最多抢一次两次，碰上了，算你运气差，总不可能一辈子挨抢吧？当地主是这辈人挨抢，下辈人跟着挨抢，你不服，想抬起脑壳做人，大家就斗争你，把你的脑壳按下去。

乡里的地主斗死了好几个。小华甸（音译）村有个匪，从来不抢穷人，从来不抢附近几个村的人，而是跑得远远的，专抢出名的大户。听说真发了点财。那次到小华甸开群众大会，逼他交出“不义之财”，他犟着脖子不吭声，把大伙惹毛了。民兵下手不够狠，他耸耸肩膀就扛过了；工作组的老唐下台来，笑着拍他背：共产党的政策你可明白？老实一点。他还是犟着脖子不吭声。老唐就笑着一拳，把他打蹲下去，接着蹦了个高，又踢又睬。全场惊呆了，都是第一次看见工作组打人，而且赤手空拳这么厉害，当场就把土匪的肋骨整断两根。眼看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老唐挥挥手，让他大儿子上去，背他爸爸回家。

老威：这个人不就残废了？

杨品英：哦呀，第二天又站起来，去找工作组道歉认罪。

老威：变魔术啰。

杨品英：他家里有一种祖传的药酒，当夜他连灌几次，连敷几次，肋骨就接好了。到处走，没事儿。

可我爸爸吓坏了。他在几个村子转着挨斗，这是头次见身边活生生的人转眼瘫痪。家里人在台下老远，也感觉他浑身哆嗦，有些站不稳了。政府还算人道，那天将所有挨斗的土匪、恶霸、地主都放回家。老唐说：这个人的下场大家都看见了，回去好好反省两天。

我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希望亲属们也配合做做思想转化工作。

老威：转化什么呢？

杨品英：不晓得。娘家的大事小事都我爸爸说了算，可那时候，他完全垮了。回到家，头天不吃不喝，第二天还是不吃不喝。妈妈用破锅煮了些洋芋，和 3 个儿女缩到旮旯里吃，尽量不出声响。天看着看着擦黑了，妈妈就过去和爸爸躺在一块，噉噉喳喳咬耳朵，开始听不清他们摆啥子。妈妈哭了，爸爸也哭了，这辈子，我还没听见爸爸哭呢，闷声闷气的，一个劲地抽。到后来，他们突然吵架。爸爸说：这日子过不成嘞！过不成嘞！妈妈说：为啥过不成？以前都忍了，以后为啥不能忍？爸爸说：打呀骂呀关呀吊呀，挖苦呀，牲口一样对待呀，都能忍，变了狗还怕吃屎么？可前天大家都看见了，工作组带头把人往死里整！妈妈说：那是匪，我们又不是匪。爸爸说：我们说不好比匪还惨！他们诬我解放前跑生意与匪勾结，抢了哪个哪个。妈妈说：哪过哪个都穷得叮当响，有啥子抢头？你有嘴巴罗，辨得清楚罗。爸爸说：辨得清楚还会当地主？田心、发窝都毙了几批，搞不好下回就轮到我。妈妈说：杨二爷呀，你莫吓人罗！

老威：你爸爸叫杨二爷？

杨品英：是。他 52 岁死的。

老威：你妈妈呢？

杨品英：叫腊月。1960 年饿死，活了 58 岁。

老威：你妈妈姓什么？

杨品英：不晓得。那晚爸爸妈妈互相抱着吵架，哦呀，爸爸两天没吃没喝，还吵得动嘞。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妈妈回到我们这儿，使劲搂着，让我们莫朝爸爸那边看。

天更黑了，不一会儿又亮开了，原来是月亮出来了。草棚门眶

唾两下，还以为是刮风呢，却是四爸的脑壳拱进来。整个杨家，就四爸的文化高，有见识，他读过初中嘞。这时候他来，先蹲下身子，在草铺边安慰我妈妈，还给我和弟弟两颗水果糖。风声这么紧，他还能搞到水果糖，真不简单。妈妈说：兄弟你快劝劝你大哥，他不想活。四爸怪怪地笑了笑。妈妈又催：你有文化，只有你能劝动他不死。四爸说：嫂嫂，我连自己都劝不动，莫提劝大哥嘞。妈妈流泪了，我和弟弟虽不懂事，也感觉到不对劲，就放声哭。四爸立即堵住我们的嘴。

我爸爸已从铺上起身，冲四爸点点头说：你来了。四爸也站起来说：我来了。爸爸说：婆娘娃娃一大堆，说话不方便，我们出去。四爸说：好，我们出去。妈妈说：等一下我。爸爸说：你晓得我们出去干啥子。你拦不住的。所以还是留在屋里陪娃娃。妈妈跪在地上，嘭嘭嘭磕了3个头，哭喊道：杨二爷呀，好忍心嘞！爸爸说：腊月，对不住了。眼前能自己作主，比以后自己作不了主痛快嘞。

老威：你们就眼睁睁盯着……

杨品英：是。一家几口眼睁睁盯着他俩走出门。月亮很大，草棚四处都在漏光。岩子后的黑老鸦呱呱叫了一阵，我们冷得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晚我爸爸是上吊死的。他们走出村子，过了河，在那边的岩子顶上找了颗树。我爸爸将就自己的外裤，撕成布条条，挽个套，下巴挂牢就一了百了。四爸站在一边，安安静静等他大哥断完气，干脆后退几步望前冲，呼地跳下百米深的岩子。过后，村里人找尸体都花了一整天。

老威：以后呢？

杨品英：畏罪自杀嘞。不光彩嘞。在大会上，老唐代表工作组表了态，说我爸爸是恶霸地主，欺压贫雇农，还通匪。自杀算便宜了，为人民政府节约了子弹。接着娘家的大人全部抓起来，斗了无数次。直到1953年，土改结束。跟着我嫁到发块这边，相当于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

熬到 1979 年地富分子揭帽，大家平等，日子稍微好过。杨自海这个倒霉鬼，几十年的哮喘，干不得重体力活，是大半个废人。我呢，原来还里外一把手，可上前年得了这发抖的病，就只能一天到晚坐在这火塘边，动不得啰。抹脖子也抬不起手啰。废人望废人，看哪个先去天国。

老威：你们的儿女呢？

杨品英：刚才你看见的那个是我的小儿子，20 几岁，还整不成房子，结不成婚。现在我们就是村子里的穷人啰。幸好全村都信靠主，不搞阶级斗争了，不歧视人了。全部是上帝的儿女啰，记爱不记恨啰。特别是孙庆元的媳妇，对我们特别照顾，个个星期都要给我们送好吃的。

感谢主。感谢主……

退休政府官员苴公

前奏

这条寻访线索是个四处云游的摄影家朋友提供的。某天狭路相逢，彼此问询近况，我随口说还在“搞土改”。不料彼兴趣极浓，并当场摸出手机，给彼元谋县老家的舅舅打电话，三言两语就敲定了。

稍后在酒桌子上，我还表示疑问：你舅舅是政府官员，咋会干反政府的事儿？彼答：现在的政府官员，私底下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儿，当婊子立牌坊，社会主义墙角大家挖嘛。可我舅舅的情况还有点特别，他跟你一样，多看了几本书，假反动就变成真反动。

2007年4月8日凌晨从成都抵达昆明，滞留1日，拉上冤案线人孙医生，约也曾在元谋县做过政府官员的蒋老师见面。我刚说：土改这本书的开头就是我们3人……蒋老师就接上话茬：那结尾这趟也是我们3人。孙医生点头称好。

于是像循环的戏剧，第三日清晨，我们同样在老地方碰头，同样由蒋老师驾同一辆甲壳虫型的小车，乘兴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却有闹有笑。我说：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元谋，北京猿人，元谋猿人、山顶洞人。没料到这次还真投奔祖先去了。孙医生说：时代朝前你朝后，跟考古一个性质嘛。蒋老师说：对对。所以我们愿意陪你。

沿途停了两三次车，我们借小便空隙，参观了云南白药的原料基地。气温极低，令人下车就打寒战。哈气成冰夸张了，但吹气成雾却实实在在。蒋老师说：这儿是马头山制高点，差不多是马眼睛的位置，从眼下起，全是下坡路，从马脖子到马屁股，落脚点就是元谋县城。

下完马脖子，连拐两三个山坳，刚拢一个叫“大梁子”的场口，

一团团空心石头般的积雾便迎面砸来，令人晕头转向。蒋老师立即减速，把汽车变成牛车，一寸一寸挪动，可双眼透过镜片，鼓得像两颗核桃。我说：刚才空气比玻璃还透，怎么眨眼就成迷宫了？蒋老师说：元谋是云南最热的地方，每年5月，气温就窜高40多度。蒸锅原理嘛，热气顺着山体往上翻，在这儿遭遇头顶的冷空气，就形成了迷宫带。我调侃说：我们祖先咋会选口蒸锅定居？孙医生插话：猿人时期，元谋说不定是个四季如春的风景区呢，后来树砍光了，当然变成蒸锅。蒋老师刚说：对啰，四周差不多变为老威的脑壳……车嘎地刹住，路堵了。原来有倒霉鬼连人带车栽岩了。

等候十几分钟。不料我车前面的大卡车突然发作羊癫疯，坦克一般倒退而来。我车措手不及，刹那间竟扎入货箱之下，犹如被怪兽的巨嘴吞入半截。我们3张嘴一起呐喊，以蒋老师的女声为最，惊恐，尖利，像被几十把刀子给刺穿。

然而呐喊并没有阻止末日的降临，我们仍在巨轮之下，在轰鸣之上，中邪一般后退。眼看要坠崖，而且是万丈悬崖。四周掀起了人声的骇浪。怪兽嘎嚓一下站住了。

如梦方醒的卡车司机跑了过来；

屁股后跟了一大堆看客。透过车窗玻璃，那些脸如从云雾山洞里飘出。

有一只后轮已悬空。我们3人面面相觑，不由自主地哆嗦。后来在县城修车时，蒋老师还心有余悸，指责我是“著名的扫帚星”。我问为什么？她说：你忘了前年的第一趟土改采访？也是这辆车，也是这3个人，结果陷进泥坑，差点没起得来。我连忙哦哦，猛拍秃脑门，称“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下午两点过，我们坐在小饭馆里狂吃一顿，算自己给自己压惊。元谋是个没啥特点的小县城，就一些高低不平的房子，一些宽窄不等的街道。因刚下过雨，行人稀稀拉拉，空气也黏乎乎的，像被铺

天盖地的油汤给滤过一遍。但是蒋老师却数说了此地的不少优越之处，其中有蔬菜特别新鲜，番茄比外面的苹果还好吃，等等。

我点头称是。接着让这位昔日父母官带路，去中兴街某某号寻另一位昔日父母官。在当街铁门外大呼小叫一阵，又打了电话，一个头发乱如刺猬、衣着简如乡民的家伙才开门纳客。大家相视一笑，他自我介绍道：苴公，你朋友的舅舅，元谋县政府某某部门原主任。说着绽露出一口比头发更乱的牙。

从小院子上到2楼和3楼，我们参观了苴公的书房和卧室，陈年旧货、老书老杂志极多，可同样乱如刺猬。在客室，宾主各自掸扫臀下灰，落座。交谈开始。

老威：先生蛮有名士风度的。

苴公：人死就是一堆灰，既然活到这把年纪了，就没讲究的必要了。我侄儿来过电话，说你是专门搞土改专题的大作家？

老威：惭愧，惭愧。

苴公：我在县里负责编纂过《地方志》，晓得解放前元谋县长朱准的侄姑娘还活着，快90岁了。你可有兴趣？

老威：当然。经历过土改的老人我还想多采访几个呢。

苴公：抢救历史，义不容辞，一会儿我亲自带路。

老威：没料到先生你如此爽快！

苴公：共产党衙门呆过的人，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承认我以前也有毛病，可近几年活醒豁啰。每去一趟昆明，都要去逛地摊，买不少海外的盗版书回来啃。《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文革内幕》《往事并不如烟》刚读过不久，还有《炎黄春秋》上的文章，很有分量，很长见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看书想问题啰，可我身边退下来的老同志，一天到晚钓鱼打麻将，最多看点《晚霞报》，抄点

老年养生知识，没得意思。

老威：你是那年到元谋的？

苴公：我在昆明读的大学，1963 年毕业，就分来，一直在单位坐办公室。文革中是造反派，被结合进革委会，可因为胸无城府，不整人害人，也没树什么敌。后来提升进县政府，上进心实在缺乏，官当不大，就挪开屁股把座位让给有本事有野心的人。今年 67 啰，来日无多，才觉得平生最大的失误就是加入共产党。把成立了 57 年的新中国砍成两半截，前半截专制独裁，后半截贪污腐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真他妈的一无是处！越想越气愤，越想越觉得自己划不来，于是就在几年前写了份《退党申请》，递交给县委组织部。这下捅了大漏子，官阶从高到低的领导，都排着队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啊。嘿嘿，年轻时候，觉得入党光荣，入党不容易；可到老来，退党虽不光荣，却比入党更不容易。但是不行，我非退不可，免得我的子孙后代骂我是腐败分子，免得我夸海口标榜清白的时候，他们表面不吭声，转过脑壳就龇牙咧嘴笑。但是啊，组织不吃这一套，元谋这地方，自有猿人以来，就翻不出一个退党的，你苴公想借这个制造新闻效应，办不到。

老威：后来呢？

苴公：组织部长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不服我，就出了个主意：将组织关系从县委提出来，交给我个人，并开了介绍信，指明转入本人目前所在的街道党委。

老威：什么意思？

苴公：县委踢出的球，街道没接着，就装聋作哑嘛。如此，这个狗日的组织关系就永远睡在我的荷包里，甩不脱。我不交党费，也没人来要。组织部长说：卖我个面子，莫闹了，好歹你的铁饭碗还是共产党给的啰。

老威：还蛮有人情味的。

苴公：算了，莫提这流产的退党了。还是书归正传，给你们讲一件我所接触到的土改公案。

老威：洗耳恭听。

苴公：大概是 87 还是 86 年？有些含混了。上级转了 1 封《申诉信》到我手中，并责令我调查。咋个回事儿？原来这信是离县城不远的苴林乡 1 个老信信所写，他连续不断地申诉好几年，楚雄州委就将他的材料转发元谋县委。嘿嘿，县委领导一碰头，这个谁都不肯去的“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就落到我这个主任肩上。

苴林乡有个白沙井，从解放前到解放后，村民都在井里舀水吃。可到了土地改革，可能是工作组刚拢不久，有贫雇农发现井水有毒，就指控是村子里几户地主干的，其中就有这个申诉的老信信。在当时，这是个比较轰动的反革命集团案子，罪名除了投毒，还有放火、预谋杀人、反革命暴动等等。开群众大会公审，结果枪毙 1 个，无期徒刑 1 个，其他还判了好几个。

我动身到苴林乡，在白沙井蹲点整整 1 个月。每天上午、中午、下午都找不同角色的人问话，案子当事人及家属，贫下中农，民兵，农民协会，一般群众。我还跑了别的几个地方，尽量不漏掉任何关键性的细节。每一份讯问笔录，我都当场念给证人听，如认可，就签字盖手印。不认可就拉倒。

劳改农场也去了，法院的判刑材料也调来对照研究了。我的调查结论是：彻彻底底的假案。所有罪名都是通过刑讯逼供强加的，比如几个民兵轮番用柴块子暴打，不招，很可能当时就出人命。我给县委写了个将近 30 页纸的详细报告，仍然把老信信的《申诉信》，还有大量的询问笔录附在后面。其实老信信的要求很简单：感谢政府摘掉他戴了多年的“反动伪军”的帽子；要求政府摘掉他戴了多年却还没摘掉的“现行反革命”帽子。

老威：可怜啊可怜。

苴公：某某部长看了我的报告，点头认可，马上汇报给上级。县委为此召开专门会议，让我到场作详尽的案情介绍，并展开讨论。大家都认为，既然是元谋县境内发生的历史冤案，就应该由我们自己妥善处理，该摘帽就摘帽，该平反就平反，这样也能保个面子；如果以后让州委来清查、纠正、责令解决，就被动了。

老威：这个结局还算可以啰。

苴公：是。某某部长根据会议精神，将所有材料转给县委“历史旧案复查领导小组”。可谁都没想到，那个组长恰巧是土改后期由民办教师提升上来的干部，思想深处压根没觉得土改有错误。听说他翻了翻材料，只有一句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意思是，你平了这一桩案子，其它的跟着就来，到那时收不拢口，就相当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老威：可是 1979 年就给所有地富分子揭了帽。

苴公：左的思潮在党内影响还在，直到现在影响也还在。那个组长就是抵着不办，谁能拿他咋样？

老威：我手中有本《土地改革运动史》，2005 年出版，作者罗平汉。上面还在赞美土改是“中国农民伟大的翻身运动，它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苴公：所以，只要土改整个没翻，哪怕在其中发生过再多的局部冤案，都可以死拖死赖，时间一长，就不了了之。

老威：你写的那些材料呢？

苴公：全部上交了，这是组织原则。可能一直冷藏在公安局的档案里吧？这么多年又过去，当事人死得差不多了，材料销没销毁也不晓得。哎呀，你这个年轻人，还写土改！费力不讨好啰。

老威：我也算地主阶级狗崽子嘛。

苴公：《炎黄春秋》杂志上，也经常登一些揭露真相的文章。去年有一篇《土地改革法的夭折》，就透露了共产党内有相当一部

分人，不赞成以行政命令或暴力手段去推进土改。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大局，“和平土改”必然破产——明白人一看就晓得，这字里行间掩盖着何等血淋林的历史！我身处偏远小县城，也能读到这种与“八荣八耻”的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东西，算幸运了。说明胡锦涛还有点点想法，明里暗里都要显示：我这个胡式共产党，与毛式、邓式和江式不一样。

（鉴于被采访人的真名及职务需要隐私保护，该文使用了“苴公”的化名）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1）

前奏

2007年4月10日下午5点，我们跟随退休官员苴公出门，走了一段污水四溢却行人稠密的老街沿，来到宽阔笔直却人烟稀少的城边马路。由于蒋老师的小车已躺入修理店，我们就招手要了一辆机动三轮。4人挤进鸡笼一般的车棚，车身就嘎吱嘎吱摇曳不止。孙医生担心道：这行吗？可否再要一辆车？司机不服气道：咋个不行？水牛也能拉走的。见我们神色异样，又补充道：不过你们昆明下来的，普遍比元谋本地的要肥些。

蒋老师挂不住脸，我却被逗笑了，还回道：有啥子科学依据？苴公不耐烦道：快开快开！肥瘦跟你有狗屁相干？

司机踩几脚油门，车就如挨揍的野狗，呼的窜将出去，屁股拖长长一窜黑烟。蒋老师微笑道：这条路不错吧？它还是我几年前在这儿做官时主持修的。苴公却抬杠道：晓得啰，面子工程啰。孙医生立即附和：政府嘛，要办实事，不可以光做面子。我急忙挂免战牌道：同志们的要求莫太高，有路总比没路好，政府要脸总比不要脸好。

几句话还没落音，大路和城市都一起终结，估计有十来分钟行程。接着是乱七八糟的红土浆子路，泥槽翻起半人高的主路两旁，还分了数条叉。幸而该下车了。

但眼前可谓令人绝望的超级噪音区域！左边为汽车修理铺，停靠好几辆装卸式大货车；右边为汽车修理铺，停靠好几辆装卸式大货车，并且都在肆无忌惮的忙碌中。苴公站在一潭污水之侧，盛情指点一线浮面的砖头，请客人鱼贯而上，而自己牵着裤腿殿后。

过了简单的之字形水泥楼梯，现在我们已经两层楼的高度，脚下陷阱似的空间填了一堆车和人，而头上还有顶楼、悬崖、望不

尽的山峦和乌云。马路对面是田野，老娼妓一般，被人类蹂躏得无声哭泣的田野，灰红、灰黑之间，泛着灰白泪水似的生活垃圾。

我们要拜访的角色依次呈现。先是患有忧郁症的女儿，在门洞内冲我们笑了笑，没话；接着是在昆明打过工的见过世面的孙女，微黄的染发，挺灿烂的笑容。苴公在下面仰头招呼道：红英啊，你奶奶在不？

红英还未作答，本文的主角就在她的背后探出脑袋。有客人来？她小孩一般哈哈笑着。请进来！请进来！

屋里光线极暗，稍微适应了几秒钟，才认清狭窄的空间有 3 张床。我捏住这年近 90 的寿星的枯柴手，一起在靠窗的床沿落座。趁苴公作开场白的间隙，我默默祈祷，感谢上苍，感谢命运，如此眷顾于我，眷顾于我的工作。

老威：老人家身板还如此硬朗，真叫人高兴！

朱家学：吃得，睡得，走得。就是眼睛有毛病了，看东西麻麻杂杂的，所以姜蒜不能吃，辣椒花椒不能吃，牛肉羊肉不能吃。平时少生气。门出远了呢，要人牵着。是啰，活到这把岁数，啥子风浪没见过，啥子西洋镜没瞅穿过，有气也生不来。

老威：医生的告诫吗？

朱家学：医生？好多年没看过医生了。

老威：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了不起的医生，长期跑乡下，给农民治病。我呢，是个写陈年旧事的文人，眼下最感兴趣的是土改。

朱家学：土改？不敢提，不敢提。

老威：老人家不提，以后就没人提，历史的某一段就从你身上断线了。这位县政府的苴公，你们都熟悉吧？

朱家学：苴主任是我家的恩人啰。这座房子的地皮，就是他以

“侨眷”的名义，帮我们申请到的。

老威：我晓得你有个大你3岁的二嫂叫黄友瑞，定居美国；我还晓得2005年8月，你夫家重修过《湘潭石子坑居仁堂黄氏族谱》，里面对你丈夫的评价仍然很不公平，说什么“我黄氏家族，以德立家，友朝未继承，自食其果，后代子孙应引以为戒”。

朱家学：是啰。黄友朝已经平反了，湖南那边不太了解其中的冤屈。

老威：所以嘛，你得说。趁这么多人在场，你得把你经历过的都说出来。

朱家学：外面天黑了？

老威：还没有。

朱家学：我咋个感觉天黑了？孙女儿呢？红英！红英！快把灯拉燃！好，可以了，亮了。这个老威同志光着脑壳，像个和尚。哎呀，我家的事难得扯清楚啰。

老威：慢慢来。莫着急。我提个头：你是哪年出生的？

朱家学：我只记得属羊，今年88岁。

老威：据《黄氏族谱》里记载，你生于1919年8月22日。

朱家学：嘿嘿。

老威：你一直在这儿？

朱家学：我是土生土长的元谋人，老屋在离公路不远的大沟村。站在顶楼往下望，有一条贴着公路的机耕道；再朝前，弯弯曲曲的泥巴路，翻两个坎坎，就拢大沟村老屋了。房子塌了，院墙倒了，草已经1人多高。美国的二嫂资助钱，政府让我们搬到公路边，建了这座水泥房子，总算有个踏实的窝。

老威：旧社会最后一任元谋县县长叫？

朱家学：朱淮，是我大爷。他在云南讲武堂毕业，20年代就

跟随孙中山，勤务兵出身，参加过北伐，参加过抗日战争，屡立战功，从团长、旅长一直升到 12 师的师长。大爹他结婚，孙中山是证婚人，送了一对银芯，还有对联和条幅，可惜后来都毁于战火。

老威：不简单哦。你祖上是士绅家族吗？

朱家学：不，帮人的，一直帮，到我老爹（祖父）还在帮，是本地大户朱玉华家的长工。

老威：按土改的阶级标准，应该划成贫雇农。

朱家学：对啰。而且是大户很信任的贫雇农。我老爹头脑灵活，手脚麻利，帮工好多年，连婚事都由人家操办。本来我家姓杨，据附近十棵树村编纂的《杨氏族谱》记载，最先的老祖是明朝朱元璋时，从南京过来戍边，后来才在元谋定居下来。同志你想想，传了多少代？为啥我家又改姓朱？

老威：人家朱家对你家有大恩嘛。

朱家学：对啰。朱玉华帮我老爹立了门户，我家从此改姓。我老爹生了 4 儿 4 女，好像男丁都不太安分守己。小时候没办法，在坡上放猪放牛，可到了十几岁，就开始削尖脑袋朝外跑。

老威：跟现在一样吗？

朱家学：现在是跑外面打工，那阵是跑外面玩炮火，时局动荡啰。先是我大爹，一离元谋，就一二十年没音讯，二三十年才回乡。然后是我爹朱海，十几岁娶了个马街（即如今的元马镇）的媳妇，结果处不来。他媳妇家嫌我家穷，搬不出动不动就遭水淹的大沟村。我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昆明还不过瘾，竟下了广州。混几年，学会文化，还当上革命军第七团的团长。

老威：哪个部队的第七团？

朱家学：晓不得。

老威：不得了哦。

朱家学：我大爷的部队在上海驻扎过，打日本鬼子。他的儿子，也是我的堂弟朱家荣，是被复仇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的，当时才19岁。我大爷一直将堂弟的照片随身带着，抗战胜利返回云南时，还经常拿出来看，有时候还悄悄抹眼泪。

老威：后来呢？

朱家学：后来都回元谋。

老威：衣锦还乡啰。

朱家学：我爹是开着吉普车回来的，第一件事就忙着重修大沟村的房子，太烂了，没法住人了。我爹把房子迁到高坎上，再大的水也淹不着。可防得了水，却防不了匪。四几年的元谋乱得很，大股小股的土匪，十天半月来一次，胆大的抢，心虚的偷，与我家有仇的就点火烧房子。记得我家房子被烧了三四次，毁掉又建，建起又毁，搞得手忙脚乱。有一次，火燃旺了，我家的帮工上房泼水，埋伏着的土匪就从林子里打冷枪。帮工连中两弹，晃了好几下，才从3楼这么高，哗啦栽到院坝里。嘿，不偏不歪，正砸在我爹的脑壳顶，溅了一身血，看起来好像我爹杀了人。

老威：你家出两个大官，据说你大爷还是国大代表，土匪还敢找麻烦？

朱家学：都是为元谋。我爹刚回那阵儿，县城就叫攻破过一回，李县长也为国捐躯了。继任县长叫文泰和，把我家的门槛都踢破了，死活要请我爹当县里的自卫大队长，负责防匪守城。我老爹晓得了，还拉住我爹说：海娃呀，千万当不得！我家房子在城墙外，如果土匪攻不下城，惹毛了，就会像疯狗一样转嘴来咬！到时候我家遭殃，大沟村也遭殃。我爹说：我是军人啊，虽然如今退役还乡，可保境安民仍然是不可推卸的职责。

老威：明火执仗，攻城掠地，什么土匪这么厉害？

朱家学：为首的叫丁志平，枪法准得很……

（苴公插话：这个丁志平有些来历。他是丽江华坪人，二几年入党，随后与组织失去联系，所以到 1935 年又入一次。后来他受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的派遣，回云南组织反蒋武装，十分骁勇善战。拿行话说，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威：不是寻常意义的土匪啰。

苴公：可一解放，他真被当作土匪给抓了起来，逼着写交待，由当时的边纵丽江第 9 支队政委杨某某亲自审阅。哎呀，二几年入党，还受董必武直接派遣！资格比自己老得多啰。如果经过调查，情况属实的话，这个姓丁的阶下囚岂不转眼就变大功臣？要爬到我等脑壳上去！一旦他成上级，硬要追究我等将他打成土匪的罪名，咋个办？搞不好他也来个依样画葫芦，把我等当作土匪抓起来！他妈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推出去枪毙掉，死鬼总比活人好打发。

老威：万一上面追查咋办？

苴公：人死不能复生，事过境迁，多检讨几次总能过关啰。

老威：厉害厉害，这才是真正的匪性未改。）

朱家学：因果报应，逃不脱的。丁志平好威风哦，我爹费了天大的力气，还得到几支回民队伍的及时增援，才把他的人马打退。

老威：你家和回民还有交往？

朱家学：是啰，我老爹那辈有 4 弟兄，跟元谋周围的回民恩恩怨怨扯不清。我 7 岁时，回民就闹过起义，围住元谋老城，要把汉族赶走。那阵的县长姓董，还找我家老爹、二爷、四爷，商量咋个守城呢。我恍惚记得几个城门都着火，民房也燃了好几排，老百姓如炸窝的马蜂，轰轰轰满街窜，一会儿涌到这边，一会儿涌到那边。我爹还站在街中央指挥，又带人爬房子浇水，打墙，断火源。我二爷就是那次被烧死的。后来回民退了，两边经过谈判，和解了。但是我家老爹传话给回民，要他们交出领头的肖长安，抵我二爷的命。

肖长安怕死，就连夜逃到保山去，我家也就没继续追究。从此后，回汉两边客客气气，一说打土匪，两边都卖力。

老威：原来如此。请老人家再回头讲你爹守城。

朱家学：那个文泰和，还是第2个县长呢，吓破胆了，趁我爹在城墙上顶着，丢开县衙和家属连夜溜了。哎呀，又是我家遭殃！被丁志平一把火烧成白地。我爹又急又气，病倒了，弄到昆明住医院，还在病床上干瞪眼，啥都说不出来。我服侍他，忍不住在一边嘀咕：保城保城，保下来是座空城。人家是来找县长算账的，关你啥子事嘛。

老威：接着呢？

朱家学：接着就是我大爹朱准被委任为元谋县长，1949年从昆明下来，当了大半年，就解放了。唉，我老爹还劝阻过他，兵荒马乱，你既然在外面当过师长，就趁着关系多，场子上蹬打得开，瞅个空子跑啰，何必要回来趟浑水！元谋各方面太复杂，本事再大，也要当心阴沟里翻船。可我大爹没听，一幅“受命于为难之际”的样子。最后一次，丁志平带人攻城，眼看守不住，我大爹才连夜突围，上昆明搬兵。搬来了卢汉手下的保安7团，可一拢城，见炮火喧天，都怕送死，就退得远远地驻扎。我大爹急了，叫团长带头出击，团长不动；他又去叫营长，结果营长刚和他一块出军营，膀子就挨了一枪。跟在屁股后的兵吓得手脚抽筋，哗啦一声全散了。营长就躺在地下吼：团长呢？团长钻了哪个牛屁眼？老子在前头给他顶炮火，等伤好些了，动得了，老子就找他拼命！

老威：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真该垮台啰。

朱家学：救兵没起着啥作用，元谋城里死了许多人。后来丁志平自己退了。再后来解放军就进城了，大家都传，是跟地下党里应外合。

老威：你大爹被俘虏了？

朱家学：逃了。在之前，云南省主席卢汉托人带手书给他，意思是大势已去，要自己看兆头。我大爷还没琢磨明白，就来不及了。

老威：你亲眼见着你大爷逃跑？

朱家学：黄友朝在昆明，我们结婚后，生了大姑娘，就住昆明了。家里出事，我妈没人管，我就不顾黄友朝的阻拦，硬要回元谋接我妈。哎呀，哪还有家哦，大沟村烧光了，全家都搬进城内的蒋家巷暂时呆着。我说：妈妈，啥子都不要了，赶快走啰。我妈却糊里糊涂，舍不得家里的坛坛罐罐。当时我大爷刚刚失踪，听说是换了件麻布衣裳，化妆成老百姓跑的。过了几天几夜，家里才晓得他被抓住的消息——饭没吃水没喝，他就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可翻到马头山，大概在白云坡吧，被罗真撞上了……

老威：我们曾路过马头山，地理很险要。你大爷想逃往昆明吗？

朱家学：不晓得是上昆明还是进禄劝，总之就撞上罗真了。这个罗真是民青成员（即民主青年同盟，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老威注），正带着解放军，漫山遍野搜我大爷。尽管我大爷过卡子时，还包着头帕，挑了一担土碗，可还是被罗真一眼认出了。他首先朝天开一炮，百把条枪就上上下下冲过来，“缴枪不杀”吼得比雷响。其实大爷他哪来的枪啊？只能高举双手，让一堆人按在地下，拿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罗真一路都在打我大爷，一会儿拳头一会儿耳光，一会儿又是棍子，连解放军都看不下去，拦住不让继续打。我大爷先被关在武定监狱，后来又叫押回元谋。

（直公插话：这个罗真也算元谋的老革命，可在八几年的时候，不晓得因为啥子问题，受到审查，一时想不通，就自己上吊自杀。）

朱家学：罗真还是我么爹朱杨的干儿。可他爹罗久师不晓得跟哪个结了梁子，莫名其妙被杀了。后来他却将这个罪名安在我大爷脑壳上，口口声声要报阶级仇。

老威：你大爷什么时候被杀的？

朱家学：1950年1月17号元谋解放，1月26号我大爹被公审，枪毙掉。死前人家问他有啥遗言，他就说了8个字：生为元谋，死为元谋。

老威：你大爹算条硬汉。

朱家学：枪毙他那天，元谋老城大街小巷都挤的是人，树上房顶上都爬着人，解放军、地下党，前前后后好几百，押着他朝刑场走。我大爹自从二几年跟随孙中山北伐，身经数百仗，啥子场面没见过，生离死别都看麻木了。所以还边走边笑。拢了土坑坑前，解放军的枪筒子抵住后脑勺，吼“跪下”，他回过头，眼睛都没眨，大声说：你也是军人，我也是军人，军人不可以跪着死。解放军上去四、五个，都没把他压服贴，就只好让他站着挨枪啰。

人不人，鬼不鬼，野兽不野兽，畜生不畜生。我早就有死的心了，可娃娃咋办？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2）

夜幕渐渐降临，我开窗透气，几颗星星居然出来了。蒋老师一边作笔录一边说，明天千万别晴，因为那不幸的太阳一旦升起，气温跟着就疯狗一般往上窜。我说：有这么严重？那元谋猿人咋几百万年前就到这儿了？朱家的人都笑了，连称“不碍事”，老寿星更是夸口，说整个夏天自己扇子也不用。少吃造火的东西，心静自然凉嘛。孙医生问：你经历了那么多惨剧，能做到心静自然凉？老寿星点头说：因果报应，不用去管它啰，那些整过我家的贫雇农，多数都短命，三四十岁，五六十岁，老天就把他们给收去了。偶尔有两三个熬够七八十岁的，要不就孤寡，要不就多病，要不就儿孙不孝。有时在马街碰上我，头都抬不起。我说：对对，上苍有眼，他们都注定活不过你老人家。连毛泽东这个大魔头，人人吼“万寿无疆”的，也就熬到80出头，不仅死得难看，儿孙也难看。老寿星听得心花怒放，连夸“红英乖孙女，又漂亮又懂事，与我最合得来”。

红英有些羞涩地站起来，对大家说：饭已经摆好了，请随便用一点。我们稍微推辞，就跟红英出这门进那门，来到居中的逼仄的堂屋里。我始终扶着老寿星，使她觉得又“遇上一个忘年之交”。接着落座，客主十来个人围住一张黑乎乎的矮桌，面上有荤二素四。灯光昏暗，迎门的墙中央，照旧是福禄寿三星的拙劣年画，以及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我们承其传统的恩泽，在下面你请我让。红英在给老祖宗夹菜，朱家女婿的主攻对象却是我，不过几秒钟，碗内的肥肉块子就堆满了，吓得蒋老师和孙医生立马将碗筷都搂在怀中。

我的确饿了，就连整肉饭若干。可能是胃口接近，朱家女婿和我侃起四川话，原来他是四川自贡地区的农民，80年代初流落至此，走投无路，就做了这个破落地主家族的上门女婿。“开始在大沟村，连房子漏了都没钱翻修，成分高，没地位，遭人歧视，后来

才慢慢好起来。特别是有了海外亲戚，成为统战对象，就更上一层楼。”我随口问为什么？“元谋小地方，统战对象稀少，所以碰着统战时期，我们还是能得到某些实惠。比如这房子的地皮，政府就没要钱，这年头，啥子不要钱啰？”

不晓得什么原因，红英嘟着嘴，吆喝一声，阻止她爸爸侃下去。她妈妈却没有一句话。本来我们准备暂别的，可老寿星用餐后，余兴未减。我看了看时间，才八点多，就问红英是否继续？或继续后是否影响老人的睡眠？

星星还在天边闪耀。红英笑着说：没关系，我也想多了解一点我家的旧事儿。

老威：你大爹家还剩什么人？

朱家学：我大妈是大半年以后被枪毙的。她是苏州人，读过女子学校，属大家闺秀，却 20 来岁就跟随我大爹走南闯北。他们家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上海被日本人杀害，剩两个小的，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没长成人。

老威：这个时候土改应该开始了。

朱家学：刚刚清匪反霸。可我大妈既不是匪也不是霸，就一个四十六岁的老婆娘。本来是关在县城，可大沟村的农民协会硬要把她弄回来，天天斗争她，打她。要死的那天，她半夜就醒了，对着我一直流泪。我说：大妈呀，星星还挂在天上，你再睡一会儿啰。她说：我倒想睡，想睡过去就再也不醒来，可是睡不着。我说：是不是叫打狠了，身上痛？我给你揉一揉。她说：自从你大爹去到现在，我哪天不挨打？哪天不痛？可心比肉痛多了。我一个外省人，从来不懂政治，从来不问江山社稷，只是在做姑娘时，倾慕英雄，那个军阀混战、翻天覆地的时代，哪个姑娘不倾慕流血不流泪的英雄呢？谁会预料今天客死他乡的下场！

听她的伤心话，我也忍不住流泪了，却不晓得如何劝解她。

老威：你当时也三十多岁吧？

朱家学：是。城里的房子被没收掉，全家老老少少都叫圈在大沟村。破草房住着，三天两头挨饿。我大妈真是来错了地方，她说的话，村里都没几个能懂，更莫提交流了。所以她说，想娘家，想死之前看看苏州。当然这相当于梦话啰。

老威：给她定的什么罪名？

朱家学：国民党县长太太。反革命分子。

老威：这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朱家学：人家说有，就有。大妈最不放心的是两个娃娃，所以她托付给我，东一句西一句，唠叨了好久还放心不下。我说：大妈呀，你不用再说了，有我一口吃，就有他们一口吃，没我一口吃，也不会让他们饿着。大妈点点头，又将外衣里面的三件好衣裳换下来，说是娘家几十年的箱底货，本来要穿着去见大爹的，这次就全送我。因为以后没机会感谢我了。

遭孽呀。我没法推辞，只能收下。天已蒙蒙亮了。我替大妈梳完最后一次头，就坐在草铺上候着。一会儿，民兵将我叫出去挖泥巴……

老威：挖什么泥巴？

朱家学：死人坑坑。大沟村的地主都押去挖。我是汗一把泪一把哦。接着民兵就挨家挨户通知开会，天大亮时，周围几个村都来齐了，人脑壳又是密密麻麻。我们全家，还有好多户地主都被圈在一块，参加大会的群众都朝我们吐口水。那天主持公审的叫朱恒元，是个南下干部，解放后元谋县第一任公安局长。他的老婆叫王婉兰，家里也是大地主，可不晓得施展了啥子手段，傍上大靠山朱恒元，成为革命太太，这一下子就翻身了。嘿，她还耀武扬威地站在台子上宣布：今天人民政府要枪毙老班果，枪毙老苏州。

老威：什么？

朱家学：老班果是我四婶，住在班果村，所以叫老班果；老苏州是我大妈，元谋就她一个苏州人，都叫她老苏州。

老威：她们的真名呢？

朱家学：我四婶叫张桂林，我大妈叫张丽娅。大家都记不得，所以枪毙时没宣布她们的真名。哎呀，啥子世道啰，王婉兰宣布完，我家两个老婆娘就被民兵拖过来，脚软了，走不动路，只有靠民兵拖。才到半路，鞋子就掉了，光脚板磨出血了，裤子垮到半截，人已恍惚，估计啥子都不晓得了。翻了几个土坎坎，来到死人坑前，大家都亲眼见着我大妈跪在那里，挨了七枪。

老威：七枪？都打在哪儿了？

朱家学：民兵手抖，有几枪没打准。中的全在脖子根，差不多要打断了。我大婶中的也在脖子根。脑壳耷起，血泡泡咕嘟咕嘟冒了好久。

老威：然后就栽进坑了？

朱家学：他们临时又变主意，要把死人抬到村子外面的田坝坝去。四个人抬一个，八个人抬两个。脖子拖着，脑壳一点一点朝地下坠，我实在不敢抬，民兵才让我抬大妈的脚，他们抬脑壳。这样折腾到河边，我瞅着不对劲，就扑通跪下磕头：求你们！让她们落土为安！民兵说：反革命婆娘死了，连狗都不如，啥子安不安啰。我跪在地上，整死不起来，他们不耐烦，就将我大妈和四婶扔在那儿，不管不顾地走掉了。

我一个瘦小婆娘，面对两个死人，喊天也无奈。只好回家。捱到第二天大早，摸到班果村，找到四婶的一对儿女。我说：弟弟妹妹哟，你们妈妈的尸体还摆在河滩边，还是大家一起去埋掉了事啰。哎呀，这两个狗日的不孝子，他们不敢去！人都死了，还有啥子阶级界线？可那个年头，都不敢去认！过了几天，我再去，尸体已经

叫野狗啃残了，脸皮肉都没了。我只好一个人慢慢掏，慢慢掏，弄一个浅浅的坑，勉强埋了。想一想啊，我大妈挺仁慈的一个外省婆娘，当年从昆明下来，人生地不熟，可见哪个都点头笑。她还随身带了两大箱子西药，村里村外，只要有人病了，她都赶过去。提起老苏州，哪个不念她的好！咋个一下子就变了呢？就算我大爷反革命，她也不一定就反革命啰。这个因果报应可有点不准。

十几个大人打一个娃娃，当场就脸青面黑，咽气了。我将他抱回屋，还以为死啰，可他命大，后半夜又缓过来了。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 (3)

2007年4月10日夜10点11分，访谈双方都困倦了，因此暂停。我们随即告辞，在鬼影晃动的空街奔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寻着一辆元谋特色的机动三轮。直公拱手作别不久，三轮开始爬坡，并且又持续半个多小时。遇一急弯，三轮发出怒吼，却停滞不前，我们只好跟在车后，摸黑步行一段。

由于蒋老师的关系，我们免费住进相当于3星级的政府招待所，这是土改专题发展至今，享受的最高待遇。我照旧和孙医生同一房间，照旧让他先上厕所，几秒钟后他心情激动地探头报告：还有热水！我这个陋习成性的脏鬼却心不在焉地应道：好啊，洗个够。

洗完澡，孙医生累得不行，很快就入梦了。我本想躺在床上钻研一番自朱家带回的《黄氏族谱》，不料刚看完首页上写的“黄氏为黄帝的直系后裔，黄帝第10代孙陆终之长子樊人跟随大禹治水立了大功，夏禹治水成功，论功行赏……受封黄国……规定凡黄国地方子民都享受黄姓，黄姓从此繁衍发展，相传已至160多代，4800多年矣！”瞌睡竟如洪水滔滔，将我卷入遗忘海底。

重出海面之际，感觉孙医生在湿漉漉的睫毛之上，占据了整个天空。他唤一声老威，四面八方就回荡好几声老威。我终于坐起身，一问时间，快9点了。

匆匆忙忙地出街吃东西。匆匆忙忙地重蹈覆辙。老寿星和她的小孙女早已梳洗打扮毕，坐在昨日的床沿静静等候。我们在雷声隐隐的闷热中赶到，东拉西扯地客套几句，我便翻开笔记本，如处理电影老胶片那样，熟练地拼接上断开的话头。

按下录音键的刹那，我猛然惊悚，多少年又多少年，我是否已符合“旧闻行规”，如一个标准的访谈工人？

正文**朱家学**：好多次我都对自己说：熬不得嘞，熬不得嘞，油

都快干啰。

老威：你家里其他人呢？

朱家学：我丈夫黄友朝，土改刚开始就当反革命关起来，一两年，连面都见不着。

老威：《黄氏族谱》里记载，你丈夫“1947年因参加所谓援胡志明组织越境，在马关被捕，后潜逃回元谋。解放前夕，又卷入一些不明的社会组织，解放初期又参加了反共救国军集团，判劳改5年……”

朱家学：政府早就平反了，还这么说，对死人也太不公平。

老威：你妈妈呢？

朱家学：土改才开头，她就被又绑又吊，一会儿正起吊，一会儿反起吊。场场开会都少不了。我妈妈也算大户人家出来的，年纪也大，脸皮也没我厚。有一天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家学，我活不成了。我一下子哭了，我说：妈妈，你病了？我想法给你抓药。她说：没得药啰，没得盼头啰。我说：熬啰，我陪你一起熬啰。我们是人，过了这土改，总要给一条活路。她说：你还年轻，你熬啰，我就不拖累你了。我说：妈妈，看在娃娃的面子，你不能这么想不开。她说：家学啊，顾自己，顾娃娃，不要顾我。接着泪水哗啦哗啦下来，任由我咋个劝，她再也不吭气了。我在外面找来吃的，喂她，她死活不张嘴。过去三四天，她滴水未进，可出气进气都紧了。我着急呀，在亲戚那儿弄了块红糖，兑水给她喝，她还是不张嘴。硬要喂，糖水就从下巴一直淌进脖子。我急得放声哭起来，我捶着胸，我叫：妈妈呀，妈妈呀，你不要这样为难我！妈妈还是不吭气，眼睛却一动不动盯住我，好像在笑，又好像没笑。我心里发毛，就伸手摸她的额头，全是汗水！我又顺着摸了摸身上，全是汗水，衣裳裤子都贴肉了。天哪，几天不吃不喝，哪来这么多汗水？急忙去求医生。医生怕老地主，不敢来；我就抱起妈妈跑医院。

医生号了脉，开了中药。我还没来得及去捡，陶院长拢了，他弯腰看看，觉得不对劲，又号了脉，还翻来眼皮检查。然后说：你妈妈已经死了，你还抱着干啥？

老威：她死在你怀里，还好。

朱家学：还好？我已经哭不出来，没眼泪了。我妈妈是和我老爹一起抬出元谋城东门的……

老威：你老爹？跟着也死了？

朱家学：刚土改，农民协会放风，说要斗争他，几天就骇死了。我家将老爹入殓，用石灰封棺材里，停在蒋家巷老屋后面。

老威：没及时入土？

朱家学：群众不答应。说埋了也要挖起来斗。

老威：你老爹停了多久？

朱家学：两年多。直等到我妈妈过去，两代人就一块出丧啰。老爹好歹有棺材，我妈妈就几块薄板子框起。雇人抬到东门外埋的，一片乱坟地，解放前的叫花子都葬那儿。

老威：真是旷古奇闻。

朱家学：死干净了，除一个坐牢的黄有朝，家里就剩我一个大人。可是三天两头，锣敲得哐哐哐，心惊肉跳、心惊肉跳啊。娃娃们都条件反射了，只要一听锣响，就哇哇哭。挤，挤，一遍遍挤，非把肉，把血，把骨髓都挤干。黄友朝受不了，害怕被整死，就交待了：你们不要再打我，不要再吊我，肠肠肚肚我都吐出来，好不好？我在元谋县邮局，还藏有两口箱子，那是我全部的家底。我本来打算熬过土改，再取出来，偷偷地吃，偷偷地穿，不惊动别人，只偷偷地把日子过下去。可现在，我怕死。我是耗子，我挖洞，我藏粮食。我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土改，对不起群众。我祖宗 18 代都剥削，我祖宗 18 代都不是好东西。我祖宗 18 代都贱种。毛主席说的，反动派，你不打，我就不会倒。莫打我了，不用你们动手，

我自己打自己。拿根绳子，我自己吊自己。

老威：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朱家学：没胡言乱语，邮局的确藏有解放前从昆明带回的两口皮箱。里面有大妈的金项链、金戒指、镯子，有我的嫁妆，还有呢子大衣。当新媳妇时，我都舍不得穿戴，这一下完了，民兵押着怕死鬼黄友朝，去邮局。还连累邮局的亲戚，被打得死去活来。黄友朝在一边眼睁睁看着，嘴里唠叨“作孽呀作孽呀，我也是没办法呀”。

老威：这应该是土改的“赔罚”阶段了。我猜测，你丈夫也是为了保你的命，才交出最后的家底。

朱家学：是啰，收了箱子他们还开“庆功会”，有4家地富分子，十几口人弄来陪斗。我在刺藜笆上跪了几个钟头，膝盖烂了十几天。

老威：经过土改，你们家族上一辈几乎没活下来，你这一辈呢？

朱家学：大爹家1儿1女，现在还住大沟村。老二朱家全，14岁就叫弄到东山大沟修水库，饿得头昏眼花，还天天抬石头，实在受不了，就趁民兵不注意，偷跑回家。我把他锁在房子里，几天几夜没露面。可一露面，就被到处搜查的民兵给逮住，十几个大人打一个娃娃，当场就脸青面黑，咽气了。我将他抱回屋，还以为死啰，可他命大，后半夜又缓过来了。

老威：按年龄，你算他的长辈了。

朱家学：我今年88，他65，与我的大姑娘同岁。我四爹还有1儿1女，如今都70多岁，在昆明搞文化工作。

老威：他们退休后没回元谋吗？

朱家学：我那个堂弟朱家万，自从跑出去参加工作，一次都没回来过。

老威：他没有中国人普遍都有的“叶落归根”的观念吗？

朱家学：已经伤透心了，元谋这边的人他都不想见。

老威：你们去找过他？

朱家学：找过，他对家里人还很照顾。我孙女红英在昆明打工，经常进出他家。平时好好的，和和气气，你就别跟他提元谋，否则肯定翻脸。他曾赌咒：死了连骨灰也不要拿回来。

老威：永不还乡？真是个充满诗意的老人。

朱家学：唉，这又何必呢？

老威：你丈夫黄友朝也是永不还乡嘛。

朱家学：不，黄有朝是有乡还不了。我夫家在湖南湘潭，世代中医。黄有朝早年思想活跃，追求进步，跑过好多滩的。后来接触到地下党，一时激动，觉得找着了中国的希望。就加入了，还被国民党抓过一回，差点就没命，幸好逃脱了。由于在昆明被通缉，没法呆，所以地下党才安排他到元谋回民中学教书。我们是抗战期间认识的，那时我刚从昆华女中毕业。

老威：土改时他也在元谋教书吗？

朱家学：开始我们都上昆明了，家里出事，又回来，一下子就没走得脱，还遭冤枉判了 5 年刑。劳改期满继续留场，到 1962 年才回家，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次次运动都有份，文革就更惨。他是 1975 年死的，起因是大沟村的民兵连长怀疑他搞破坏，挖了连长家门口的石头。

老威：你丈夫想不通？

朱家学：经历了这么多变故，黄有朝早就胆小如鼠，连一般的贫下中农都不敢得罪，更莫提村上干部！为了息事宁人，他马上去将连家门口的石头垫好，还种了几颗龙舌兰。但是人家成心找茬，晚上召集社员大会，斗争黄有朝。连长控诉完，队长又跟到控诉，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黄有朝辩解说：我没搞破坏，调子莫提那么高。我也说：你们借他 100 个胆子，

他也不敢破坏到你民兵连长的头上！大家还不了解黄有朝？走路怕踩死蚂蚁，落树叶怕砸烂脑壳。队长一听就跳起来骂：两个狗地主不老实，就斗争个三天三夜！接着民兵连长又领呼口号。黄有朝气急攻心，指着连长连叫“你，你，你”，突然就翻倒地下。我弯腰抱起他的脑壳，直呼队长和连长的名字，“今天要你们拿个说法出来”。

大家怕出人命，抬起黄有朝跑大沟村卫生院，不行，又跑马街。由于天黑，外加折腾了两个多钟头才吊上水，黄有朝浑身已经冰凉了。我记得这天是阴历 10 月 15 号，他只活了 53 岁。

老威：病因是什么？

朱家学：不晓得。我只晓得是气死的。我从队里弄辆马车拉回尸体，又找队长借钱埋人。队长说钱归会计管，会计说钱要队长批准。两边踢皮球。

老威：这完全是蓄意谋杀。

朱家学：为葬黄有朝，我卖了一对猪。

老威：他什么时候平的反？

朱家学：死以后。1979 年地富分子揭帽，夫家那边和我联系上了。我 70 几岁才第 1 次去湖南湘潭探亲，人家问起黄有朝，我都只敢说病死的。

他在美国的二姐比我还大 3 岁，现在 91 了，还健在。她连连叹息“弟弟命苦”，还说早知如此，为啥不回湖南治病？她不晓得当时的政策已经允许黄有朝走，可大沟村一直卡着不开证明，走不了。

老威：难怪《黄氏族谱》的撰修者对他有较深的偏见，称之为“我黄氏家族最惨者，特别是祸及子孙”。

朱家学：是啰。我女儿维群自小受歧视，得了忧郁症，还没念着书，作为妈妈，我有责任啰。

土改受害者朱家全

前奏

整理这篇文字时，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脑内的图片文档，本想对照一番，尽可能多地搜索记忆残片，却猛然惊醒。随即内心起一阵抽搐。原来在一个多月前，我的相机已同所有乐器一道，永远丢失了——我一时懒惰，没将元谋之行的图片倒出来！

晃眼就往事已矣，悔过无济于事。只得翻开笔记本，让思维的虫子一点点爬回 2007 年 4 月 11 日上午。孙医生和蒋老师外出办事，剩我和苴公一道，坚持做完朱家学老人的访谈。接着又由老寿星及其孙女红英带路，去拜访本文的主角，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准的么儿。

老寿星眼力不济，沿途是我和红英轮番牵引；可脚力极健，对泥沼狭路、坡梁沟坎全然不怵，且谈笑风生。过了公路，又过了相当长的机耕道，我们拐入掺杂着农田的起起伏伏的村庄。老寿星杵着拐杖，站在一条深沟的边缘指点对面说：大沟村，我的老家。

一行人缓缓而下，耳畔溪水潺潺，泥土的腥味十分浓郁。我们过了沟，再缓缓而上，在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底，我为寿星拍了照。路绕着树盘桓两圈，就抵达枝桠掩蔽的大沟村头。土墙、砖墙、水泥墙、爬满了葛藤的废墙，横七竖八。我和红英在老寿星的鼓励下，用棍子辟哩啪啦抽打蓬勃发展的杂草，拨出一条沿土坎上墙的路。我终于俯瞰了占地大约一亩的朱家老宅，不过只剩残垣断壁。红英像个现代导游，在身旁指指点点，地基从哪儿到哪儿，堂屋、厢房从哪儿到哪儿，灶房在哪儿，解放前如何如何，解放后如何如何。我不禁嘀咕道：你 1982 年出生，咋晓得这么清楚？她笑道：90 年代搬家，我也有 10 几岁，后来又听老人一遍一遍讲，自然记住了。寻根啰，我懂得。

我以老墙为背景，为祖孙两代留影。老寿星准确指出土改时，工作组进村住哪儿，民兵连长住哪儿，农民协会的某某某住哪儿；还有最终害死自己男人的那块垫脚石的具体位置，几十年前龙舌兰的位置，等等。我瞅着那双快瞎掉的怒目，哦哦称是，暗里却唏嘘不已。红英挽牢婆婆的胳膊，直叫快走。如此拉拉扯扯出了村头，老寿星才心潮平息；大家沉默寡言了十几分钟，来到能禹镇轧花厂的大门前，不料老寿星又心潮澎湃起来，转头对孙女一再叮嘱：上面那户人家的地基下，埋着你老祖朱海的骨头，不要忘掉自己的出处啰，不要烧香都找不准方向啰。红英一脸沉重地点头答应“晓得了”。我却蓦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几十年来，也一再唠叨：二毛，我们的老家在成都小南街，有公馆哦，住了几辈人哦，解放后都遭没收了。

穿过不少稀稀拉拉、不伦不类的房屋，牛马来来去去，畜粪蜿蜒蜿蜒。我们到底在一扇铁门前站住了。红英叫门，应声而出的是个粗壮汉子，方脸浓眉，经介绍，他就是我的寻访对象，所谓恶霸地主的后人朱家全。

寒暄着进屋，我却习惯性地探头探脑。肮脏的院子，马圈、猪圈、鸡圈和人圈，异味相投，朝夕相闻。我刚掏出录音机，朱家全却顺手拿起来，反复端详，反复讯问，我不得不耐心讲解后，才切入正题。

老威：今年你多大岁数？

朱家全：65了。

老威：那土改开始时，你才七、八岁。

朱家全：对啰。

老威：有记忆吗？

朱家全：很模糊。

老威：你父亲长什么样子，有记忆吗？

朱家全：一点点。高大，不爱笑，当然，娃娃眼中的大人都高大。

老威：你父母没有照片留下来？

朱家全：我还有个姐姐，以前她那儿有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关心。总之都烧掉了，你想想，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多少次政治运动啊？我们是国民党、反革命、恶霸地主的后代，家里被抄过多少次？被整过多少次？活出来都不容易了，还保存啥子照片啰。如果叫贫下中农晓得了，就是“反攻倒算，铁证如山”。好了好了，跟你说没得用，你年轻了点。就像跟我的儿女说，也没得用，陈谷子烂芝麻，没人过问。你就是说你差点叫打死，他们也瘪嘴：你既然叫打死了，咋个还会生下我们？

老威：你父亲跟随过孙中山，参加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伐战争，做过国军师长，元谋县长，应该算这方圆百里的大人物啊。

朱家全：又不是共产党的大人物。

老威：你可知道你父母怎样被杀？

朱家全：记不得。

老威：总会有印象吧？

朱家全：真的记不得。

老威：没听旁边人提起过？

朱家全：过去不敢问不敢听，现在不愿问不愿听。农民嘛，就是种地打粮食，盖房子养牲口，娶媳妇生娃娃，把日子过下去。

老威：然后呢？

朱家全：还是种地打粮食，盖房子养牲口，娶媳妇生娃娃，把日子过下去。

老威：你就这么教育你的后代，也是你爹朱淮的后代？

朱家全：是嘞。但是他们不好好劳动，一门心思要朝昆明跑，要朝外省跑。荷包跑空了，在大城市饿着肚皮了，又灰溜溜地回来。20几岁，连媳妇都说不上。哎哟，不好办不好办。

老威：当年你爹不就往外跑吗？

朱家全：那是兵荒马乱的时代。投军扛炮火，就能捞着吃。我爹还在江苏娶了我妈，喝过洋墨水的大家闺秀，漂亮得很。

老威：还记得你妈妈的名字？

朱家全：张丽娅。

老威：还行啊，没把你妈妈的名字忘掉。

朱家全：也差一点点。我没念过书，加上我妈的名字不太顺口，时间一久，要想好半天才记得起。前一段，县里统战部还派人来找，我一看，父母的名字都写在书上的。朱淮，淮海的淮；张丽娅，一个女一个亚洲的亚。

我还晓得大哥朱家荣被日本鬼子杀了，为我爹抵的命。上海叫日本人占领，我二姐又在逃荒中丢了。我还有个姐姐叫朱家敏，大我两三岁。我是老么。

老威：还有呢？

朱家全：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来了一个外省知青，自称是我妈的侄姑娘，叫我哥，寻亲的嘞。

老威：你寻过亲吗？

朱家全：当地主子女的时候，想都没想过。后来揭帽了，我爹要上县志了，我才托人写信到江苏无锡广播电台，寻我妈那边的亲戚。如今也一二十年了，找不着了。估计那边的成分也高，土改中也叫赶尽杀绝了。

老威：虽然你土改时年龄小，可后来还是长大了。

朱家全：长大了？也没啥说的。地、富、反、坏、右、军、警、

宪、特，九种人的后代，贫下中农不会让你好过。

老威：可否讲具体点？

朱家全：挨斗啰。挨打啰。比如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

老威：怎么啦？

朱家全：唉，没意思，算了。

老威：听你堂姐朱家学讲，你 14 岁被弄去修水库，熬不住，就逃跑回家，结果被民兵搜查出来，差点打死？

朱家全：命大啰。现在我都六十几了，还提十几岁的事干啥？

老威：你堂姐救过你的命，也不提了？

朱家全：地富子女的命贱，就如蚂蚁被踩了，没死，还活过来，算运气可以。但是无产阶级的江山，贫下中农就是人上人，就凑合着，不吭一声地往下活啰。没搞破坏，敲锣通知你开会，你就去，不能不满，更不能一肚子火。因为你不搞破坏，总有其他地富分子搞破坏，陪斗算便宜了，不就弯个腰，挨几巴掌？大不了捆几绳子。你又不是主角，又不会把你朝死里整。我爹是国民党师长，元谋县县长，太威风啰，太显眼啰。这么大的地方，几十万农村家庭，出过几个师长、几个县长？所以共产党要枪打出头鸟。

老威：你还觉得杀自己父亲有几分道理？

朱家全：绝不是。我爹也绝对是英雄好汉。就是太威风啰，所以要累及子孙，让我们受气挨整，替父背过。听说毛主席的儿孙也不好，一样的啰。

老威：你这个宿命观很彻底啊。

朱家全：虱子顶不翻铺盖。省政协的人来过的，我也这么讲，不晓得。他们说：实事求是嘛。我说：实事求是也不晓得。嘿嘿，来诓我？讲好了给不了钱出不了名，讲坏了让我来担责任，万一那天政策又变，我又成阶级敌人……

老威：社会还是进步了，不至于此的。

朱家全：你见过好多事情哟，因为一句话、半句话把人弄死，你相不相信？我堂姐夫黄有朝，有文化有礼节，大气都不敢出的老好人，就因为民兵连长怀疑自己屋前的垫脚石被掏了，与他有关，就又打又骂，死在批斗会上。哎呀，说你年轻还不服气，到我这个岁数，错误要把你给犯死。

老威：谢谢大叔的提醒了。

朱家全：土改是贫下中农翻身，有了土地，得了实惠；改革开放后，阶级成分取消，大家平等，贫下中农和我们坐一条板凳上。原来都是乌龟对王八蛋，把脑壳伸得再直，哪个也比哪个高不到哪儿去。我们家族呢，有我这种，至今还在泥里土里打转，与大家长短一般齐的；也有又翻一次身，和我爹当年差不多风光的。把中间几十年拿走，嘿嘿，吃国民党和共产党皇粮的都有啰。

老威：谁吃共产党皇粮？

朱家全：我四爹的一儿一女啰，都在昆明市的国家单位。

老威：我晓得，都七十好几，比你大得多。

朱家全：我的堂哥哥朱家万，在军区歌舞团搞创作，还会拉小提琴，得过好多国家奖，不得了。

老威：听说他永不还乡？

朱家全：家里被杀掉那么多人，开始是害怕回来，以后可以回来，地方上欢迎回来，却伤心又灰心，不回来了。我这辈的都去过昆明他家，下辈的也经常去，嘴皮都劝破了，他就是不松口。话说急了，他还火，还摔东西。政府里的人去，他见都不见，他说：即使我孤老一人，也不想凑那个热闹，也不想上啥子县志。我死也不回元谋，连骨灰也不回元谋！就算我生错地点，做了一场噩梦吧。

苴公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故事。有一个叫张娅琴的女人，生于辽宁沈阳的一个书香门第。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以后，国破家亡，

举家逃难。这个张娅琴在南下途中和家人失散，只身一流落到贵州，经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大难不死，又流落到云南。昆明太乱，她呆不下去，不知如何又到了元谋。栖身元谋县中学，教书糊口。接下来呢，与元谋中学的校长好上了。我估计，她从小受的教育太良好，所以在这个偏远的县份找不到说话的人，实在寂寞得发慌。校长好歹也算见过世面吧，不得已，红颜薄命也就认了。她做了校长的小老婆，没两年呢，就解放了。跟着土改，校长成了地主，她连带成了地主婆，双双从学校被撵出来，在农村搭个草棚安家落户。天天挨打，夜夜挨斗，不晓得哪个干的缺德事，她的相也叫破了，额头上一个疤拉下来，经过脸颊，抵拢脖子根；一只手也吊起了。校长有大老婆，新社会新风尚，没地方可容下小老婆，所以她只有搬出校长家，虽然只是一个草棚，跟狗窝差不多的家。这是命啊，没户口没亲人没粮食，也没哪个村子肯承认这个读过书教过书的大活人……

老威：黑人黑户，贱民里的贱民。

苴公：对，那个年月，没文化光荣，有文化犯罪。我至今都不理解，这个毛泽东是个啥鸡巴怪胎？自己把书读得摇头晃脑，却喜欢大老粗，糟蹋文化人。所以这个弱不禁风的《红楼梦》里的小姐张娅琴，注定在普天之下皆文盲的社会里生不了根。她沦为叫花子，沦为疯婆娘，露宿街头，捡着任何东西都往嘴里塞。据说后来她又嫁了一个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过了一段，连老光棍都嫌弃她，赶她出门。我不晓得她的下落如何，总之 60 年代我刚分到元谋时，还经常碰见她，才 40 多岁吧，就满头白发。捣蛋娃娃朝她甩石头，打在身上头上，没一点反应，连出血了也不擦。哎呀，啥子世道啰，分辨不出人与鬼，正与邪，疯癫与清醒。哎呀，浪费了，浪费了，这辈子我就这么浪费了。

土改民兵何秀元（上）

前奏

刚打出这篇文字的标题，电话响了，是吴闯，称本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要前来拜访。我立即关闭电脑，正襟危坐于屋檐下，恭候20多分钟，无果。心神波动，遂找出《易经》，占了一卦，为“大过”，上下两个阴爻，中间四个阳爻，犹如两端脆弱的房梁。

既然栖身摇摇欲坠的房梁下，当然要格外小心；可如果整个国家犹如一座危房，小心也就没什么用。那么值此乱世，只能坚守正道，做自己眼下该做的，将成败得失交给老天去安排，这就叫“以大过之才，行大过之事”。

这么一琢磨，也就释然。因为土地改革这个系列已做了将近两年，风餐露宿，行踪飘忽，鞋底磨穿了几双，却没出过大的纰漏——恐怕上苍也眷顾于我，觉得应该为这一桩桩“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苦难留下最后的记录。

第三天，也就是2007年9月28日下午，下过雨，又出过太阳，正在不阴不阳之间，警察登门了。先是两男一女，极为客气地上阶沿寒暄，然后自我介绍，是本地国保部门，想请我去他们单位谈谈心。我笑道：是传讯吗？那么请诸位出示证件，还有写明正式理由的正式的《传唤证》。警察们立即声称不不，只因为你是著名作家，我们领导请你去做客。顺便嘛，谈些公事。我说：既然你们都找到这儿了，那就在这儿谈，院子里也没别的人，很方便。

彼此都微笑着，僵持了十来分钟。警察们就开始打电话。接着第二波高级警察登门，领头的是本地国保支队的杨政委及两个大队长。院里一下子进了7个不速之客，顿时闹热异常。

跟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一样，他们与我聊了一会儿家常，才由满头冒汗的大块头的杨政委切入正题。开场白是“共建和谐古城”，

我这样在国际上都知名的作家，本地人民更是欢迎，所以我来了那么久，他们从没有打搅过。我连忙致谢，并称自己愿意继续埋名隐姓。可杨政委话锋一转，说他们作为保守本地安全的职能部门，最不愿意看到有人破坏和谐，给古城抹黑。我沉默了，听他继续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为地主维权”的文章，社会影响很不好，他们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与我交流看法，能否停止写这类不和谐的东西？我点点头，却有些懵懂地问：什么时候我为地主维过权啦？况且土地改革已经过去 57 年，写写这段历史与今日的和谐有关系吗？杨政委答不上来，接着我又拿出一本 2005 年国内出版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给他看，申明连共产党中央在当时，都存在“暴力土改与和平土改两种倾向”，我作为一个有起码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为什么不能抢救和记录在暴风骤雨中的个人经历，为国为党填补这项历史空白？杨政委与我争辩了几句，由于隔行如隔山，只得悻悻然地撤退。不过我敏感到，他们此行之目的，不仅仅是为舞文弄墨的事，他们很好奇，我居然住在这么一个院子里，居然与这么一个院子的主人是朋友。虽然他们竭力掩饰，甚至一再询问院主名字及背景。

刚刚看过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搞了 20 多年文学，何曾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比《窃听风暴》更复杂的环境中？在强权之下，没有隐私可言；我已经和女友金琴分手许久，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了。我记起干我这行的榜样，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对自己最有力量保护，就是公开所有的真相。

说吧，记忆；说吧，垂死的地主和贫农。也许再过四、五年或五、六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那代人就缓缓失踪，一切都将从风平浪静过渡到死寂。

现在回到 2007 年 4 月 11 日下午的元谋县城。天气阴着。我们依旧由苴公领路，步行 20 多分钟，来到富强街中段。一个中年人拉开大铁门，将客人迎入僻静的院落，并站在院坝中央仰头叫了两

声“爹”。随即上二楼。本文主角何秀元正扶着门框，颤巍巍地恭候呢。我们紧赶两步，与老人家依次握手，还不约而同地赞扬他身板硬朗。

主客双方都哈哈笑着，气氛很融洽，戴着一顶褪色军帽的老人家越发慈祥，深锁在皱纹内的小眼如星光闪烁。经过苴公的撮合，话题自然而然就展开了。

客厅相当大，交谈回旋着进入了录音机。窗外是一座比较高的楼，三两只麻雀划着弧线，从此端到彼端。而楼下是狭窄的马路，市声隐隐，我突然想，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

老威：我是苴公的朋友，是搞土地改革这个专题的。

何秀元：好远的事情啰。几十年都没人过问啰。

老威：所以我特地登门拜访，一见老人家的样子，身体不错，脑袋也还灵光，就放心了。

何秀元：吃饭还可以，走路不太稳当了。同志你坐。

老威：你老先坐。

何秀元：不晓得从何说起呢？

老威：无所谓，只要你记得起的，就随便说。比如，你是哪年生的？**何秀元：**1927，今年整80。

老威：一直在元谋城里住吗？

何秀元：旧社会在城东边的一个村，叫官能，如今叫官能镇了。我家啥都没得，毛主席咋个说的呢？脑壳顶的是别人，脚下踩的是别人……

老威：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何秀元：对啰。我父母起早贪黑，打草鞋、割马草卖，还给大户人家做长短工，腰都累弯了，才将儿女5个拉扯大。接着呢，我

们又跟在父母屁股后面帮工，经常是几个人同时帮几家。收花生，运到油坊榨油；收甘蔗了，运到糖坊榨糖；大户人家盖院子，又去嘿咗嘿咗夯土墙。还挑水卖过，一挑水两分钱。

老威：按书上的说法，你们家算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

何秀元：老实说，我们家虽然下力，可没跟哪个结仇啰。

老威：受压迫、受剥削嘛。

何秀元：都是解放后，阶级觉悟提高了，才有这样的认识水平。

老威：地主打骂过你们吗？拖欠过工钱吗？

何秀元：没有，都是活路一干完，脚跟脚结账。有时天天结，有时几天结。大户人家顾及名声，不会在乎几个小钱，否则起了争执，下次就没人给你干。

老威：不干行吗？

何秀元：有啥不行？临解放我才 20 多岁，手脚麻利，还忙不赢。这家太小气，转头就去帮那家啰。

老威：听口气，你帮工还帮得抢手哦。

何秀元：也辛苦，几天不帮就没得吃。那时候经常用包谷抵工，算下来，1 人帮工 1 年，大概挣 1 升多包谷。

老威：你们家都这样？

何秀元：不完全，三几年时，我大哥被国民党抓过壮丁……

老威：哪儿的国民党？

何秀元：滇军。打过几年仗，他就在外头混了。我爷爷考过科举的，落了榜，就在家乡教私学。

老威：当地士绅的私学吗？

何秀元：不是 1 家人，而是好多家凑钱，请我爷爷教。私学地点嘛，先将一个废庙修修补补，过渡一阵，后来就设在大户人家的

院子里。还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呢。农闲时，娃娃们在屋里叽里哇啦读，大人们还在外面边抽水烟边看。娃娃多了，书教得复杂了，我爷爷忙得没工夫弄饭，二哥就被叫去打杂，日子久了，居然就会了些文化。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后来就解放，爷爷教的封建主义那一套自然就停了。我们家有了丁点底子，搬到元马镇街上住。工作组也来了，从苴林乡派下一个镇长，姓王，对穷人很信任。组织民兵队伍，我当时20多岁，就被吸收进去。

老威：你对工作组的印象如何？

何秀元：多数是南下干部，当地情况不太了解，所以要依靠穷人，组织了农民协会以后，就依靠农民协会。鼓励大胆工作，即使有偏差，也很少横加指责，而是找你单独谈心，一遍遍将政策交待清楚。总之，他们很少公开说啥子，第二天要开重要的群众大会了，头天晚上，工作组就要召集农会的头头，特别是贫雇农主席团的，一个也不准缺席。一条一款布置妥当，包括定调子、开头、收尾、唱什么歌喊什么口号、主要斗争对象由哪几个人带入会场、陪斗的站哪个位置、哪个范围的秩序该重点维持、如何应对骚动甚至突然间的失控，等等。

老威：很细致哦。

何秀元：我们家和工作组个个都熟，访贫问苦，还在我们家住，不怕虱子、蚊虫，不怕铺盖破烂。外出工作，回来吃饭提前通知，我们吃啥他们吃啥，往锅里多添两瓢水就行了，不让单独准备。每顿饭都要交钱交临时粮票，你不好意思收下，他们会非常严肃地说：这是共产党的纪律，任何人都得遵守。

老威：不简单。

何秀元：睡觉前也聊天，吃饭也聊天，随时揣个小本子，动不

动就拿出来记。生产咋样，哪年哪年的收成咋样，够不够吃，盐巴咋个解决，哪家哪家姓啥子，当家的叫啥子，几口人，靠佃田地种呢还是靠帮人，佃谁家的田地帮谁家的人，工钱咋个分，拖欠了咋个办……哎呀，问题多得不得了。后来才明白，人家水平高，任何时候都在干革命工作。

老威：作为贫农民兵，你们主要干什么？

何秀元：组织起来，巡逻、查夜、监视地主、开会维持秩序。最先的贫雇农主席团主席是周志勇，跟我父母一样，也是帮人的，苦大仇深，但人太老实，说话没水平，服不了众，很快就下台。接着大家选王正平当主席，才算固定下来。

老威：王正平有文化？

何秀元：没文化，帮人的，但能说会道，执行上面的政策来得快。当时的元谋城很小，就半坡上一点点，城墙以外差不多是荒坝坝。可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上面通知土改，划阶级，具体执行起来就不太好弄。后来整明白了，这个元马镇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有大地主、小地主、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

老威：有啥区别？

何秀元：大家评议，看你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出租土地呢，还是靠工商业？大头占前面，小头兼后面。其他还有破落地主，比如你家在解放前3年还有20多亩地，后来不争气，吃光喝完，把家产败了，却刚巧遇着变天。难道你也要浑水摸鱼，跟着一大伙穷人闹翻身？这可不行，就划破落地主。

老威：比唱戏还热闹啊。

何秀元：还有小摊贩、小土地出租、游民、富农、雇农、贫农、中农、下中农，复杂得很。

老威：由谁定呢？

何秀元：镇里开大会，传达土改精神，亮明3把尺子，土地财

产、长短工、是否收租子；村里群众就接着一家一家评议，先将地主刨出来，然后才是工商业、富农、游民，挨着往下划。嘿嘿，一群乌合之众，屁都不懂。开头你照顾他，提议给他划雇农，他不干，直惊叫唤：我是没房子老婆，但从来也没帮过工嘛。接着又划贫农，他还是不干，说整死不种地。于是大家觉得难办，就问他：你不帮工，靠啥子吃饭？他说：我有本事啰，城里乡下到处晃荡就能吃饭。于是大家说：是这样哦，我们想不起该给你划啥子，你就自己给自己划吧。他抠了半天脑壳才说：游民咋个样？游民比贫农要高明些。

老威：游民相当于现在的社会闲杂吧？

何秀元：对啰。贫农是依靠对象，游民是改造对象，几乎就是偷鸡摸狗的坏人。这个蠢驴，不做依靠对象，偏偏要挤进坏人堆里！后来政府要净化城乡风气，收容游民，集中起来改造，他才慌了：莫关我！我原来是贫农！可是后悔药没得吃啰。

老威：类似情况多吗？

何秀元：多的。到了评审阶段，大半都推倒重来，最后工作组主持开会，一条一款反复交待，大家才慢慢搞清楚。

老威：政策严格吗？

何秀元：弹性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大地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多少土地多少帮工才算恶霸一级？上面没明确的说法，或者暂时不拿出明确的说法，就交给群众来评。你在社会上处人处事过得去，民愤不大，大家多少能抬抬手，让你过关。否则就麻烦。我们这儿最大的地主是吴耀先，整庄子有好几个，外乡还有土地……

老威：什么叫整庄子？

何秀元：就是整个村的土地全是他的，村中几十户佃农全在他的门下，每村都有一个他委派的伙头，专门负责收租子。其他还有雷树膏，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还有朱淮，元谋县县长，过去威风得很的人物，统统定为恶霸。

老威：他们有土地吗？

何秀元：他们有权有势，要啥子不容易？只要看中了哪块地，说一声，就是他的了。跟现在当官的差不多嘛。

老威：他们的下场如何？

何秀元：都杀了。

老威：有多少个？

何秀元：太久远了，记不得了。

老威：拣记得的说一说。

何秀元：吴耀先是从昆明抓回来的，还没等到枪毙，就关死在元谋县监狱里。

老威：其他呢？

何秀元：杀了好多批，但执行的都是解放军和公安局，我们是外围民兵，主要维持秩序、看守、巡查，防止意外发生。

老威：请讲讲开公审大会的情况。

何秀元：清匪反霸的时候，有一次就枪毙了 13 个。头天就通知，监狱里加了几道岗，我们民兵通宵都挎枪在街上逛，只要遇到可疑的家伙，二话不说就关起来，没得问题，也要等大会开完再放。第二天上午，临到宣判结束，警卫连就开过来，将五花大绑的罪犯架拢事先挖好的坑坑前，齐刷刷跪一排，子弹在鞋帮子喳喳磨亮，上膛，步枪筒抵准后脑壳，只听得哨子呼地一吹，嘭嘭嘭一起搂火。硝烟味好浓啊，周围群众又是鼓掌又是喊，简直都兴奋得发狂了。

老威：清一色杀恶霸？

何秀元：有个叫张诰，恶霸的帮凶，主子遭抓了，气不过，就放火烧甘蔗地；还有杨永怀，划成大地主，他估计农民协会要去抄家，就在院子门楣顶栓了一颗手榴弹，哪个一推门就炸。幸好大家是翻墙进去抓的他。

老威：还记得审判长是谁？

何秀元：张兴德，一个南下干部。

老威：工作组的？

何秀元：法院的。还有公安局局长，叫朱恒堂。

老威：当时法院系统还没建立起来吧？

何秀元：哦，那就是临时法庭，工作组、贫雇农主席团都有。

老威：如此毙人的大会，相隔多久开一次？

何秀元：说不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十天半月都不一定。县城集中枪毙比较热闹，几千万把人，甚至几万人的时候都有。乡上开会规模自然小些，枪毙两三个，就不用提人到县里，由贫雇农主席团根据群众的呼声，商量商量哪个哪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再报给工作组，划了勾，最后让点长批准。

老威：点长拥有生杀大权？

何秀元：点长相当于后来的区长。

老威：工作团团长？

何秀元：小一点。

老威：管一个乡的工作队队长？

何秀元：有的又大一点，管两三个乡。

老威：点长亲临毙人现场吗？

何秀元：不一定。下面只要将名字报去，他批准就可以了。

老威：有没有先斩后奏的情况？

何秀元：开始有，后来被制止了。

老威：点长都由南下干部担任吗？

何秀元：多数是本地提拔起来的干部担任。

老威：有没有点长公报私仇呢？

何秀元：晓不得。我当时才 20 多岁，小小民兵，上面的事情晓不得。

土改民兵何秀元（下）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 2007 年 9 月 29 日中午，这家院子的主人远游归来。我从桌边起身相迎，寒暄之间，自然提起昨天国保警察登门拜访。主人微笑着说没事，主要是中共 17 大正在筹备，内忧外患加剧。我说这与本人有何关系？我连 17 大什么时候召开都不晓得。主人说：你可以不晓得，但是公安部要让下面落实你具体在何处。

我骇了一跳。心想有这么严重吗？可表面却不动声色。待坐回桌子边，我扳着指头算，从大理搬进这家有特殊背景的院子已有大半个月，风平浪静，甚至躲过了两三波户口盘查。皆因为房主是解放军中将军之子，为人率性，有《水浒传》里江湖庄主之风，这大约是遗传——乃父当年进军川西平原，就不顾党组织的数次告诫，甚至不顾开除党籍的警告，非要娶当时与刘文彩齐名的崇庆县恶霸地主某某某之女为妻。

真是世事难料，经多次酒酣耳热，我这个反革命居然与革命者成为朋友。甚至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佛道儒之学，我们都非常喜欢达赖喇嘛，认同“你的敌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他说，等到一定的时候，说不准他会将自己父母的土改故事讲给我听听。

那就等着吧，可眼下还是继续弄完手里的活路再说。

老威：讲讲你最熟悉的地主。

何秀元：我们家住南门，村里有两家地主，肖晓明、梅洪乾。印象中不是讨嫌的那种。认罪交浮财都积极。土改后上面规定了地富分子的“三要八不准”，每次开会，肖晓明、肖晓成两弟兄都背得滚瓜烂熟……

老威：啥子“三要八不准”？

何秀元：出门要请假，进门要销假，来客要报告；不准乱说乱动，不准搞破坏活动，不准搞迷信活动……

老威：还有呢？

何秀元：记不得啰。总之，地富分子年年、月月、天天要牢记。不牢记就要出差错，出差错就要挨打。来了客，出身贫雇农的，就批准住一晚黑，还得对客人进行阶级教育；出身不好的，马上撵起走。

老威：那阶级划清以后，减租退押又如何？

何秀元：政府主持公道，将解放前的老租约废除，换成新租约。比如从前佃农租地期限 1 年或者几年不等，如今就换成两三个月，老租约里写明的该交的租子统统砍掉，拖欠的也一概不算。退押嘛，就是在减租的基础上，命令地主把最初租地的押头退给佃农，并且根据物价的逐年涨幅，逐年增加。

老威：押头就是押金吧？那我交不起咋办？比如我把地租给你已经好几年，甚至 10 来年，最初的押金每亩地 1 块大洋，而现在你将 1 块大洋翻几倍，甚至十几倍，要我还你，我咋个还？

何秀元：家里的东西，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坛坛罐罐，能卖就卖，能抵押就抵押。总之，你在解放前越富，佃农越多，就越倒霉；越穷，越叫人看不起，就越扬眉吐气。这才是翻身嘛，昨天你踩我，今天我反过来踩你，你不服，有共产党做主，就斗争你，要你的老命。

老威：卖了，抵押了，掘地三尺了，我还是还不起，咋办？

何秀元：必要时候，该斗该关，该伤筋动骨，革命群众不会客气的。班果村的地主张建杨，就被弄来坐软轿……

老威：啥子叫坐软轿？

何秀元：让你坐一个独凳，把你的双脚捆拢，独凳两边放桌子，再把你的双手拉平，捆牢在桌面上；然后往你怀里揣石头，一块一

块，揣个几十斤；最后将独凳抽走，你的屁股就悬空了。

老威：啥子感觉？

何秀元：我没坐过，晓不得啥子感觉。只是那种叫法，将周围的人耳朵快震聋了，不怕你笑话，连看家狗都受不了，汪汪两声，就从院子中央箭一样射出门去。

老威：还有啥子花样？

何秀元：吴耀先有个狗腿子，叫李强贵，被弄来背石头。

老威：做苦工？

何秀元：让他站在太阳坝，背一箩筐，一块一块朝里面加石头，撑不住重量了，一屁股摔地上，又从头开始。如此折腾几小时，不见效，又将他的手指头用浸过油的麻线密密地绕，然后点火烧，整得他满地跳脚，不求饶也不行。

老威：隐瞒的浮财都交待了？

何秀元：他是狗腿子，没啥浮财，主要逼他说出吴耀先的财宝去处。因为本地最大的地主，财产到底有多少？哪个搞得清楚嘞？

老威：所以只能根据想象，拼命地挤。

何秀元：但是没挤出来，手指头烧掉几根，也没效果。

老威：那狗腿子的确不晓得狗脑子想的什么。

何秀元：但是的确有恶霸地主转移财产，逃避土改的现象。比如有个叫昌培林的中农，解放前同伪县长朱淮家关系不明不白，土改刚开始，朱家就悄悄将好些财产送昌家隐藏。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农民协会得到线报，就找昌培林谈话，要他自觉交待，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否则就死路一条。昌培林吓坏了，立马将朱家的浮财彻彻底底暴露，还低头认罪，痛哭流涕。后来大家研究了，他为恶霸当“防空洞”的事实清楚，但是向人民举手投降的事实也清楚，就从轻将他的中农成分升为小土地出租。

老威：他出没出租小土地呢？

何秀元：有剥削行为嘛。替剥削阶级隐瞒财物，就是变相的剥削。当然，浮财都由贫雇农、下中农分掉，中农以上粘不了边。

老威：你们家也分了？

何秀元：朱家属于大沟村那边，我们分不着，到底有个啥子也不晓得。我们家在土改中也分了土地、房子。班果村的一个地主，名字忘了，以前在乡下，后来搬到城里买了院子。土改了，包括我们的3家贫雇农就搬进去住。那时还没发正式的土地和房产证，打张条子，写上位于哪里哪里的土地，哪里哪里的房子，从某年某月某日，属于某某某，签个字划个押，就作数。公布了《土地法》以后，才把原来打的条子翻出来，换正规的《土地证》。

老威：减租退押的时间有多长？

何秀元：不到1年，地富的油水就算挤干了。

老威：之后的赔罚呢？

何秀元：其实赔也赔不出多少，罚也罚不出多少。也有城镇的游民，趁着土改，跑到农村去，住地主的院子，还不讲理，与贫雇农争了起来。

老威：游民属于哪个阶级？

何秀元：游民不务正业，讨口叫化、偷鸡摸狗、鼓吃霸欺，啥子都干得出来。按财产划分呢，本来是劳动人民，可也归入政府的改造对象。地、富、反、坏、游，五类分子。斗地主时，也弄来陪斗，说是受教育。嘿嘿，那个贫雇农成分不要，偏要当游民的人，每次挨斗都喊冤枉，声明自家三代帮人。大家都忍不住笑，还扯着他的耳朵说：自己争取来的，怪得了哪个？他就在地下又打滚又敲脚：鬼晓得哦，鬼晓得哦。不过呢，差一点的房子、土地还是要分给游民的，不能让他们在社会上吃混食啰。

老威：元谋县境有多少游民？

何秀元：几十百把个？记不得了。

老威：达不到枪毙级别，送劳改的地主多不多？

何秀元：不清楚了，总有好几十吧。最高有判无期的。元谋附近有个黎明农场，关地主、反革命，后来也关右派。说老实话，南下干部拢地方，脾气也见涨，经常独断专行，不把本地干部放眼里，所以容易摔跟头。有个南下的，老家有原配夫人，到元谋后又染了个年轻的。后来他回去探亲，可能是商量离婚啰，不料原配夫人不久就莫名其妙死了。这可不得了，他洗刷不清，被抓起来，以谋杀罪判死缓。事隔多年平反，人们还私下说，这是他乱搞的报应。

老威：你当了几年民兵？

何秀元：五、六年，从开始土改，到小社成立。接着我被选为社长。

老威：小社？初级合作社？

何秀元：对啰，叫南城社。

老威：老人家挺进步的。

何秀元：自己水平差，全靠党的培养。1954年我光荣入党，1958年元谋老城合并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元马镇划为大管理区，我又被调到管理区当领导。

老威：管理区？管城镇居民吗？

何秀元：居民归镇长管，我是元马大队大队长，管农民。

老威：城乡一体，两套班子？那地主归哪边管？

何秀元：土改一过，都放回自己家里，住哪边就归哪边管。该干活干活，该学习学习。有专门的民兵监督他们，定期汇报思想，定期开会，不准乱说乱动。

老威：在土改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何秀元：嘿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恶霸雷树高遭镇压，他的

婆娘被群众弄来干农活。哎呀，快 40 岁了还细皮嫩肉的，啥都不会做，可见平时有多懒！田不敢下，秧不会栽，大家气坏了，就在田坎边批斗她。弯了半天的腰，还是不见效，于是就叫她跪在田坎上，盯着大家栽秧。我们栽好久，她就跪好久，我们歇气，还是不准起来，磕头也没用。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她求大家让她干活啰。栽秧慢，跟不上，就加班加点。月亮出来明晃晃的，就剩她一个婆娘在田里梦游，有点诗情画意不是？

老威：不觉得。

何秀元：嘿嘿。

老威：土改收尾是咋样的？

何秀元：土地、房子、财产正式落到每户门下，就还有土改复查。一个查成分，划得实在高了，没有实事求是，就要纠正，给人家降下来；划得低了，还要升上去。还有一个是查隐瞒的财产，不像运动高潮，充分发动群众，狂风暴雨似的检举、揭发、斗争、枪毙，而是一点一滴、一项一款、不动声色地将某个地主、某个富农被清算过的东西再滤一遍。一个人拿着单子念，群众围着边听边琢磨，边回忆。看有没有漏网的。

老威：这个阶段动不动粗呢？

何秀元：避免不了啰。捆绳子、坐软轿，看你熬不熬得过。

老威：实在没得呢？

何秀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复查也有针对性，有重点。比如戴玉林，解放前的大烟贩，土改还没搞到头上，他就主动交财产，烟土、金条子都拿出来，争取了态度，政府就没要他的命。可能他自己也暗中得意，以为避过了风头啰，哪料到共产党的运动一波接一波。他被揪出来炒回锅肉，先一把鼻涕一把泪，死活不吐，于是

民兵将他拖到野外搞假枪毙，屎尿骇出满裤裆，当场就招供了。我们在他的院墙地基下挖出来很多金条子。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戴玉林被关押几天，大家发表意见，觉得太恶劣，民愤太大。只能将他枪毙掉。

老威：哪本地有没有交不出财产被毙掉的？

何秀元：先都是喊爹叫娘，恨不得把心啊肝啊交给群众，后来挤啊挤啊，遭不住，交待一点点，再遭不住，再交一点点。但是与大伙估摸的总差一大截。最后呢，挤出来的财物实在与大伙公认的数目合不上，就只有报请上面批准枪毙。

老威：你参加过镇压地主吗？

何秀元：我没毙过人，只跟着毙人的去维持秩序，也抬过几次尸体。老城外河坝，坑先挖好，让人跪在坑边，再听哨子，轰隆一炮火。开始打脑壳，血浆子乱飞，很不雅观，特别是娃娃们看了不好，所以后来就一律打背心。围观群众太多，每次毙人，围观群众都多，比逢年过节闹热。

老威：你估计，整个土改期间枪毙了多少恶霸、地主？

何秀元：元谋是个小县，当时只有五、六万人口，所以毙掉的不多。

老威：多少？

何秀元：记不得。哎呀，解放初期的地主，跟现在的家庭比不得。按目前的财产标准，元谋城里大半人口都是地主。当时周围的十几个村子，有的穷得那个凄惨样，评不出个地主，可土改形势在那儿明摆着，评不出也要评，地主没有，富农也弄一两家，过关嘛。其实呢，有的地主就比一般农民多几间房、半个院子。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包谷杂粮塞一肚皮，细粮留到逢年过节才整几顿。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有的地主，节约得吓死你，连娃娃不小心把屎拉在院墙外，都心疼，破口大骂哟，追着把屎铲回自己肥堆哟。

不怕你笑话，那阵元谋连电灯都没得，地主家有只手电筒，都值得显摆，相当于现在的大型家用电器。

还告诉你，元谋人第一次见着汽车是四几年，当师长的朱淮从昆明开过来一辆吉普车，开天辟地哦，不得了哦。还没拢城门洞，还没停下来，方圆几十里就轰动了，都想去看一看，摸一摸。现在呢，汽车遍街跑，还有拖拉机，连农民都不稀罕机械化，更莫提地主。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只可惜我们这种人，黄土已淹齐下巴，享受不了几天人人做地主的的日子。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上）

前奏

2007年4月11日下午3点半，我们结束了对八旬老翁何秀元的拜访，即马不停蹄地穿插了几条街巷，直趋元谋县委的某处宿舍，欲乘胜拜访另一个八旬老翁陈文高。

略微颓败的铁栅门前，满嘴酒气的中年门卫刚拦住我们吆喝“登记”，就被同样不拘形迹的苴公一把推开了。我们顺势深入，几颗年轮久远的大树巨伞一般支撑天空，将两三幢爬满藤蔓的7层高楼笼罩得垂头丧气。我们上了某一个单元的4楼，紧闭的铁皮门两边贴着极其庸俗的对联和门神，门框顶好像还描着避邪的桃符。苴公敲门，不应；又敲，还不应；就干脆直起喉咙叫喊。

上面的老妪被惊动，自楼梯口倒悬白头，与苴公对答，方知主人已外出。我们撤退到门卫亭右侧，坐等约1小时，依旧渺茫。于是继续撤退到大街上，透一口闷气，顿觉饥肠漉漉。我提议请朱家学老人吃晚饭，得到3位同行者响应，于是找了个像模像样的饭馆，点了大锅土鸡。我亲自搭机动三轮去接来寿星全家，将尊者让入上位后，十几个食客即围成一桌，席间几起几伏，欢声雷动。

夜幕降临时，我跟随苴公再次登门，终于逮住刚看完所有电视新闻，正闭目养神的前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戴老花镜的表情非常严厉的干巴老头。昏黄的光晕下，我们几番要切入正题，都被挡回。老式钟摆嘀嗒嘀嗒，还夹杂着哮喘一般的噗嗤噗嗤。约6张门神大的毛泽东风俗画占据了半壁墙，我直视那鲜红的嘴唇，转了几秒钟的脑筋，无果。

只得如黑旋风李逵，赤膊上阵。

老威：我是从四川来的一个文人，可以访问你吗？

陈文高：有没有《介绍信》？

老威：哦？《介绍信》？这是哪个年代的事儿？

陈文高：不管哪个年代，坏人、不明身份、不怀好意的人总是有的，组织原则总是要讲的。

老威：我做土改工作，试图还原那段历史，一两年来，我跑了禄劝、武定、石鼓、剑川，采访过不少老人。我还在成都采访过工作队队长洪钟，解放初期，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部上下集的记录片，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洪钟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陈文高：你到底属于哪个单位？把证件给我看看。

老威：我没有单位。按目前流行的说法，我是自由撰稿人。

陈文高：自由撰稿人？没听说过。

老威：可见你老人家落伍了，某些观念该改变了。

陈文高：这不关你的事。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干什么的？来元谋找我有何意图？

老威：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你不是警察，即使你就是警察，也没有权力以这种口气冲我说话。我到元谋也不是专门找你的，与你同时代的经历过土地改革的老人还有，你不愿意谈，总会有人愿意谈。

陈文高：你这么年轻，有资格调查土改吗？这应该由政府出面的。

老威：这位苴公你认识吧？还有元谋的前任官员蒋某某，她现居昆明，昨天亲自驾车带我们来。

苴公插话：陈老，和你这样的老革命相比，我们算晚辈了，资历浅，水平差。我之所以引见老威同志来采访你，正是出于对你老的尊重。历史就是历史，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乱开簧腔的。

你心里也清楚，有些事政府出面行，比如开个大会，救个灾，维持个治安，动员群众抓个逃犯，平反个冤假错案等等；有些事嘛，政府出面就费力不讨好，比如写历史，我在县委多年，多次组织班子写历史，歌功颂德的废纸一筐又一筐，自己都不想看，更莫提拿出来见人。所以，同一桩土改，如果报纸、电视台、政府部门来找你，调子就是定了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叫你说好，叫你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必须得一丝不苟照办，这才是组织原则，哪还容得你对待老威这样，盘问来盘问去。你想想，阶级斗争的观念 20 多年前就没了，连反革命的罪名也取消了，你还一口一个坏人坏人。现在的坏人是贪污腐败、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对待卖淫嫖娼也就罚款，人家交了钱，出了公安局，依照法律，你就不能随便叫坏人。

陈文高：哎呀，我没这个意思。

苴公：警惕性高没错。可凭你几十年的革命工作经验，哪个坏人会对几十年前的土改感兴趣？陈谷子烂芝麻，好人也不感兴趣，除非吃错药了。《炎黄春秋》看过没？老革命纷纷做回忆文章，我改天带几本来，你看了就晓得如老威这样想澄清历史真相，又舍得跑路的文化人难得找！陈老，打消顾虑，与时俱进啰，而今自由撰稿人自费写历史的大有人在，秉笔直书，学司马迁嘛，这才是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

陈文高：既然苴公是政府部门的同志，你带着人来，我就破格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接受一次谈话。请老威同志提个头。

老威：请老人家尽可能放松，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想必你心里有个底吧？**陈文高：**是的。

老威：你是土生土长的元谋人？

陈文高：是的。

老威：城里？

陈文高：直林乡小村。当时整个村子有 40 多户，多数烤酒卖。而我们家老少 8 口，都靠帮人吃饭。

老威：一直帮人吗？

陈文高：是的，从老祖到我爹，至少 3 代上都帮人。

老威：长工？短工？

陈文高：主要打短工。夯墙盖房、薅秧打谷、种菜、种西瓜、种包谷，还有上山割草，卖给烤土酒的人家。

老威：烤酒比打短工挣钱？你们家为什么没烤酒？

陈文高：家穷没本钱。

老威：我们这代人的土改知识都是从书本来的，刘文彩、黄世仁等等，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就是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你在旧社会的实际感受是这样吗？

陈文高：当时嘛，共产党没来，没觉悟到，后来觉悟到了。

老威：没觉悟到？你是文盲？

陈文高：读过两年小学。

老威：私塾？

陈文高：直林乡的新寺小学。初识些字，家里认为够了，就不让继续读了。

老威：你打短工时，与地主发生过纠纷吗？

陈文高：没有。

老威：地主拖欠过工钱吗？

陈文高：干完活就付，或者以粮食抵，耍不了赖的。

老威：你什么时候参加的革命工作？

陈文高：1949 年 7 月，地下党从昆明派张炳今、张绍虞两位同志来元谋，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全称为民主青年同盟，积极

准备迎接解放……

老威：两位同志的背景是？

陈文高：都是本地人。张炳今是国民党县参议会参议长张鉴良的儿子，在昆明读书就加入了地下党。他们此次潜回元谋，一是搞组织，二是策反张鉴良，并通过张鉴良去策反城里的主要武装力量长臂大队，大队长叫张柞纪，与张鉴良私交深厚。

老威：你当时的角色？

陈文高：我算不了啥子角色。整个元谋发展了 60 多个民青成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以解放划线，我如今就享受老革命的离休待遇。

老威：然后呢？

陈文高：我年轻腿快，充当张炳今的秘密通信员，经常从班果走路到元谋东门，长臂大队的 3 个中队，300 多号人都驻扎在那儿。我找到张柞纪，呈上信，等一会儿，取了书面回执，或口头吩咐，又往回跑。有时也去找张鉴良。

当然，策反工作具体咋个进行的，我也不太明了。可解放大军还没拢元谋，张柞纪就将长臂大队火力配备最强的一个中队拉跑了。县城周边的几个伪乡长也倒戈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伪政权，欢迎解放。地下党和民青拥有 30 多条枪，分派在几个城门。做过少将师长的伪县长朱淮见大势已去，就抛下家小，化装成老百姓逃跑，当时他的老爹还想将他藏起来呢，可地下党眼线太多，变根针也藏不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追捕朱淮？

陈文高：1950 年 1 月 18 号的晚上，已经入老城的地下党负责人张炳今获知朱淮潜逃，立即打电话向滇西北地工委第 8 支队的领导王元昌汇报，请求指示。随即派罗真、杨杰真等率领民青武装及策反过来的武装，分成几路人马，抄小道追捕。直到三天三夜后，

才在武定县境的马鞍山将朱淮抓获。这个罗真，还是朱淮的干儿子，又是边纵独立 2 团保卫中队的付中队长。

老威：国共两边都沾？

陈文高：特殊历史环境，许多人都有公开与秘密的双重身份。但是到 1950 年 1 月 19 号早晨，我们就分别通知学校等单位 and 群众，从城里到城外，排队迎接解放军进元谋。至此，每个人的身份都公开了。

老威：才几个月地下工作经历，就享受老干部待遇，真划得来。

陈文高：关于元谋解放，李某某那个家伙还自我吹捧说，他带领人马去白西头梁子，放了两枪，朱淮就投降了。放他妈的狗屁！

老威：李某某也是个老干部吗？

陈文高：也算吧。

老威：你们真厉害，居然将县、乡两级的政权都提前瓦解了。

陈文高：不能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吧。

老威：策反时，都许了啥子愿？比如解放以后，不关，不杀，不追究之类？

陈文高：你咋个晓得？

老威：我做土改专题这么久，当然晓得解放前后的政策变化啦。

陈文高：这的确是沉痛的教训囉！地下党和民青花了大力气，嘴皮子都磨破了。才将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的口径全部统一：只要背叛了反动政权，对解放元谋县有贡献，不管你从前任过什么职务，干过什么对人民不利的事，不仅不关，不杀，既往不咎，而且当作投诚或起义人员看待，在新生政府里安排工作，不愿意工作的，就发放一定资金，安置回家。

老威：对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内有影响的官员，共产党的确也这么做过。比如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率部起义，解放后就当了

水利部长，虽然他的弟弟刘文彩后来被树为恶霸地主的最高典型。

陈文高：元谋毕竟是小地方。当年我们的策反口径，是上级定的调子，不是哪一个人随便说的。后来清匪反霸，风向变了，也是上级定的调子。南下干部都是经过炮火，几千里，一路打到这儿，人家有革命资历，革命经验，阶级性、政策性都强，说得起话。我们本地干部呢，只有当学生。

老威：啥子意思？当年的策反许愿一律不算数？

陈文高：说不得，说不得。连地下党负责人张炳今的父亲，为和平解放元谋贡献最大的参议长张鉴良也枪毙了。通过张鉴良做工作，策反过来的长臂大队长张柞纪也毙掉。中队长也毙掉，下面的几百号人，毙的毙，劳改的劳改，遣散的遣散。起义的乡长也差不多杀了。

老威：罪名呢？

陈文高：恶霸地主、土匪武装。

老威：有点过分哦。

陈文高：地方干部的话顶个屁，你说多了，自己就叫牵连进去了。

老威：以后呢？

陈文高：等着几十年后平反嘛。唉，韭菜割掉还会发，人脑壳割掉就割掉囉。

苴公插话：这个情况我略知一二。土改刚开始，长臂大队及乡里民团一类都统统成了土匪；边纵也打成土匪、地霸武装，下面的民青也顺着成了反革命组织。历次政治运动都没逃得脱，惨得很囉，改革开放后才平反。

老威：如此看来，这儿的土改也算轰轰烈烈了。

陈文高：毛主席说，要给地主阶级吃3付泻药，第1付是累计

征收几年的农业税，并补征 1949 年全年公粮，土地越多交得越多；第 2 付是减租退押；第 3 付才是土地改革。

老威：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陈文高：传达的政策，肯定不是传说囉。从 1950 年 3 月起，第 1 付泻药就开吃。解放军和地方结合，组成多股征粮队，下乡用枪杆子逼着大小地主补交 1949 年的公粮。当然，在边远地方，还一时不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懵头懵脑地组织抗粮队，几支破枪，结果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接下来是合理负担，你土地越多，财产越多，就负担得越多；反过来，没土地没财产就没负担。

老威：可以讲得详细些吗？举个例子最好。

陈文高：我亲自参加过征粮征税，可是年代太远，记不得了。镇压反革命是 1951 年初，为土地改革扫清障碍囉。

老威：哪些东西是障碍？

陈文高：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伪官员，与官府勾结，吃香喝辣的大户，伪乡长伪保长，甚至伪甲长。欺压老百姓，民愤大的也算。有劳苦大众的检举嘛。

老威：有硬指标吗？

陈文高：有名单。根据群众意愿，排名单抓人，抓齐了集中关押，再开公审大会，毙掉一批罪大恶极的。

老威：据你所知，当时毙掉多少敌人？

陈文高：记不得囉。那时我当直林乡乡长，对整个元谋的镇反情况并不掌握。

老威：20 多岁就当新政权乡长？不简单哦。你所管辖的范围毙掉多少？

陈文高：有一次集中毙掉了 10 个。

老威：不算少。

陈文高：也不算多。大地主两个，组织抗粮的两个，还有伪乡长杨炳林，其他嘛，其他嘛，哎呀，实在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非杀不可。

老威：作为乡长，你主持过公审吗？

陈文高：主持过的。但上面的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也到场，下面的贫雇农代表也在，但最终的生杀大权还在区委书记以上，他们都是南下干部。解放不久，整个元谋暂时按区划分，区下面才是乡。苴林第一区，东城第二区，班果第三区。苴林辖4个乡，相当于现在的4个大村吧。

老威：这是区一级的公审了。以现在的观念看，你认为这当中有没有错杀的？

陈文高：绝没有。不杀不足以威慑敌人，不杀不足以鼓舞群众。

老威：其中有没有对元谋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

陈文高：这10人中没有。

老威：那都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了。

陈文高：不见得当权，可的确该杀。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下）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 2007 年 10 月 15 日下午，乌云翻卷，雷声隐隐。我的心情突然烦乱不堪，出室立于檐下，良久，突然听见楼上电视里传来军乐齐奏的《国歌》，原来中共 17 大正式召开了。

短短几天，本地国保和国安两大部门的最高领导先后会见了，不得不令人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我还跟随这个院子的主人去赴宴，与国安局局长喝酒，碰了两三杯，彼此称“久仰”。席间得知，我差点就被国保大队请进公安局，在囚室内同步开完党的 17 大，是国安担保协调，才放了我一马。

通过频繁接触，我悲哀而荣幸地获知，这十几年来，从重庆、四川、北京到云南，警察始终是我忠实的读者和追踪者。包括我的文字来源、风格、险恶用心及近期走势，他们全都了然于胸。我辩解说自己的祖师爷是司马迁，模仿的范文叫《史记》，国安局长就马上笑道：《底层》我看过，这个话是你的右派师父流沙河说的，啥子两千年前的暴政造就了司马迁，今日又用同样的手段培养出作家来。

话音未落，我脸色顿时煞白，记起《三国演义》里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细节，急忙称“不敢”。局长继续发挥道：你的巧妙之处，就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转个弯，经第三者的嘴巴说出。《底层》如此，《冤案》如此，地主系列也如此，哎呀，真是洗我等的脑壳！

我无言以对。人家将“反面教材”研读到这个深度，真不错了。记得席终之际，局长的告别辞大致是：任何哲学都强调存在就是合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了近 60 年，还在发展、进步，肯定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就表明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人民的心声。

我本想问什么是广大人民的心声，金钱？女人？醉死梦生？还是好死不如赖活？可忍住了。我天生口舌笨，不是能在酒桌上决高下的勇士，我承认自己懦弱、孤单，而黑白混杂的江湖却有太多太多凶险。

眼下雷声隆隆，乒乓球大的雨点三三两两飞降。我反身回室内坐下，稳定情绪，重新打开录音机，聆听老革命谈土改。

老威：革命声势就这样造起来。接着呢？

陈文高：就减租退押。减租又叫二五减租，解放前，元谋周围的佃农租地主的田地，一般是按春播时借一斗谷子，秋收时还二点五斗计算，可现在却反过来，按地主收过的二五比例，将原定租子砍掉。

老威：这叫砍租，不叫减租。

陈文高：所谓退押，就是命令地主将当年出租田地的押金，也就是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佃农。

老威：押金的伸缩性比较大的，特别是改朝换代，通货膨胀都相当厉害。比如一九四几的物价与一九五几年的物价，或许短短三四年，翻若干个跟斗。那么我向你老人家证实一下，这个押金是按土改当年的物价退还呢，还是照原始契约逐年累加后再退还？

陈文高：肯定是按土改当年物价，逐年累加，让地主过去吃了多少，今天一块吐个干净。

老威：如此滚动退押，不是和驴打滚的高利贷差不多？

陈文高：话难听啰。不过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强调经济基础，土改的最终目的，就是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吃泻药嘛。

老威：不择手段？

陈文高：你太年轻，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懂啥子？革命既是

手段，也是目的。毛主席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不过嘛，老地主还是狡猾的，还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想方设法抵赖，谷子、花生、西瓜子都是实物，他们也翻转给贫雇农一五一十地算帐，哪年哪年，物价又垮了，纸票子又值多少了，实物实际才值多少钱，或者根本不太值钱。泥腿子没文化，如果不是工作组撑腰，还算不过他们。

老威：大形势摆在那儿，动小脑筋有啥用？

陈文高：对啰，下场只有更惨。

老威：接着就是赔罚阶段。

陈文高：赔罚？没有过。

老威：是吗？我在其它地方了解到，减租退押之后就是赔罚。有个叫洪钟的工作队队长还称它为“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

陈文高：挖浮财是有的，赔罚没有过。我乡长当了1年多，又调到区里做公安助理，除开镇反、抓恶霸地主，还管净化社会空气，比如抓赌、抓抽大烟、抓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然后才正式土改，县委书记孟家珍做报告，布置任务，接着在大沟村，那阵叫大沟乡，搞试点。我们的组长叫王世光，组员有20多个，都是几个区抽调来的干部，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头是发动群众，造声势，宣传《土地改革法》，个把月以后，以1951年12月25号的公审大会为标志，宣布土改在元谋县境全面铺开。

老威：这是哪一级的公审？

陈文高：全县大会，几万群众参加，地点就在如今的县政府背后。公安局长，也是南下干部的朱恒元主持，枪毙了5个恶霸地主，其中有伪保安团长赵登第。

老威：还有谁？

陈文高：记不得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大会？

陈文高：当然。

老威：那怎么会记不得？

陈文高：时间久，忘了。

苴公插话：这个赵登第是冤枉的。他原来在国民党 93 军任团长，退役还乡，应当地主绅请求，做保安团团团长，在地方武装中有些威信。后来受地下党说服，率部弃暗投明，和平解放元谋，他功不可没。80 年代我在县委，晓得政府特地给他平反，推倒不实之词，重新定为投诚起义人员。

陈文高：赵登第是跟着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的，退役回家，还领了 3000 斤大米。

老威：可能 3000 斤大米还没吃完，脑袋就丢了。

陈文高：试点一结束，我们马上就重新分配，我被任命为元谋县第一区金雷乡土改工作组组长。

老威：不简单。

陈文高：试点经验已有了。具体政策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所以我们一下村子，就着手访贫问苦，落实毛主席教导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老威：先把最穷最苦的找出来？

陈文高：不一定。还得追究你为啥子穷，为啥子苦？解放前你是干啥的，以何为生？贫农就是有一小点土地，但多数时候不够吃，还要靠打长短工维持生计；有一小点房子，但破破烂烂。雇农就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只靠打长短工，饱一顿饿一顿的。

老威：毛主席也教导过的，叫乡村无产者，跟城市无产阶级一

个阶层。

陈文高：对囉。先寻着几个，再个挨个串连，就像布蜘蛛网，逐渐将我们要依靠的对象组织起来。这是土改第一步，叫发动群众，宣传政策。

老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挑起最穷的去整垮最富的。

陈文高：同志，你这口气不对，立场有问题。

老威：道歉道歉。

陈文高：此时的斗争目标还没确定，咋个能够想当然？

老威：再次道歉。我们换个话题，怎样团结中农？

陈文高：中农相当于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我们不团结他，争取他对土改的理解，他就消极悲观，滑到同情敌人那边去了。

老威：土改几十年后，小辈我还能隔着时空听见如此有水准的报告，真是受益非浅啊。

陈文高：中农又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要作严格区分：上中农稍微有点剥削行为，但没有富农那么严重；而下中农经常受剥削，程度又没有贫农那么严重。我们不会动中农的土地、财产，可他们基本分不到土改的果实。

老威：为什么中立富农呢？

陈文高：我们不让他“中立”，他就滑向地主一边，地富合流，土改的艰巨性就增加。所以对富农的政策不是没收土地、财产，而是征收多余的部分，剥削所得的部分。特别是对反动富农，决不能手软，决不能叫假象所蒙蔽，要坚决征收他的个人所得。

老威：反动富农和一般富农的界限在哪儿？

陈文高：反动富农跟旧政权、半殖民半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就在其中担任过职务，如保长、甲长等等。即使当保长，还要分清 1946 年之前还是之后，抗日战争之前还是之后；

国民党连长，也要分清解放战争前后，确定戴不戴反革命帽子。

老威：1946年是条杠杠。

陈文高：对啰。之后就是反革命，在土改中和地主一样，是打击目标。要特别申明，我们是最终消灭剥削，消灭地主阶级，消灭私有土地制度，而不是消灭作为个人的地主。我们要通过改造，让地主和他们的后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老威：据有关资料证实，作为个人的地主也被镇压了几百万。不少地方的土改，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斗争高潮，自杀、冤杀、逼死、私刑致死、不明不白而死的此起彼伏。

陈文高：我也听到、看到一些不愿意听到、看到的事情，这是土改工作中的失误，是极左路线的教训，却绝不是土改的主流。我敢担保，我当工作组长期间，金雷乡没发生任何一起冤屈。的确，也杀了一两个地主，一个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手下，上了那个级别，只能杀；一个隐瞒浮财，将金银财宝深埋，无论咋个挤，都不松口，后来终于暴露，挖出来的大烟、金银、首饰，用一匹骡子才驮得起。判刑的地主有10个，一个乡的范围，这个比例算平常囉。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组长水平不错。

陈文高：还可以吧。金雷乡的土改搞出名堂后，我又被上调为点长，管几个工作组。

老威：升官了。

陈文高：点长的上级是片长，相当于区长。

老威：你有生杀大权吗？

陈文高：我有建议生杀大权，报给片长批，再报给武定专区最后核准。

老威：你的确算尊重程序的干部，在那个年代，不容易。

陈文高：是啰，正式的刑法还没出台，依据只是暂时的政策，

比如《惩治反革命条例》，可杀可不杀，其中的空间很大。

老威：唉，地主和农民多少年生活在同一个村子，虽然改朝换代，可彼此真是你死我活吗？你们用什么法子点燃群众？

陈文高：解放了，大势所趋，群众都拥护共产党。运动一搞起来，瞎子都摸着来开会，聋子都立起耳朵，害怕漏掉啥子内容。我们不怕群众点不燃，只怕热情燃过头，违反了政策，收不拢口。

老威：跟现在不一样。

陈文高：是啰，现在人心涣散，开任何会，通知半天，也是锣齐鼓不齐。除非要分钱、分房子、分利益指标。

老威：如今回顾土改，你老人家觉得对还是错？

陈文高：土改是我们党建国初期的第一件奠基大事，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村最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此之前，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有力气无处使，或者使了力气得不到收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为了平均财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向新民主主义的近期和远期目标迈进，必须土改。

老威：是吗？一定要通过暴力掠夺吗？政治运动真能够发展生产力吗？那邓小平为什么要拚着老命收拾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1979年为什么又要给地富分子揭帽？既然是对的……

陈文高：邓小平改革正确，毛泽东土改也正确。没有毛泽东的摸索和实践，经验和教训，就没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历史不能分割，要回到当时的背景。

老威：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千秋功业，渺小的普通人就注定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比如元谋县城解放之前，地下党做工作，千辛万苦许愿封赏，争取和瓦解了旧的社会基础，可等到不费一枪一弹进了城，就翻脸不认人，将已经投诚，堪称和平解放功臣的地方贤达统统公审，定为恶霸地主，然后枪杀，这正常吗？如果史书敢于

如实记载，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怎样看这因为阶级斗争而扭曲人性、出尔反尔的一页？光荣还是耻辱？

陈文高：我有时候也没想通，虽然后来平了反。但是，我们不能拿现在已经进步了几十年的水平、政策、法律去衡量过去，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刚得江山，硝烟未散，百废待举，莫提法律了，啥子都不健全。比如判处死刑，都是草草宣布“依据某某条例的相关条款或有关规定”，远没有法律健全之后这么细，手续这么周到。加上群众对经历过炮火的南下干部崇拜，甚至盲目崇拜，本地干部说不起话，也不敢说错话。年轻人，脑壳不要发热哟，啥子事要多转几个弯弯，才能做到客观、全面。比如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不可能直戳戳开过去就到达，总是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再右一下……

老威：每左一下每右一下，都有数不清的人头落地，家破人亡。

陈文高：事后诸葛亮。

老威：老人家，你算个秉性率真的干部，也当过元谋地下党负责人的通信员，了解多人的投诚内幕，那你当时或事后就没为冤死的“恶霸”们说说话？

陈文高：1953年，我就调到武定专区土改队了。

老威：土改复查吗？

陈文高：参加少数民族山区的土改，要慢一步。所以元谋那摊子事，没功夫问，也问不着。

老威：有人问吗？

陈文高：多得很。后来调到县委统战部是老杨还亲自写了材料，好些证明人都签了字，毕竟人命关天囉。可人家南下干部掌权，根本不尿这一壶。长臂大队长张柞纪在监狱里闹，骂元谋地下党和民青都是一帮骗子，许愿当放屁，早知如此下场，还不如扛枪进山打游击。哎呀，任凭咋个整，都封不住嘴。张家的人也四处找当事者，

追得本地干部躲着不敢见。张柞纪的关押地点也转移了好几回。

老威：唉，世事难料啊，老人家你有何体会？

陈文高：在土改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元谋县地下组织，百多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却始终安然无恙。这不是人有多聪明，而是吸取了教训，尽量少说话，即使说，也是按照政策的条条框框，求个四平八稳。不怀好意的人太多，都想“引蛇出洞”，随便你咋个引，蛇就是不出洞。

老威：那今天咋出洞了？

陈文高：苴公同志亲自登门，就给个面子；况且我 1928 年生的，快 80 岁了，皮子已蜕掉几层，出出洞也无妨。款款陈年旧事，咬不着哪个。

寻访未遂

拜访完老革命陈文高，已是 2007 年 4 月 11 日深夜，元谋之行接近尾声，紧绷的神经猛然松弛，站在黑漆漆的街头，我不禁伸了个分把钟的畅快懒腰。接着梦游似的截住一辆机动三轮，屁股卜卜冒烟地回旅舍睡觉。

次日依旧搭蒋老师的车，满面春风地返程，两个小时后即窜至马头山脖子间的一个坳口，我笑道：这大概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落网处吧。孙医生点头道：地势的确险要，插翅难飞啰。蒋老师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路边的农家乐用午餐，说不定还能吃上插翅难飞的土鸡。

于是停车。果然点杀了正宗的土鸡。在狼吞虎咽的间隙，我接到朱家孙女红英的电话，互道珍重之余，她提到家住昆明的堂爷爷朱家万，并答应为我们牵线搭桥，以便选择恰当的时机登门拜访，解开彼“永不还乡”的谜团。

大喜过望。孙医生又乘机锦上添花，称家住昆明的另一位老人“也值得拜访”。我习惯性地问：与土改有关系吗？孙医生答：大概有，老人的父亲做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厨师，这就注定了他一辈子的霉运。我仰天叹息两声，却吞了一大口从冷太阳那儿吹过的冷风，不禁咳起嗽来。

继续赶路，拢昆明北郊王家桥一带，依旧塞车近 1 小时。大约 5 点，孙医生在黄土坡车站附近下车，去联系我的下一个寻访对象。“真是过意不去啊，”我刚摇下窗玻璃冲外面客套，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扬起阵阵烟尘，紧接着，孙医生又如纸人一般在肺穿孔的夕照里支离破碎。

我跟随蒋老师，吃了喝了。天黑尽时，在一茶楼接孙医生电话，说已和基督教内之某某弟兄碰上头，正一起赶往老人的住宅；夜渐

深时，再次接孙医生电话，说已从老人住宅出来，有好消息。我那个高兴劲儿啊，当即抽出洞箫，为蒋老师等人连吹两曲，感动得众茶客都称赞“老威的确多才多艺”。

至此，蒋老师也抖落了连日倦意，主动侃起家事。由于我采访过她远在重庆的农业教授父亲，知道她是蒋介石的远亲，所以兴致极浓。蒋老师道：多年没回过浙江萧山的老家，不晓得祖坟成啥样子，那边还有啥子亲戚。我道：嗯，你爸爸讲过，你们家是特大恶霸地主，在旧社会，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平分一个县的地界。蒋老师道：不是我们家，而是我们蒋姓家族。土改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划了好几十户，光算爷爷那辈的堂弟兄，就被枪毙了 18 个。还有几个为逃避打击，星夜窜到上海滩，不料城里风声同样紧张，连过去走动密切的亲戚也不敢收留。没办法，躲进胡同底不见光的旅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乡下逮逃亡地主的几路人马，早就与城市革命群众一道，在大街小巷布下天罗地网。我明知故问下场如何？蒋老师道：还能如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除了上吊死，跳楼死，就是服砒霜死，反正都比抓回去枪毙舒服。我打了个寒战，眼前闪过一幅幅呲牙咧嘴的鬼脸。记得一本书里记载过，当时有经验的上海市民走路，都不敢靠街边，以免被突然跳楼的家伙给砸个正着。

蒋老师继续道：不知老威你有没有兴趣陪我回老家探亲？也许我爷爷那辈人还有剩下的呢。我道：是吗？那得多老？蒋老师道：起码八九十岁以上啰。如果地主没剩，或许还剩有参加过土改的贫雇农；如果啥子都没剩，还有他们的儿女，还有《地方志》和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那边的省、市、县三级图书馆都有熟人。我道：好好，你先联系着，等我把这本书弄完，就学当年的土改工作组，去你老家的村子蹲点。蒋老师笑了，果然摸出手机，拨通了好几个电话。我想，真是急性子！可这落花流水般的苦差使何时到头呵？

4 月 13 日上午 9 点，我到昆明火车站附近与孙医生碰面，三

言两语后，方明白还得等候。“因为老人身体太差，而要回忆的东西又太苦，”孙医生谦卑地笑着。我点点头，觉得应该把这次寻访的序曲记录下来，就掏出了录音机。

老威：你们怎么认识的？

孙医生：有个妇女找我看病，诊断过程中我问她过去吃的药，于是她就摸出一个方子，我看了觉得不错，进而产生了拜访学习的兴趣。

老威：跟着就登门了？

孙医生：没有。老人的创伤太深，对陌生人很警惕。所以我们共同的病人从中斡旋几次，他都找借口拒绝。这次跟你去元谋采访，受到触动，就记起要了却的这桩心愿。

老威：也就是说，昨天你才首次见着老人？

孙医生：是啊。先打电话给远在西郊的中间人，1 个多钟头后碰面，又商量好半天，我把你鼓吹得天花乱坠，硬说行，人家硬说不行。吃罢晚饭，再打电话给老人，磕磕绊绊的，嘴皮子都磨破了，总算松口。8 点至 9 点，我们才接着坐公交车，从西郊折回市中心，找到五华区中医院宿舍，爬黑灯瞎火的筒子楼，大约 7 层。一个 8 旬老翁孤零零地住那么高，真叫人担忧。

老威：你们在路上耗掉了大把时间。

孙医生：你我 5 点分手的，见着老人已 9 点过。他姓施，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同姓。他家里很简陋，我们在那儿呆了 1 个多钟头。

老威：摸清来龙去脉了？

孙医生：恍恍惚惚的。因为老人有头痛病、心脏病，间歇性发作，影响到情绪，时好时歹。腿脚也褪化了，步子在拖，所以

下楼的次数很少。

老威：如此说来，他相当于在自己家里坐牢。

孙医生：人生的悲剧，上帝也无能为力啊。

老威：老人是基督徒？

孙医生：不是，但经常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对我们的主内弟兄很亲切。我和他在一块，虽然才 1 个多钟头，但几乎膝盖碰膝盖，彼此的呼吸交流着。我不是作家，尽管行医数年，与老人称得上同行，但面对埋在他内心，无人知晓，无人理解的伤痛，也只有祈祷。那是岁月造成的，毛泽东那批下地狱的恶魔造成的，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我只有祈祷，愿老人好好的，稍微平静地渡过余下的时光；愿老人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至少在临终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美的，善的，上帝的慈悲属于每一个人。

老威：你也算没长翅膀的天使嘛。

孙医生：他的思维倒活跃，跟长了翅膀似的；可胆子小，跟惊弓之鸟似的。我呀，见着悲观者就特别难过。

老威：比我们找过的那些老地主更悲观？

孙医生：已经积累成病态了。他还反过来告诫我，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室儿女。在解放初，他就是因为私下对一个最好的朋友开了两句玩笑，而被告密，险些连命都丢了。

老威：什么玩笑？

孙医生：他说在共产党手里当干部，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工资高。

老威：这话的确反动。

孙医生：所以就打成特务，坐了多年牢，释放后还被革命群众管制。由于医术高明，五华区中医院将他弄进去，完全是命令式，病必须要看，厕所也必须要打扫，阴沟必须要掏，父亲为帝国主义

弄菜的剥削经历也必须要交待。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哦，刚解放他还参军，是从部队将他揪出来的。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零零碎碎，记不住。我重点介绍了你。大概是孤单久了，加上当时气氛也融洽，老人就说自己考虑一下，看身体状况不允许接受拜访。

老威：难为你了。

孙医生：总体讲，我还是比较乐观。老人平时 9 点半就熄灯睡觉，可昨晚我们告别之际，已 10 点半钟，他还依依不舍，拉着我们的手，颤巍巍地送到楼梯口，并一再叮嘱：市面不太平，走在路上当心强盗。

老威：除了年轻女孩子，你很容易跟人沟通嘛。

孙医生：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给老人打电话。

我点点头。接下来近 1 个小时，两人都隔着桌子，相对无语。

我弯腰从背包里挖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复印本来看看——这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学术专著，作者韩丁，与史沫特莱同辈的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解放区的大学里教英文。1948 年作为中共高层特许的“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试点，其间广泛采集资料和群众口述，写出了当地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砸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这本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由北京出版社在 1980 年翻译出版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 50 余万字的大书，是我的好友芦苇主动为我复印的。他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尽管立场、观点、结论都不对，但人家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西方人，资料来源可靠，方法更

无可挑剔。

芦苇是《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也是电影界屈指可数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他推荐的记录中共解放区早期试点的《翻身》，正好成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翻身”的范本。幸许这即是我今天写《最后的地主》所要回溯的源头？

我将在书中的档案部分引述这个源头。尽管共产主义把戏已被拆穿，历史车轮出乎意料地转回来，碾碎了韩丁先生激情万丈的终结预言：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分，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弟兄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电话铃响了。在贫困山区奔波数年，对“翻身的康庄大道”体会深刻的孙医生站起来，抓起话筒喂喂两声，然后接连3个“是吗”。我已猜出结局，却默不作声地等待。孙医生磨蹭了几分钟，才故作轻松地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

老人身体不好。昨晚就身体不好，今天仍旧身体不好，头晕，心跳加速，从7楼朝下看一眼，就害怕得呕吐。他说可能是回忆过去造成的。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不一定。没说死。就不一定。等你下次来吧。

生死无常。下次来？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而孙医生为了掩饰尴尬，从我手中抽去《翻身》，心不在焉地翻动着。我自觉失言，

也随即强笑着改变话题：哦，《翻身》是最早的土改英文专著，作者韩丁，美国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们的朋友。据说他的女儿韩惊与新中国同生同长，17岁碰上文革，还组织过洋红卫兵呢。后来被撵出中国，再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反思八九学潮的《天安门》和反思文革的《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是她拍的……

孙医生还在心不在焉地翻书。

我继续道：这也是两代人，始终关注中国，险些把命搭上的两代人。尽管从父到女，从《翻身》到《天安门》，共产王朝，还有他们自身的神话已灰飞烟灭……

孙医生抬起头来，轻声道：我们吃饭去好吗？

下午两点，我登上昆明至大理古城的长途客车。在此前和此后，我们闲聊着，告别着，却再也没提起本次未遂的疲惫的采访，以及任何采访的话题。

两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苍山脚下心血来潮，就给朱家孙女红英去电话，欲打探其“永不还乡”的堂爷爷朱家万的近况，不料手机里的回音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愣住了。真是世事难料。我感觉苍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在嘎嘎哑笑。

魂儿在深渊飘零。

再次寻访未遂

阴历7月半，传统的鬼节，阵阵铅灰的雨雾，从苍山顶齐斩斩地切下来。而我，如游魂，还在暂居地背后的草坡走动。三三两两的农舍，闪闪烁烁的长明灯，左一滩右一滩的纸灰。我持棍子，拨打着比人高的野生大麻，还在沟坎下，骤然遭遇一只腐烂的死猪。

不觉抵拢了公墓门口，我迟疑片刻，还是进去兜了两圈。白惨惨的墓碑顺草坡蜿蜒，我在其间停顿，合十念祝着姐姐和爸爸，他们在天上已有些年月了。

没见鬼，不过迷路了，归途颇费周折，似乎条条都是绝路。走进去，退回来；再走进去，再退回来。眼看着苍山如冥府之门，吱吱呀呀地敞开，天色被颤抖的大麻叶子掩蔽得晦暗，裤腿及袜子都湿透了——铃声却适时响起。我惊醒似地掏出手机，对方竟是断掉联系多日的朱家孙女红英！我换了电话卡——她说，回音波纹一般扩散着——对不起，老威，我那个永不还乡的堂爷爷还等着你去呢。

我大叫好好。接着还魂一般调整方位，到底在天黑前绕回自己灯光大作的窝。

进入2007年10月下旬，本书接近收尾。于是我提前与红英联系，稳妥之后，我即于24日乘长途客车，颠簸8个小时，从丽江赶赴昆明。照老习惯，先跟孙医生碰头，放稳行包，然后约会红英。此时夜幕降临，原打算次日再从从容容办正事，不料红英在电话那端催促立即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寻访日期又得推迟。

偷不了懒，这是命。端起刚沏的茶呷一口，又烫了嘴。倒抽着冷气出门，自火车站打的去北郊，在一黑灯瞎火的所在等候10来分钟，红英极其男友终于浮现。互相打过招呼，4人就次第穿越两个建筑工地，花了1刻钟，又撤回到货车屁股密密匝匝的马路边打的。记得当晚月亮比较圆，天空比较深邃，飞扬的尘头如烟如雾。

我们在出租车里热切地交谈。红英说，她考虑了半天，怕遭拒绝，没敢给堂爷爷挑明。我说，那这么风风火火上门，是不是太冒失？红英说，当然冒失。可为了你老威，也顾不了许多。我说，这次没挑明，上次总提过吧？红英说：我提过一个作家朋友要来拜访，堂爷爷没表示反对嘛。孙医生说：万一老人家认为你开玩笑呢？红英说，隔了一两代，有啥玩笑好开！

光阴随轮胎飞驰，出租车在某个巷子口嘎然而止。我们摸入云南省歌舞团宿舍，红英在前领路，抵拢最里面的单元，上2楼，敲门。一个鸟窝发型的老太太隔着铁栅，定睛辨别了分把钟，才开锁放人。我到底见着了有些神秘的主角朱家万，胖得像尊不倒翁，正坐在客厅沙发里看电视。我厚起脸皮蹭过去，挨着坐下，使眼色让左右张罗的红英快快切入正题，红英却视而不见，还一个劲地与老太太拉家常。孙医生更是如坐针毡。没办法，我只好开门见山了。

老威：老人家，我们摆谈一下，不要紧吧？

朱家万：老了。经不起折腾了。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炎，左心室亏空，也就是冠心病。我坐在这儿都累啊，还摆谈？

老威：对不起。对不起。**朱家万：**轻松的话题还可以。你是哪里人？

老威：成都。我专程来看你。

朱家万：不敢当。不敢当。

老威：我是专门写土地改革的，曾到元谋县城采访过你的堂姐朱家学老人。

朱家万：她的记性好，经历过好多事，你采访她就足够了。

老威：你呢？

朱家万：我这辈子，几乎就没在元谋生活过。

老威：为啥子？

朱家万：我 1929 年生，解放前就来到昆明，上昆师附中。1950 年 11 月，由昆明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考取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工团歌舞队。1953 年上调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在乐队，也兼搞创作。1956 年转业，返回昆明，在云南省歌舞团工作至现在。

老威：哦，原来是个老艺术家！可听你的履历，好像跟家乡没有丝毫瓜葛。

朱家万：我为啥要有瓜葛？

老威：水有源，树有根，人有父母嘛。

朱家万：革命就是我的源，我的根，共产党就是我的父母。

老威：老人家，我又不是政审干部，你对我说这个干啥。

朱家万：不是政审干部？那是干啥的？你的录音机开着，以为我不晓得？

老威：我要真实地记录此时此刻，我需要录音机。

朱家万：你记录？为了啥？

老威：为了写书方便。

朱家万：过去就过去了，忘就忘了，为啥要写进书里？

老威：老人家别紧张，现在不是毛时代，社会还是进步了。右派、大饥荒、文革都可以写，只有这个土改嘛，缺材料，写不了……

朱家万：有啥用？

老威：嘿嘿，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嘛。否则，一提到地主，人们还以为是我的成都老乡发明的扑克游戏“斗地主”，岁数稍大的，也只晓得恶霸地主刘文彩、黄世仁……

朱家万：历不历史跟我没关系。

老威：元谋赫赫有名的朱氏家族也跟你没关系吗？

朱家万：我读中学就出来了。

老威：读中学之前呢？

朱家万：记不得。

老威：是吗？

朱家万：是！！再次请你关掉录音机！这是我的老伴杨老师，她刚才不眨眼地盯住你，她很紧张！

老威：内心有阴影？什么造成的阴影？

朱家万：请你关掉录音机！你刚才说关，直到现在都没关，出于啥子目的？

老威：没目的。机器早关了。

朱家万：为啥有红点？

老威：通着电，就有红点。好好，我把它揣进衣兜，这样，可轻松些了？

朱家万：我嘛，破罐子破摔。我老伴轻松些了……她是彝良县人，中农成分，家里没受过冲击。我们 1956 年结的婚，她在军区教幼儿园。

老威：难怪她把我盯得死死，像监视一个两三年的捣蛋鬼。哦，她可回过自己的老家？

朱家万：年年都回。

老威：她都回，你为啥不回？

朱家万：你明知故问嘛。

老威：土改时期，你们家族被杀害多人，你怕受株连，不敢回去，你是地主子弟，却苟且偷生，将革命队伍当避风港。你肯定要与剥削阶级划清界线，大势所趋，是我，选择也和你差不多。可是后来，时代不同了，不搞阶级斗争了，你为啥还不回老家看看？

朱家万：我病了，懒得动。

老威：病之前呢？

朱家万：断肠人永不还乡。

老威：啥子？

朱家万：断……没啥子，啥子也没说。

老威：你父亲排行老几？

朱家万：老四。叫朱洪。我还有个妹妹，叫朱家茹。

老威：我晓得你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你妹妹呢？

朱家万：还活着。

老威：我可以拜访她吗？

朱家万：不可以。

老威：你真的连回元谋的念头也没转过？

朱家万：隔开 57 年，还有感情吗？你想想，人和人隔开 57 年，还有没有感情？所以，不听，不看，不联系，好得很。中国人被捉弄得还不够吗？我既改变不了历史，也改变不了现状，甚至改变不了身上多种要命的病。哪天腿一蹬，完了，烧成一把灰，也不要埋回元谋。不瞒你说，因为在昆明混出点名堂，元谋政府方面自来人，数次邀请，我都推辞掉。

老威：这么决绝？可中国人都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嘛。

朱家万：没有必要。

老威：祭祖也没必要？

朱家万：解放了，划地主了，早就无祖可祭了。

老威：哦。

朱家万：不行不行。对不起。心里有点慌……

守候一旁的老太太急忙扑过来，又是喂药又是抹胸口。我等随

即仓皇收兵。瞟一眼壁间挂钟，进门还不到个把小时。万般沮丧地下楼时，红英还在埋怨我莽撞，称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大家都负不起责任。我随口问有多大责任？红英闪着哭腔强调，堂爷爷是著名艺术家，命可比我这种小小打工妹值钱。孙医生急忙连声道歉，我也回过神来，顿时冒一头冷汗，土改专题快完工，如果附带牵出这么一桩命案，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容易啊红英！我站在黑黝黝的街口，冲着楼群之间明晃晃的月亮大声说，出门在外多留神，愿老天爷保佑你，保佑你的家人。

心事重重地返程，在街边胡乱享用“鬼饮食”，孙医生不饿，就按科学配方替我安排，几乎全是素菜。他解释说：过一会儿睡觉，身体放平，内脏全处于休眠状态。就不要自己给自己增添负担了。

但是我今天只在旅途中吃过一顿。

好啊，你今天很健康啊，孙医生嘿嘿笑，况且你不正吃着吗？没沾粮食，越吃越饿。

这就对了。节奏放慢，再放慢，细嚼慢咽，饿的感觉就消失了。

自己骗自己？难怪你瘦得像麻杆。

瘦好啊，过去的人都瘦，耶稣也瘦，可特别能走路，传播一种有意义的宗教或者思想都需要走路。

我不能走路吗？可吃饱喝足才能走，饿肚子走不了。

你说得对。可现在不需要走路，需要休息。所以，嘿嘿。

所以，嘿嘿，我还需要一碗肉面。

让胃部再度兴奋，再度充血？这违反生息规律。

我违反了几十年。我是夜行动物。

那么，这样吧，我们回家削梨，你一个我一个。

我承认是3岁小孩，可我的胃不是3岁小孩。老板，来一碗肉面！别咧着嘴叫，不太雅观。好吧，我去要面，肉就免了。

两个岁数偏大的光棍汉拐入一个十分落伍的大杂院，穿过高低不平的两个天井，再爬某一单元煤窑似的楼道，5层，上顶，便是孙医生的窝。我在临窗的办公桌前坐下，而孙医生坚持站立，似乎时刻都在操练动手术的基本功。我摸出手提电脑，打开视频，准备看律师滕彪为我下载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叙述魔头毛泽东怎样利用文革，打倒政敌，掀起个人崇拜，最终彻底葬送自己，葬送革命的记录片，正是《翻身》作者韩丁女儿韩惊的力作。“东方红，太阳升”的序曲刚响起，习惯早睡早起的孙医生竟探过头来，与我一道兴致勃勃地欣赏，直至午夜1点多。

革命是死了，但暴力的根子还埋着。他紧接电影的结尾台词，边发感慨，边进卫生间洗漱。我明白这要花去一二十分钟，直到从头到脚，一尘不染，他才缩回黯淡的卧室，去独自祈祷，独自做梦。

我则不洗不漱，即刻闭门入室。我靠床呆坐一会儿，不禁抽出洞箫来吹了两段，幽幽游游，飘飘忽忽，父亲和姐姐的亡灵围绕身体，秃头发麻，似乎有掌心在嚓嚓抚摸。唉，这次未遂的寻访太悬乎，幸好没出事。我这样无依无靠的流浪汉也不能出事啊。我自语道——如此轻微的语调，既像是自己的祈求，又像是来自身外的亲人的叮嘱。

第三次寻访未遂

阳光明媚的 10 月 25 日，孙医生一早外出，我则睡了懒觉，用罢午餐，与一个朋友约好在翠湖边喝茶。下午突然接孙医生电话，称晚上领我去寻访半年前寻访未遂的老人。我问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厨师吗？他答否，是厨师的儿子，今年 80 了。

心情愉快的黄昏，几个人由基督教医生主导，吃了一顿朴素的晚饭，然后打的 10 来分钟，直抵昆明五华区中医院宿舍。进门没几步，又遭遇矿井一般深邃的筒子楼，一行人摸黑鱼贯而上，在每个拐角处挤成一团。我层层默记，转着转着又迷糊了，7 楼还是 8 楼？总之，老人家住最高，而且是单家独户。

依旧是铁栅栏，这楼里四处都是铁栅栏，跟二战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似的。孙医生的女教友敲门，里面有个面色苍白的时尚女孩开门，哐当一声，那颗落下的铁锁起码有拳头大。我们扁着身子，自黑暗的瓶颈涌入灯光昏黄的内室，老人家正要从靠墙的老式沙发里起身迎客呢。

不必了。不必了。我和孙医生连忙欠身扶定，生怕有丝毫闪失。接着，除了我和老人家之外的 4 个男女互相交换着眼色，似乎早有预谋。然后，由圆脸盘的女教友笑盈盈地道出开场白：施爷爷，我们给你带来个客人。

施爷爷眼花气紧，还偏着耳朵：你说啥子？女徒弟凑过嘴，正冲着他耳门叫：带来个客人，是作家，早就给你提过的嘛。

哦，作家。失敬失敬。可是我没得啥子写头。

孙医生插嘴：施老先生，我们大家以人格担保，这个老威不是歌功颂德的狗屁文人，而是严肃的，有良心的，他在记录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司马迁做的同样的事情，所以……

民族的历史？跟我有何相干？脑壳昏，站不稳当，在家像坐牢，真不晓得今晚睡下去，明早爬不爬得起来。唉，个人都没活明白，还“民族的历史”！

女徒弟急忙打圆场：施爷爷！脾气好大哟！你平时都爱摆老话，那沟那坎，有条有理的，今晚咋个啰？大家瞎聊嘛，上天入地吹嘛。

女娃子，没吃过亏哦。施爷爷我除了中医之外，再教你 8 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女徒弟哈哈直笑：你都 80 岁了，祸还从口出？这屋里除开 3 个基督徒，就是 3 个无党派，哪个去告密嘛？况且告准密，哪个警察吃了豹子胆，还敢来抓你嘛？风一吹，嘿嘿，不吹都要倒。

我接上话茬：施爷爷，警察倘若上门，那就太人道了，等于带你到外面的世界兜风，免得你一天到晚在这高高在上的铁笼子内闷得慌。我比较熟悉监狱的情况，你这岁数，你这快散架的身板，想进去增添国家的财政负担？没门儿。监狱又不是养老院，你有个三长两短，还要当事故处理呢。

这道理我明白。可是我不愿意老提以前的伤心事。

孙医生说：你不是已答应和老威聊一聊吗？

我是答应过。可是我也提醒“在生理和心理允许的条件下”。我要避免激动，否则会彻夜难眠。

孙医生说：既然如此，我们明天上午再来拜访。

上午也要避免激动，否则整天的情绪低落。

我问：下午呢？

下午更要避免激动，否则诱发各种病灶，人随时都可能报销。

我差点说，你都到这步田地，还觉得人耍人好玩？可到底忍住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但也没有谁提议告辞。挂钟嘀嘀嗒嗒响，我扭头望着窗外，竭力分辨夜空中的灯光和星星。一阵军号突

兀而起，女教友笑道：好多年没听过军号了，真稀罕。

我可是天天听。施爷爷说。后来有只耳朵背，军号声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打摆子似的，很凄凉。你们莫笑，因为这种笑比较反动，晓不晓得？我是老兵哦，昆明刚解放就参加解放军哦，不出事的话，军龄比老地主的裤腰带还长。

我随口应个是吗？你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吗？

是的，我的老家在昆明郊区的小板桥，我家几辈人做云南菜，我父亲给省主席龙云做菜。还是有些名气啰。

你生于哪一年？

1927。整 80。

按红色教科书里的说法，是北伐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年。

不清楚了。我父亲不识字的。

那墙上挂的是你父亲的老照片？胸牌上还写着“云南省军区司令部”。

昆明刚刚和平解放照的。以后他继续给部队首长做菜。接着就做不成了，再接着就死了。

咋个死的？哪一年？

这个嘛，这个嘛，嘿嘿，就不要说了，事情过去那么多年，过去就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是吗。听孙医生讲，你的文化很高。

不算啥。1948 年考入云南师大外文系，1949 年碰上解放，没毕业就犯错误。

啥子错误？

就一句话。不提了，不提了。

你给孙医生提过嘛：在共产党手里拿工资，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

私下胡扯，被人告密了。那时候才 20 多岁，又刚从旧社会过渡，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体会还不深刻。如今奄奄一息，就体会比较深刻了。听起来像在说反话。

你说反话，我没说。你的录音机开起的，你在搜集材料，我晓得。

我把录音机关掉。

关不关无所谓。干啥子也无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

那我们随便聊聊。你父亲是大厨子，你母亲呢？

保姆。在法国领事馆，给帝国主义带娃娃。

待遇如何？

不敢说。总之你都晓得了，我能上大学，念英文，很费钱囉。

你父母的收入都可观。那家庭成分是啥子？

划成分？那又是土改了。我家在城市，不在农村。

城里也划成分嘛。

我家能有啥子好成分？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具体是啥子？地主？资本家？

唉，不要问了。这辈子，父母把我害苦了，我也把他们害苦了。怨不了谁，怨不了时代，更怨不了党和政府，只恨自己中旧社会的毒，没有认真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没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你在写《悔过书》吗？

我也是作家，我写过几百份《悔过书》，还不算口头悔过。成没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呢？要组织说了算，群众说了算。不悔过不行，

我曾经跪了几天几夜，魂都整出窍了，倒在地上，再咋个泼水都醒不来。好歹还魂了，嘴里念念不忘的不是爹妈，不是老婆，而是共产党、毛主席。只有共产党、毛主席不会整人害人，而下面的、身边的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一眼望不透的墙，都要防着。你不防着，哪天突然又被揪出来，你还蒙在鼓里。

你讲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作家写过了。

反动。太反动了。他叫啥子名字？是不是昆明的？我要去告他。

他叫乔治·奥威尔，英国人，写了一本政治寓言小说叫《1984》。嘿嘿，没法告了。

老人家吃过不少苦头，有点神经质了。

你才神经质呢。我活满 80，你能不能活满 80，都很难说。前一阵，我还下得了楼，过马路时，被小汽车挂倒了，本来没受啥子伤，可是开车的慌了，怕被老人赖上，就永无出头之日。他匆匆忙忙把我弄到街沿，浑身都哆嗦，还谎称回家拿钱。其实呢，溜之前我就晓得他肯定要脚板擦油，哎呀。

正常嘛，如今乱世，人人都没安全感嘛。

你这个文人，够冷酷，放在土改时期，是当民兵的料。

民兵的料？

就是捆人、打人、煽人耳光的料。

你挨过耳光了？

有一回，我跪在毛主席像前，一口气煽了两三百个耳光，自己把自己打得昏倒在地，牙床都搞松了，流好大一滩血。

疯了疯了。

自己冲自己发疯总比别人冲你发疯来得实惠，虽然也痛也累也猪狗不如，可不会残废，更不会死，而且悔罪效果特别好，容易过关。

你的尊严呢？

说梦话哟。命都差点保不住，还有尊严？官僚地主的狗崽子加现行反革命，还有尊严？

那你的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了。厨师家庭咋会划官僚地主？你家在郊区有土地、房产？

没有嘛。

是受龙云的连累？不可能吧？龙云虽然在国民党手里是云南王，但也是起义将领，为和平解放昆明做出了贡献的。好像，好像，还在共产党手里弄了个什么官当。

说来话长，干脆就不说。你的老伴呢？儿女呢？

说来话长，也不说了。

唉，不少老人都是你这种心理，被整怕了，运动怕了，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惯性。其实活到你这份儿上，说点真话，谁还能上门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影响身体嘛。那些惨事，多说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脑壳昏沉沉，却整夜睡不着。

现代医学证明，倾诉自己内心的隐痛是一种精神排毒治疗。

瞎扯。我就是医生。我不愿意回忆，为啥子要强迫回忆？更莫提倾诉了，20多岁只倾诉过一句话，就倒霉终身。

你就不愿意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你父亲不识字，你有文化呀。

人死如灯灭，没意思。

你这样说，身边这3个基督徒可不同意。

基督徒？他们同不同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此糟糕的新中国。

年轻人，作为医生，我再次送你8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谢谢。我无话可说了。

我也该休息了。作家同志，让你失望，很对不起。

保重吧，施爷爷，虽然你连名字都不愿透露。

名字对名人有意义，对普通人没啥意义。我撑不住了，再见。

我们只得告辞，重新将老人孤零零地丢在囚笼一般的室内。沿黑漆漆的楼道往下，再往下，我不禁想起但丁的《神曲》，从第一层坠落到第九层，从地狱坠落到炼狱就是天堂。那么现在，世界是否真如诗中描绘的那样，在一瞬间倒了过来，地狱反而在顶楼，在接近星空的极高处？

夜深沉。稀稀落落的过往车辆和行人，令眼前的都市显得空寂。我和孙医生都无精打采，直到返回自己的窝，在关门之际，孙医生才突然开口：哦，忘记告诉你，张应荣长老死了。我触电般哆嗦一下：死了？什么时候？

今年中秋节。我们在丽江还碰面，一起吃月饼呢。

我细细地咀嚼着孙医生的叹息，的确，中秋节那晚，丽江有乌云，有冷风，就是没有一丝月亮。孙医生陪同两对美籍华裔医生夫妇，并约了班忠义和我，本想在仿古客栈的草亭子下，吟诗作对，尽兴风雅一番，可惜天公不作美，烛光于风中飘忽不定，最后雨也跟来了，搞得大家立即掐断进行不久的侍奉神的话头，各持月饼一块，匆匆祝别。

然而在千里之外，在我们相聚过节的同时，我最初寻访的、因为信仰基督而被划成地主的张长老，却正终结其尘世生命，奔赴天堂——他曾受尽折磨，一次次在天堂门口打转，却奇迹般活拢 85 岁。

约两年前，我写了《土改受害者张应荣》，以下是此文的结尾：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

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3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在《最后的地主》快落幕之际，在一连3次寻访未遂之际，读者们请原谅我，以一个证人，一个落魄文人特有的“自我抄袭”的方式，表达对所有过去的、正在过去的、将要过去的老人的悼念。我们曾经接触，曾经交谈，曾经交谈得很不成功（如本文所述），可一旦相互离开，无论死、将死、还是活着，他们都悄然退出了我的视野，远远的远远的，在永恒之河的那边，招不回，叫不应，却一直在人类的记忆星空里闪烁。

眼眶湿润了，但我不会为内心的这份酷烈哭泣，总有一天，我将步他们的后尘。谁不想甩开病痛、无助和孤独，然而病痛、无助和孤独却是注定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能够帮你吗？它们有死那么持久吗？有历史那么持久吗？甚至，有历史里所包含的主宰我们的专制，有专制里所包含的谎言、监控、威胁、利诱、背叛、血泪及喊叫不出的危机那么持久吗？

你可以自己掐住喉管，试试什么滋味。我记述或正在记述被社会主流遗弃、被汹涌群众遗忘的旧日真相，个人被时代的巨手掐住喉管，有的粉碎了，有的残疾了。我在纸上经历了这一切，依然健康。所以不能不感谢上天的眷顾，感谢天上的父亲和姐姐的眷顾，更要感谢我这个行当的先行者司马迁，他为“叛国贼”喊冤，而后被盛世君王割掉卵蛋，而后孤愤作《史记》——这令我数度惊骇，

并在乱世危邦的呼号不绝于耳之际，下意识地抠紧裤裆。

我没有被阉或自阉，我还是个拿得出手的男人，我幸福无比。

然而，司马迁，他的确比我有更高的去势的尊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

1927年3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1），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

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2)，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各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出、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之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³⁾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

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竹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

团，醴陵叫游拢)。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⁵⁾，坐飞机回广东⁽⁶⁾了。吴佩孚⁽⁷⁾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⁸⁾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激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感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感。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

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伯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橙，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升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

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11)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行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眼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

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¹²⁾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

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无二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

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县，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巧。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

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¹³⁾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¹⁴⁾，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¹⁵⁾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轨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16），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

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¹⁷⁾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示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

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农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

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喝，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

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

苞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¹⁸⁾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苞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县，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否，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瞪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¹⁹⁾，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

被迫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激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20）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

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雉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统，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统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2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

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22）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23）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 件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

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信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

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线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5）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28）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27）有什么两样！

【注释】

（1）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2) 赵恒惕（一八八〇——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〇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

(3)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4) “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打”，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6)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7) 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一九二〇年七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

(8)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十节。

(9) 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一九二七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10)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11) 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12) 袁祖铭，贵州军阀，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间曾经盘据湘西一带。

(13) 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

(14) 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地方性

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15) 都总、团总是都、团政权机关的头领。

(16) “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17) 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

(18) 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19) 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20) 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21) 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

(22) 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7）。

(23) 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24)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把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

(25) 张静江（一八七七——九五〇），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26) 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

(27) 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第二章 土地的没收和征收

第二条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三条

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但对依靠上述土地收入以为维持费用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事业，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另筹解决经费的妥善办法。

清真寺所有的土地，在当地回民同意下，得酌予保留。

第四条

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

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

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第五条

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主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百分之二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第六条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第七条

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第八条

本法规定所有应加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在当地解放以后，如以出卖、出典、赠送或其他方式转移分散者，一律无效。此项土地，应计入分配土地的数目之内。但农民如因买地典地而蒙受较大损失时，应设法给以适当补偿。

第九条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农村社会阶级成分的法律定义，另定之。

第三章 土地的分配

第十条

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第十一条

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但区或县农民协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为便于耕种，亦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乡与乡之间的交错土地，原属何乡农民耕种者，即划归该乡分配。

第十二条

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农民租入的土地抽出分配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应使原耕农民分得的土地（自有土地者连同其自有土地在内），适当地稍多于当地无地少地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农民保持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土地为原则。

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原耕者保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土地。

第十三条

在分配土地时，对于无地少地人口中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如下：

一、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而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在本乡土地

条件允许时，得分给多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

二、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应酌情分给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庭生活者，得不分给。

三、家居农村的烈士家属（烈士本人得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荣誉军人、复员军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均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得视其薪资所得及其他收入的多少与其对于家庭生活所能维持的程度，而酌情少分或不分。

四、本人在外从事其他职业而家属居住农村者，其家属应酌情分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属生活者，得不分给。

五、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六、经城市人民政府或工会证明其失业的工人及其家属，回乡后要求分地而又能从事农业生产者，在当地土地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七、还乡的逃亡地主及曾经在敌方工作现已还乡的人员及其家属，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八、家居乡村业经人民政府确定的汉奸、卖国贼、战争罪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坚决破坏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不得分给土地。其家属未参加犯罪行为，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有劳动力并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第十四条

分配土地时，得以乡为单位，根据本乡的土地情况，酌量留出小量土地，以备本乡情况不明的外出户和逃亡户回乡耕种，或作本乡土地调剂之用。此项土地，暂由乡人民政府管理，租给农民耕种。但所留土地最多不得超过全乡土地的百分之一。

第十五条

分配土地时，县以上人民政府得根据当地土地情况，酌量划出一部分土地收归国有，作为一县或数县范围内的农事试验场或国营示范农场之用。此项土地，在未举办农场以前，可租给农民耕种。

第四章 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

第十六条

没收和征收的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应按适当比例，折合普通土地统一分配之。为利于生产，应尽先分给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农民。分得此项土地者，可少分或不分普通耕地。其分配不利于经营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并合理经营之。

第十七条

没收和征收之堰、塘等水利，可分配者应随田分配。其不宜于分配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

第十八条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河、港等，均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其原由私人投资经营者，仍由原经营者按照人民政府颁布之法令继续经营之。

第十九条

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苗圃、农事试验场及有技术性的大竹园、大果园、大茶山、大桐山、大桑田、大牧场等，

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但土地所有权原属于地主者，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收归国有。

第二十条

没收和征收土地时，坟墓及坟场上的树木，一律不动。第二十一条

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应妥为保护。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地主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不合农民使用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充作公用。

第二十二条

解放后开垦的荒地，在分配土地时不得没收，仍归原垦者耕种，不计入应分土地数目之内。

第二十三条

为维持农村中的修桥、补路、茶亭、义渡等公益事业所必需的小量土地，得按原有习惯予以保留，不加分配。

第二十四条

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的一般原则，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五条

沙田、湖田之属于地主所有或为公共团体所有者，均收归国家所有，由省以上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六条

铁路、公路、河道两旁的护路、护堤土地及飞机场、海港、要塞等占用的土地，不得分配。已划定线路并指定日期开辟的铁路、公路、河道及飞机场等应保留土地者，须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七条

国家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经营者，经营人不得以之出租、出卖或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项土地时，必须交还国家。

第五章 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

第二十八条

为加强人民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

第二十九条

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三十条

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第三十一条

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村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院判决执行。

第三十二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院，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

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人民法庭的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三十三条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为保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严禁一切非法的宰杀耕畜、斫伐树木，并严禁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三十四条

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本法适用于一般农村，不适用于大城市的郊区。大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办法，另定之。

本条所称的大城市，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按城市情况决定之。

第三十六条

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汉人占多数地区零散居住的少数民族住户，在当地土地改革时，应依本法与汉人同等待遇。

第三十七条

本法不适用于土地改革业已基本上完成的地区。

第三十八条

凡在本法公布后开始施行土地改革的地区，除本法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及第三十七条所规定之地区外，均须按照本法施行。各地

何时施行土地改革，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省人民政府以命令规定并公布之。

第三十九条

本法公布后，各省人民政府应依本法所定原则及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当地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提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施行，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

第四十条

本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公布施行。

土地改革记实¹

铁流

文章摘要：1951年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暴力运动。我先后参与了三期土改工作，当过组员，也当过组长，现将所见所闻回忆于后

一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暴力，它的利润大过任何营生，且赚不赔。只要你手中有了枪杆子，而这枪杆又变成强大的权力后，天下无论什么再贵重的东西——黄金、白银、玉器、珍宝、田地、房屋、美女、奴婢，都是你的了。要什么有什么，谁敢不给？不给，就抓起来。轻则坐监，重则杀头。所以千百年来在我们中国，有的是“起义英雄”，“造反好汉”，如果成不了事，当个山寨王也不错。1951年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暴力运动。我先后参与了三期土改工作，当过组员，也当过组长，现将所见所闻回忆于后。我既不粉饰它，也不丑化它，本着诚实态度，留下那一历史。

经过为时三个月的紧张学习，中共成都市委青干班在歌声笑声中正式宣布结业，除少数几人在自查交待中怀疑有历史问题退回外重审外，其它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成了成都市第一批中坚的干部力量。官小的当上了科长、处长，官大的当上局长、厅长，还有个别人爬上了省部级的宝座。这叫“膏药一张，各人的熬法不同”。不过也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捞上，还成了“反革命”或“右派”。我虽然是右派，有幸活到了今天。那位与我交好的毕业于建国中学的“梦

¹ 这篇文章在凯迪社区里找到，原书目录的文章名是《我所经历的土改》，不知道是否这篇。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078240&page=6&uid=&username=&userid=&action=>

竟”老兄，1957年12月因划成右派自杀于金牛区农委，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还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根据中央指示：也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为了巩固红色政权，新解放地区立即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于是，中共川西区党委（四川省的前身）立即成立川西区土地改革工作团，由区党委常委郝德青任团长，各地市设立分团。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

成都市土改分团长由中共市委秘书长曹振之出任，团员主要是从市委干训班中精选一批立场坚定，有工作能力的学员（我是其中一名），然后再增调一批老区来的干部，正式组成川西地区土地改革工作团成都分团。总人数约120人，选择近郊青龙乡作为试点。

人员配备好后，立马进行新一轮培训，学习土地改革法大纲以及如何发动群众、划清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分田分地等一系列政策性的工作。在工作开展前，全区（川西区）二千多位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集中在总府街区党委大礼堂，听取郝德青团长的动员报告。

郝团长约莫四十岁，大个子大块头，戴付茶色眼镜，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土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不会轻易交出田产，必然抗拒到底”。他特别强调，“对那些罪大恶极，作恶多端、欠有农民血债的地主，必须坚决予以镇压。当杀的杀，当关的关，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站稳立场，打好这一场无硝烟的战斗！”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团一行百余人，在成都北门大桥第八区区委的大院子里集中待命。先由曹振之团长训话，然后背上被盖卷、戴上草帽、项上扎着白毛巾，男女一色的灰制服，一两人一排成长龙，浩浩荡荡向土改试点的青龙场开去。

青龙场距成都市中心不足十五华里，那时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村。

那里的人情世故和生活习惯，几乎和城里有天壤之别，当地人说的客家话（称土广东），我们根本听不懂。全场有近百家商店，分布在宽不足五尺、长不过七百米的路的两旁。穿街是一条光滑的石板路，石板路上留有鸡公车（即独轮车）和钉鞋的痕印，与石板路交相辉映的吊角屋檐，檐口上挂着各式长短不齐、颜色各异的吊牌和纱纸灯笼。商店开间大小不一，但却是一色的木门、木柱、木柜台，黑色匾额上多是刻写着“童叟无欺”、“言不二价”的硃红大字。纱纸灯笼老是在风中摇曳，影影绰绰，神秘莫测。而场头场尾几株老态隆钟的古槐树，又给古镇频添一派秋色，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中世纪。

当我们进入青龙乡地界，早在那里等候的农民欢迎队伍，一下向拥上前来，又是送茶水，又是抢背包，热情似火，感人至极，还不停地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土改团万岁！”

……

那阵势，就象一年前解放军进城的动人场面。我心里在想：革命真伟大！我也真走运，碰上了这么好的一个岁月，怎的不卖命为党工作，为毛主席献身啊！

青龙场乡农会（未建政前均叫农会）在场口田埂里，用十几张拌桶塔起了一个台子，作为欢迎土改工作团大会临时的主席台。参加欢迎的群众有两三千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小红纸旗。他们伸着长长的脖子，眼里闪着企盼之光，恨不得立即就拿到梦寐以求的土地。

欢迎会先由乡农会李主席，代表全乡农民对土改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其后是曹振之团长讲话。他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

土改团，来的来目的是帮助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翻身！就是要把地主手中的田地没收过来，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彻底根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

他的讲话，赢得全场阵阵掌声和口号声。会后，土改团按事先分配好的名单，下到全乡二十四个自然村。

全团下设四个分团，每个分团下有五到六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有三至四名组员，组长是老区来的干部和市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们属三分团，团长叫朱震，中共成都市委委员，后任农村工部部长。分团部设在三村百公堰旁边一座地主的大院子里。

我和“百灵鸟”以及另外两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负责小地名叫回龙寺的第七村土改工作。这儿是个土地贫脊，人烟稀少，是个丘陵村落。一条长长的土山头把村子分为两半，一边与天回镇接壤、一边和龙潭寺交界。解放前这儿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一年前发生过激烈的叛乱，曾是“四大运动”（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重点清查的村子，先后“杀、关、管、斗”近二十余人。据所掌握的材料表明，现村农会干部不纯，大权仍为坏人把持。

工作组组长叫叶青，团市工委一个部长。沉默少言，原则性强，满脑子敌情观念，一点风吹草动看半天。他成天老是皱着眉头想问题，总想有点新招数。组员除我和“百灵鸟”外，还有一人是刚从乡农会提上来的干部邓大泉。他是本村本地人，解放前曾给地主当过放牛娃，对村里情况十分熟悉。

村农会主席是个40多岁的精瘦女人，头缠青纱帕，腰系一块围布，虽是小脚，走起路来轻快麻利，大家叫她罗大娘。她带着我们回村，一路上十分热情，主动介绍村里情况，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当过保甲长，谁参加过叛乱，一五一十如数家珍。“百灵鸟”听后很激动，悄悄向我说：“黄牛，这罗大娘觉悟好高，不愧是村农会主席啊！”我未及回答，身旁邓大泉却对我耳语道：“她是一贯

道点传师，当然会说。”

“百灵鸟”吓得打个颤，睁着双大眼睛不知说什么好。

一贯道是土改打击对象，前人、点传师内部已定型为反革命分子。说他们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马，以宗教作掩护，大肆搞封建迷信活动，所以吓得百灵鸟打颤。

从青龙场到迴龙寺虽说不足十里，全是一溜坡的黄泥巴上山路。这种黄泥巴是粘性土质，贴脚连鞋，路真难走。土路上遍是鸡公车的轱辘印，坡坡坑坑，弯弯曲曲，累得一身大汗。罗大娘见“百灵鸟”走得气喘吁吁，便要抢着帮背行李，她死活不干，生怕沾上这位“一贯道”点传师。罗大娘笑笑也不强行，指着远处坡坎上几间瓦房说：“快到了，那就是有名的马家店，又高又陡，推车挑担的人最怕。当地有句顺口溜：“马家店，磨盘山，上面悬个药罐罐。我们村就装在药罐罐里。”

叶青站个立马式，望望马家店又看看罗大娘，紧皱眉头，话里有话，自言自语道：“药罐罐？村子就装在药罐罐里……”

进了村，我们安排住在一户张姓的农民家里，成份下中农。他一家三口，两夫妻和一个十七八岁叫英英的女儿。是个独立小农院、正屋、厢房共五间，房外一圈黄泥巴院墙，上面长满茅草，院里茂密修竹，青幽别致。土墙外有个小水塘，用来洗衣洗菜。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在厢房里，“百灵鸟”和英英同住右侧厅房，原放农具的地方临时作工作组办公室。

我们和他家同吃同住，每天每人交纳 24 两米票和一毛钱的菜金。他家三餐白米饭。菜是从地里新摘下来的，又嫩又鲜好吃极了！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更无电话，基本上过的是中世纪自给自足生活，唯一要买的是盐巴。他们全家穿的衣服，是自织的窄逢家居布（一种土制木机，自纺自织出的土布），吃的油、肉是自己种的菜籽榨的油和喂的猪

张大爷约五十出头、蓄着大清的半边头(前顶剃光后顶蓄发)，腰上栓着搭琏，搭琏里装着菸絲和打火石，见人说话一言一笑，和霭兼躬。他成天呆在地里，不是锄草就是松土，从日出忙到日落。张大娘也有做不完的事，煮饭、喂猪、喂鸡、喂鸭，要不便是缝缝补补或摇纺车，把自种的棉花拉成长长的綫。女儿英英留着过腰长辮，手腕上戴着发亮的银镯子，腰系长围裙，瓜子脸，细眉毛，一双眼睛水汪汪，见人说话就脸红。全家和和融融，过着妻贤子孝，没有忧愁没有痛苦，几百年、几千年都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日子。

那天晚饭后，我们团聚在办公室里紧闭双门，研究村里情况，叶青首先把团部得到的信息向大家通报，说：“根据乡农会和县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全乡百分之九十五的村农会成员严重不纯，有土匪、有地痞、有帮会头目、有‘一贯道’骨干和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这个村的农会主席罗大娘，一贯伪装积极，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钉子。还有地主黄和尚也不简单，他那深不可测的果园里不知埋藏着什么秘密；位在马家店开饭馆的那个万保长，据说支持过土匪叛乱……”

他越说我们越紧张，百灵鸟握的毛打起抖来，邓大泉习惯性地摸着屁股上的手枪。我到镇静，心里却七上八下：真有点严重，看来土改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村农会武装队长冯高宣解放前当过捧客，有血债”叶青继续介绍敌情，显得老练，满有信心。他拨亮油灯，警惕地往窗外一看，确定无人偷听后才说：“其实要抓这些人十分容易，来几个县公安捆走就是，但不利于发动群众。抓人是为了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也是为了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清理整屯农会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你们注意没有，那天我们乡上来到村里，那个一贯道点传师罗大娘公然说，马家是药罐罐。什么是罐罐？就是要把我们装进去。”

其实，罗大娘所说的“药罐罐”，是指马家店地势而言。它是

个山坡上的么店子，一条毕陡的黄泥巴山路直通将军碑，连接到川陕大道。这条路又陡又直，为肩挑役夫和推车大汉所怯，多是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躬腰贴地，气喘呼呼，走起来吃力极了。若谁能一气登顶，不死也得患场大病，故有“药罐罐”一说。可是叶青口中之“药罐罐”，完全是另一种意思。“百灵鸟”举手发言：“管它的，先把她抓起来！”

叶青把指头立在嘴上，意思要她小声一点，说：“我不是说过吗，肯定要抓，问题是如何抓？但现在群众对她很信任，我们得做大量的工作，首先要收集她的材料，发动苦主控诉和揭发她的罪行。”

大家同意叶青的决定，请理农会组织，发动群众，找到新的依靠对象，正如曹团长说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依靠对象，土改工作就无法搞下去，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通过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尽快建立起新的农会。”

通过斗争实际，我似乎使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用人是一批代替一批。“清匪反霸”一批人；“减租退押”一批人，现在“土地改革”又是一批人！一批替带一批，这就是阶级斗争。近似老百姓说的“推完磨子杀驴吃”。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驴呢？会不会到后来也把我们杀来吃了呢？

无数历史证明，共产党的干部几乎都是“驴子”，常常有被“杀”的可能性。“反右斗争”不就杀了我们吗！

确定好工作目标后，我们立即分头下村了解情况，每晚忙到十一二点钟才回家，吃罢饭马上又聚集在一起汇报工作，研究情况，忙得来洗服都没有时间。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掌握到罗大娘一些情况，比如一家农户娃儿病了，她去烧过蛋，收了钱；又如土匪叛乱时，有个土匪在她家喝过茶；还有一年干旱，她组织大家去庙里点过香。冯

高宣搞不到新的情况，全是县公局掌握到的历史材料。罗大泉到一个新发现。他说：“我昨晚回来路经黄和尚果园，突然遇上冯高宣，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干什么？我问他，他说他巡夜，发现这里有响动，以为黄和尚在转移财产。他非得要送我，吓得我一身毛毛汗。我推了多次还是要送，我只好叫他在前面带路，我走后面。一路上我都按着枪扣，万一有不对劲地方也来得躲闪。”叶青听得很认真，最后以不确的口吻说：“他不会是想暗杀你吧？不过你很有经验，让他走前面。”说到这里，转头向我和百灵鸟，“今后你们如遇上这种情况，也要这样处理。”

我应着，心里却在想：有这么严重吗？冯高宣与我打过几次照，每次都很有气，惟恐有不周之处，还说：黄工作队，这村子全是山路，走路当心一点，没跌着，要你同意我带带路怎样？

叶青决定现在可以对罗大娘动手了，他首先布置邓大泉，向一叫彭兴顺的贫农嘘信，说：斗倒罗大娘后，他就是村农会主席。又向我吩咐，准备好捆人绳子，一当他宣布逮捕，立即带武装上来捆人，并要连夜送公安局去。

彭兴顺得知自己接替罗大娘当农会主席，高兴极了，除向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外，还串了一大帮人，说：这个坏蛋早就该抓，至今还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反对共产党，破坏土改。

斗争会在回龙寺小学操场坝里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可是士气不旺，几乎斗不起。发言人不多，好在彭光顺极积，又吼又叫又是喊口号，才把罗大娘威风打下去。后又由他出手捆扎，捆得罗大娘叫天叫地大喊冤枉：“我是参加过一贯道但不是点传师啊！工作队，你们抓错了人，我是拥护共产党的下中农啊！不信，可问村里人？”

谁去问，谁又敢证明她不是一贯道点传师？她叫屈有什么作用呢，纯洁阶级队伍和提纯海洛因一样，由粗而细而精而净，同时必须要有彭兴顺这样的加添剂，工作组这样的催化剂，不然何以叫阶

级斗争？伟大的土地改革不抓几个人，不杀几个人，怎能显示出轰轰烈烈的壮举场面！

有首歌就是这样唱的：“土改锣鼓一声，工作队员下村庄，农会组织要搞好，阶级队伍大放光。抓坏蛋，清暗藏，敌人开始才着慌。”百灵鸟教村里青年男女唱这歌，还按这首歌的拍子扭起秧歌来。

第二步工作，拿那个地主开刀祭旗？这是一个穷村没有大富人家，只有黄和尚和万保长还有点家产，可是两人口碑极好。一天吃早饭，叶青突然问张大爷：“你们村地主黄和尚和万保长怎样？”

张大爷想也不想地说：“黄和尚虽说是地主，自来吃斋把素行善，万有全虽是保长，做事公道从不欺负人。我看一个是善人，一个是好人……”

邓大泉闻言脸色骤变，立把筷子一撂道：“你这是什么立场，像贫下中农吗？地主是善人，保长是好人？”

叶青不动声色，继续问道：“他们怎么个善？怎么个好？”

张大爷放下碗，拈着下巴上几根胡须，沉思半晌说：“民国二十八年，村里闹瘟疫死了不少人、好些人家买不起板板（即棺材），是黄和尚捐的。有一年大天干，乡上发下救济粮，万保长按粮分到人头，自己没要一颗……”

我忍不住了，岔断道：“那是伪装善人好人啊！”

张大爷是个老实人，没注意大家脸色，仍实打实说：“是善人就是善人，好人就是好人。”

英英毕竟是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意思，冲着他爸道：“天底下哪个地主是善人，保长是好人的？爸，你真落后。”

张大爷一下来气了，几乎叫喊起来：“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可不能当着工作组面乱说，像彭兴顺样去害人啊！”

这顿饭闹得大家不欢而散，晚上研究工作时，叶青提醒大家：“看来发动群众是件很细致的工作，不能急躁，要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地主阶级和伪保长的伪善面目。”

一天我们去分团部开会，正碰上北京来的土改参观团，团长是当时通俗文艺负责人王亚平，团员均是文化界的名流，有不少作家诗人，一个个斯斯文文，人人长袍西装，好些还戴着眼镜。他们不参加实际工作，每天到各村去听农民的“苦”。一天，王亚平将他新写的诗念给农民听：“土改风雷捲狂涛，农民弟兄站起来！”

那些听念诗的农民，全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王亚平即招手说：“坐下，坐下，我是在念诗，不是叫你们站起来。”

这事成不了个笑话，长时间在我们中流传“农民弟兄站起来”。

正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访穷问苦，发动群众的时候，川西区党委来了新的指示：要加快在新解放区内开展土改工作。

我们土改团立即分成若干分团，在全市十多个乡面铺开此一工作。我调到驷马乡分团部去，并担任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后来听说黄和尚等六户有钱农民被划成地主，没收了全部土地、农具、房屋和生活用品，以及桌椅、板凳和睡的床铺、穿的衣服。在斗争会上黄和尚喊天哭地地叫屈：“我是什么地主呀！新衣没穿一件，肉没有放开肚皮吃一顿，成天起五更睡半夜，一背太阳一背雨的、累了几十年挣了几十年，才买下一个果园种葡萄、苹果，就成了地主。这叫啥世道啊！？”结果被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打得皮青脸肿，最后还送到乡农会去关了三个月。万有全保长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作为管制对象，因认罪守法好没去劳改。冯高宣因有血债不仅逮捕，还在全乡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上，连同几个恶霸地方被决罗大娘还算万幸，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二

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分子，纵然乖乖地交出田产也不行，必须

要挨斗争，必须要触及灵魂。凡开斗争会，地主没有不下跪、不挨打、不受捆的，不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土改”，工作组立场有问题，自然一顿暴打在等待着钟家兄弟。

清溪碧波绕竹院，小桥流水湾。鸡鸣犬吠，花香十里，暮云处，村姑唱晚。地沃土肥生金果，夏凉冬有暖。谷穗拦道，麦苗障目，画中画，成都平原。

我爱成都，成都是我放乡！成都北面驷马桥乡是川陕道的起点。驷马乡缘于驷马桥，驷马桥始于西汉司马相如赴京求官，与才女卓文君别离时留下的誓言：“如不高车驷马，决不过此桥”

驷马乡距成都北大门约五华里，是座石拱桥，现已不存在，掩盖于高楼大厦之中。当年它是川陕大道枢纽，来往车辆均由经此桥，从早至晚响着鞭梢的、载运棉花和粮食的骡车，以及“咯吱咯吱”推货的鸡公车，偶尔也有一二辆鸣着喇叭的卡车，扬起片片尘灰呼啸而过。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店铺，其中茶房、旅店、饭馆居多，便于南来北往的客人休息下榻。大概这儿距成都很近，故不赶场。全乡除街村外还有十八个自然村，土改团团部设在石桥左边一个绅粮（指有钱人）的院子里。此时乡农会已成为“看守政府”再没有什么权力，仅给农民开开什么证明而矣。

我们来后，它就搬到街村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办公，可怜兮兮，冷冷落落，乡长、武装队长、文书，都是待审人员，去留与否则等土改结束，新成立的政府而定。这是既定的方针政策，新的运动不用老的运动留下的人，近似一朝天子一朝臣。

土改工作团长叫李捷，成都市三区的区长，山西人，抗日时期打游击的干部，是个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和上进的干部。他个儿细长瘦高，走路习惯性地曲着背，对人和霭，不发脾气，腰上插只不足拳头大的美式白朗宁小手枪。

团部下设两个中心大组，各管九个村的土改工作组。李捷对我

有点偏爱我，不知是我年纪小还是出身成份好的原因，他常向我说：“我参加革命和你一般大，还没有扛的步枪高。”所以一去报到，就指定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

双水碾村位于川（四川）陕“陕西”道和成“成都”彭（彭县）道之间，深藏在翠竹绿水环绕的田畴之中。村子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很大的碾房，碾房被一条石板路一分为二：一边碾米磨面，一边榨油压枯。那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水，从远远的西边直奔而下，冲着碾房昼夜发出轰鸣声，似有万马千军厮杀，“咣啷，咣啷”的碾砣声不绝于耳。碾房老板姓李，为人厚道谦和，生意上十分讲诚信，故这里碾出的米又白又净，榨出的油又黄又澄，好得不得了，深为四乡八里的人称赞。

对着碾房有六七间瓦屋，北头三间是么店子，终日售酒卖茶，人来人去显出静中的热闹。村农会的办公室正对着榨油房的石桥边上。那奔流不息卷着浪花，发着狂吼一泻千里的清清河，流经驷马桥，再汇集上千百条小溪，倾入九远桥下的沱江，然后汇入滚滚长江之中。

村农会办公室正面的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像下摆放着木桌长凳，每天都有几名男女武装扛着步枪在这里值班放哨，有时也去村里各处巡逻，如发现陌生人或认为有嫌疑的人，就要进行盘问和查看路条，以防地主和阶级敌人外逃。。

我们工作组驻扎在钟家大院子，这是座百年老院子，青砖灰瓦黑木柱，一看就知是书香大户人家。红漆大门的院子前，有上马磴下马石，三重院门的门楣上，都挂有金字匾额和楹联，巍巍雄踞，一派昔日风光。

院子主人姓钟，弟兄三人，各住一座大院。我们来前村农会早已把他们撵在最后一座院子里，一、二重院子全归了土改工作组使用。钟家三弟兄无论老小男女，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总是低着头，不敢正面嘘视，就像监狱里的犯人看到狱警一样，只差没喊报告。

他家种着百多亩上等的田地，雇着两个一老一壮的长工。老的叫郭师，壮的叫马师。郭师一见着我们就回避，背地向人说：“怎么能去分有钱人家的田地，那是人家出汗出力挣来的呀！我帮了他们家几十年，没骂过我，也没克扣过我一年一担（十斗米计量，约合三百斤）六斗米的工钱，我为啥去闹？下辈子会遭报应的。”

马师和他恰恰相反，经常找着我们反映情况，说钟家三兄弟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恶，不给他吃好吃饱，年底还扣他的工钱，应该好好斗一斗。后来有人私下向我们说，马师经常去么店子里掷骰子、玩牌九，还去嫖女人，知道他德性的都不请他，钟家弟兄看他找不到事，两年前才请了他。没想到现在却恩将仇报，老是说别人坏话。

看来农村也是个复杂天地，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也有人干，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贫雇农的马师当然是我仍的依靠对象。

接钟家大院既是工作组的办公地方，也是土改团中心工作组的指挥部。中心工作组相当于一个工作队，管着四个村的土改工作有点权力。组长叫文理阳，市长米建书的秘书，一个很厉害的女强人。她行事果断，处理问题刚强，说话时从不准许人插嘴，大家有点怕，背地里叫她“文主观”。

村工作组加中心组有近十二个人，设有伙食团，雇有炊事员。炊食员叫夏得海，一个国民党的老兵，会煮饭，会作菜，会讲笑话，文理阳叫我兼伙食团长，采购代管账。

一天，坐在起吃饭，他忽然长长叹息一声，文理阳关心地问：怎么啦？他说：“快憋死我了。我‘下得海’，‘下得海’，成都平原没海只有河，要不，我早捉条鲨鱼给你们熬汤了。”大家哈哈大笑，文理阳却反感，说他油腔滑调，哗众取宠，对他不放心，叫我暗地监视他，防投毒做坏事。我心想，有这么严重吗？但不敢掉以轻心，常常呆在厨房看动静。

由于工作组和中心指挥组在一起，我又身兼伙食团长，双水碾村土改工作决定权，实际领导权在大组长文理阳手里，我仅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不过文大组长我很器重，经常差我去团部领送材料，还专门给我一只“可尔特”手枪防身，总是“黄牛”前“黄牛”后地叫个不停。

我们每天上午汇报研究工作，午饭后下村访穷问苦，发动群众，收集地主分子和反动分子材料。农民不叫我们名字，统称工作队。我们工作组有三个人，一个叫杜斌老区老的，一口山西话，土得掉渣，大家叫他杜老陕。另一个是罗的女同志，长得矮矮小小，说话尖声尖气，剪个男孩的矮头，我叫她罗么姑。她很不高兴，骂我是条笨牛。我说，我是条笨牛，纵碰上母牛也下不了崽。气得她向文理阳告状，说我流氓。文坦护我说：一句笑话就认真了，真小气！

土改队男男女女，均是清一色四个箬的灰制服，灰布帽，元宝胶鞋，女同志要不是胸前鼓有包鼓，定分不出男女。

土改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第二阶段，划分成份，分清敌我；第三阶段，斗争地主，没收财产；第四阶段，查田评产，分田到户。

斗争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还在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钟家三弟兄就多次找到中心工作组组长文理阳要交田契、房屋，表示向农民弟兄请罪。文大组长立着眉毛，大声呵斥道：“你们要什么花样？，没那么便宜就过关。农民弟兄还得开你们的斗争会，评你们是不是守法地主。不守法，还得赔退哩！”

钟家三弟兄吓得浑身发抖，不断低声下气说：“我们有罪，我们有罪，请工作队宽大。”

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分子，纵然乖乖地交出田产也不行，必须要挨斗争，必须要触及灵魂。凡开斗争会，地主没有不下跪、不挨打、不受捆的，不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土改”，工作组立

场有问题，自然一顿暴打在等待着钟家兄弟。

我每天办完伙食，向夏德海安排好生活后，便下村串户了解情况。去前先到到双水碾村农会办公室坐一坐，了解了解情况。我一去他（她）们便要和我聊天，或背着枪陪我下户，说保护工作队是他们的任务。下到村里，无论任何一家农户都十分热情，送茶、打水，有的还煮荷包蛋，你若不吃，他们便拿话激你：“工作队，我们又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呀！毛主席派你们来帮我翻身，我们真心诚意煮碗鸡蛋都不吃，难道有毒药么？”

我们只好笑着推谢，说：“这是纪律，土改队不能拿农民一针一线。”

他们听后不依不饶说：“这不是针线是鸡蛋，违反了纪律我们说去。”

面对如此盛情，我真拗不过，有时只好吃。

下村送我的多是武装班长蓝秀琼。她家是贫农，又是军属，年铃和我一般大。她满头浓密的黑发，分扎成两条小辫子，辫稍上还系一对红蝴蝶结，老是不停地在胸前脑后飞去飞来。她有圆盘脸，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胸脯高高，显示出少女成熟的美。她总是紧跟在我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切，生怕有人对我下黑手。时间长了，难免不搭讪，只我一看她就脸红，立即把视线避开，惟恐碰上我的眼睛。

一次，她十分感慨地说：“黄工作队，我真羡慕你，这么小就参加革命了，将来一定是个官。”

我笑道：“傻姑娘，我们共产党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讲做官挣钱。”

她愣了半天，想了想望看我问：“我傻吗？”

我不好意思笑了，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也回头看她半天，从牙缝里冒出文不对题的应答：“挺漂亮！”

她哦了声，一抹鲜艳的红晕窜到了耳根。

在青龙乡回龙寺村有“百灵鸟”教青年农民唱歌跳舞，在双水碾村工作组其它两人都是比我还土的土包子。杜老陕粗嗓门，硬腰杆，吃橘子连皮吞的角色，甚至看电影不知把立着的椅板放平，还说“电影好看，就是椅子难坐”。先初大家不明白，后来闹清楚了，整整让人笑了三天。罗么姑左喉咙，又扭妮，出不了众，成天吱吱喳喳像只麻雀，没说唱歌，听说话也得塞住耳，不然吃不下饭。于是教歌教舞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不过蓝秀琼最乐意帮助我，更喜欢拉着我的手跳“二呀二郎山”的集体舞。

这些时候，我心中既惬意又迷茫，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一天她送她下村，见四处无人，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热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叫她给我的。弄得我要不是，拒不是，心里老犯嘀咕。第二天汇报工作，发现文理阳大组长老是看着我笑，我紧张极了，心想这下完了，肯定她知道了，这可是严重违犯了纪律，不记过也得挨批，定说我乱搞男女关系。

土改纪律极严格，决不允许任何人与农民有私人关系，特别是男女交往。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找到文理阳说：“大组长，我犯错误了。”

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愣愣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本想说我和村武装班长蓝秀琼有男女关系，到口的话却变成了“两个熟鸡蛋”。

她听后哈哈大笑，笑得眼眶呛出泪水，说：“黄牛，你真有趣，热鸡蛋就吃呗！”

但没有想到五年后，我被划成右派分子，在省市召开的千多人揭发批判我的斗争会上，她却义愤填膺地说：“黄泽荣，晓枫，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还在一位女同志面前耍流氓（指罗么娘事）可恨不

可恨？”

弄得我哭笑不得，有口说不清。其实我和蓝秀琼两情相悦的发展并不在土改，而是我回到机关以后的事情。1952年成都市组建公共汽车公司需要售票员，因她合乎招工条件，我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职权，把她介绍了去，但后来条件发生变化，有比她更漂亮的姑娘闯入我的视线，我们仅仅成为一般的友谊，不过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纯贞与憨厚。

在土改工作进入到划成分阶段，我和“文主观”发生了意见分歧。她指示我一定要把碾房李老板定为地主，还要组织群众斗争。我说，他家虽有钱，土地不多，是工商产，如斗争过火了一点。因为，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调查李的劣行，连一颗芝麻也抓不出。

她却批评我“思想右倾，立场有问题”我不服，说她“太主观，逼着牯牛下儿”。于是，矛盾闹到团部去。李捷团长解决的办法，第二天调我回团部，负责成渝铁路修建的拆迁工作。

驷马乡几个村都在成渝铁路占地范围内，特别是街村要修交叉道，需得拆不少民房。工作务任重，时间紧迫，李捷区长不知为什么觉得我能胜任此一工，借此把我留在了他的身边。

占地拆房动员搬迁，是一项新的工作。那时共产党做任何事没有强迫命令，以民为本，坚持说服，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老百姓讲清道理，哪象现在的干部趾高气场，一骂三瞪眼，又吃回扣又贪污，不搬家用推土机推！，你敢反抗老子有防暴队，用皮带打，电棒揍，再不然抓到监狱关起来再说。所以老百姓说，共产党的官儿，哪在为人们服务？全在为自已造金窝！变味了，早早地变味了。

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占地拆迁的五百多户人家逐个征求意见，有什么要求和打算。老百姓真好，人人支持修筑成渝铁路，纷纷表态配合政府工作。我还叫他们唱：

“成呀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款又拉夫，

人民血汗化流水，不见铁路只听哭。共产党，好领导，立即动工把路铺！军民合力修铁路，火车奔跑笑呼呼……”

仅管拆迁任务大，时间紧，我是工作组长又是组员，唯一助手是筑路指挥部一个技术员，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学生哥，什么都不懂只会丈地。确定赔偿金额是我。发钱记账也是我，，成天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忙完工作，夜里李捷团长还要我学习文化，有时还背着卡宾枪送他下村检查工作，当义务警工员。他总是一路走，一路向我讲革命理：“黄牛呀！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啊！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就要靠笔杆子了。你懂不懂，坐天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你对党忠心耿耿，工作能力也不错，立场又坚定，但还不能象潘清雍、袁忠智那样独当一面。尽管他们出身不如你，但他们是大学生，搞建设就需要大学生。”

他说的潘清雍、袁忠智，和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一是川大学生，一是华西大学学生，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很受他的器重。现在两人一个是红花村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团部秘书。由于李捷区长对我器重，两人对我挺不错，像大哥哥对待小弟弟。这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中心工作组所在的双水碾村，原来觉得我文化低挑不起担子，实际让文理阳领导那里工作。于是，我决定学习文化，赶上潘清雍、袁忠智。自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拼命看书写字，不浪费丁点时光。一次，我在油灯下看书到深夜，被他发现，忍不住笑着夸我一句：“黄牛呀，不错，现在正是你人生发奋的时候。记住‘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一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人，不能受到党的重用！”

成渝铁路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时间，筑路大军就开到占地的村子，任务迫着人跑得翻脚板。拆房搬家，首先从街村开始，事前得搞清楚，拆多大面积的房、是木结构还是砖砌房？不仅要标出补助金额，还要为他们找到搬迁的房子，不敢半点马虎，干得特欢。李捷区长几次要给我调一个人来，都为我婉言拒绝。

我说：“李团长，你不是说为革命要勇挑重担吗？现在我能挑，何必多占一个人呢？”

他听后点点头，高兴地说：“这也好，更能锻炼你。”

那天我坐镇现场指挥老百姓折房搬家，干到晚上十点才回团部，累得浑身没丝力气，仍点亮煤油灯看书，不会儿竟然睡着了。八月的天空老爷的脸，说变就变。不一会儿云黯风起，大雨倾盆。在迷迷糊糊中，似乎听得有人在叫我：“黄工作队，黄工作队，不得了，房子垮了，周裱褙一家埋在墙下了……”

我一惊，慌忙跳下床，抓起斗笠蓑衣，拉起叫我街村农会周主席，没命地向出事地点跑去。

此时，天黑不见五指，风刮得尘土狂飞，豆大伪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原来是他家那堵封火墙因紧邻的房屋被拆去，它便孤立无援地裸露在风雨中，又因封火墙是泥坯垒砌的，被雨水一泡，大风一刮，就轰然坍塌了，把熟睡中的周裱褙夫妇深深埋在地下。此时我全身没个干的地方，雨水顺着下巴流，屏住呼吸听去，只听得从泥土的隙缝中发出一种求救的微弱呼喊：“救命呀！救命呀！”

“救人，救命”无声的命令！争分夺刻不容缓。

此时若再去组织人或有半点怯懦犹疑，都是对人命的不负责任不关心，也是良心上的犯罪。我立即扑上前，蹲下身，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用双手扒抓泥土。

街村农会周主席在旁提醒我：“黄工作队，太危险了，封火墙还在坍塌啊！”未待我回答，又一堵封火墙坍了下来，所幸距我不远，未伤着。

我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深深打动了围观群众，他们迅速挤身上前，也用双手扒抓泥土。人多力量大，大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埋在泥土下的周裱褙铺夫妇，扒了出来。但他们一身是伤，多处

骨折，人已经昏迷过去。我当机立断：“赶快送医院抢救。”我和七八个群众，临时找来两付滑竿，轻轻地把夫妇两人放上去，抬起就往成都市青龙街省医院旋风似地跑。

街上没个人影，静得来只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板声。即到了省医院送到急诊室，经医生检查，须立即开刀抢救。但开刀需要有亲人签字。哪有亲人？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签字人的关系上填上“儿子”二字。医生看着抢救单上的签字，又注目地望我一眼，喃喃地说：“儿子，你是他们儿子？”

我点着头，道：“对，我是他们儿子！”

周裱褙夫妇两人保住了性命，我十个指头有八个没指甲盖了，充血红肿像萝卜头，整整疼我了半个多月。李捷区长知道后心疼地批评我说：“黄牛，怎么不叫团里同志？下次可不行啊。”我笑笑，不好意思道：“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造成的事故。”

他拍拍我的肩头，深深地动了情感，说：“不错，小小年纪敢一肩挑责任。”

我在土改团部是个招人喜欢的小孩，见事做事，喜欢做事，知道我绰号的叫我“黄牛”，不知道我绰号的叫我“小鬼”，有些女同志还叫我“小弟弟”。我不知道什么叫愁？什么叫忧？快活得象只小麻雀，纯洁得象块白玉。我一个心思在革命上，在工作上，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记得当朝鲜战场传来黄继光以胸口堵住美国大兵的机枪，光荣牺牲的消息时，我几个宿晚不成眠，多次向李捷团长提出“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为黄继光报仇”的请求，请组织批准。李捷团长批评道：“黄牛，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需要。现土改工作需要你，你就一心一意搞好土改工作。上朝鲜打美国鬼子想法好，但当前革命不需要你这样做，你报仇的决心就是搞好现在的工作！”我只能服从。

征地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土地改革也进入尾声分田分地分财产

的阶段。为了让农民放心分到的土地，不被地主再夺走，在这个时候要召开公审大会，杀一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以资“庆祝土地还家”的胜利。

那时杀人很简单，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只要土改团团团长点个头就行了。布告也是手写的，只需识字人当众念一遍，便把杀的人插上死标，拉出去毙了就是。在召开公审大会前一周，李捷团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上门极秘密地说：“黄牛，给你一个特别任务，从现在搬去和看守犯人的武装住在一起，一天要去仓里查看几遍，决不准许跑掉一人，如出了问题我会处罚你。”

不用问，他的谈话意味着什么？

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的阶段，各村都要召开几次斗争大会，每次斗争大会都要抓几个人，不是恶霸地主便是反革命，以及会道门头目、保长、甲长等。驷马乡一共抓了三十几人，加大“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遗留下来未决犯人共有五十多人，全关押在距团部不远的几个谷仓里，一日三餐均由家里人送。看守他们的是各村派来的武装（民兵）。那时人特老实，不知道逃跑，如想逃跑易如反掌，那关人的谷仓用拳头就能打开一个洞，可他们不跑，一天老老实实地等死。

我去了后，立即召集武装开会，把李捷团长压我头上的任务转压到他们身上，说：“为了庆祝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从现在起，对关押的犯人要加强看管，这是革命任务！要做到仓里飞不出一只蚊子，爬不进一只蚂蚁。”

武装全是贫下中农子弟，拥护党拥护革命的坚定分子。我是工队，虽然年龄比他们小，却是党派来的，敢不服从！大家异同声应着：“请黄土工作队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话虽如此，我不敢掉以轻心，白天晚上提着枪不停地查看巡示，以防万一。听说在“四大运动”中，就因为不注意防范，枪毙人的

头天晚上，有个反革命分子听到风声，竟开了小差跑掉了，至今还没有抓回来。如果这些人放在今天，判两三年徒刑可能都不够条件，那时为了“革命需要”，他们只能作“替死鬼”。应了老百姓一句话，“阎王叫尔三更死，怎能留你到五更。”

在公审大会三天前，我才知道他们中有四个人要枪毙：一个姓刘的棒老二（即土匪），解放前多次拉过“肥猪”（即绑架），1950年又参加叛乱；一个姓李的袍哥大爷（哥老会头目），是驷马桥乡的舵把子，很吃得开，并无什么血债，但民愤大；一个姓何的恶霸地主，天生怪脾气，解放前逼死过佃户；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人，在1950年3月参加过土匪暴乱，打死两个解放军，后混入新津机场当防空兵，新近才被抓回来。

公审大会会场设在场背后，一块收罢庄稼的田坝里，主席台是用十五张方桌搭成的，左、右、后面三方，用晒垫遮盖住，前方上首挂有一条红布长幅，上面写着“驷马乡群众公审大会”七个大字。

公审会由土改团秘书袁忠智主持，李捷团长讲话之后，叫带犯人。区公安局小队，押着一溜被关押的人犯，五花大绑走进会场。每个犯人胸前挂有一块纸牌，写着各自名字，名字上用红笔划了XX。当人犯鱼贯而入地来到公审会，全场群众立即高呼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分子！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坚决镇压恶霸地主，为死去的农民弟兄报仇！”

跪在主席台面前的一干人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会场，只那个何姓恶霸地主，几次爬在地上向群众磕头，不停地说：“农民弟兄，宽大宽大，我有罪，我有罪……”

公审会先由受害苦主上台面对面的揭发控诉，控到激动处，苦主挥手便打，举脚就踢，打得人犯鼻青脸肿，以示自己立场坚定。还有些不是控诉苦主，也跳上台来打欺头，要不是有武装拦着，当场定会打死几个。这就是“阶级斗争”，其实都是工改团我掌控，

为怕冷场，三天前便分头向群众作了布置。另外，在这种场合，一些人也喜欢表现自己，争当积极分子，争当干部特别是些年轻人，谁愿失去机会？

控诉结束后，由红花村工作组组长潘清雍，代表土改工作团，向临时组成的人民法庭提起公诉，并要求给下列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刘、李、何、王等四犯，予以严惩。接下来，是文理阳代表临时人民审判法庭宣判，实际上是自编自演的独脚戏。

宣判判处死刑的犯人，背上立即插上死标，由区公安武装押下去等候，待公安局长李云成讲话结束后执行。

李局长是个大胖子，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农民弟兄不要怕地主反攻倒算，不要怕反革命分子威胁，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壮胆，江山永远是贫下中农的！蒋介石八百多万匪军都被解放军消灭了，几个小毛贼地主还怕他们吗？

他反反复复讲了两个小时，我提着手枪和区公安武装，也就守候了这四个被枪决的人，两个多小时。

这四个人犯表现各不一样，那个姓何的恶霸地主，早瘫痪在地上，像散了架的一堆肉；姓刘的那个棒老二，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说，“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小伙子”；那个袍哥大爷说，人总得死，唯一是死前没有看见儿女；姓王的那个年轻人直直站着，象在想什么心事。他突然冲我一笑，说：“小同志，请你把我头上帽子摘去。”

我准备上前去摘，一位区公安武装，叫他先蹲下，以防他用足踢我。我想，临死的人还会这样凶恶吗？多此一举吧。看来我自幼属于那种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的人，怎不犯“错误”当右派分子嘛！

区公安局李局长讲完话，便是最后一出戏：枪毙人。参加公审会的群众，人挤人的往杀场挤，都想站在最前面看枪毙人的情况。有的人还用线麻线吊块铜钱，用来沾人血，说挂在家门上驱邪；有

的还准备馒头来蘸血，说吃了可以治痲病。

杀人的地方在河边不远的乱坟坝里，早由区公安武装扎成人墙，划了警界线，警界线外是农会武装。这四名被执行死刑的人犯，由八名区公安武警押提着，依次进入刑场。我威风凛凛地提着那支“可尔特”，紧跟在区公安武警后面，俨然是个监斩官。

到了刑场，区武装叫犯人跪下，那刘、李、张，都乖乖跪下，姓王的却不跪。一个武警上前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足弯上，王一个踉跄倒了下去。一声口哨，枪栓哗拉一声，再一声口哨瞄准，第三口哨，四只黑森的枪，同时“呼、呼、呼、呼”地射出一团绿茵茵的火，呼啸的子弹一触到人体，人犯即应声倒地。区公安武装不打回头枪，见人犯倒下转头就走，由我和团部另一位同志逐个检查被枪毙的人，是否已经毙命？刘、李、张全没有了脑袋，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只有那个姓王的足手还在动。我立即扣动手中“可尔特”，对着他胸口“叭，叭，叭”三响，他再也不动了。

警戒解除后，围观群众一涌而上，用铜钱蘸血的蘸血，用馒头沾血的沾血，有的人还用石头砸尸体，以示仇恨。乱哄哄的，煞是热闹。

待围观群众散尽后，家属便备上香烛、纸钱、棺木前来收尸，有的哭，有的嚎，有的一边哭一边嚎，一边数落死者生前的功与过。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背上背个小娃娃，手里牵个半大子，头缠孝布，跪在地上给那个何姓的恶霸地主烧纸帛，一边长声呜呜哭说：“死人呀，谁叫你活着不听话，上前年张家交不出租子，我说算了，你却偏要去追，追得别人上了吊，欠下命债，这下成了恶霸地主，把老命都丢了。你倒走了，丢下我们娘娘母母，怎么活啊！呜呜，呜呜……”

在土改团离开驷马乡前，不少翻身农民前来送行，依依不舍，难分难解。在人群中我看见了马师，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阴丹士林长衫，头戴一顶青绒瓜皮帽，不伦不类，满脸红光，腰间还别着支

二十响手枪。他笑嘻嘻走上前，得意地向我说：“黄工作队，真感谢你们，这下我们穷光蛋翻身了，我分到了钟家大瓦房，还有三亩地。你看，还穿上了钟老大的衣服，合身不？”说到这里，猛然放开嗓门：“我现在是村农会武装队队长！狗日的哪个地敢作乱，老子就毙了他！”

他说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无言，心里在想：这就是农民翻了身，他们还会穷吗？

驷马乡土改结束，李捷团长回到区里任职，行前悄悄告诉我，说：“黄牛，你的人事关系已从土改团转到了区政府，等洞子口乡土改结束便回来。”还说，洞子口乡土改团长是区委书记张烈夫，他同意你担任九里堤村工作组组长。

我心里好高兴：这下可以露一手了！

年轻人谁不想逞能？谁又不想高升？但那时想高升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或权势，而是能够更多更好地为革命做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献身！也许这是建国之初，共和国欣欣向荣的原因吧？一个政权须要有一批忠诚之士，一个革命须要有一批敢于牲的人，一个国家须要有一批有理想的生命。那时，似乎都具备，因为年轻人有理想与追求。后来全被毛泽东埋葬了，大家从说真话的革命者，变成了不敢不说假话的人。所以政党堕落了，国家腐化了，社会再次回归黑暗。这是谁之罪哩？

土改团的团部驻扎在肖家碾，一个叫威武将军陈国栋的公馆里。陈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战争，作战骁勇，故号。听说，张烈夫区委书记调来三区，看上这座公馆，立即以土改团名义没收。因为“官僚地主财产”不受法律保护，那时哪又有法律呢？我一个小小的土改干部，也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人，何况区委书记。

一纸公文，一声命令，当天就派人把陈国栋全家大小七口，撵

到村里东边三间茅草房里去了。这里就成了洞子口乡土改工作团的团部，也就是后来中共成都市第三区区委的办公地址。

这座公馆很气派，占地不少于三亩，院墙外是一条宽约一公尺的小河沟，清澈见底的溪流不停地绕着院墙奔跑，汨汨潺潺，发出琴一般的声音。院墙笼罩在冬不枯，夏不黄的竹林里。院内各种树木四时常绿，鸟语花香，近似蓬莱仙境，难怪张区委爱上了它。

公馆距通往洞子口乡的大道约一公里，门前是座精巧的红木小桥，小桥和一条乡村泥土小路相连，就像一条洁净的彩带把公馆系在田野上。小路两旁垂柳依依，常年吐秀。对着小桥是两扇嵌在高墙中黑漆大门，门上钉有黄灿灿的铜钉。进得大门，是条宽窄均等的石板小道，小道把庭园分成两半，一半花草繁茂，古木扶疏；一半果橘连枝，黄金灿烂。小道尽头是客厅，客厅门窗雕龙画凤，古色古香，里面摆着紫檀木的太师椅，椅上放着红锦坐垫。客厅两旁有四个小间，是书房、茶室、琴室和赏花观景的花坞。客厅后面是厢房，再后是主人起居室。穿过起居室是花园，楼台亭阁、敞轩水榭，错落有致，别有一翻情趣。在各房的门楣上，挂有大小不等的金字匾。那块悬在客厅正中的匾，足有一丈二长五尺宽，四个“恩泽乡里”的金色大字生辉放光。上款是，“威武大将军陈国栋大人六旬寿庆”；下款是，送匾乡亲的名字，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从这块黑漆金匾里，我们窥测到主人昔日有过的辉煌与荣光。按此推算，陈国栋被逐出公馆，正好是六十五岁。我去团部汇报工作，见过他几次。他总是穿着厚厚的长棉袍，戴顶压着眉眼的破毡帽，两鬓苍苍，胡鬓长白，柱着一根拐杖，迈着蹒跚碎步，不停地绕着那座原先属于他公馆，现在是土改团的办公地址，无声无语，走去走来，有时还驻脚长望，凝目沉思。看着他那一副失落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真有点令人可怜心酸……

我们工作组所在的九里堤村，位于成都西外十余里，其名来于

村北边府河的九里堤。此堤像一条长龙，把奔腾咆哮直向成都市区扑去的锦江，迎头拦截住，使它平静下来，不再发怒，慢慢地唱着歌，迈着平稳的步伐绕城而过。

传说，这堤是当年诸葛亮出任蜀相筑的。成都那时常被洪水淹没，他率民筑堤，留名千古，故又称丞相堤。锦江河水来于灌县都江堰，水清而冽，无一丝尘垢，喝进嘴里甘甜甘甜，沁脾润心，哪象现在浑噩污浊。

我们去时，江里常有打鱼的船，船头站着鱼老鸱，它根据主人的指挥钻到水中，把一条一条的鱼叼上船，待主人喂它一点鱼肉后，又钻到水中叼鱼。周而复始，不停劳作，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工作组加我共三人，一人姓张，是个初参加工作不久的农民娃娃，笨拙拙的什么都不懂，可还摆架子；一个是区妇联叫曾明芬的女同志，人生得漂亮，喜欢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制服，以示革命资格老道。她年长我两岁，高中生，有点看不起我这个老粗，可又不敢反对，我是组长管着她。

我们住在一个傅姓的中农家，是一座独幢的瓦屋院子，两排厢房，三间正房，中间院坝，下面是三间不隔断的长屋，东边喂牛，西边堆柴火。院子四周是川西平原特有的土坯泥墙，后院是大片竹林，老百姓叫“林盘”。傅姓中农在我们面前，决不多说一句话，客客气气，惟恐有什么过失。

村农会主席叫阮金山，一个地地道道的贫雇农，翻身户，抢先住在一家地主的大院子里。他个儿精瘦，常闹病，不是咳就是喘，说是受苦受穷留下的。有人说他同房多，不节制，把那东西当干饭吃。他老婆年轻，模样虽不怎么，白白胖胖，像团火。过去是堂子里的，1950年才嫁给他。阮主席说话吐词不清，表叙更是词不达意，又加上一口下山东（泛指简阳、安岳县一带的人）腔调，叫人更难以听懂。比如吃饭，他说“卡饭”；压迫剥削，他说“鸦片吃得”。所以，他一讲话，大家就笑，但没人敢轻视他，他是主席，

和毛主席一样，叫谁做什么，谁敢不做。农会生产委员姓陈是个中农，儿子是武装队长，俩父子对人和善，不拿架子，每次开全村大会，总是在坝子里摆板凳、收板凳，做得井然有序，从无怨言。一次，他儿子悄悄问我：黄工作队，土改还抓人不？我想也不想回答：当然要抓！凡是地主、反革命敢于破坏土改，立即抓！

他听后，轻轻唉了声：我真不能再去抓人了，这样，二辈子还不清这个账。阎王不会放过我的。我笑了，笑他那个老实巴焦的样子，什么时候了，还相信阎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在“四大运动”中杀的人太多，村西头的十三组那个叫边洪恩的边三哥，是乡长叫曾智清的拜把兄弟，曾有兄弟伙千人，解放初参予叛乱，是“清匪反霸”中第一个被杀的恶霸。此后，众多的兄弟相继镇压。边洪恩一家不仅本人被杀，两个叫大龙、小龙的儿子，均敲了沙罐。九里堤村由于地缘的关系，在1950年的时间里，共枪毙了十六个人。现农民谈起此事还咋舌：老天爷，十三条命啊！

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三百多张嘴巴，有四户地主，六个富农。这里田肥土沃，农民富有，读书人不少。我怕他们小视我，处处都学老八路样子，棉衣不穿，披在肩上；板凳不坐，蹲在上面；开会讲话，老端着一个茶缸，嘴巴上还叼着根劣质香烟，说话一声长，一声短，南腔北调，开口，我们共产党；闭口，我们毛主席，一副“假老练”样子。今天回头看，真有点脸红。

按照工作安排，每十天召开一次“地、富、反、坏”训话会，训话由我主讲。我总是铁青着一张脸，趾高气场，把他们骂个狗血淋头：“你们这些，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欠下多少血债？没有杀你们，是我们政府宽大，共产党讲革命人道，才保住了狗命。但这个……是留下你们改造，让你们重新做人。如果，如果，你们再敢反动，一定敲你们沙罐，敲个你妈稀巴烂。你们几个毛毛贼算老几？告诉你们，那个，那个，你们靠山国民党蒋介石有八百万反动军队，不是被我的消灭了吗！你们，你们……”我找出更好的词汇，

只好改口问：“你们听见了吗？”

十多个“四类分子”，虎地站起来：“报告，黄工作队，听见了！”
一个站得毕直，头向下，眼看地，就像战场上的俘虏兵。

如果要是哪天我情绪不好，对谁看不顺眼，只需嘴一歪，村农会武装就会把这个人捆绑起来。什么是土改政策？我就是政策！什么叫专政？，我就是专政！体制的殘暴必然是社会的悲哀。這悲哀、殘暴，大年后落在了我的身上，迷信话叫报应。

突然有一天曾明芬的情绪特别低落，说话走路没点精神，问她又不说原因。我是组长，立即跑到团部陈家公馆向张区委汇报。张区委听后笑笑说：“她父亲是地主，三天前把斗争他的农民砍死了，现以逮捕，就这几天要枪毙，所以引起她的情绪变化。团部已作出决定，调她回来，另外安排工作。但现在又没有新人补充，你看咋办？”

我本来就不喜欢她，认为有点难领导，便说：“调走吧，我们两人一样能完成任务。”

张区委点点头，夸我有全局观点。同时，给我一项临时任务，准备一条浑猪，开公祭大会。

什么是公祭大会？为了发动群众，控诉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在划分成份阶段的前夕，以土改团部名义，组织一次全乡的公祭大会，公祭那些被万恶的地主阶级，害死的农民弟兄。公祭会设在团部门前的空坝子里，参加公祭农民头缠白帕，受害家属身穿孝衣，全团土作人员臂戴黑纱。会场挂满孝对，飘着白绛，气氛极为悲伤。我们九里堤村按张区委分咐，杀了一头肥猪，在刮去猪毛的猪背上插上蜡烛，放在灵桌上，一大队人拥着，吹吹打打抬去，很为公祭会增色。

公祭会由张区委主持，有灵堂，有道士，会场一遍哭声，哀乐动天，丧鼓擂地，就像真的一样。公祭完毕是斗争会，跪在前排的

十多个男女地主，被深含阶级仇恨的农民打得满地滚，再后是枪毙人。枪毙了一男一女两个地主，也是公祭会的控诉对象。

这之后，全乡各村才展开划阶级成分，也就是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工作。划成分先划贫农、中农、富农，最后划地主。办法是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全村贫农、中农一天就划完，划富农虽有面对面的揭发斗争，但不激烈，因它是孤立对象。地主阶级是打击对象，没有一个不下跪、不挨打、不被捆的。其实未划成分前，谁是地主，已是小菜拌豆腐——清二白。那为什么又要划？就是为了发动群众，开展面对面斗争，以证明土地改革是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第一个被划的地主纽范，五十多岁了，眼睛不怎样好，村里人叫他范瞎子。他本人是个勤巴苦干的老农民，人厚实，话不多，小他十几岁的老婆范么婶是个妖精。那女人嘴巴碎，脸蛋俊，胖胖的一对大奶子，喜欢和年轻人眉来眼去，不知为什么全成了范瞎子的罪恶？斗争会开了一整天，还是过不了关，一个姓彭的帮过他的长工，不依不饶总说他罪恶未交待清楚。大冬天扒光他的衣服，抬来两架风粮食的风车对着吹。吹得范瞎子打罗索，一身鸡疙瘩，仍不放过，又押着他去村边河里抓鱼虾。说抓上一斤，才能将功补过。老天爷，大冬天怎么能抓上？不久范瞎子患了大病，高烧不退，一命呜呼！到土改建政时，范么婶带着家财正式嫁给了彭单身，日子过的热活。

另外三户地主也吃了不少苦，一个打残腿，一个打断肘，住在九里堤上那个何寡母何之媛地主婆，斗争时，问她愿打还是愿罚？她吓得直磕头，连声说：愿罚，愿罚。罚多少？讲去讲来，定为五千元（旧币，相当于新币五万元）。因她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临解放去了台湾，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何琳琳，其夫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49年秋去了香港；小女儿何娟娟，在成都近郊一个城镇小学教书。故大家深信不疑，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我把情况向团部作了汇报，受到张区委的肯定：认为此办法很好，应该推广。

可是，到了赔退时却兑不了现，气得我火冒三丈。问她，为什么要认？她说怕挨打。但群众一致说，说她家藏有金银，装穷。我很耐心细致，向她讲政策，动员她赔退。她赌咒发誓说，家里没有金银，如匿藏愿枪毙。我软硬兼施，就是没有。事情闹成胶着状态，进不是，退不是，搞得脸上没点光彩，不知该怎么办？

农会一个姓姜的武装班长，神秘兮兮地向我反映说：何之媛最爱她么女儿何娟娟，只要把她抓起来，何之媛疼女儿，定会交出匿藏的金银。这武装班长是个兵痞，除了讨好我外，还可以对何娟娟动手动脚。我年轻幼稚，不暗世事，认为是个好主意，立刻写张条子，盖上村农会大章，叫两个武装当夜把何娟娟押了回来。

何娟娟不足二十五岁，高中文化，白白净净，秀丽似花，知书识礼。先初，我耐心向她交待政策，动员她站稳革命立场，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她表态，一定按我指未办事。可一说到赔退，一口咬定家里没有金银，没法赔。还说，愿打欠条，用她教书的工资偿还。一次、两次、三次，次次如此，气得我咬牙，骂她顽固不化，存心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纵如此，她还是说赔不出。怎么办？我便把她交给武装队处理。

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自幼没吃过苦，天生丽质，弱不经风怎给得住一批如狼似虎，没有文化，没有教养，所谓贫下中农武装队，掀去推来，受尽凌辱。这些人粗鲁无比，你拧一把，他抓一下，快把美人胎的她扯成八块。最后，那个姜班长使出更坏的主意，叫她光脚光腿跪在炭花碴上。天呀，那白嫩嫩的腿，细生生的肉，压在炭渣上，其疼痛可想而知。不足一分钟，她疼得叫爹叫妈，其凄惨声真不忍闻。突然，她披头散发，哭着，叫着，跑进我的办公室，抱着我双腿哭喊：“黄工作队，饶命呀！黄组长，救命呀！……”

在这个骨节眼上，是考验革命者立场的时候，也是我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时候。房门前站着一大群农民武装，几十双眼睛死死盯着我，那个姜班长还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的举动。我该怎么办？在前

途与立场面前，我只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飞起一腿，向她当心踢去。何娟娟啊哟一声惨叫，仰面长伸伸地躺在地上。我把嘴上烟头扔去，手一挥，恶狠狠地吩咐：“拉出去，狠狠地斗！”

寒冷的夜，凄凉的风，痛苦的叫声不时传入我的耳际，我久久地站着，心里不断在问：我这样做对吗？我是不是太过了一点？但我终究没有去制止武装们的暴行。后来，团部通报表扬我，说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唉，伟大的革命，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已经将我这只羊羔灌饱狼奶，当然只有狼性了。在追讨地主赔退上，我没有获得全胜，但在追缴地主浮财上却有了意外的收获。这也是姜斑长立的功！

他为了挣表现，取悦于工作组，通过东打探，西打听，得知另一户住在村里姓于的地主，城里放有不少衣被。这户地主是烈士于渊先生的遗孀。于渊是民盟地下负责人，临解放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成都西门十二桥。于太太为了表示进步，拥护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自愿把放在城里的东西交给农民弟兄。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我们不相信于太太，认为没有交完存放的衣被，竟然开会斗争她。气得她伤心地在会上哭了起来，说：“你们太不讲理了，我放在城里东西不交出，未别你们敢去搜么？我既然主动交出，还留什么？要相信人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从不相信人。我自知理亏，仍把斗争会开下去。

收到的东西放了几大间屋，在分田前夕全部如数分给全村贫下中农。分到的人笑得嘴都合不拢来，直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土改团万岁！因为，他们未花任何一点力气，仅因朝代变更，天地易位，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有房、有地的有产阶级，是多划算的事情！，闹啊跳啊高兴死了。但没有想到五年后，毛泽东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手段，把他们分到的田地全部收回，变成雷打不动的“集体财产”。现在没有公社了，田地全在政府手中，盘剥远远超过封建地主阶级，翻了什么身呢？

分完财产、房屋、衣物、田地，保管室的木柜中还剩下几包没放来的通江银耳，这东西不好分。生产委员陈，不知怎样处理？问到阮主席，阮主席说，谁要给谁。陈说，这是好东西，大补品，他们拿去糟踏了怪可惜。阮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干脆大家逗分子买点糖，趁值夜煮来吃算了。

过去听说过银耳，知是补品，但未吃过，看也未看过，现在要煮来吃，不知该怎么弄？管它的，拣来的娃娃当脚踢。陈在傅家橱房里将铁锅洗净，把几大包白黄白黄的银耳倒在锅里，渗水加火煮熬。没煮到半个时辰，银耳膨胀到一满锅，大家笑着，盛到碗里，可不怎么好吃，硬硬地硌口。阮主席道：地主想个他妈卵福，这东西还没有回锅肉好吃。

后才听讲，银耳只能放一小点，用文火炖，至少炖上三两个小时。我们这些土包子，把几斤银耳煮一大锅，当成煮猪食，怎么会好吃？饮食是文化，享受是品味，不知净钱的人既不心疼钱，更不会去使用钱，自然不懂得怎么吃银耳，正如毛泽东不懂民主宪政一样。

2/14/2008

“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鲁顺民

一、乡关

我是兴县人，我们那个村叫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是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业，这一点也不夸张。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牛友兰先生。一高在县城里。这两所高小学校是开明绅士刘少白和牛友兰出资兴办起来的。二高经常保持有二百多学生，学生大部分是本县子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陕西神木和府谷，都住校学习。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刘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 38 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 5 名，国民师范有 3 名，其他就读于进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 20 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牛友兰先生代为交纳学费，日常开支也由他一手包下来。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很多。

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

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向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160多名在外干部，集了1万多元，那时候的1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4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13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住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1400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刘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刘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刘两家还是姻亲，

刘家老大刘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刘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刘亚雄，二女儿刘竞雄，侄女刘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刘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刘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他对母亲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筵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刘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

惜，在 1940 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 2000 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二、刘象坤之死

1947 年 4、5 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 17 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后来听说跟“四人帮”跑了，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宏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 7、8 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 8 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刘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刘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

刘少白很疼爱刘象坤这个弟弟，刘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刘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刘象坤到边区政府找刘少白，趁刘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真的就闹不清了，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就怎么来。刘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被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刘武雄就回来了。

刘武雄 1932 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中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刘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刘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刘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 1980 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

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三、向刘少白说理斗争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

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刘少白的儿子刘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

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刘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

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

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

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刘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算什么。但是，刘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

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家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个跳上台来和刘少白说理。

他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

刘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

任奴儿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还敢狡辩！

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派给刘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

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蹶。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

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刘少白再也没受制。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刘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刘义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井泉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刘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刘少白交上十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十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19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刘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给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四、“村盖子”刘玉明

土改运动和整风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1952年我到县委办工作的时候，发现县里科局以上的干部们土改时候没有挨过打的很少。

村支书叫刘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碓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刘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刘象坤那样在尸首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

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刘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刘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刘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花油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把心脏掏了出来，用布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刘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刘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花油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花油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刘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刘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刘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的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刘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刘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山西人民出版社

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刘玉明的老婆分给他时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 90 多岁了。

老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本来是 1949 年就可以入的，他说咱们拣个好日子吧，结果就推到 1950 年，我一直把入党的时间当作参加工作时间，档案上也这么填，结果到最后弄了个退休，其实我 1948 年就在村里当教员了，许多学生现在都按离休待遇，可我还不是，所以，我不是老干部。

刘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我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五、果实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

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作相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学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恹惶，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恹惶，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公纯的闺女。

任公纯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公纯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辞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宪军，刘宪军1948年的时候就是兴县专区的专员，做过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局的局长，回到山西后担任过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统战部副部长。

三女儿名叫任有莲，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她，她说行。

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

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分老实，念书笨一点。任有莲就是不同意，

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这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任有莲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有莲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 8 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那位同学也年轻气盛，也别住了一股子劲，就是不同意离，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有莲，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有莲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非离不行。

我就劝她说：你们俩都是通情理的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你们是不是见个面好好把这一层说开，人家也是个开通人，只要说开了不会不同意的。

结果她还真的去了一趟东北，两个人一说，人家那男人也非常理解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同意离婚了。他们是 1955 年离的婚，从分配到离婚，整整用了 8 年时间。后来，任有莲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邯郸市。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那位同学也成家立业，在东北过得挺好。

【附一】

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

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略）

（《晋绥日报》1947 年 9 月 2 日头版）

【附二】

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宏森

工作团六月间来到黑峪口，中间经过两个月的抢种工作，八月初才开始了土地改革。一开始，在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工作路线和一些同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均走了弯路，存在着问题。

不了解市镇群众的特点

当时工作团同志，费了很大劲，作每户调查，考察成份，从三代算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土地改革工作未正面进行，只一般的提了提。而情况的了解反而越来越复杂，说是真正正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认为占一大半的小摊贩（此处摊贩，多无抵垫，当日刨闹当日吃）、水手、脚行、吹鼓手（该村有三家鼓坊）和一些皮木铁匠等手艺人，他们中有的也捎种一点土地，这些人不好发动。一些同志特别对其中某些比较油腔滑调，人面前要强些，或是到处倒贩跑打的人怀疑。结果造成群众心理上的疑团：咱有剥削啊，“一个钱买的，不肯一个钱卖”，这怎么办呢？工作圈子狭小得只在几个比较纯正的贫苦农民身上打圈圈，他们自然感到没有力量。要他们诉地主的苦时，他们向黄河诉苦，说河路不通，水推走了地，靠“河桶子”吃饭吃不成；诉苦今春调剂土地不公道；诉一些坏干部欺人；这些，确也是些苦，但真正的苦是以大地主恶霸刘象坤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全村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则没人诉或者诉得很少。

在“太复杂”、“正派农民不多”的概念下，就自上而下的组织了那少数群众，对后湾（该村分三个地段：前街、后湾、后崖，各有六七十户不等）的贫雇农小组，起先由四个人组成，再由他们吸收扩大，但是，在讨论中很难通得过，一个月左右，仅仅增加了三

个人。这个贫雇农小组实在是脱离群众的。

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

工作团重新检查和研究了情况：黑峪口是市镇地方，黄河渡口，有它的许多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但不是那么“太复杂”，“基本群众少”，“不好发动”。遂确定暂时不提贫雇农小组，放手发动群众，从无地缺地户着手，团结多数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形成骨干，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进行组织。

从最底层算起，水手、脚夫、吹鼓手、铁匠、小摊贩等，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他们有土地要求，有斗争恶霸地主的的要求；其中一些作风上有毛病，油腔滑调些，或好为强的人，是长期的教育改造问题。这时，向群众宣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解释了什么是剥削的问题，使一些没有直接剥削关系的群众，了解了自己是受着地主的剥削，打破他们的疑虑。大会小会个别教育，宣传土改政策，工作开始跳出了小圈子，群众情绪振奋起来。

接着，以地段发动无地缺地的贫苦群众，选出土地改革代表，条件是由大家提出大家通过的。

一共选出廿四个代表（内女的六个），除两个是旧日的干部外，其余多是从来没有在村政上出过面的人。他们为全村群众拥护。以他们为首，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向地主斗争。

集中火力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的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所以人们口口说：“快不要鬼抬翻了，凭咱黑峪口这些人能搬倒人家？”“那还不是蚂蚁

搬大树，费死劲也不行。”有的竟说：“官官相为，马头相连，谁还不让人家几分？”经再三的说明解释，群众才扭转来相信工作团这一次是真正来为大家办事，是一定听群众的意见的。

接着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分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高塬头村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在斗刘的会场上，因为事情的牵连，其他一些地主又被群众扣起）。

斗争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群众觉悟提高，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表现积极主动。

一条重要经验诉苦教育

从土地改革开始到斗倒刘逆这一时期工作，重要的经验之一，即是充分发动诉苦，通过每个人的苦事，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这一点，在本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说，有的是做的较差的，群众急于扣起地主，因而未经过充分的诉苦教育。黑峪口是注意了诉苦教育，但开始只着重一般的内容，如世界是谁创造的，地主的土地财产哪里来的等等。没有放手引导每个人诉说自己的事情。因而好几天中诉来诉去就是那几句话，群众认识还不深，情绪不是激愤的。后来发展到接触了具体人的具体苦事：陷害人命，霸占财产，杀人放火，吃租放债，打人骂人……每个人诉说自己亲身经历的苦事，群众情绪大大提高，这样大家不仅认识了某个地主的罪恶，而且逐渐提高到认识了整个地主阶级的罪恶

《土地改革法》的天折

何之光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胡乔木在序言中大加赞扬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4页，关于土改有这样一句话：“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这一句话掩盖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刘少奇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政务院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当时，全国除台湾西藏外都已解放，各级新政权均已建立，党

的威信空前高涨，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全国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情志高昂的大好局面。农村中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征粮等一系列斗争，“杀、关、管”了一大批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反革命分子等。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尽管成分不纯，也已普遍建立，11月开始的大规模镇反也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应该说，地主阶级已遭受沉重打击，狼狈不堪了。

前段土改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完成的。其基本做法如下：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即展开政治攻势，首先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说明来意，宣传土改，稳定民心。然后分别召集农会会员、民兵、妇女、青年和暂不冠名的贫雇农、中农及富农、地主先后开会，有针对性地宣讲土改政策、约法几章。有的村还将《土改法》写成了大字报张贴。与此同时，工作队员个个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纪律）。经过扎根、诉苦、串连、诉苦会等，将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选出觉悟较高、办事公道、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改造原农会，然后在农会和工作队领导下，有计划地对有劣迹有民愤或隐瞒土地、转移粮食等的不法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说理斗争，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确有必要时，由人民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斗争会上会下都禁止打人。在斗争间隙，继续深入发动，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农和妇女人农会。对一般守法地主，只要交出应交的地契房契等，承认过去剥削农民的罪错，便不开他们的斗争会，以利于分化瓦解地主阶级和土改工作的进展。

由于贯彻执行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地主分子陷入农民的汪洋大海，极其孤立和惶恐。在这种有声有势、合理合法的斗争形势下，即使是顽固地主也不能不看到，只有下决心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

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从而也可看到，土地是回农民老家，而不是哪一个“恩赐”的。（可是后来却大肆宣传“饮水思源”，说成是党和毛主席的恩赐，农民要感恩戴德云云，个人崇拜便在农村迅速泛滥起来。）

这样的土地改革，对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可以说，这是党领导土地革命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当然，四个区各乡各村的工作参差不齐，或多或少存在缺点和错误。但总体来看，成绩是主要的，是不应该否定的。

下面是“反对和平土改”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首先，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 60 个重点乡减少为 46 个。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 1952 年 4 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人生产），延期

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 13 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这表明，《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

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

上述这些暴行，哪有一点像 20 世纪后半叶一个文明国家执政党所领导的作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恐怖、草菅人命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场人为的灾难！而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暴行也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文革中发生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等地对地富反坏右逐家逐户地疯狂大屠杀，也是实例。

当年被抛弃的《土改法》，现在可能无人记得，无人知晓了。为了使人们了解其基本精神，特抄举主要几条如下：

《土改法》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这里的“其他财产”，就是指浮财和底财。《刘少奇报告》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收和分配地主这些财产，就要引起地主对这些财产的隐藏分散和农民对于这些财产的追求。这就容易引起混乱现象，并引起很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这样就不如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见《刘少

奇选集》下卷 73 页)

当年我曾听到汇报说，确实有个别地主拿着《土改法》来找干部争辩讲理，说这是毛主席正式公布施行的国家法律呀！但立即遭到拒绝，并被扣上“以《土改法》顽抗土改”的罪名。令人啼笑皆非，心情沉重！但谁也不敢依法纠正。

《土改法》第三十一条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院判决执行。

“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就是指地主、富农及其他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国民嘛，划定阶级成分这样一件关系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大事，当事人理应亲自参加，并经一定的法律程序决定。但是，即使在四个区土改中，也只有贫雇农和中农是采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三榜定案”方法，地主富农参加评定和申辩、申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人家讲的有理有据，不是可以避免错划成分吗？

《土改法》第三十三条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的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这里规定，即使是恶霸分子和罪犯都要由县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处分。《刘少奇报告》说：“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这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地主在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改造之后，是可以成为新人的。”（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34 页）这

在前段土改中基本上做到了，并且公开宣传了地主改变成分的条件。

但是，毛泽东于 1951 年 2 月 18 日起草的党内通报关于土改的第七点说：“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见《毛选》五卷 35 页）一个“严禁”，一个“劝告”，两者相距多远！而且此时正是乱捕乱打乱杀的高潮，能“劝告”得了吗？又有谁敢于去“劝告”而不怕落个“包庇地主”或“立场不稳”的罪名？

关于地主成分的改变，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务院决定》丙部分 11 条规定：

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成分或其他成分。>> 不合于上述条件，则不得改变。

这里规范了地主的改造，使其有人生的奔头，对国家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对其家属与子孙后代，都是有好处的；《刘少奇报告》第三部分专讲“保存富农经济”，但后来都不予实行，反而把富农与地主同样看待，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固定为永久敌人，永不改变成分。1957 年反右后加上右派，成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作为不断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也低人一等，备受歧视。而后再整出“右倾分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层出不穷，都被打人另册，实行专政。他们的人格和尊严都被剥夺，便都不是人了！是什么呢？“牛鬼蛇神”！而且特别讲究“出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升学就业等处处都受限制，以致血统遗传，祸延子孙。

《土改法》第三十四条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

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土改法》是由党政“二把手”刘少奇主持起草，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后经执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查讨论和修改，然后交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再由毛泽东于1950年6月30日下令颁布施行。这是经过许多人深思熟虑后制定的，是严肃的、郑重其事的。

但是，“反对和平土改”部署了相反的一套，下面做检讨都来不及，谁敢自由批评及弹劾呢？农民及其代表能批评谁？弹劾谁？应受法律制裁的又是谁？

一部庄严的具有进步意义，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法律，连同其民主法治思想和将阶级斗争纳入法治轨道的尝试，在摇篮里就被扼杀了。这是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意毁法的严重事件，也是获取“无法无天”权力的一个突破。“和尚打伞”的角色在1950年就登上舞台了。

当年参加土改的大体上是三类人，有一定文化的年轻新干部包括地下党员；农民积极分子包括农村贫苦知识分子；区委委员以上的南下干部。他们接受了暴力土改的阶级斗争“教育”与“锻炼”，其中参加过1946—1947年北方土改的南下干部更是第二次了。尽管接受程度不同，但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那些出身、成分好，“根子正”，文化低却适合干部政策的人，刻意受到提拔，逐步成为基层、中层乃至高级领导干部，暴力土改为极左路线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左”倾干部队伍。在后来的“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等运动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包括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来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极左路线畅行无阻。

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暴力土改的结果适得其反，抑制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耽误了生产季节，死了那么多人（其中不乏有用的人才），糟

踢了那么多东西，是其一。其二，由于它的野蛮残暴，在普通农民心中埋下深深的恐惧，土改后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嘀咕：“富了没有好下场！”有些报刊当时曾开展农民积极分子“消极退坡”思想的讨论，湖南的李四喜思想和北方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当时讨论的典型。

暴力斗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不得人心。

1953年全国土改刚完成，同年冬开始，便相继实行粮棉油猪等农副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从此发端，不几年就固定为中国社会独特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至今仍在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到1956年，农民手里的土地所有权被他们极不情愿的“合作化”彻底化掉了。接着而来的是“大跃进”和“公社化”，无一不是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倒退性灾难，而且愈到后来破坏愈大，灾难愈重。回首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到，1950年反对和平土改，自毁国家法律，是在反民主法治、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了严重的一步。这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

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

野夫

—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弟。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竭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涸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 1994 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

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 500 米下的绝壁间泱泱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 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 100 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辈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权，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

长莫及的荒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四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 1000 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生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 8 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辮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

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 60 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 200 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 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 1946 年将我 18 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磐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难，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

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么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 1948 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 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

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斑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 1951 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共产党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

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镇压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垦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

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

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十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

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 1949 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 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 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

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一大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 1951 年的 4 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

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 20 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镇压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

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 12.9 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 1947 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 1050 人，自杀 863 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 63 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

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他穷国传播，衍生出 20 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

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 1921 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 1937 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 1946 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

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 50 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 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

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保护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386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

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憾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

【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

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彳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整理者注】

右派诗人流沙河【缺】

迷信职业者龙金涛【缺】

错划地主之子张三民【缺】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韩丁，1948年）【略】

《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翻身运动素描》（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49年7月）【略】

【全书完】